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曾卓散文集

 **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笛 声

柯罗连科的中篇小说《盲音乐家》里面，有这样一段情节：五岁的盲眼孩子彼得鲁思为他家里的马夫约西姆的笛声迷住了。每天晚上临睡前，他都摸到吹笛人那里去，在马棚里消磨一两个钟头，安静地倾听着柔和的笛声。他还幼小，但对音乐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的生理缺陷加深了这种敏感。他凭着纯洁的心感受到了笛声中某种质朴的、真诚的东西，虽然未能理解，却被感动了。在马棚里，在那个看来粗俗的马夫身边，倾听着笛声，成为他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了。甚至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他还出神地回忆着那些曲调。做母亲的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产生了嫉妒。她在求学时期学过音乐，她的钢琴演奏曾经受到人们的赞扬。

于是她去购买了一架钢琴。她要把迷恋笛声的心吸引到钢琴上来，把儿子从粗鲁的马夫身边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一个黄昏，她带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在儿子和马夫面前演奏了自己最拿手的曲子。她纤细的手指轻快灵巧，她弹奏的旋律也比较丰富。然而，意外的是，她看到儿子苍白的脸上流露出迷惘的神情，而马夫约西姆同情地望了望孩子，然后对钢琴投了轻蔑的一瞥，大步走出去了。

这次失败使母亲流泪：痛苦的眼泪和羞愧的眼泪。她，一个贵妇人，曾听过“上等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怎么会被一个马夫凭一支粗俗的木笛击败了呢？她因而憎恨那个“可恶的奴才”。晚上，当孩子又摸到马棚去的时候，她站在窗前，带着嫉恨的心情倾听着飘送过来的笛声，想从中挑出毛病。但是，逐渐地，那“粗俗的吱喳声”却引起了她的兴趣，她不自觉地沉浸到了那悲怆的曲调中。她不得不承认，由于疼爱儿子才和这个“村夫”在一个竞技场上站在平等的地位较量，而胜利者竟是这个村夫。

原因在哪里呢？

她自己解答了这个问题：因为那笛声里面有一种“特别真挚的感情”，有着一种“天然率直的、纯洁的、非矫揉造作的诗意”，那是乐谱上学不到的。而她自己所有的仅仅只是技巧。

可能有人认为这段情节只是表达了一个平凡的道理。这样说当然也可以。但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是表达了一个美学的奥秘。问题在于，一般人都知道的平凡的道理，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理解那含意的。平凡的道理往往包含着，或者说，能够生发出丰富的内容。在艺术领域里，我们往往为一些表面的技巧，为一些虚张声势、装腔作势的姿态，为一些空洞的叫喊、言不由衷的言词所蒙蔽，所欺骗，而渐渐麻痹了我们的艺术感受力。那个失明的孩子，由于他有着纯朴的心，却能够直感到艺术的真伪。虽然怀着对母亲的爱，他却舍弃了母亲用高度的技巧（仅仅是技巧）所弹奏的钢琴，奔向了那真正能打动他、感染他，也就是使他得到真正艺术享受的、马夫吹奏的有着特别真挚感情和纯洁诗意的笛声。

这个看来平凡的道理，柯罗连科是通过一种尖锐的对比提出来的，因而有着迫人深思的力量。不过，他是这样解释“诗意”的：“诗意的秘密就是由逝去的‘过往’和‘永远存在’、永远向人类心灵倾诉的大自然（大自然就是‘过往’的证人）两者之间的微妙联系”。这说得有点儿缥缈。我们

不妨说，诗意产生于对生活、对大自然（那也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从宽广的角度去看的话）的热爱。连苦难的倾诉，深沉的忧郁，事实上也是出于对生活的爱，是对生活的爱的另一种表现。

一个歌唱家不仅是用他的嗓子，而且也是用他的灵魂歌唱的。

在一切艺术领域里也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画家用色彩，雕塑家用大理石，作家用笔，而同时也都用他们的灵魂。所以鲁迅先生说：“创作总根于爱。”

所以托尔斯泰说：“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是——作者的心灵。”

晚年的屠格涅夫有一次叹息着说：“我现在已经是什么也不能写了。以前每当我构思写作的时候，总是由于爱的狂热而激动得发抖，现在这种情形已经没有了，我已经衰老，既不能爱，也不能写作了。”——这是他的悲哀。由于缺乏激情，自动停下笔来，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道德。谢德林就更加直接地说过：“我发誓：当我的心不再颤抖的时候，我就停下笔来，即使我穷得要死。”

一个看来粗鲁的马夫坐在马棚里，吹奏着他自己手制的木笛。在他的吹奏中，倾注着他的痛苦和忧愁，他的期待与渴望。他的笛声里震荡着草原的气息，风的呼啸，白桦树的低语……悲怆的笛声与夜色融合在一起，又散发到草原上去。一个失明的孩子坐在一边聆听，他的稚弱、纯洁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引起了他对生活的激情，对他还陌生的生活的向往。而在临近的一座高楼里，一个少妇倚站在窗口，也感动地倾听着笛声，思索着艺术的奥秘。

我多么希望，在我的窗口也能听到那样动人的笛声，有着特别真挚的情感、有着纯洁诗意的笛声…… 1974年

永远的春天

最近借到了巴金同志在三十年代翻译的、匈牙利作家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这是我念初中时所喜爱的一本小书。这次重读时，我好几次有了眼泪，而且也正是当年感动过我的那几个章节。这真是有一点费解的，四十多年了，难道我的感情和欣赏力还停留在当年的水平上吗？作者在序言中说，这个“关于温和的悒郁的遇合的故事”，是他的“编织幻梦的心儿的含泪的微笑”。是的，这是含泪的微笑，但不是果戈理似的辛辣，也不是契诃夫似的沉重，它温柔而凄凉，带着梦幻的光影。作者写这本小书时已是中年了，他说：“秋天（烦忧的生活）夺去了我面颊的玫瑰色。”这是一朵美丽的、凄艳的小花，开在秋天的心境上。

主角是两个“拾得的孩子”：亚当，十八岁的中学生，有一个悲惨的童年，现在在一个忠心的老保姆的照料下，过着贫寒的生活；另一个少女夏娃，比他小两岁，是被两个流浪人收养，在卖艺的帐棚中长大的，他们钟爱她，唤她“小太阳”。当这个小小的江湖班子到一个小镇上演出时，这两个“拾得的孩子”偶然地相遇而且相爱了。这个江湖班子只在小镇上停留了两天，

就又奔向另一个市集。这两个在巨大热情中的初恋者不得不含泪分开了。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这里的爱情是写得如此纯洁和美丽，以致使我们不得不深深同情这两个“拾得的孩子”，为他们的分离难过。同学之间的友爱是写得如此纯朴、动人，而又带着只有中学生才会有的那种特殊的风格，使我们不得不会心地微笑着，而又深受感动。那个老艺人和那个丑角是可爱的，穷困、颠沛的生涯没有摧毁他们善良的心。那个教员巴南约席也是可爱的，他看来严肃却是慈祥，而且富有人情味，他谅解了亚当：亚当因为与夏娃会见而上学迟到，却大胆地用“因了春天的原故”作为解释，虽然那是十月十日。老教员严厉的脸上闪过了一个看不见的微笑，春天的温暖也掠过了他苍老的心。

作者深深地同情这一对小情人。然而，他在生活中经历过许多痛苦，也亲见过许多不幸，他知道他们是不得不分离的。他通过那个少女的口说过，她幼年时在一家百货商店里看到过一个又好看又会说话的小玩偶，非常喜爱。当她好不容易凑了一笔钱，兴高采烈地去购买时，却看见一个有钱的小姑娘将它抱走了。店员拿出了另一个肿脸的玩偶来哄骗她，深深伤害了她幼小的纯洁的心。以后，她逐渐发觉，有许多次，当她怀抱着美丽的希望时，生活掷来的却不过是一个肿脸的玩偶。在那样的社会中，对于那些贫困的人们，严酷的现实总是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梦想，即使那是小小的、卑微的梦想。作者看清了这一点。如果他从这一点上深入追究下去，他会得到应该得到的结论的。然而，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他却走向了宿命论。他借那个老艺人的口，发出了一些虚无、悲观的论调，损伤了这本美丽的小书。

但作者毕竟有一颗温柔、爱美、向善的心，他用哀伤的调子说出了一个美丽然而凄凉的小故事。有一个友人在读了这本小书后，在底页上写着：“这是一本感人的真挚的小书。它使人懂得爱，懂得青春的权利……”另一个友人又加了两句：“是的，或许这样说更好些，它使人珍惜和尊重爱，珍惜和尊重青春的权利……”这都说得很好。每一个人都将有、有着或有过青春，每一个人的青春都应该是幸福和美丽的。对于那两个“拾得的孩子”，作者为他们被损伤了的青春的权利叹息，同时也抱着祝福的心情。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凄风苦雨的夜间，祝福过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这本小书的作者在风雨飘摇的黑暗的社会中，祝福那些贫困的、纯真的少男少女。引伸一步，这里要求的不仅是珍惜和尊重爱，珍惜和尊重青春的权利，而且要求珍惜和尊重人的权利。我们惋惜作者只不过发出无可奈何的低沉的叹息，但我们也珍爱作者的善良的祝福的心情。特别是，作者在生命的秋天还能讲述这样一个虽然悲凉然而美丽的故事，说明他心里还怀着春天的温暖，还有着对春天的渴望。那个教员巴南约席安慰因恋人的离去而痛苦的亚当说：“抬起头来！春天还会来的……还有许多美丽的春天。”这是缥缈的希望，生活会掷来一个又一个肿脸的玩偶来哄骗那些不幸的人们吧。但这也是真实的希望。它所以真实，不仅因为没有希望人就不可能生活，而且总可以看到真正的出路和真正的春天的，只要“抬起头来”！

作者怀着真挚的深情讲述着，感动我们的不仅是美丽而凄凉的故事，而且也因为他的这种真挚的深情。他感动过少年时候的我，也使我现在还深受感动，虽然我也早已到了生命的秋天。可以责备我的进步太小，但我却为自己还能保持与少年时候相通的心情而喜悦，即使说那是过分的温情、软弱也罢。是的，现实的斗争是如此激烈，我面对过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

也见到了剑的寒光和火的烈焰。但健壮的心不一定就不能有一点纯真的柔情。不仅真实的憎恨和真实的追求必须要以真实的爱为基础，而且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真正的强者也应该能够柔和地爱的。我不满于自己的不够坚强，但却不必因为自己还多少保留着少年时期纯真的感情而羞愧。

在三十多年前，我在自己排演的一个话剧的说明书中写着：“青春伴随着我们整个的生命，有一段时日，我们占有它；其余的时日，充满了对它的回忆。”这是说得太低沉了。其实，不仅在回忆中，青春应该永远与我们同在，不管面对的是萧瑟的秋日还是凛寒的冬季，只要你心中保持着春的温暖和春的希望，只要你——

“抬起头来！” 1975年

偶然的机会找到了一本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旧杂志，那上面有

一篇题名《胜利者》的短

篇小说，我曾读过，深受感动，这次又重读了一遍，也还是心情激荡，而且引起了一些联想。

一个关于溜冰运动员的故事，一场扣人心弦的斗争。

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斯特列什涅夫，溜冰冠军，他的一万公尺记录保持了六年还没有被刷新。现在他已经三十八岁。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巅峰，今后就会走下坡路了。他原已决定今年退休。但冬天来临时，他又动摇了，一个运动员不会甘心退出运动场的。他努力练习，想报名参加比赛，但最后他终于明确地认识到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想，自己葬送自己是毫无意思的，我还是进教练学校，从另一个方面为运动服务吧。

另一个溜冰运动员库尔却托夫，几年以前还只是一个身材又瘦又高的孩子，是一个忠实的热烈得有些过分的溜冰迷，一个斯特列什涅夫的崇拜者。现在他已成为刷新斯特列什涅夫记录的最有希望的健将了。

但这个冬季他在一次一万公尺决赛中的成绩并不理想。虽然他有意打破记录，在场的全体观众也都热切地希望他能这样，他的成绩却使大家失望，离开记录还有一段距离。

问题不在于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有一个缺点：要是后面没有人钉得紧，他就没有劲。他是太年轻了。现在他需要一个坚强的敌手。

坚强的敌手是有的，就是斯特列什涅夫。这位记录保持者也在观看比赛。像在场的许多有经验的观众一样，他了解库尔却托夫没有打破记录的原因。他知道，如果他和库尔却托夫一道跑，就有可能激发这个青年的全部潜在力量。而这个冬季，还有一次万公尺比赛将要举行。于是，他不自觉地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参不参加这次比赛呢？

如果参加，他就要失去记录保持者的荣誉，失去保持不败的冠军头衔。他一定会败在这个青年——他过去的崇拜者的手里，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不是要用自己的失败去帮助别人赢得胜利呢？是不是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别人打破自己所保持的记录呢？

他可以不这样。他原已决定退出运动场，不是么？

他自问并不是一个胜利迷。他也理解记录不是运动员的私产——它属于国家，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不应该把渺小的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但是要做出一个决定还是太难了。

他自觉不自觉地找了一些不参加比赛的理由（人们只要想原谅自己，总会找到一些理由的）。但内心的斗争没有停止，因为他自己也知道，那些理由的作用不过是用来掩盖自己内心的一种卑鄙的感情。最后，他终于决定参加比赛。

斯特列什涅夫毫不怀疑观众都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不平常。但是他想，恐怕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他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来参加比赛，而且他是输定了的。第九圈跑了一半，他就向前猛冲，他的“敌手”紧跟在他后面，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用了最大的决心和力量坚持着。在他的带动下，那年轻人心中被对尖锐斗争的热望鼓舞着，发挥了他的潜在的力量，在最后几十公尺的猛冲中赶过了斯特列什涅夫。

报告员用响亮的声音宣布：“运动员斯特列什涅夫以前创造的记录，被库尔却托夫以缩短整整三秒又十分之八秒的时间打破了。”掌声像山崩地裂般响了起来。斯特列什涅夫感到有着说不出的悲哀，同时又非常高兴。他也很有兴趣地知道，这些年来他第一次重新达到了自己的记录速度。

意外的是，他发现人们对他的欢迎和欢呼甚至超过了对胜利者。一个教练以沙哑的声音对他说：“这样的失败等于许多次的胜利。”

这是一场艰辛的斗争，是运动场上的，也是内心中的。在前面我用了“扣人心弦”这样的字眼，这并不过分。作者从正面和侧面，直接和暗示，刻划了斯特列什涅夫内心的犹豫、矛盾、苦恼。我感同身受地紧紧跟着他，我了解他的心情，一如我自己正在受着考验。当他终于决定参加比赛，我是这样兴奋。当他在比赛中途艰难地支撑着使出全部力量时，我肉体也感到紧张。一直到最后，他被击败了，我也感到内心的空虚和悲哀。而当人们对他的失败——他的真正的胜利欢呼时，我有了眼泪。斯特列什涅夫原来想不参加比赛的最大理由是自己青春的力量和身体已一同衰老。但是，他记起了在战争时期进攻一个阵地的情况，三次冲锋都在惨重的损失中失败了，连长要他们进行第四次进攻。一个弟兄说：“实在没有力气了，指挥员同志！”连长回答：“瞎说，你只知道自己的力气，但是除了它，你身上还有一点儿别的东西哩！”那阵地终于被占领了，如同斯特列什涅夫在这“一点儿别的东西”的帮助下终于战胜了他自己。我懂得了这“一点儿别的东西”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对集体的爱；而且，也是对作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无愧于大写的“人”的爱。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来冷静地面对自己，不要害怕深入自己的内心；我们是不是有时也遇到和斯特列什涅夫类似的情况，在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之间犹豫踌躇？我们是不是有时也企图在一些漂亮的言词下来掩盖自己的私心？

我们是不是有时找寻一些理由来推卸自己应尽的责任？

更进一步，可以问一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因为害怕受到损伤，有时对于明知不合理的事情缄默无语？我们是不是有时违背自己的良心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们是不是有时会对一个无辜的人扔出石头，以表明自己的“清白”？……我可以列举许多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

中经常可以遇到许多这样的问题。这些也都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对我们的大大小小的考验。

可怕的是，我们往往不能认识自己内心中那些不洁的东西，而心安理得地将它保存了起来，甚至让它发展了起来。

可怕的是，我们有时虽然能够认识到那些东西是不洁的，却用一些自欺欺人的辩解将它掩盖起来。

可怕的是，我们认识到那些东西是不洁的，也想将它清除，却没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

因为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往往在个人的利害得失中犹豫不决，常常是想着，下一次再改吧。而一次妥协就可能导引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无数次，以至到最后完全丧失了斗志。

我们其实应该知道，真理、理想、正义……这些都不是空洞的字眼。对真理的追求，对理想的渴望，对正义的执着……都不应该仅仅是口头上的漂亮话。而可悲的是，我发觉，我们有些人甚至连口头上也不屑于说这些了。他们自认为是从许多痛苦中得到了教训，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心中渐渐熄灭了曾经照亮他们的火焰，不再能听到那呼唤他们前进的声音。

他们用尽一切方法保卫自己，想使自己活得好一些，却没有想到，他们因而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我常常含泪仰望那些踏着蒺藜前进的强者，那些奉献出自己孩子的母亲，那些在风雨中仍紧紧握着自己爱人的手的妻子，那些敢于安抚被诬为“叛逆者”的尸体痛哭的吊客，那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徒，那些含笑献身的烈士……而我自己，我承认，有时却在一点私念下低下头来，有时考虑到个人的安危，家庭的幸福，而在真理面前背过脸去……高尔基说过，即使要战胜自己的一个微小的缺点，也需要作最大的努力。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微小的缺点，而是隐藏在灵魂深处的一些污秽的东西，那是历史的、旧社会的影响，那是现实生活的复杂、曲折的反映，因而更需要巨大的决心和艰苦的努力。

人应该达到时代所要求的高度，即使我们离那高度还很远，也应该一步一步地攀登。而道路不是平坦的，每跨出一步都需要努力。但只要你有这样的决心，你就能够有力量跨出这一步。如果说，一次的妥协能够导引第二次的妥协，那么，一次的胜利也可以导引第二次的胜利的。你的同志、朋友，你的亲人都可以帮助你，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你自己。

斯特列什涅夫在万公尺比赛中失败了，但全场观众都向他欢呼，邀请他和新纪录的创造者一同绕场一周，走一个胜利者的光荣圈。他开始还有些羞羞答答地不好意思。但他想，也许他确实是有权利走这胜利者的一圈的。今天他不是取得了所有胜利中最艰难的一次胜利：对自己本身的胜利了么？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肉体的胜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灵魂中自私自利这些卑鄙感情的胜利。

“作为一个溜冰运动员，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胜利者的道路，但作为一个人，这也是他新的、光辉的道路的开端。”而我们每一个人也是都能找到这样的开端的。问题在于你的决心。1975年

战士·诗人·哲人

——读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

有一本书，在我处境艰难、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时候，曾经使我得到安慰和鼓舞，而且给我以很大的艺术享受。——这其实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严格地说，它甚至不是文艺作品。我所指的是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

这是一束从敌人的监狱中寄给友人的信。不是偷偷地传送出来的，而是必须经过敌人检查的信。因而，它不能够谈一些可能被敌人认为是违碍的事情和问题，只能写一些平淡的、零碎的感想和小事。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一束信札还是闪着耀眼的光芒；即使谈的是小事和片感，还是反映出了作者的人格的光辉，如同一滴海水也还是会反映阳光一样。罗莎·卢森堡（1871—1919），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的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威廉·皮克、梅林、蔡特金的战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坚决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的政策，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因而多次被捕入狱。这一束信是一九一六年七月——一九一八年十月，她在狱中写给李卜克内西夫人的。

她在信中谈读书的感想，谈一些往事，谈一些生活中的印象，也谈小鸟，谈动物，谈花草，谈自然的景色。当她自由的时候，她忙于革命工作，不大可能有闲情谈到这些，更不大可能将这些写下来。正像许多革命者一样，只有在监狱中，她才有较多的空闲，又被限制着不能谈别的事；而她写信的对象又是她的挚友，她才会这样随便地漫谈。这样，我们就窥见了作为一个战士的她的心灵的另一面。这对我们是珍贵的，使我们对她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她在我们心中是更亲切了。这对我们是珍贵的，也因为，在读着这些短信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的人格和心灵所感动。我常常翻阅这本小书，每一次我都沉浸于其中，引起了心的颤动。这对我们是珍贵的，也因为，这些信札是写得如此朴素、真挚、美丽，好多地方是真正的诗。

卢森堡在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就参与了革命斗争，以至受到敌人的追捕。她躲藏在—辆牛车的稻草堆中，从祖国（波兰）流亡了出来。那以后，她一直坚持斗争，一直到悲壮地牺牲。她写过不少政论性的著作，就是在狱中，她还偷偷写过一些论文和传单。她还对一般人认为枯燥沉闷的政治经济学有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有专著（梅林的《马克思传》中关于《资本论》的那一章也是她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位战士，而在我们读了这些短信以后，才知道她的心灵是这样的丰富，感情是这样的细腻。

她说，在她的斗室内，“通过千丝万缕直接而微妙的细丝和外界千百种大大小小的动物联系起来”，“内心和生物自然界息息相关”。她能懂得鸟兽的鸣叫声中各种最细致的差别和感情，她的心会因鸟儿的鸣啭而颤抖。她满怀怜悯地将被—群蚂蚁围攻的受伤的小虫解救出来。她对—只半死的蝴蝶低语。她为了有些鸟类竟然默默无声地灭绝下去而悲痛，甚至哭泣起来。她的丰富的同情心特别表现在对—群水牛的态度上。那些水牛产自罗马尼亚的草原，是战利品，拖着沉重的货车到监狱里来，受到赶车士兵的毒打。她写着她站在—匹淌血的水牛面前的心情：

那牲口望着我，我的眼泪不觉簌簌地落下来——这是它的眼泪啊，就是一个人为了他最亲爱的兄弟也不会比我更无能为力地目睹这种默默地受难更为痛心了。那罗马尼亚自由而肥美的绿色草原遗落到多么遥远不可及的地方去了！那里阳光普照，微风轻拂，多么和这里不同啊！那里鸟儿清脆地鸣啭，牧人富有旋律的呼啸声也和这里多么不同啊！可是在这里——这个陌生的恐怖的城市，这阴郁的厩舍，这些搀杂着烂稻草的、令人作呕的腐朽的草料，这些陌生的、可怕的人们，以及这殴打，这从新的创伤涔涔流出的血滴……

啊，我的可怜的水牛啊，我的可怜的、亲爱的兄弟，我们两个都是那样无力、疲惫地站在这里，在痛苦、无力和怀抱着热望这几点上我们是相同的。

这是被敌人称之为“嗜血的卢森堡”写的。我们可以不理睬敌人的这种污蔑，但是不是我们有的同志也会认为这是“过分温情”呢？

她是那样热爱大自然，她常常用“这是多么美啊”来赞叹一棵大的黄杨，一簇小花，一个黄昏。仅仅一朵玫瑰色的云彩就能够使她心旷神怡。

她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生的乐趣，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生活的美，甚至在单独监禁的狱中也是如此。在一个寂静无声的漆黑的夜里，她在囚房中静静地躺着，身子像是被冬日的黑暗、烦闷和不自由的黑布层层缠裹住。但她的心却由于一种无从捉摸的、奇怪的内心喜悦而怦怦跳动着，就像是在辉煌的日光下走过一片绚烂的草原一样。狱卒沉重、迟缓的步伐在潮湿的沙砾中发出的吱吱声，对于她也像是在唱一支短小悦耳的生活的歌。在黑暗里，她向生活微笑，仿佛她已得知一个魔术的秘密，这秘密能制裁一切邪恶和令人沮丧的谎言，并能把这一切化为纯然的光明和幸福。

凡是受过单独监禁的人就知道那是多么痛苦。恩格斯说，那是往往会把人逼疯的。我也有过一点这样的经验。在孤独的煎熬中，我常想到一些先辈们，从他们的榜样中吸取力量。

其中两位妇女，一位是俄罗斯的薇娜·妃格念尔，我读过她的《狱中二十年》，她的从容和镇定帮助我镇定下来。但我更多地却是想到卢森堡，想到她对待生活和对待痛苦所达到的那种哲人的高度。

她不是那种“万物静观皆自得”的遁世者，也不是那种“留连光景惜朱颜”的玩世者。

她对生活的美的感受，她对大自然的爱，对动物、鸟类的爱，是根源于她对生活的爱。而她能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把握住生活的美妙和奇趣，能够生活在陶醉里，能够“披着一件绣满灿烂的繁星的外衣通过人生”，这件外衣保护她不受一切细屑繁琐的杂事和一切烦恼的侵扰，则是由于她对将来、对真理的信念。——热烈地有所爱，因而强烈地有所憎，同情一切受难者，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这一切溶化在她的内心中，溶化在她的生活中，成了她的本能，像呼吸一样地自然。她不能有别样的选择，不能有别样的生活。如果让她站在斗争的一旁，将比把她关在监狱中更使她痛苦。她知道她为什么而斗争和受难，她知道她为什么必须斗争和受难，因而，她说：“不管一切如何，你仍然要平静和愉快。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也就必须这样对待生活，要勇敢、无畏、含着笑容地——不管一切如何。”与斗争融合为一体，与信念融合为一体，伟大的热情创造了伟大的人。因而，她可以说：“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跟我同在。”

有人说过：对于真实含义上的战士，就是真实含义上的诗人也应该为

之低头的。我想说，在真实的含义上，战士、诗人、哲人原是相通的。真正的战士也就是诗人——即使他一生中没写过一行诗，然而他的一生就是美丽的诗；也就是哲人——正是由于对生活的明澈的认识，才能使他英勇地斗争，从容地受难，而在必要时，又壮烈地献身的，如同卢森堡。

是的，卢森堡有时也会感到很悲痛，有时也会感到疲惫无力。但这不正说明她是一个真正的人么？作为一个人，她有着人的感情。但也正因为如此，就更能显出她能超越于这一切之上的坚强了。

是的，卢森堡也有过错误，甚至不止一次犯过错误。但作为一个人，她怎么可能没有错误呢？问题在于，她的错误是认识和理解的原因，而不是由于私心。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工人阶级奋起推翻德皇威廉后，卢森堡获得了自由，重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而在第二年的一月，她就被残酷地杀害了。在她生前最后写的那篇政论《秩序统治着柏林》中，她以无比愤怒的心情谴责了替资产阶级绞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叛徒，同时她也宣告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然胜利的信心。她说：“你们的‘秩序’只是建筑在浮冰上的宫殿”，“革命是永存的……革命必将通过失败与胜利，走向自己伟大的目标”，革命“将在你们发抖的音乐齐奏声中宣告：过去我存在，现在我存在，将来我存在！”——这是壮丽的诗。但是，我也为她所写的这些朴素、真挚、珍珠般闪光的短信所感动。血管喷出的是血。列宁曾将卢森堡比作是一只鹰，就在这些短筒里面，我们也看到了鹰的心。这些短筒告知了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做一个真正的战士，做一个真正的人。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像她那样：不论我到哪儿，

只要我活着，

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跟我同在。 1980年

无愧于“人”的人

我最初读到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是在一九四八年的秋天。这是一个人在死狱中的手记。他幸运地从一个事实上是“自己人”的看守那里得到了纸笔，有机会时就偷偷地写几行。他要说的话是那样多，而死神随时可以抓住他，所以他常常耽心自己不能写完。在他写了最后一页不久，就被处决了。

这是名符其实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是激荡着欢乐的书：生命的欢乐，战斗的欢乐。作者自己就正是这样说的：“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纯真而朴实的欢乐情绪是浸润在全书中间。当我们读的时候，不能不满含眼泪——不是由于悲哀，而是真诚的感动，感到自己是在生命的祭坛前受着洗礼，一股圣洁的热流在内心进涌，鼓舞着自己向前奔去。伏契克说：“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让我们来读一读这本书，看我们能不能以同样的爱来回答。

伏契克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法西斯占领后，作为捷共的中央委员，转入地下坚持着斗争。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牺牲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

在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中，他从生被带到死亡的边缘，又渐渐复生，而后重新面向死亡。在这中间，备受苦刑和折磨。

如果他被捕的当时拒捕（当时他身上带有手枪），他就可以仅仅一死，而不致遭受酷刑和折磨。但是，考虑到在场的五位同志（在敌人眼中，他们不是问题那么严重的人物）的安全，他没有这样做。他被捕后，遭受多次的毒打和重刑，眼看必死，连敌人也说，“够他受的了！”同牢的难友为他唱起了挽歌。然而，他又奇迹般地慢慢活了过来。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体质好，也因为他有坚强的生活意志。虽然这“生”，不过是使他又一次经受苦难，面向死亡。

而他原是热爱生活，渴求着日常的自由的生活的。当熬受着苦刑，一步一步逼近死亡的深渊时，在昏迷中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狱外的生活的节奏，想象着狱外的生活的洪流。

当他从弥留中慢慢醒过来时，他说：“我希望再过一过自由的生活，再能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唱，多多地在世上游逛。要知道我现在才刚刚成熟，我曾有过这么多的力量。”而且，正由于是从死亡的边缘回来，他是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美丽和幸福，在最普通的事物和现象上都能发现迷人之处。

他在黑暗的狱中感叹着：“多么想看一次日出呵！”

审讯他的特务在知道酷刑不能使他屈服后，想到多彩的生活可能对他是有力的诱惑，因而把他带到城里，坐在公园中，对他说：“我知道你爱布拉格，你看看它吧，你难道不想回到这儿来吗？”

当然想的。夏天的傍晚，已经有点秋意的布拉格被淡蓝的轻烟笼罩着，像是成熟了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样的醉人，令人想看它，拥抱它，一直到世界的终止日……。然而，回答是：“如果这儿没有你们，它会变得更美丽。”

这种力量：从生到死，死而复活又重新面对死亡，忍受几乎不能忍受的肉体上的折磨，抵抗那种为自己所热爱的生活的诱惑——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呢？

伏契克说：“我清白地活到现在，我愿意至死都做一个清白的人。”

——力量来自人的尊严。

他说：“千百万人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呵！”——力量来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的自豪感。

那个审讯他的特务对他说：“你们输了，你们所有的人都输了。”

“只有我一个人输了。”他回答。

“你还相信共产党会胜利吗？”

“当然相信！”

——力量来自对信仰、对胜利的坚定的信心。

是的，人的尊严，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的自豪感，对信仰和胜利的坚定的信心，这就是他的力量的源泉；这就是他面向死亡而满怀欢乐的原因。

伏契克写到在狱中与他的夫人古丝妲两次的相见。她是他艰难而不安

定的生活中的忠贞的伴侣。地下斗争和经常的离别使他们永远保持着初婚的感情。在伏契克被捕后，她也被捕了。

第一次是在伏契克被捕的当晚。秘密警察领她去对质，要她承认那个人是她的丈夫。面对着已被蹂躏得不成形的人，她连眼神都没有流露出一丝恐惧，断然地说：“不，不认识！”

可以想象，她要以怎样大的毅力，才能承担巨大的痛苦，才能忍住自己的眼泪，才能克制冲向前去的激动。

另一次是秘密警察企图让古丝姐去“影响”伏契克。敌人告诉她，如果伏契克还“执迷不悟，今天晚上把你们俩都枪毙。”

古丝姐用温柔的眼光注视着伏契克，这样回答敌人：“这对于我不是恐吓。这正是我的请求：如果你们把他打死，就请你们把我也打死吧。”

两次相见中的不同的表现，表现的是同样坚贞的爱。而且这不只是一个亲爱的伴侣的形象，也是一个坚定的战士的形象。

伏契克还一个一个地刻画了监狱中其他英雄们的形象。他恳切地希望将来的人们记住他们，希望大家知道：“没有名字的英雄是没有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面貌，自己的幻想和希望。因此，其中任何一个最不著名的人的痛苦，也不比那些历史名人的痛苦更少些。”

这是一段感人至深的话。只有真正关怀人、尊重人、怀着真正同志爱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伏契克就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一个一个地写着他所接触到的难友们，这些人在平时是平平常常、默默无闻的，然而在那最黑暗的炼狱中，他们的生命发出了强烈的光辉。

叛徒也总是有的。譬如米列克，他也是捷共中央委员。伏契克曾以为他不致叛变。然而正是他，被捕后就供出了所有的他知道的同志。对于伏契克，这是比敌人最残酷的毒刑还要沉重的打击，使他感到无比的痛心。值得注意的是，谈到米列克时，他没有责骂，只是指出米列克的信仰和勇敢都同样是浅薄的，经不住几下鞭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指出米列克不理解，懦弱能够损失比生命本身更多的东西。他的语调是平静的，然而这是最大的轻蔑——一个胸怀宽阔的战士对一个叛徒的轻蔑。

那么敌人如何呢？那个平时温顺的玛丽亚被捕的时候，带着几乎惊奇而又不无幽默的语调对那个打她的秘密警察说：“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原来是这样的野兽！”

她形容得很对，这正是一群野兽。他们穿着纳粹制服，制服袖口上 A 字金板在闪光。*欢 侵挥腥说耐庾危 挥腥说内容、人的心灵。

伏契克也一个一个地勾划了他们的形象，描写了他们的残暴、卑劣、贪婪，也描写了他们内心的虚弱和惶惶不安。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仰，随着战争局势的逆转，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狂热和傲气。譬如那个秘密警察珂克拉尔，他在布满尘土的灯罩上写着这样忧郁的话：“一切都成过去了。”甚至想要自杀。而那个绰号“野猪”的斯密唐茨，在听了一个“犯人”讲述了政治形势以后，说：“你是这样想么？……大概是这样的，我们是不会赢的。”他叹息着，从此不再耀武扬威地吼叫，也再不敢随便地殴打犯人了。

这是监狱，看来是沉闷、阴森、恐怖的，然而这这也是一个沸腾着斗争的世界。

那些“犯人”手无寸铁，是任人蹂躏的被迫受害者，而且看来是分散和孤立的，然而却是一个伟大的集体。一种在监狱中显得更突出、更温暖的友

爱将他们联合了起来。当你受刑回来，将受到难友们细心的照料；当你走向刑场，每一个铁窗后面都有人向你招手，呼唤着你的名字，响起壮烈的送行的歌声。在这里每一个英勇的行为都受到赞扬，一闪念的动摇都会受到注意。如果你叛变，将会受到集体的唾弃，而没有比监狱里的唾弃更难忍受的了。

这是远离前沿阵地的壕堑，它被敌人四面包围，但决不投降。

在监狱中，要得到纸笔，往往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的。伏契克没有利用这珍贵的纸笔更多地写自己。然而，通过全书，表达了他对敌人的憎恨，对叛徒的鄙弃，对同志们的热爱，对事业的忠诚，对信仰的坚定：反映了一个伟大战士的灵魂。

他生长在一个很有音乐修养的家庭里，养成了对音乐的爱好。在狱中，当伤势还未复原的时候，他就开始歌唱。他的这一篇报告，也就是一首欢乐的、壮丽的歌。它曾经鼓舞了千百万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当然也能够鼓舞我们。“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呵！”这是他报告的最后一句话。

在那个时代和那样的环境中，他的像警钟一样轰鸣的这句话，含意应该是：必须保持清醒，戒备敌人；必须提高自己，战胜敌人。

而在今天，对于我们，这句话应该有另外的含意。

不能不承认，这些年来，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某一些精神状态是值得注意的：冷漠、怀疑、谨小慎微、玩世不恭、愤世嫉俗……最耽心的是个人的平安，最关心的是家庭的幸福。有一些年岁较大、稍有经验的人，习惯于用流行的语言来应付场面；有些年轻人，不愿膜拜在神前，却连一切神圣的原则都抛弃了。——造成这样一些现象有其社会因素，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对个人的要求来看，未必是应该谅解的。

在今天，就某一意义来说，我们要警惕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身上的那些不清洁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要战胜自己，是一场长期的、艰难的斗争。此外，还存在着别的困难和阻力。前几天，一位经历过风浪的老朋友对我说：“我现在何所求呢？只想尽自己的力量做一点事，说几句真实的话。”沉默了一会，他又加了一句：“有时候，这样也很不容易。”

我理解他的心情，也理解他的话的含意。是的，有时候，即使做一点该做的事，说几句真实的话，也需要英雄的气概的。

但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还有什么可谈呢？

要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要有人的信念和人的品质。

伏契克，这个真实意义上的战士说：“人啊，我是爱你们的！”

作为一个人，我们也应该自爱。

“让火燃着！”

整整两年前，一九七九年的三月，一位年轻的友人送我一本新版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使我很喜悦。我在那场浩劫中丢失了大批书籍，《贝多芬传》也是我有时念及的一本。友人还在书的扉页上题了几句话，谈到了我这二十多年来的遭遇和处境，那最后一句是：“我欣喜地看到他面临

春天了。”我很感激他的好意。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天正是我的生日，他送我这本书，于我乃是最珍贵的礼物。

有时候我们听到一支过去唱过的歌会引起很多回忆。有时看到一本过去读过的书也是这样。我最初读到《贝多芬传》是抗战中期，在重庆，是陈占元的译本。当时自己还那么年轻，生活在我是一首轻快的乐曲，生命之歌在我是大路之歌，虽然实际上是在那样贫困、动荡的情况下面。我不懂得真正的痛苦，真正的苦难，真正的斗争，真正的欢乐，因而也并没有真正读懂这本虽然单薄，分量却很重的小书。然而多少还是体验到了书中那种迫人的激情，那种对于生命的丰满和崇高的追求。我受到了感动。它是我在流浪的生活中珍藏的书籍之一。后来我又得到了傅雷的译本。在生活海洋的波涛和风暴中，在某种心情下，有时就找出来翻读一下，我逐渐体会得更多一些，接受得更多一些。它安慰、鼓舞了我。对于我，它已不是一般的一本读物了。

前几天，接到诗人C的信，其中有一段说：重读了一遍《贝多芬传》，还是像当年初读时那样激动。看看目前某些人的思想状况和生活态度，我感到我们也还是需要贝多芬——约翰·克里斯多夫式的英雄主义精神，我还是将他看作是我的兄长。虽然我们之间远隔时代的鸿沟，对人生的要求也并不完全相同……

于是，我也将《贝多芬传》找出来重读了一遍。掩卷沉思，心潮起伏。我回想了自己的过去，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引起的一些回忆，也是对自己生活道路的回顾；我也想到了自己目前的思想状况和生活态度，感到了心的沉重，这是由于知道应该飞得多高，而羽翼无力；同时想起了罗曼·罗兰在《我所认识的梅森葆》一文中的一句话：我的年轻的兄弟们，让火燃着！……这也是对我的呼唤么？虽然我早已不复年轻了。

《贝多芬传》不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它没有详尽地叙述贝多芬的生平事迹，没有仔细地去分析和评论他的作品。作者在很短的篇幅中，着重地刻画了贝多芬的精神风貌和为人的品格。作者说，这个人“曾经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撑持”他，他是在“苏生与振作之后”，怀着感激、信仰和爱情的心情来写这本书的，“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像罗曼·罗兰其他的许多作品一样，这本传记是以庄严、华彩、激情的文句写成的。对于有要求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支震撼心灵的歌，是一声亲切的呼唤，是一道破窗而入的阳光……是这样一个不幸而坚强的人：在青年时期就开始耳聋了。对于一个以音乐为生命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呢？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避免与人见面，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独自承担着这漫长的酷刑。一直到后来终于隐瞒不住了。他写信给友人说：“……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一切心爱的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我却要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栖留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我们不能不为他的一位朋友所记述的一个场面所感动：有一次，他要求亲自指挥他的歌剧《费德里奥》的最后预奏。由于他的耳聋，结果全局紊乱了。但没有一个人忍心告诉他：“走吧，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但他从人们的脸上的表情和乐队的骚动上，感到出了什么事情。于是他用命令的口吻呼唤在场的他的那位友人，并把谈话手册授给他。朋友在上面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呼唤朋友“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一动不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

脸……谁能想象他此刻的心情和痛苦？谁又能想象他在漫长的酷刑中的心情和痛苦？而就是这个人，写出了那样大量的乐曲，而且往往是欢乐的乐曲——当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虽然那欢乐本身也蒙上苦涩与犷野的性质。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苦斗的成果，是胜利的标志。

是这样一个人“唐突神灵、蔑视天地”的“反抗的化身”，如尚伯纳所说的。有人则形容他是独自生长在无人荒岛上而一旦突然被带到欧洲文明社会来的人。他有所向往、追求，而且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从不顾及当时社会的习俗、秩序。他无所畏惧，不愿苟且，敢说，敢怒，敢哭，敢歌，一切发自内心的内心。他是黑暗中的一道强光，死水中的一股波涛，市侩侏儒中的一个巨人。这是一个很可以说明他的性格的有名的故事：他有一次与歌德一道散步，遇到一群皇族迎面而来。歌德挣脱了贝多芬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贝多芬按了按帽子，像流星似地从人群中大步穿越过去，皇后、太子都向他招呼；而歌德却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是这样一个人怀着爱的渴望，对于爱情抱着神圣观念的人。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地爱着，梦想着幸福，而又不断地经验着希望幻灭的悲哀，承受着痛苦的煎熬。他爱得强烈，所以痛苦深切。他的爱是纯洁的，这我们可以从《月光奏鸣曲》等为他的情人所写的乐曲中感受得到。他的密友兴特勒曾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

是这样一个人倾向于革命的人。他信仰共和的原则，热爱“自由、平等、博爱”。他把这种信念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浸透在他许多的作品中。他曾写了一支交响音乐准备献给拿破仑。而当他听到拿破仑称帝的消息时，就将乐曲撕碎，抛在地上，愤怒地说：“那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

是这样一个人向往着人本身的崇高的人。他说：“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有什么优越的标志。”他写信给他的侄儿说：“……我虽不曾生下你来，但的确抚养过你，而且竭尽所能地培植过你精神的发展，现在我用着有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坎里求你走上善良与正直的唯一的的大路。”

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把创造美丽动听的乐曲作为目的，而是坚持要用音乐表现各式各样的感情。正如尚伯纳所指出的，他区别和超过他的前辈亨德尔、巴哈和他的两位老师海顿、莫扎特之处，在于他那奔腾澎湃的灵魂。而他的灵魂是充满了对人生至善的追求、对苦难的斗争和搏击、对自由和共和的渴望……

是这样一个人，罗曼·罗兰在传记的最后这样概括了他的一生：

什么胜利可和这场胜利相比？波拿巴的哪一场战争，奥斯特利茨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的努力的光荣？曾经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凯旋？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的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

“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罗曼·罗兰将这样一个人的传记放在他立意要写的《名人传》的首位。

他在序言中说，他立意要写《名人传》，是想冲破当时老大的欧罗巴的

重浊腐败、自私自利的气氛。他疾呼：“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他称之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他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

他说：“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他是为了这样的受难者而写他的《名人传》的：“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

他将《名人传》的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他引用了贝多芬自己的话：“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地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而能借以自慰。”

罗曼·罗兰的这篇序言是与《贝多芬传》的本文同样著名的。它记录了罗曼·罗兰的思想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他自己的形象：对人类前途的坚定的信念，对于人的至善的渴求，在探求光明的道路上与困难和苦难战斗的勇气。可以说，很少有作家像罗曼·罗兰将文学事业与人生理想那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文学事业中为他的人生理想坚韧不拔地战斗着。他自己就从贝多芬的人格和音乐中汲取过力量，得到过鼓舞，“唤醒了永久的生命的火花”。

所以，他才能那样充满激情地写出《贝多芬传》。他在那里面寄托了他对人生理想的追求，通过贝多芬的形象，向那些在生活的重压中苦闷、跋扈、挣扎的人们发出了真挚的呼唤，希望他们振奋地抬起头来，坚定地迎着风浪前进……

站在今天的时代的高度，我们是很容易指出罗曼·罗兰和他所推重的贝多芬的弱点的。

但重要的是要看到，在他们的时代的条件下，他们曾对人生怀着怎样坚定的信念，他们曾以怎样真诚的态度去追求人所应该达到的高度，他们在困难和逆境中的大勇者的精神。这对于我们应该是一种激励和鼓舞：如果在那样黑暗的年代，还有人即使是在看不到明确远景的情况下，在孤独中，进行过壮烈的斗争，那么，我们是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更能够意识到集体的力量，对人类的前途怀有更大的信心的。

重读《贝多芬传》，我不能不有一些感慨。在我们周围可以看到，有的青年安于平庸，追求一己的幸福；有的青年缺乏信念，看不到前进的目标；有的青年大喊大叫，否定一切……而有的战斗过来的人，现在却充满了“革命的世故”，在漂亮的言词下掩盖自己的私心；有的人抚摸着自已的创伤，祈求平安和宁静……我自己原来就没有能够飞得多高，现在有时就更感到软弱，迷惘于个人的得失之间。

无数的革命先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那些在人类历史上为争取光明而斗争过来的人，也应该可以看作是我们的兄长的。革命英雄主义不但表现在战场上和刑场上，也应该流贯在日常生活态度中。人生、战斗、理想，都不是空洞的言辞；作一个无愧“人”的人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重要的是，在心中让火燃着，永远燃着！1981年3月

《海的沉默》

写于一九四一年夏天被法西斯德国占领的法国。作者维尔高尔当时正处于地下。

它没有直接写到法西斯的暴行。我们从许多文学、戏剧作品中看到的都是冷酷残暴的德国军官的形象，作为这篇小说主要角色的那个德国军官却是正直、诚恳、热情的。小说也没有反映法国人民地下抵抗的英勇活动，只写了一个老年的绅士和他的年轻的侄女，他们几乎无所作为。但是，这篇小说秘密出版后，在正经受苦难的法国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鼓舞了他们斗争的热情和胜利的信心。在国外也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被认为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

现在，经受了时间河流的冲洗，我们看到，这篇小说还是一颗闪光的珠玉。它描写的生活早已是历史陈迹，但作品却没有失去艺术魅力。

小说是以一位老人自述的口吻写的。

老人和他的侄女共同生活。看来这是一个中层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法国沦陷了，他们的一部分房屋被一个德国军官征用。

平静的生活被破坏了，谁知道这个德国军官将为他们带来怎样的命运呢？

然而，那个德国军官看来是彬彬有礼的。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面对老人和少女的抗拒性的沉默，他露出了严肃的微笑：“对于那些爱祖国的人，我是十分尊敬的。”

这不是虚伪的话。他尽可能不妨碍房主人的生活。他只是在每个晚上找一点什么理由到起坐间来，开始说几句并不需要回答的客套话，然后开始了无尽无休的独白，涉及他心里存在的种种问题——他的祖国、法国、音乐……他谈得很亲切，很热情。他尊重老人和少女的沉默，从不企图从那里得到一种回答，一种赞同，甚至于看他一眼。

从他的这些独白中，我们逐渐了解了。他是生活在一个小城中的专门作曲的音乐家，脱离政治，也不喜欢国内的那些政治人物，然而却相信了元首和那些政治人物的宣传，以为他们占领法国是为了德法两个国家的团结（“那样，太阳就将普照欧洲了”）。他认为法国的精神和“飘渺的带诗意的思想”将教导德国的那些政治人物成为真正伟大而纯洁的人，而德国将把法国的伟大性和自由退还给法国。他希望德国和法国像“夫妇似地联合起来”，而这种结合是双方“自愿”的。由于父亲的影响，他热爱法国，熟悉法国的文化。所以，当他开始走进法国时，看到人们由于懦弱而欢迎德国军队，他感到痛心。不过，他说：“我后来看见它了；而目前呢，”他对严峻地沉默着的老人和少女说，“我很高兴看见它这种严厉的面孔……我很高兴在这里遇见了一位有道德的老人，和一位沉默的小姐。”但他说，必须战胜这种沉默，必须战胜法国的沉默。他相信，“真诚永远能消除阻碍”。

他在不尽的独白中表明了对法国的爱，而促使他作出这样不尽的独白的是还由于另一种爱：对那个美丽的少女的爱。他有许多话事实上是专门说

给她听的。有一个晚上，他讲述了那个美人与兽的童话：一个美人被囚起来了，那个可以任意摆布她的兽每天出现在她的面前，强迫她忍受它那种无情的令人心烦的嘴脸……那个美人是高傲的，有道德的。那个兽笨拙、粗鲁，却有好的心肠和力求上进的灵魂。美人终于逐渐为兽的祈求和爱情所感动。有一天，她向兽伸出了手去，那个兽立刻变成了一位很美很纯洁的骑士……他们的结合决定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他似乎是用这个童话来说明德国和法国的关系，但更主要的却是说明他自己对少女的感情。所以他说：“我尤其爱那个兽，因为我是了解它的痛苦的。”

老人和少女一直对他保持着沉默。后来，他们冰冻的感情渐渐溶解了，德国军官诚恳的善意和热情感动了他们，如同那个童话中的美人逐渐为兽所感动。然而，沉默却保持着。因为，无论如何，他是一个穿着敌人服装的军官——一个兽。来了一个意外的转折。

德国军官到巴黎去了一趟。他久已渴望此行，他是兴高采烈地去的。他返回后，一反常态，避免与老人和少女见面。好几天以后，在一个晚上，他终于来了。情绪沉重愁惨，他是来告别的。他将参加一个正在作战的师团，第二天就要动身到东方（苏德战场）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地狱去”——那里的广漠的平原上，妻子将从德国人的尸体中摄取营养。

是他自愿提出要求的。原因是，到巴黎后，他从那些“政治家”和“战友”那里了解到，法西斯口头上所宣传的一切漂亮言词不过是谎言，他们是要毁灭法国，是要用“微笑和客气手段来腐蚀它，要让它变成一条地下爬着的狗”。他们要毁灭法国文化，要完完全全把火焰灭掉，“欧洲从此再不能受到这个光明的照耀了”。——这个可怜的理想家认清了严酷的现实，他的梦想被粉碎了。原来元首和那些“政治家”们所指示的道路不是向山上的光明高高地上升，而是通向一个愁惨的幽谷，通向一座恶臭、阴森的黑森林。这条道路是他所决不愿意走的，他宁可走那条通向死亡的道路。

这是一个善良灵魂的悲剧。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他的觉醒也就是地的灭亡。——他认识到，在法西斯的统治下，不可能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生，不允许一个正常的人有他的理想和追求。他自愿灭亡，是表现了他因失望而来的最大的悲愤，同时也是对法西斯专制的最强烈的抗议。

然而，这也不正是法西斯专制的悲剧么？一种被正常意义上的人所反抗的统治，一种不能容忍正常意义上的人的统治，它所有的就不过是兽和鬼。因而，就只能是表面强大，实际虚弱，而终于只有通向灭亡。

老人和少女并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战士。他们是普普通通的法国人，是资产阶级文化传统好的一面所教育和熏陶出来的人。他们在不言不语和心照不宣中作出了一个决定：丝毫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哪怕是一点点小节，对那个闯入者保持沉默，而且几乎不看他一眼，就仿佛根本没有他的存在，就仿佛他只是个魔影。

这是在他们所处的地位所能表示的抗拒。这是人的尊严和民族的尊严的维护。这是有意的无视和漠视，因而也就是大的蔑视。鲁迅先生说过：最大的轻蔑就是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他们是手无寸铁的老人和少女，是被征服者，是弱者；敌人是征服者，是强者。然而，他们是人，而敌人是丧失了人性的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是强者，而敌人是弱者。他们像大海般的沉默。海沉默着，而潜流汹涌。海沉默着，但预示着暴风雨和万顷波涛……而作为人，他们的感情也就不可

能是那样单纯的。

当以沉默和蔑视对待那个军官的同时，老人说：“不过在我心里很可能另有一种感情夹杂在这个意志里面，那就是我不能冒犯一个人而自己不感到痛苦，哪怕他是我的仇人。”他有一次对侄女说（在开口以前，他干咳了几声，因为他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把话说出来）：“像这种样子一句话都不肯施舍给他，也许有点不近人情吧。”而有一个落雪的冬夜，老人坐在火光熊熊的壁炉面前，不由自主地为那个德国军官担心，想象着他回来时满身雪花的样子。——这几个细节很能帮助我们理解老人的性格。我们可以赞扬他的善良，也可以指责他的温情。他已习惯于对人的关怀和尊重。这是人的好的品质。不过，他也意识到，那究竟是一个敌国的军官，所以他又因为有这样一种感情而恨自己。所以，当他向侄女说了上面引的话，看到侄女炯炯发光充满愤恨的眼睛时，他的脸红了。

侄女看来在感情上是比老人更坚强的，但在听了那个德国军官许多晚上的独白，逐渐了解了他的性格和心情以后，也不能自己地对他滋长了一种微妙的感情。只是由于那个人是一个德国军官（有着兽的外形），所以她不能也不愿向他伸出手去。她的心灵在自己建筑起来的监狱里产生了骚动和不安。

当告别的那个晚上，听到了德国军官发自内心的凄厉悲痛的告白以后，她第一次（的确是第一次）把她的一双惨淡眼睛的眼光赏给了他。而当他临走，低低地向她说：“永别了”，而且用深切的期待的眼光凝视她时，她的嘴唇终于动了一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开了口，虽然那声音低微得几乎听不见：“永别了！”

那个军官微笑了。因为，他终于听到了他所爱的人的一句话；因为，从这一句简短的悲惨的话中，他感到的是对他过去的谅解和宽恕，是将他看作是人的同情和祝福——是的，在那个美女的眼中，他不再是兽，而是一个纯洁的人了。他微笑着，走上通向死亡的征途。

小说的思想是立足于“人”的观念。它没有直接描写法西斯的暴行，但通过那个被蒙骗的善良的德国军官的觉醒和决心走向死亡，从“人”的意义上否定了法西斯。它没有直接描写法国人民地下抵抗的英勇斗争，但通过老人和少女的抗拒性的沉默，表现了人的不可侮辱，不可征服，体现了民族的尊严。老人和少女逐渐与那个德国军官在感情上接近，是作为人的感情的接近。

小说所描写的生活是早已作为历史陈迹了，但它所表达的特定环境中应该怎样做一个人，怎样维护人的尊严的主题是并没有过时的。这主题的意义一直通向今天，而且将通向不会是太近的将来。

还可以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看。

这篇小说无疑地是为了宣传：它是揭露法西斯德国占领法国初期所采取的那些伪善措施和漂亮言词的。然而，这是通过了和服从了艺术规律的宣传。

这篇小说的德国军官的形象，不是漫画似的脸谱。老人和少女的形象没有被拔高和膨胀。他们都是真实可信的有血有肉的人。

作者满怀激情。他的激情深深隐藏在每一个语句中间。沉默的海面下激荡着潜流，作者的感情凝练成表面的冷静状态。这样，就使小说具有庄严、深隽的风格。

这篇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作为故事来说，它是太简单了。只有三个人物，没有任何热闹的场景。除了军官的独白以外，连对话也只有简单的几句。它着重的是刻画人物的内在感情，人物之间的感情的激荡和冲击。那扣人心弦远远超过了表面的戏剧性，超过了表面的矛盾冲突，而且它是真正感人肺腑的。

我们有一些文艺作品曾经轰动一时，但不久就从读者记忆中消失了。

反映十年浩劫的文艺作品，在开始曾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现在读者对陆续还在出现的这类题材的某些作品，已经表示了冷淡。

这现象值得深思。而《海的沉默》的艺术经验（一切好的作品的艺术经验）是值得借鉴的。1980年12月9日

读着《荒野的呼唤》时，一直沉浸在紧张的心情中，有的

章节真是惊心动魄。读完

后，心情还不能平静，而且一时还不能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仿佛还置身在那冰天雪地的荒野中。

这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早期的使他赢得广泛声誉的作品，也可以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的场景是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时间是十九世纪末。

布克，原是法官米勒珍爱的一条狗，过着舒适的生活。由于在北极圈里发现了黄金，成千上万的人都拥到那里去。这些人们需要健壮的狗作为冰天雪地中的交通工具。这就影响了布克的命运，他被法官的园丁偷偷地卖去。在新的主人手中，他受到了侮辱和虐待，而对付他的愤怒的反抗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棍子的毒打。于是，他知道没有战胜一个拿着棍子的人的可能，懂得了“棍子的法则”。生活开始对他采取了凶恶的面目。他毫不畏缩地去面对他的命运，同时用被唤醒的全部狡猾来对付它。他被打败了，却并没有被驯服。相反地，这是促使他恢复野性的第一步，他的身上原就有着狼的血液。

他被辗转卖到了奔走在北极地的两个信差手中。他很快就学会了拉雪橇，而且，像其他的狗一样，驱下的苦工似乎就是他存在的最高的责任、生活的整个目的和引以为乐的唯一的东西。

他在别方面的发展（或者说退化）也很快。他的肌肉锻炼得像铁。对一切痛苦处之泰然。能吃任何东西：不管是怎样讨厌的和难以消化的。学会了在雪地上做窠。善于嗅风。

他的第一场生死的决斗发生在和另一条狗史笔兹之间。那是一条凶猛的雪橇的带头狗。

史笔兹敏感到了布克是会危及他的领导地位的对手，因而一直敌视他，不断地向他挑衅。而布克也利用各种机会打击他，挑动其他的狗起来造反。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战终于爆发了。那场生死的决斗是在其他的狗屏息的围观中进行的。在惨烈的搏斗中，布克咬死了敌手，自己身上也满是伤痕。从此他就取得了带头狗的位置，而他的确是胜任这一位置的。他是一个胜利的战士和一个出色的领袖。

他们在零下五十度的严寒里几乎没有休息地往返奔驰着，终于累垮了。

布克和他的同伴作为不中用的狗被转卖给了三个年轻的主人（其中一个女的）。这是三个被黄金潮卷入北极圈的新手。他们对黄金的梦想是炽热的，却完全缺乏经验，不会安排生活，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在开始的浪漫热情过去以后，在种种困难面前，他们就互相埋怨，争吵，闹出了一些笑话，终于走向了毁灭——他们和拖着雪橇的狗一起落入结着薄冰的湖中。

布克是这当中唯一的幸存者。在那次走向死亡前，临出发时，出于对灾难的预感（那是他通过一些迹象敏感到的），他伏在地上，无论怎样的毒打也不能使他站起来。站在一边看到这个场面因而愤愤不平的一个美国人，从那三个幼稚无能的主人手中将布克买了下来。那个美国人的名字叫约翰·宋顿，是因病在途中留下来等候同伴的。他也警告过那三个新手：过湖是危险的。这好意的劝阻被嗤之以鼻。宋顿带着布克站在高坡上，一起看到那三个人和那一群狗的灭亡。从此，布克对宋顿怀着敬爱。这爱是如此强烈，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跳向深渊，只要那是宋顿的口令。他在湍急的河流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落水的宋顿。他竭尽全力为宋顿赢得了一次巨额打赌的胜利，那是宋顿一次轻率的大胆的打赌，没有人相信他会胜利的。

而布克的野性也逐渐滋长。在这样的荒野中，在这样严酷的斗争中，他的狼的本性被一点一点地唤醒了起来。他经常听到狼的嚎叫——自由的呼唤，那对于他是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仅仅是由于对宋顿的爱，他才没有向那呼唤奔去。后来，他在一次和鹿的追逐后回到营地时，发觉宋顿为一群土人所杀害。他由于悲痛和愤怒而近于疯狂，勇猛地扑向那一群正在兴高采烈地跳舞的凶手，一个一个地撕咬他们……在这个人的世界里已无可留恋，他终于走进了狼群，和那些野兄弟并肩在雪原上自由地奔驰，口中吼着一只原始的年轻世界的歌，那就是狼群的歌。

描写的是狗，作者对他们的生活、习性是那样熟悉，把他们的性格、内心活动刻画得那样细致入微，真实可信，一如描写人——作者正是以“他”而不是以“它”来称谓这些狗的。

作者在二十岁时也到阿拉斯加淘过金，历尽艰苦，除得了坏血病外，毫无所获。但从文学角度看，他倒是发现了一个丰富的矿藏。他以这方面的生活为题材，写过不少作品（有名的短篇《热爱生命》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熟悉也细致地观察过生活，而同样重要的是他在创作过程中的体验：化身为自己笔下的那些狗，设身处地的想象着、体验着他们的思想感情。而读者则通过作者的体验而体验着这些狗的思想感情。这样，这本小说就不仅是一幅北极淘金的生活风俗画，吸引着读者的兴趣，而且是以布克这条狗的命运吸引着读者的关注，搅动着读者的感情。

在一本回忆录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记述：有一次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一道在田野上散步，走到一匹衰老的老马的面前时，托尔斯泰倾诉着马的经历和心情，这是一次即兴创作，他说得那么真切可信，以致屠格涅夫大为惊奇，似乎托尔斯泰就是马的化身，他吓得跑开了。在《荒野的呼唤》中，杰克·伦敦写狗，也同样达到了真实得令人惊异的高度。

但是，这样描写狗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这里也侧面反映了人的生活。但作者的意图主要是，通过布克的遭遇和命运，显示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严酷，要对付各种各样的挫折、折磨、打击，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斗争，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弱者只能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为了生存和生活，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做一个强者。

杰克·伦敦出生在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里。他过早地肩负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做过童工、报童、水手，曾经在大地上流浪，坐过监狱。他与黑社会的暴徒们打过交道，进行过较量。他看到过最底层人们的悲惨的生涯。这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残酷。他从这个人的世界里看到了兽的世界。而在《荒野的呼唤》中，他描写了兽的世界，事实上却是针对人的世界。通过了布克的遭遇和斗争历程，他歌颂了原始的强力、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歌颂了奔向自由的渴望，歌颂了强者和英雄主义。他自己的斗争经历说明他就是这样的一名强者。但是，这中间也流露了作者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观点，他对强者的歌颂又往往通向了尼采的“超人”哲学。由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感性认识和反抗热情，他是容易接受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使他后来能够写出像《铁蹄》和《马丁·伊登》这样比较深刻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品。但是，他一直没有摆脱尼采超人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而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在文艺创作中也没有能够达到更高的成就——依照他的丰富的生活经历，他的文学才能和创作经验，他理应是能够写出更宏大、更深刻的作品的。

我们可以接受杰克·伦敦在《热爱生命》中对人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求生意志的歌颂，我们也可以接受《荒野的呼唤》中对于奋斗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歌颂。即使是在新的社会中，我们也应该具有那么一种精神的，但它必须被正确地摄取，被容纳和被控制在健康的思想感情中。必须警惕那些消极的东西。在《荒野的呼唤》中，杰克·伦敦可以让强者布克成为一个胜利者，在广漠的雪原中自由地奔驰；但是，他自己虽然也是一个强者，由于那些消极东西的负担，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思想上的坚实的基地，在精神上愈来愈感到苦闷、痛苦，在四十岁的壮年，就自己结束了生命。

对于他，这是一个悲剧。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教训。

在写《荒野的呼唤》的前一年，杰克·伦敦写信给一个女子，其中有一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荒野的呼唤》这本书的：“这样看我吧，一个迷途的客人，一头在你面前飞逝的伤翼的候鸟——一头粗野的横冲直闯的鸟，一头惯于长空大漠而不惯于笼中逸乐的鸟……”

1981年4月29日

《老人与海》 发表于一九五二年，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

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有代表

性的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来说，它未必是最上乘的，但对于了解海明威来说，它是重要的。

这个三万多字的中篇写的是一个古巴老渔民桑提亚哥在海上打鱼的故事。海明威自己说，《老人与海》如果由别的作家来写，篇幅可能要扩大到十几倍以上，他们可能写到渔村居民的生活，老人的身世经历、社会交往和家庭生活等等。他是想用以说明这篇作品的精炼和简洁。海明威的确创造了一种精炼、简洁的文体。但他在《老人与海》中没有写到渔村生活等等，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与他所要表达的主题无关，而并不是由于追求简洁的文体。

他集中写的是老人在海上几个昼夜的经历。关于这场经历，他倒是写得过于详尽了。由于是出之于他这样的艺术大师的笔下，才能够写得不那样沉闷、枯涩。

关于老人的过去，作者只在故事的叙述中简略地提到两笔：他的妻子已经死去了，只留下一张照片挂在他破旧的茅屋里，他有一次看了感到凄凉，就取了下来。他曾经是一个飘洋过海的水手，到过非洲。

当年他肯定是一个健壮的小伙子。现在他老了，又瘦又憔悴。他的两只手，因为老是用绳拉大鱼网的原故，留下了很深的伤痕。引人注意的是他的一双眼睛，像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他是孤独的，关心他、和他来往较多的，只有一个过去和他一道出海打鱼的小男孩。他不关心世事，他看报纸只是想知道垒球比赛的消息。他的生活极其清苦，而并无怨言。

孤独，与世无争，向生活要求得极少。就是这样一个谁也不会注意的普普通通的老渔民。但是，到了海上，就显出了他性格的美好的内核。

他八十四天来没有打到鱼。这对于一个以打鱼为生的人来说是太不幸了。那个和他一道出海捕鱼的小男孩，在第四十天就被家里命令离开他搭上了另一只小船。但老人并没有丧失信心和希望。在第八十五天上，他在黎明前就出发了。他说：“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目。”这只是他的自我安慰。这一次他划向远海，在三处下了鱼钩。

幸运女神终于走向了他：一条比他的船身还要长的大鱼上钩了。

而同时，他也被置于生死的竞技场上。

他无法收拢大鱼。上了钩的大鱼拖着小船不慌不忙地游着。老头儿把钓丝放在脊背上，用手握得紧紧的。他拚命地支撑着身子，抵抗着大鱼给钓丝的拉力，几乎一直保持着紧张状态。一只手抽筋了，一只手勒出了血。骨头累酸了，头脑昏晕。他吃了一点生鱼。当大鱼安静地游着的时候，他弓着腰，用整个身子去撑住钓丝，睡了一会觉。就这样在海上漂流了两天两夜。又花费了极大的气力，才杀死了那大鱼。

这是一场艰苦的搏斗。好几次，老人感到自己支持不下去了。他想起了年轻时的一件往事：在卡萨布兰卡，他跟一个力大无比的黑人码头脚夫进行抵手（掰腕子）比赛。坚持了一天一夜。到了天亮，打赌的人都要求算成和局。就在这个时候，他使出了浑身的力量，逼着黑人的手往下落，落，一直把那只手按到桌面上。从那以后，桑提亚哥断定，只要他愿意，什么人都会被他打败。——现在他老了，身体虚弱，而他以当年同样的意志坚持着。他说：“鱼啊，我到死也要跟你在一块儿。”这已经不仅是求生的斗争，而且是荣誉而斗争，因为他是一个打鱼的，必须战胜鱼。而且，他要让鱼知道什么是一个人能够办得到的，什么是一个人忍受得住的。

同时，这里还有一种奇妙的心情，鱼是他搏斗的对手，他必须战胜它，捉住它，杀死它，否则自己将被拖死。然而，鱼又是他劳动的对象，他依靠它为生，因而对它有一种感情。他欣赏它那无所畏惧、信心十足的风度。人和鱼是这样抗争着而又交融在一起，是敌人又是兄弟。当老人想把鱼拽过来而鱼好像在戏耍他似的慢慢地游开的时候，老人想：“鱼呵，你要把我给弄死啦。话又说回来，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兄弟，我从来没见过一件东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沉着、更崇高了。来，把我给弄死吧。管它谁弄死谁。”

当他费尽心机，精疲力竭地终于把大鱼杀死绑在船边，向回划的时候，又遇到了新的灾难，而且是更可怕的灾难。那条死鱼成了鲨鱼追踪的对象。

开始来的是一条，后来是两条，后来是成群的。为了保卫千辛万苦的收获，已经疲惫不堪的老人又不得不与鲨鱼战斗。开初是用刀子，刀子折断以后，用棍棒，后来，甚至将舵拆下来当武器。但是，鲨鱼还是吃完了他捕获的大鱼。他只带着一条十八尺长的鱼骨架回到了岸边。他终于还是被打败了。

但是，他又是一个胜利者。他，一个衰弱的老人，像一个士兵那样战斗过，他无畏地面对困难、艰辛、死亡。他战胜了疲累、痛苦，最重要的是，战胜了不时冒出的软弱的心情。

当老人回到岸上酣睡时，那个陪伴他打鱼的小孩来到了茅屋，他看见老头那双满是伤痕的手，放声哭了起来。这眼泪不仅仅表示同情，也是由于崇敬。

从茫茫的大海上，从死亡的边缘空手回来的老人在他的破旧的茅屋中酣睡着。他正梦见狮子——说明他还有着对力的追求，对强者的向往小说是对劳动者英雄气概的赞歌。它表明了，劳动者求生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千辛万苦得到的劳动收获也往往会不幸失去。然而，他们勤劳的劳动态度和勇敢的战斗气概是值得赞扬的。

还可以扩大一点来看：人生的道路是艰难、充满坎坷的。不要向困难和厄运屈服。需要的是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搏斗精神。“痛苦在一个男子汉不算一回事”，“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这是一篇小说，但也可以将它看作是一个寓言。海明威在这里唱出了对人类顽强战斗精神的赞歌。而且小说是以乐观的调子结束的。通过那个小男孩将再度伴着老人出海，预示了新的战斗和新的希望。

我冷静地思考过，是不是拔高了作品的主题呢？我以为并不。以上所说是作品的内容所内涵的。我也并不认为作者所歌颂的打不垮的精神，如某评论家所说的，是既空洞又抽象，“实质上也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我认为，无产阶级的战斗者也并不是完全不能从中汲取力量的，只要通过正确的理解和消化。

但是，我们当然也要认识到，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海明威的局限性。他既看不到社会的出路，也看不到群众的力量，他是在一个虚弱的立足点上来歌颂个人斗争的精神的。因而，他歌颂的英雄只能是失败的英雄。《老人与海》的乐观主义只能是广阔的暗空中的一抹微光，而且贯穿全篇的是一种忧郁痛苦的基调。

老人是一个真实的劳动者的形象，或者如某评论者所说的不过是一个有劳动者外表的海明威式的知识分子呢？——我们认为，是一个真实的劳动者的形象，虽然，可能稍有一点理想化。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不肯将他笔下的人物简单地当作是自己的传声筒的。如果桑提亚哥只是化了装的海明威，这篇小说就不会有这样感人的力量。桑提亚哥的思想感情并没有超出他这样一个劳动者的思想感情。他在茫茫的海上与大鱼生死搏斗时，那种将大鱼既看作是敌人又看作是兄弟的心情，应该是可以理解和体会的。在海明威笔下的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有着深厚社会内容的典型，而是可信的、真实的形象。

但老人桑提亚哥身上是有作家海明威的影子的。他的儿子格雷戈里·海明威在一篇回忆录中写着：“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就是海明威本人，或者说是他身上最好的东西。”这话是对的。我们在许多作品的某些人物中都看到了作家自己的影子。只不过，在《老人与海》中，我们感到海明威在思想感

情上与桑提亚哥是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他喜爱他，歌颂他，他真正进入了“角色”，老人在大海中的感受和感情，是他真正体验到的。在某种意义上和从某个角度看，老人是海明威的化身。然而这并不与我们前面所说的老人是一个真实的艺术形象这一点相矛盾。

在一九二六年，海明威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他表达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美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深刻的绝望。他因而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身份受到了注意，而有的人将这部长篇小说看作是“迷惘的一代”的宣言。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进行他的人生探索和社会探索。他参加过西班牙反佛朗哥的斗争。他在作品中暴露过资本主义的黑暗，表现过反法西斯的热情。他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是一个严肃的有正义感的作家。但是，他始终没有能够走出个人主义的圈子，因而，也始终没有摆脱悲观主义的束缚。虽然“迷惘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进入三十年代后就已瓦解，从思想上说，晚年的海明威依然是一个“迷惘者”。从表面看，海明威是一个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大作家，名誉、地位、金钱他都有。他豪放、豁达、慷慨。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海明威，没有看到人类真正的出路。而且，由于在战争中受过几次伤，这损害了他的健康。而且他老了，写作愈来愈困难。他内心是苦闷、悒郁、悲凉的。在茫茫的人海中挣扎、浮沉。《老人与海》中是表现了他灵魂深处的某些本质的东西。他不仅在老人桑提亚哥的身上寄托了他对生活的感受，也企图将老人的英雄气概作为激励自己的榜样。

据他的儿子的回忆，海明威在后期写作起来已不如以前那么轻松自如。“过去是一口喷水井，而现在却不得不用抽水机把水抽出来。……他已不再是诗人……，他变成了一个匠人，埋怨自己的命运，叹息他的打算成了*蓁啊！倍 罄 蠹 坝 倘 纒 舸 闾 谎 *他的天才又回来了，从而孕育出了一部杰作（指《老人与海》），规模虽然不大，却充满了爱、洞察力和真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同意，由于对题材的爱，由于作者与对象无间地融合在一起，是这部小说能取得某种成就和能感动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总的说来，他在写作上是愈来愈感到困难。以致他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那本书我写不完了。我不行了。”“我整天都在这张该死的写字台前……可是我写不出来。一点也写不出来。你晓得，我不行啦。”他的儿子说：“他总是竭力要赢。输，他是受不了的。”他的一位老朋友马尔科姆·考利说：“如果他不能写作，他就不想再活下去了。”一九六一年，他用一颗猎枪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恐怕不能仅仅解释为病的折磨，这应该也是他所赞赏的老人桑提亚哥英雄气概的另一表现方式。但是，我们也可以将那看作是对在茫茫人海中挣扎、苦斗的个人英雄主义者的一声丧钟，他们在个人的力量丧尽以后，就看不到更大的希望了。

珍 珠

从大海中捞取到一颗巨大的珍珠，对于一个采珠人来说，应该是最大

的幸运了。那难道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么？然而，斯坦倍克却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印地安人奇诺，偶然捞到一颗真正的“稀世宝珠”，他和她的一家并没有得到幸福，却引来了种种不幸和灾难，承受着惊惶、悲痛甚至死亡。珍珠是从大海中捞出来的，他宁可将它再扔回大海——也许大海是珍珠最好的藏身之所。他宁愿没有得到过珍珠，回复到原来贫困然而平静的生活中去，然而过去的生活已经破碎了。

这是用诗的调子讲述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渔夫奇诺既年轻又结实，黑红的头发覆在棕色的前额上。他的眼睛热情、凶猛而又明亮。胡子又稀又粗。他的妻子胡安娜，黑眼睛好像一双亮晶晶的小星星，是一个顺从、愉快而又有耐心的女人。然而她有着铁的意志，几乎比她的丈夫还能耐劳和挨饿。再加上一个幼小的婴儿（他们叫他小狗子），就组成了他们的家了。他们住在墨西哥的一个海湾边。生活是贫困的，然而奇诺的心中有着一支温暖的“家庭之歌”——奇诺是印地安人，印地安民族曾经是伟大的作曲者，凡是他们看见、想到、做过或听到的东西都变成了歌曲。

故事是从一个黎明开始的。这是像其他的早晨一样的一个早晨，又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早晨。然而这一天开始就为奇诺夫妇带来了不幸。他们的睡在摇篮中的婴儿被一只蝎子咬了，那是可以致命的。母亲胡安娜用古老的方法进行了抢救：用口去吮吸伤口，好将毒液吸出来。他们还是不能放心，又抱着孩子到城里去求助于一个白人医生，却受到了羞辱，由于拿不出更多的钱而被拒之于门外。

接着，他们似乎交了好运。当他们出海打捞珍珠时，奇诺在水底发现一个非常大的珠母，在那嘴唇似的肌肉里，一道阴森森的闪光，随即贝壳就闭上了。他的心急剧地跳动，慢吞吞地用力把那珠母揪了下来。上到船上后，他心中强烈地震响着“可能有的珍珠之歌”，然而又潜在地颤动着“可能失望之歌”。妻子胡安娜看出了丈夫的激动，也感染到丈夫的激动，屏住了呼吸望着珠母，然后轻轻地说：“剖开它！”

那是一颗曲线完美的巨大的“稀世宝珠”。

而当他们在狂喜的心情中望向婴儿时，发觉那肩头上的红肿正在消散。

奇诺把头向后一仰，号叫了起来。他的眼睛往上翻转，他大喊大叫，身体挺得笔直。

一个新的命运开始了。

在珍珠的耀眼的光芒中，他想到的、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对围聚在他茅舍里的邻居们说：“我们要举行婚礼——在教堂里。”“我们要买新衣服。”接着，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奢望：“一支枪，也许，一支来复枪。”最后，他说：“我儿子要上学……他会有知识，而通过他我们也会拥有知识。我们就会得到自由。”最朴素的要求，也是最高的愿望。他在巨大的幸福前几乎昏眩了，几乎不相信那可能实现。而且，他一辈子也没有一下子说过这么多话，于是，他害怕起来了，正如一个说“我想要”而又没有信心的人那样。

而他没有想到的是，真正值得他害怕的是在另外一方面。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渔村和邻近的城里，都随着“稀世宝珠”的发现在跳动和震颤了。他没有想到的是，各式各样的人都对他发生了兴趣，每个人都跟他的珍珠发生了关系。当他在珍珠的光辉中诉说着自己的梦想时，那“稀世宝珠”

也进入了每个人的梦想。只有一个人妨碍着大家，而那个人就是他——奇诺。他因此变成了每个人的敌人。

他的破旧的茅舍光临了高贵的客人。首先来的是头发花白的神父，他说的好像是一些祝福的话，但在奇诺的耳朵里，邪恶的歌和珍珠的音乐尖声地对唱着。后来的是医生——早晨拒绝为小狗子看病，现在主动地来了，对孩子的健康表现得那么关心，说蝎子螫伤将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于是从皮包里取出一小瓶白色的粉末和一个胶囊让孩子吞下。这些药的作用在于使已经好了的小狗子痉挛，呕吐，以便于他过一小时后再来治好他。看，这条小命是他救活的！

在城里的那些收购珠宝的商人们，虽然有着各自的店铺，事实上都是为同一个大老板经营。他们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期待着奇诺的到来。当那颗“稀世宝珠”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内心在发抖，却以轻蔑的语调议论着，说它“又大又笨，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希奇的玩意儿”，想用低得只能算是抢掠的价格收买它。

而在黑夜，就来了偷盗的人，抢劫的人。在一次搏斗中，奇诺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他的前额破裂了。在另一次搏斗中，他失手杀死了对手。现在他成了一个杀人犯了。

胡安娜首先敏感到了珍珠带给他们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这东西是邪恶的……这颗珍珠就像桩罪恶，它会把我们毁掉的……我们把它扔回到海里去吧！”

但奇诺不愿意。

他其实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种族几百年来是受到那个神父、医生所代表的种族的侵略、掠夺、欺骗……。而且，就在他的同族人中，他也看到了贪婪的眼睛。

他也同意他哥哥说的话：“你反抗的不是那些收买珍珠的人，而是整个制度，整个生活方式。因此，我替你担心。”所以，他自己说：“我害怕所有的人。”

然而，当妻子背着他，在夜半想将珍珠扔回到海里去时，他赶去愤怒地夺回了。

不仅仅因为珍珠是他唯一的机会，他在珍珠的柔和的光辉中看到了希望和幸福，看到了儿子的未来；而且也因为一种郁结的仇恨正在他心里滋长。他感到豺狼的包围，兀鹰的盘旋。他要斗争下去，“我是一个男人”，屈服是可耻的。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那比我的生命还要重大……这颗珍珠已成了我的灵魂，如果我放弃它，我就要失去我的灵魂。”

而且，他的茅屋，那为他们一家遮蔽风雨的破败的茅屋，被人放火烧毁了。他的小船，他们一家赖以生计的古老的小船，被人砸坏了。在矮树丛里还躺着一个死人，那是他杀死的。

他将被认为是杀人犯而受刑。每一条道路都被切断了。

他只有在黑夜中走向了新的途程，和他的忠实的、温顺的、坚强的妻子胡安娜；和他们的亲爱的头生儿小狗子。他们将走向一个大城去出卖珍珠，勿宁说，去寻找他们的命运。

那座大城会是他们的天堂吗，或者，那是另一座炼狱？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并没有到达。通向新的命运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在草原和山丛中小心翼翼地走着，不愿留下一点足印，但追踪的人还是紧随在后面。三个

猎户正像追猎野兽似地追猎他们。

两天以后，在金黄色的迟暮时分，奇诺和胡安娜归来了。他们并排走着。胡安娜把她的披风像个口袋一样扛在肩上，那里面有一小包软绵绵、沉甸甸的东西，那是小狗子的尸体，他被追踪者枪杀了。而奇诺杀死了那三个追踪者。现在他的胳膊上挂着一支来复枪。

在围聚着的人群的紧张、惊奇的眼光中，他们沉着、庄严地走着，像是悲哀的神，又像是复仇的神。他们走过他们的被烧光的茅屋的废墟，连看也没有看它一眼。他们来到海边，站住了。奇诺放下来复枪，用微微发抖的手在衣服里掏摸出珍珠，那丑陋的、灰黯的，像一个毒瘤的珍珠，他听到了珍珠的走了调的、疯狂的音乐。他慢慢地转向胡安娜，把珍珠向她递出去。肩扛着小尸体的胡安娜向他凝视着，柔和地说，“不，你。”

于是奇诺把胳膊往后一甩，使尽力气把珍珠扔了出去。在可爱的绿水的深处，珍珠的音乐越来越低，逐渐消失了。但故事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音乐却还在激荡……曲线完美的、有着柔和的光辉的珍珠是丑陋的么？不，丑陋的是通过珍珠所映照出来的那种压榨、贪婪、欺骗、掠夺……丑陋的是那些人的思想感情。

不是珍珠是邪恶的，而是人是邪恶的，而是社会制度是邪恶的。正是在那样的社会制度下孕育出、滋生着那样的人。

奇诺斗争过，他失败了。他的四周包围着豺狼，他的头上盘旋着兀鹰。无论他个人怎样勇敢，无论他有着怎样的斗争的决心，他是不能不失败的。

杀死了那三个追踪者，他原是可以走向那个大城的。而他却没有去。因为他已失去了他的儿子，那是他的爱，他的希望和未来。他不能用使他牺牲了儿子的珍珠去换取他自己的幸福。而且，他也应当认识到了，珍珠可能为他带来更大的灾祸。他和他的妻子带着儿子的尸体回到了故土。当着众人将珍珠扔回到大海，这样来表示他的深重的悲痛和仇恨。

他曾经说过，放弃了珍珠他就会失去灵魂。现在他自己将珍珠扔进大海中去了，他并没有失去灵魂，相反的，他的灵魂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他的梦想和愿望只有一项实现了：他得到了一支来复枪，那是从追踪者手中抢来的，那是杀死了他的儿子的凶器，现在是在他的手中了。在实际上那没有很大的作用，然而可以将那看作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和启示。

作者在小说的引言中说：“如果这个故事是个寓言，也许各人都会从里面领会他自己的意义，也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读它。”是的，可以将它看作是一个寓言。然而，作者并不是编造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个生活道理。这原是一个流传在印地安人中的故事，作者加以改造和丰富了。人物各有着自己的血肉和性格，生活场景是真实的，文笔生动、细腻，充满了感情和诗意。作者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但又不是飘浮于生活的表面，而是将生活提到了寓言的，或者说，哲学的高度。对照一下我们的某些“主题先行”的作品看看，是不难受到启发的。约翰·斯坦倍克（J·E·Steinbeck，1902—1968）是与海明威、福克纳等齐名的现代美国作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在四十年代就翻译了过来。另外，《相持》、《月亮下落》、《人与鼠》、《前进的客车》、《红马驹》等长短篇小说，也都早已有过译本。不知为什么，近几年来却很少介绍他的作品。其实，我以为，比起海明威、福克纳来，他在我们更可亲的。他在年轻时长期过着流浪生活，从事过多种职业。他常常以劳动人民的生活为题材，表现了他们的善良的品质，

歌颂了他们求生的反抗和斗争。斯坦倍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暴露者和抗议者，对劳动人民有着同情和爱。从《珍珠》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个著名的中篇也可以算是文艺瑰宝中的一颗珍珠。1982年1月

为了介绍斯蒂芬·茨威格的著名的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

让我们从一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开始：为什么有的作品制造了非常紧张的情节，描写了非常激烈的场面，我们读起来却无动于衷，甚至感到读不下去；而有的作品叙述的只是一件小事——譬如我们要介绍的这篇小说中一盘象棋的胜负，却引起了我们这么深切的关注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是并不困难的。主要在于前一类作品没有写出有血有肉的人物，作者只是在那里编造故事情节。如果人物的形象不是真实的生命，如果人物没有成为读者热情地关切的对象（如同关切他的知心友人），那么，无论怎样紧张的情节，怎样激烈的场面，都不可能激发读者的感情，不能引起他的关注的。后一类作品则是塑造出了人物的真实性格，我们对情节如何发展的关心，是出于对人物的遭遇和命运的关心。所以有一些看来是一般无关重要的事，但由于和人物的遭遇和命运联系起来，而取得了重要的意义。

这一道理，我们的作家们的理解是比这里的简略的说明更深刻和更完整的。但理解是一回事，在创作实践上如何体现又是一回事。看看某些电影、戏剧、小说，我们不能不常常想到这一问题。

而在人物的性格塑造，主要是心理刻画上，茨威格的长处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象棋的故事》不能算是他最好的小说，也不能代表他主要思想倾向，而是可以说明他的心理刻画技巧的例子。

那是一次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心和兴趣的棋赛，虽然那不是一场正式的比赛，而只是在轮船航行中旅客间的一次偶然性的活动。

交手的一方，是年轻的世界冠军米尔柯·琴多维奇。这是一个传奇似的人物。在棋桌上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师，曾经击败了许多世界著名的选手。可是当他一从棋桌边站起来，就无可挽救地变成一个怪里怪气、近乎滑稽可笑的角色：行动滞重，沉默寡言，而且，像他的恼怒的对手之一所刻薄地指出的，“在任何领域都惊人地无知”。他原是一个贫困的孤儿。

他的象棋天才是偶然地为收养他的同村的一位神父所发现的，在稍加训练以后，他很快就跻身于世界名手之列了。他从过去的手足失措一变而为冷漠的、往往表现为极其笨拙的目空一切。而且他极其贪婪，依靠棋艺聚积着钱财。

在这次航行中，他却遇到不可轻视的敌手了。而那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旅客，一个默默无名的人物。在昨天他和旁人对局时，由于那个无名人物的指点，他本来一盘必胜的棋被逼成了和局。这不仅是使他少赢了两百五十元美金而已，也损伤了他的自傲，也可能难得地引起了他的好奇。于是他主动提出来要与这个无名人物比赛一次。

这也不能不引起读者的好奇心：这位无名人物是一位怎样的人呢？而且，他说他二十或者二十五年没有摸过棋盘，又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棋艺呢？

我是一向不大习惯于去研究和分析作品的布局的，认为那样往往容易将一篇有生命的作品解剖成了一具僵尸。但对于《象棋的故事》的布局，却想略略说几句话。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的身分叙述的，首先由作品中的“我”为我们介绍了那位世界冠军，他的经历和个性。那个“我”知道了那位传奇般的人物和他同在一个船上后，他热切地想去结识，用尽了各种办法都没有得逞，于是，就想起了猎人屡试不爽的策略：模仿山鸡发情的叫声来引诱山鸡。他和他的妻子在吸烟室里对棋，想以此将象棋大师吸引过来。但首先吸引过来的是一位因钻探石油赚了一笔大钱的名叫麦克柯诺尔的苏格兰采矿工程师。这是一个自以为是、颇为得志的人，即使在最无足轻重的比赛中，也把失败看作是降低自己的身分。他心里充满了特殊的优越感，以致把任何阻力都看成是对自己极不应该是的反抗，几乎就是对自己的侮辱。当他一听说著名的象棋大师在这一艘轮船上，就冒昧去邀约他来下棋，而且接受了每盘赌金二百五十元的约定。这是荒唐的，等于将钱向大海中扔。然而在输了一局后他还不服气，要求下第二局。当他在第二局已陷入绝望时，一个偶然出现的旁观者为他出了主意，使他得以下成和局。

茨威格生动地写出了在对棋时大师的那种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性格。他明显地让对手们感到他对他们的轻视。他随手地下一步棋，然后懒洋洋地躺在安乐椅里翻阅画报。一直到将对方“将死了”，也不抬头看他们一眼。茨威格也生动地写出了那位工程师好强、倔犟、死不认输的性格。他宁可损失大笔金钱也要取得一次胜利，而这又是他绝对无力做到的。几位热心的参与者也都愤愤不平，只想压倒那位大师的傲慢之气，却也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势和气氛下，作者让一个无名者——真正的主角——出场，几句话就表明了他棋艺修养的精深，在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挽回了败局。参与比赛的人和旁观者都无比地激动了，而那位傲慢的大师也知道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他第一次抬起头来，看了看那位无名者，而且主动提出来，愿意第二天与他较量一次。

我只是想指出作者这种善于制造情势和烘托气氛的本领，而无意于推广这种在“节骨眼”上让主角登场以吸引读者注意的创作技巧。事实上，这种技巧在我们不少作品中都已运用了，而且往往运用到了这样的地步：损害了艺术的真实感。而损害了真实感的技巧就不是真正的技巧。所谓技巧，应该是力求表现生活的真实。离开了这一点，那至多也不过是雕虫小技。

茨威格比较欢喜某种戏剧性的情节，但他不是企图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去吸引读者，而是想去表现在一种特殊情势中，人物的心理状态。他说：“我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遭遇。”《象棋的故事》中，关于那位无名者怎样在一种绝无仅有的情况下学得了精湛棋艺的描写，是作品中最精彩的核心。

那原也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故事：他出生于奥地利一家古老的名门望族，二次世界大战前，主持着一家律师事务所，充当法律顾问和管理一些大修道院的财产，还受托管理皇室某些成员的资产。国社党徒早就注意到了他的事务所，在那里安排了密探。在希特勒的军队进入维也纳的当天，他被党卫军逮捕了。他们想从他那里获得皇族资产隐匿的情况。他被安置在一家旅馆的单间里，被完全孤立起来，除了看守，看不见任何人的脸；除了审讯，听不

到任何人的声音。在一次提去审讯的等候中，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挂在墙上的一件雨衣的口袋中偷到了一本小书。他怀着无限的喜悦回到了他的房间里，使他失望的是，那是一本他读不懂的棋谱。他恼怒得几乎想将这本小书扔到窗外，但后来他终于渐渐看懂了书上的那些术语，而且以有格子的被单当作棋盘，用省下来的面包瓢子做成棋子，将小书上的一百五十盘名家棋谱下了一遍又一遍。当他已烂熟这些棋局之后，他就自己和自己下棋。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像想跳过自己的影子一样的不近情理。一种人为的精神分裂终于引导到精神上的崩溃，他变成了癫狂。最后一次的癫狂大发作却拯救了他。他被送进了医院，渐渐恢复了神智，并在医生的帮助下，从法西斯统治下逃了出来。

就是这样一点情节，作者写了将近两万字，只有少数几句对白，主要是心理刻画和内心动作。写到那个人当初被关进那个单间的情景，没有什么事可做，没有什么可听，没有什么可看，他在虚无和孤寂中所感受到的痛苦和压力。写到在开始的审讯中，他的复杂、焦虑的心情。他无法忖度敌人究竟查明了多少情况。敌人真真假假的问题使他实在难以回答。如果承认了敌人还不知道的某件事，他就可能毫无必要地使别人遭殃；而如果否认的事情过多，结果就将害了自己。写到审讯之后，他回到那一片虚无之境以后，如何来回考虑、反复思索，仔细检查向审判官说的口供中的每一句话，这比审讯之苦更加残忍，因为这种脑子里的审讯永无休止。写到他的头脑如何渐渐陷入混乱状态，力量如何渐渐支持不住，几乎将把一切，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东西都说出来，宁愿出卖十二个人，使自己得到片刻的休息。写到在这极端严重的危急关头，在一次被提出去，站在另一个房间候审时，他如何感到这种等待和站立的折磨同时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快乐，因为这个房间与他住的那个房间不一样，他如饥似渴地看着一分日历上的短短的一行字，贪婪地观察着挂在一个衣架上的几件湿漉漉的军大衣，注意到大衣上的每一个皱褶，一连几分钟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一件雨衣上的一颗水珠是否会顺着皱褶流下来。写到他如何发现了有一件雨衣口袋中有一本书，他兴奋、激动、陶醉，“把书偷来！”这念头像闪电似地闪过，而且像烈性毒药似地立即发生作用，他冒着最大的危险终于把书偷到了手，蒙在身上，他胡乱地应付了那一场审讯，将书带回了房中。写到他如何喜悦地想象着那将是一本什么书：一本值得学习的哲学著作吗？一本可以背诵的荷马或歌德的诗集吗？而当他终于打开那本他所看不懂的棋谱时，他是多么失望；写到他如何渐渐看懂了那些术语，用床单当棋盘，用面包瓢当棋子，依照棋谱下棋，这样快乐地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写到当那些棋谱已为他所烂熟，他开始自己将自己当作对手下棋，这样一种双重的思维事实上是以人的意识的完全分裂作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渐渐走向疯狂……这一环扣一环的每一个过程的心理变化，那种复杂、激荡的心情，那种尖锐的思想斗争，是比曲折的情节更吸引人，比单纯的真枪实剑的场面更令人惊心动魄；比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更扣人心弦。——文艺作品是以人为中心，要塑造出人的性格，而只有写出人的内心世界时，才能真正写好人，创造不仅外貌逼真，而且是有血有肉的形象。

在心理刻画上，茨威格是有着值得瞩目的成就的。借用友人绿原的话：“他处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用自己内心的火光来照亮对象精神的奥秘。……这个特征是可以从当时西欧的科学（如心理学）研究成果找到一部

分渊源的。”

然而，我们也感觉到，他有时是过分地注意心理刻画，将心理刻画本身作为了目的。以《象棋的故事》为例，有人将这作为反法西斯的作品。诚然，作品也揭露了法西斯的阴险残暴，如何将一个正常的人折磨成疯狂。但是，我们感到，作者主要的志趣和注意力是放在研究一个特殊环境中一个人的精神变化这一点上，以致冲淡、削弱了应有的对法西斯的激愤了。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是奥地利著名的作家，在近代，是在国外拥有最多读者的少数德语作家之一。他在十几岁时从写诗开始了他的文学道路，当时深受象征派的影响，沉醉在个人幻想的天地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奥匈帝国，也摧毁了他的海市蜃楼。同时由于罗曼·罗兰等人的影响，在文学上转而面向实际，写了不少有名的小说和传记。但他的深受古老文化熏陶的思想感情还没有合上时代的节奏。不像他的师友罗曼·罗兰那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不像他所敬爱的高尔基那样，有明确的追求目标。他困惑地看着这个混乱的世界，不满于资产阶级的腐烂、残酷的生活和那些唯利是图的形形色色市侩，同情那些受迫害的不幸的小人物。他没有以明澈的眼光仰望将来，倒常常在徘徊低吟的心情中留恋一种牧歌似的生活，在自己的艺术天地中去寻求慰藉。他这样的人生态度和心理状况，是经受不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强烈的炮火的震撼的。一九四二年初，当法西斯不可一世，气焰嚣张到顶点时，他和他的妻子一同自杀了。留下一封哀婉低沉、真挚感人的遗书，告白了他的无力。《象棋的故事》是他死后才发表的遗作，写的是法西斯的残酷和暴行，也流露了他的思想感情的低沉。——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除了反映所写的现实内容外，总也会反映出作者的灵魂的。1981年6月鼓浪屿

沉重的时刻

不是生离。不是死别。不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不是在绞刑架的投影前。托马斯·曼的著名短篇《沉重的时刻》所描述的是：德国的伟大诗人和剧作家席勒在创作诗剧《华伦斯坦》的过程中，是以怎样的心情面对他所遇到的障碍——他无法写好一个重要场面。

一个作家，在他的创作过程中，是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的。他可能写不好一个场面，可能掌握不住一个人物的性格，可能找不到必需的细节……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每一个作家都会遇到的。席勒自己在过去创作别的作品时也必然遇到过的。但为什么这一次问题显得这么严重，以致面对那障碍的时刻，成为了他生命中的沉重的时刻呢？

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夜。周围的人们，连他的妻子绿蒂和孩子们，都已经熟睡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扫过小巷的风声和打在窗子上的雨声。席勒正在病中——还是几年来一直折磨着他的伤风。几个星期来，医生严禁他离开屋子。此刻，他倚立在已经熄灭了的冰凉的壁炉前，面对着那无法写下去的作品。他是这样看待它的：“这个负担，这个压迫，这个良心的痛苦，

这个必需喝干的海洋，这个可怕的任务，它是他的骄傲和不幸，他的天堂和地狱。”他是将他的未完成的作品提到了这样的高度。那么，这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创作上的问题了。而是，写这样一部作品，是他发自内心的要求，是他的事业，是他的荣誉，也是时代赋予他的庄严的使命。无论怎样困难，他必需完成它。然而，此刻他感到自己无力跨越和征服那障碍，无法完成它。于是，他焦躁、痛苦、沮丧。

然而，又不仅仅是由于创作中的遇到了一个障碍以致引起了他的焦躁、痛苦、沮丧，实际上，他的内心原就隐伏着一些消极的东西，存在着一些矛盾，一些斗争，此刻不过是在创作中遇到了一个障碍的诱因下爆发了出来。

那么，这就不是创作中的一个障碍问题，而是人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如何去克服那创作中的障碍问题，而是如何提高人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创作中的障碍却为席勒带来了沉重的时刻。

情况往往如此，在焦躁、痛苦、沮丧的心情中，容易用阴暗的眼光看问题，容易把情况估计得更坏，更严重。何况，此刻席勒又是孤独地站在一个严寒的冬夜中，而且正在经受着病的折磨。

对于那未完成的作品，他有着病态的不满足：“结构是假的，语言也是假的，它是一堂枯燥的、呆板的历史讲义，根本不能上演！……好，完了。一次失败。一个没有成功的尝试。破产……”而对于自己，他也强烈地不满。是的，过去他在创作中也遇到过困难，有的作品也是从怀疑、困苦中产生出来的，而最后证明那是杰作。他也曾经贫困，受着病的折磨。但是，他当时年轻。每一次不管他的腰弯得多么低，他的精神是高扬的。而现在呢，虽然他只有三十七岁，但是已经快到尽头了。他失掉了对将来的信心，那是他痛苦中的明星。

因为他已经获得了一点幸福，因为他已经从天不怕地不怕的放纵无羁中转入循规蹈矩，转入小市民的生活，有了工作，有了荣誉，有了妻子，有了孩子，现在他松了口气。完蛋了，失败和失败——给他留下的就是这些。

在阴暗、沮丧的心情中，他尽量将一切往最坏处看，这样来发泄自己的痛苦，从而减轻自己的痛苦。但是，他又为这些可怕的想法所惊骇，不敢停留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中间。于是，他不再发泄他的痛苦，转而面对痛苦，思考痛苦在他生活中的意义，在他工作中的意义。他将痛苦和才能联系起来。才能——它本身不就是痛苦吗？对最伟大的人、最不满足的人来说，他们的才能就是最严峻的鞭策，促使他们去要求更高的完美。现在，他用另一种眼光来看那未完成的稿子了，如果它使他痛苦，那不是应该这样而且几乎是一种好的征兆吗？他将痛苦与理想联系起来。他想，他应该为崇高的东西，忘我地奉献出一切，牺牲自己。这就是他的野心：没有人可以比他更伟大，也没有人为了这崇高的东西忍受更多的痛苦。——正如为了发泄痛苦，他要将自己踩得更低一样，此刻他为了坚定信心而又将自己扬得太高。不过，这样终于帮助他摆脱了低沉、混乱、沮丧的感情，达到了心的宁静。

当他心情沮丧时，他叹息，用两手捂着眼睛，着了魔似地在屋子里走着。或是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两只手交叉起来放在两膝中间，眼睛无精打采地看着地板。而当他的感情昂扬起来时，他那大鼻子的鼻翼张开了，眼睛里射出威胁的光。他的瘦削的腮上升起一阵红晕，一缕火焰从艺术家的自我中心的火中喷发出来。而此刻，他在宁静的心情中走进隔壁的房间，站在床边，用爱抚的眼光看着在熟睡中的绿蒂。他在心里说：“亲爱的，你追随我的渴

望吗？……上帝作证，我非常爱你。我只是有时候找不到我的情感，因为我常常由于痛苦而疲倦，由于同我授予自己的任务斗争而疲倦。为了我的使命，我不能太多想到你，我不能完全因你而幸福。”——这是一个深爱自己的妻子的丈夫的话。而他又对妻子有着歉疚的心情，因为，他不能将自己的感情完全放在她的身上。因为，他有他的使命。而且，他也不能完全因她而幸福，因为，为理想而斗争也是他的幸福，甚至是更大的幸福。那么，这又是一个战士的话。这一段话，表明沉重的时刻已经过去，他终于跃过了一个几乎陷入进去的深渊，又在他生命的道路上跨进了一步。小说通篇都是写的席勒的思想活动，接近于“意识流”（虽然托马斯·曼写这个短篇的时候还没有“意识流”这个名词）。是表现手法上的晦涩呢，还是作者有意想表现席勒的混乱的思想感情？有一些地方很费解，但席勒的主要思想感情的脉络是清楚的。而且，通过思想活动的描写，也刻画出来了席勒的性格。

小说没有写席勒的胜利（他在年轻时就写出了那么多光辉的作品），却写了他的挫折；没有写他的坚强（专制暴政的各种手段都没有能够把他摧垮），却写了他的沮丧；没有写他的激昂慷慨、热情奔放（那是如此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诗和剧作中的），却写了他的内心的纷乱和低沉。事实上，席勒的性格也正是复杂的。在本质上，他是他那个时代为自由而斗争的一个战士。然而，他也跋徨过，迷失过。一如梅林所指出的：“他后来自甘淡泊，也不无一点苦涩的厌世之感。”他的人生道路也是艰难的，经常贫病交困，在政治上受到迫害。但是，无论如何，他终于选择了不幸然而充满荣誉的命运。这篇小说正是通过一件小事，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小说中两次写到，席勒在纷乱的心情中想到了歌德。这是必然的，他创作《华伦斯坦》时，正是他和歌德十年合作的那个时期。他们是战友，相互鼓舞和影响。然而，他们又是敌手，相互以某种妒意的眼光望着对方，也许在席勒更是如此。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是不同的。

在小说中，席勒这样比较了歌德和他自己：“他也许是一个神，而并不是一个英雄。但是做一个神容易，做一个英雄却很难。”这当然代表了小说作者的看法。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在这里分析这一看法。但可以指出，作为艺术家，歌德当然是更有天才更为博大的。但作为一个人，比起一生顺利，而且后来“在一个震撼世界的斗争时代，居然在一个袖珍版的德国小宫廷的小得可怜的铁笼子里怡然自得”（梅林）的歌德来，一生在逆境中苦斗，多次面对“沉重的时刻”的席勒，是更激动我们的心的。

托马斯·曼（1875—1955）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当然融合了自己对创作甘苦的体验，也寄托了他自己与生活搏斗、对理想的追求的激情。小说是为纪念席勒逝世一百周年写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为了对人类的责任勇于与困难苦战的席勒的形象，而且，也是为了鼓舞和激励那些在生活中有着自己的“沉重的时刻”的人们的。

是的，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沉重的时刻”，困难、挫折、障碍，在人生的长途中总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看到远大的目标，要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责任，要克服困难首先要克服自己灰暗、沮丧的心情。一定不要失去对将来的信心和对对自己的信心。

那么，“沉重的时刻”就不会是滑向深渊的斜坡，而将是飞跃一步的跳板。1982年4月

生活的诗

——关于《太阳·老人·少女》一个从远方城市来到西伯利亚写生的女青年画家，看到一位老人面对着落日坐在河边上。这情景使她感动。她要求为这老人画像。老人同意了。第二天的傍晚又继续画着。第三天的傍晚老人没有出现。一去打听，才知道老人已去世了。

苏联作家舒克申的题名为《太阳·老人·少女》这样一篇短短的，而且情节如此平淡的小说，为什么竟如此深深地感动了我呢？小说的最后，当那位女青年画家知道老人已去世后，她靠着篱笆哭了，“她为老爷爷感到难过，也为自己怎么都没能把他画好而难过。不过，她现在对人生和功勋的意义与奥秘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受，因此不知不觉地长大多了。”这篇小说也同样将进一步启发我们对生活的严肃感和对于人生的深思。

老人八十岁了。原来是一个木匠。几个儿子也都是木匠，卫国战争时期，牺牲了四个。

现在还剩下两个儿子，只有一个在身边。他有许多孙子，分散在各个城市里。

他的脸上满是皱纹。他的那一双深褐色的、干枯的手上也满是皱纹。可以看出，他是饱经风霜，劳累了一生。

当他七十岁的时候，完全丧失了视力。他经常在傍晚时，出现在急流湍湍的卡图尼河的岸边，坐在那棵长在水中的盘根错节的老树旁，向将要坠落的又大又红的太阳凝望——是的，凝望，虽然他是一个盲者。

“多好的太阳啊！……它多大啊！……你看那河水，多好看……对面岸边的……”老人对年轻的女画家赞叹着。他虽然看不见，却像看见了一样。他是通过他的记忆感受到这一切的；他是通过对于生活的爱——一个衰弱老人的对生活的爱——感受到这一切的。

当少女问他：“生活很艰难吧？”他惊讶地回答：“什么艰难，我不正告诉你，我们生活得挺好吗？”事实上，在家里，儿子回来时总是疲惫不堪，百事都不顺心的样子。儿媳妇也总是有气。孙子都在城里，家里冷清得很。吃饭时大家话也不愿说（有什么话好说呢？），吃完饭就铺床睡觉。是这样清苦、单调，几乎没有温暖的生活。然而老人的话并不是掩饰或矫情。他已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他对于生活不作更多、更高的要求。

那张画还没有画好，老人就不再出现在河边了。女画家在老地方等着他，两天，三天，四天，都没见来。他不可能来，他已经去世了。

他的一生是那样平凡、简单。他眷恋这生育了他的大地，但却以恬静的心来渐渐走向死亡。而他的死也正像太阳落下去那么自然。

女画家来自远方的城市。她提着写生画箱漫步来到荒凉的卡图尼河边。她看到：将落的太阳，湍湍的急流，坐在一棵长在水中的盘根错节的古树旁的老人……这一画面感动了她。

她还年轻，只有二十五岁。她的心地纯洁、善良，能够从这样一个满头白发、脸上手上都堆满了皱纹、眼睛黯然无光、身穿蓝色印花衬衫的瘦削

的老人身上，发现了她在艺术上应该表现的东西。当老人推辞说：“我如今可不好看”时，她真诚地说：“您很美，老爷爷，真的。”

通过两个傍晚的接触，她对老人了解得更多，因而有了更深切的尊敬和挚爱。出乎她意外的老人的死震撼了她。她哭了。她为自己没有画好老人的像而难过，而且思考着人生，在这思考中成熟了起来。

老人，一生勤苦，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繁衍了后代（其中四个儿子为祖国献出了生命）。是他和无数与他一样平平凡凡的人，创造了世界。他们流了汗，流了泪，也流了血。

他们是真正的大地之子，社会的脊梁。而他们从生活中所得到的极少。他们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共同的名字是：人民。

所以，年轻的女画家从老人简单、平淡的一生中，感受到某种不简单、某种了不起和意义深长的东西。她更深一层地理解到人生和功勋的意义与奥秘，不在于对荣誉和地位的追求，而是勤恳地工作，为大地，为别人，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生命。所以，她迫切地感到“应该工作，工作，工作……”

一个衰弱的老人。一个年轻的少女。老人走向死亡，他像黄昏时的鲜红的太阳那样渐渐沉落于黑暗的幽谷中。而年轻的少女提着她的画箱正走向生活，像清晨的太阳那样泛起火红的霞光。太阳落下又升起，一代人消逝又一代人成长，湍湍的江水奔腾，历史的长河涌向无限……少女从老人的身上得到了启发和启示，这将能够使她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坚定。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有着如女画家那样的认识 and 理解的。女画家就想到过，当她把老人的画像带到城里时，那位有才华的真正的画家，一定会生气地说：“又是皱纹！”

为什么要画这个？西伯利亚气候严酷，那里的人很辛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有什么？……”是的，皱纹，有些人们，即使是那位有才华的真正的画家，却看不到“除此以外”的那个“什么”，隐藏在皱纹下的那个“什么”。然而女画家却为自己没有能够画好老人的画像而难过。这说明她真正具有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素质。她没有能将老人的像画好，这不仅仅是一个技巧问题：她对人生的认识和对生活的体验还不够。我们相信，她从老人身上得到的启发和启示也将使她在艺术上成熟起来。

但是，对这样纯朴、善良、勤劳的人民表示尊敬和挚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怀着痛苦的心情提出一个问题：对人类的发展和创造，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和牺牲的人民，为什么到了今天——一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如此单调、劳累、艰苦呢？他们的胸前可以没有勋章，但是，他们应该有他们的欢乐的歌声，有他们的爱情和鲜花。他们应该真正成为大地的主人，生活的主人。如果我们在一己的安乐中忘记了这一点，可以说是一种罪过；如果我们的一切努力不是朝向这一目标，那就不过是庸人或市侩。

《太阳·老人·少女》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描写的是两个普通的人，情节简单、平淡，篇幅不大，然而内涵厚实。

作者没有付与老人和少女以名字是有其用心的。老人代表着千千万万普通的劳动人民，少女象征着新的一代。作者通过简单的情节对人生的意义进行了探索，而且接触到美的观念和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然而，这里不是简单的图解和枯燥的说教，而是真正的生活的画幅。老人和少女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都有着真实的性格。

作者有时采用了某些象征性的手法：将要坠落的太阳，新升起的太阳。太阳平平常常地升起，平平常常地落下。湍湍的急流。生长在水中的盘根错节的古树。……结合小说的情节，这些都可以使人产生联想。然而这一切是有机地融合在整个生活画幅中，并不是外在地硬塞进去的，这里没有任何牵强，任何矫揉造作。

作者的文笔是简洁而含蓄的。他一句也没有说到老人对生活的爱，然而通过老人经常坐在河岸上看太阳，我们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一句也没有说到老人艰苦的一生，然而通过老人满脸满手的皱纹，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他没有说到老人对死亡的预感，而只是由老人说，他感到浑身酸痛，接着，他望着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安详地，若有所思地望着。作者用短短的几行白描，就使我们感到了老人家中那种冷清、贫困的气氛，而且，儿子和媳妇对老人都并不孝顺、亲热。在和儿子、媳妇同桌吃饭时，八十岁的盲眼老人“挨在桌子边上喝着牛奶，小心翼翼地不让勺子碰到食盘，生怕弄得太响”。这平淡的两句话可以令人一哭。——通篇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作者不出面点明，他只是将生活的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去感受、回味、思考、想象。这些生活场景和细节写得很自然，然而都是精心选择的。

作者在文字表面也不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感情却融贯在全篇。这篇小说有着深厚的诗的素质。这种素质不表现在这里面描写了落日、河流、古树……，而在于作者的感情。

在题材的选择上，这篇小说也为我们又一次提供了例证：生活有着无限丰富的宝藏，只要你是怀着真正的生活的激情，能够感受、理解生活的意义，你就可以淘炼出真金。这一点简单的道理，却往往是那些想用一個编造的情节说明一个人所共知的教条的作者，是那些带着主观的框框去看生活的作者，是那些只想在生活中猎取一些惊心动魄或曲折离奇的故事的作者们所不愿理解的。1981年8月20日广州笕箕窝

历史的沉思

——读《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札记

我读到了苏联作家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的有些删节的摘译（听说有几个全译本，但都还未见出版），和几篇作者的访问记和有关的评论。对于雷巴科夫，我所知甚少，过去只读过他的两部小说：《短剑》和《沉重的黄沙》。仅凭这样一点材料来谈论这部书当然是冒失的，好在我只是想做一点札记，附带地谈一点感想。

共分为三部的这篇小说是60年代开始动手写的。第一部完成后，很受一家杂志主编的赞赏，但作品未能刊登出来。作者并没有气馁，继续写第二部和第三部。在70年代末，一家杂志又登了预告，也受到了障碍未能刊登。一直到1987年才得以全文发表。它本身的命运就象征着时代的变化。它的发表是苏联当前所创导的“公开性”的一个表现。它在苏联文艺界和读者群众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热烈的赞扬声中也夹杂着为数不多的严厉的

批评，这现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小说也受到了国外广泛的关注。

这的确是一部令人心情难以平静的书。

它将我们带回到了遥远的1934年。《星火》杂志在发表这部小说的前言中说：“那是一个复杂的年头，像整个30年代那样复杂。那是有着伟人成就和令人痛心损失的年代，是空前热情和巨大悲剧的年代，是准备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和有许多不必要牺牲的年代。”——是的，那是一个有着巨大矛盾的年代。小说以广阔的视角，反映了1934年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刻画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从普通的大学生到党的最高领袖。其中有一些领域是过去的作品中很少涉及到或根本没有涉及到的。作者没有回避现实中存在的巨大的矛盾，而且以严肃的态度审视和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探寻如何会发展到那种状况，今天又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

阿尔巴特街是莫斯科一条有名的古老的街。小说主要写了居住在这条街上的一群青年学生（他们是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是社会主义的第一批儿女），各自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精神状态，不同的生活经历和道路。

其中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萨沙和沙罗克。

萨沙是一个道德高尚、热情、正直的大学生。他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没有经历过党内复杂斗争。凭着单纯的心和自己所信守的原则，他不窥视领导的眼色，不考虑后果，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曾为无辜受到批评的他们学院的副院长辩护，因而为学院的党委书记（他正是批评者）所不满。后来又因别的两件事，被加以“反党演说组织者”的罪名，受到了开除的处分。他坚决不服，四处上告，才得以恢复学籍。他并未因此接受教训。不久后，又因为说了一句同情副院长的话，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他的话是：“党首先应该清除的是投机钻营者，而不是副院长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因为前者给党带来的危害要比后者的全部错误都要大。”而这位副院长过去又曾经是党内的反对派。萨沙因而被捕了。他自己却也还弄不清那原因。在审讯中，要他承认与一个“反革命组织”有关系。他尽力不牵累任何人，不承认他所没有的罪过，拒绝在为他拟定的自白书上签字。他受到了流放三年的处分。他所蒙受的冤屈和打击，后来在西伯利亚流放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对现实产生了困惑，从而逐渐走向清醒。他并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也并没有失去希望。他依然保持着对党和对祖国的热爱，依然愿为苏维埃而战。他认为错不在苏维埃政权，错的是那些并没有真心实意地使用苏维埃政权的人。他在磨难中是更成熟了。

他的中学时的同学，同住在阿尔巴特街的沙罗克则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品格卑劣、善于玩弄手段的青年。对于萨沙的被捕，他表面关心，实际上缺乏同情。大学毕业后，他混进了保安部，使他得以利用职权，踏着无辜者的血迹染红的阶梯向上爬。同时他也为自私和贪婪所腐蚀，堕入黑暗的深渊。

从生活状况看，沙罗克比萨沙要幸运得多，但作为人看，萨沙是在烈火的锻炼中受到洗礼，而沙罗克则逐渐归于毁灭。

同住在大街上的他们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们，在跨出大学的校门后，也各自在生活的大潮中浮沉。有的贪图享受，在生活上逐步堕落；有的愤世嫉俗而自暴自弃；有的一度迷途，以后仍走上了探求真理的道路……他们大都是了解萨沙，因而同情萨沙的。

萨沙的母亲，一个善良的妇人，丈夫遗弃了她。现在，在一个深夜里，

一群人突然闯进了住宅，抄了家，并将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抓走了。天啊，这是为什么呢？凭母亲的心，她知道儿子是无罪的。她一夜就苍老了许多。她冒着严寒到每一所监狱去打听儿子的消息，每一次都失望。她奔走无门，连她的弟弟，一个重要冶金基地的负责人，也不愿、不敢为她的儿子向有关方面说几句公道话（他反而认为外甥是为他脸上抹了黑），虽然他对外甥的被捕也百思不得其解。他只是劝姐姐忍耐和忍受，给姐姐一点钱以表示关怀。她愤恨弟弟胆小怕事，以冷嘲的口吻拒绝了他的关怀。她并不信仰宗教，但有些夜间，在那间显得空荡荡的屋子里，她祈求神灵使那些将要决定儿子命运的人们心软下来。但神灵并未接受她虔诚的祈求，儿子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了……同情萨沙的上层人物也还是有的。布佳金——萨沙的一个女同学的父亲，是老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曾在流放中与斯大林相处，现在任重工业部的副部长。他也了解萨沙。但他阻止了女儿和同学们上书保安局请愿的行动。他敏感到萨沙的被捕这里面肯定有复杂的原因。他暗地里打了一个电话给保安局的负责人别列金，请他对萨沙给予关照。别列金去听了一次对萨沙的审讯后，也相信萨沙是无罪的，甚至有些喜爱和器重这个正直、勇敢的青年。但他无能为力。他了解的情况更多一些：萨沙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中的一个环节。这个案子将向更远更高的地方延伸，释放萨沙就等于打开其中的一环，这是决不允许的。他虽是国家保安局的负责人，也只好眼看着萨沙受冤和受难。因为，他凭丰富的经验知道，如果他说错一句话，也将遭受灭顶之灾。他能做到的只是在可能范围内暗中保护萨沙，这才使萨沙受到了流放三年的较轻的处理。

小说中以相当大的篇幅刻画了斯大林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他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因为，作为党的领袖，他的权力君临于一切之上，他的影响无处不及，一切都发生在他巨大身影的笼罩中。

苏联30年代的许多巨大的矛盾，可以说是斯大林自身矛盾的反映。在小说中，一方面写到了斯大林为捍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所作出的贡献；没有忽略斯大林作为一个领袖的才能：他有明确的目标，他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他善于调动人民的热情和全部力量去完成他所提出的任务。另一方面，作者也着重地写到了斯大林作为领袖的哲学观点和权力观点。他认为，“为了在最短的时间把一个农民国家变成工业国，需要做出物力和人力的无数牺牲。人民应当做出牺牲。但是，只凭热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必须强迫人民做出牺牲，为此需要有一个使人民感到恐怖的政权，要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持恐怖。阶级斗争不是日趋熄灭的理论给它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他认为，“仅仅以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是软弱的政权……仅仅以恐怖为基础的政权也是不稳固的政权。只有既以对独裁者的恐惧，又以对它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才是稳固的。能够通过恐惧唤起人民对自己的爱戴的统治者是伟大的人物。”在小说中表现出他正是力图这样实践，而且收到了相当大的实效的。小说也写到他对自己的权力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至有时达到了过于敏感多疑的地步。即使对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即使对与他共同战斗的战友——不，他不承认他们是可以与并肩的战友，而认为自己是远高出他们之上的——也往往采取猜忌的态度。为了扫除被他认定的障碍和可能影响他的权力的人，他可以使用一切手段。譬如在小说中就细腻地写到了斯大林与基洛夫的关系。在表面平静的亲切的交谈过程中，却隐藏着复杂微妙的斗争。斯大林对于作为列宁格勒党委书记的基洛夫的崇高的威信和逐渐增强的权力，有着猜忌、不满，

用各种口实想将他调离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来，以削弱和打击对方的威信和权力。基洛夫则保持着警惕、忍让的态度，但不肯在原则上退步。斯大林是过于信任自己了，他将自己看得这样高，以致他是孤独的，他不愿与人，而别的人也不敢与他谈知心话。而他的权力是这样大，以至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即使身居要职，也都是兢兢业业，只能依照他的指示，看他的眼色行事。在这种状况下，民主不可能真正发挥，投机钻营者有了向上爬的机会，官僚主义容易得到助长。萨沙以及许许多多人的类似的遭遇和命运，正是在那种政治环境和政治气候下发生的。那一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苏联电视台称之为“千古之谜”）。

消息传到了西伯利亚，小说是以一个流放者的这样一句话结束的：“不管这是谁干的，我可以告诉您，黑暗的时代来临了。”事实上正是如此，基洛夫事件成了被美国作家路易·斯特朗称之为“大疯狂”肃反运动的导火线。那是作者正在写的下一部小说的题材。

我过去读过一些有关30年代的苏联小说，它们主要描述的是苏联人民英雄的气魄和建设的热情，那是由于共产党和斯大林的英明的领导和巨大的感召力。它们是有生活的真实为基础的，但其中大多作品的确包含着不少的粉饰。这种倾向在后来更有所发展，以致苏联文艺界展开过对“无冲突论”的批评（那些批评现在看来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那些小说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如雷巴科夫所写的苏联社会生活和党内生活的这一面。

我最早是从巴比塞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认识斯大林的形象的。与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结合在一起，他在我年轻的心中是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这些年来，我又读过不少有关斯大林的书和描写他的小说。随着历史的进展和一些事件真相的陆续披露，我对他的认识当然也有所变化。雷巴科夫笔下的斯大林的形象引起了进一步的深思。他所刻画的斯大林的形象是引起争论的焦点之一。雷巴科夫说，他写斯大林的任何一个行动都通过了丰富的史料，是有所根据的。那么，小说中斯大林的那些内心沉思和独白呢？他说：“进行这样的构拟，有两种方法：从已说出的内心独白出发设想出行动；或者相反，作家了解和看到了行动，然后根据推测出这个行动是如何考虑决定的。如果作家所写的内心独白与事情、与人物的行为具有有机的联系，而读者也相信思想的这种活动，那么这独白是站得住的。”这说得很好。一切以真人作为对象所写的小说，都只能是这样构拟的。但人物的内心沉思和独白（也应包括行动），也都要通过作家的设身处地的体验，这里面也难免带着若干主观色彩的。连大师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以及其他人物都未免如此。但我们可以感觉到，雷巴科夫的确是力图思考和体验斯大林行为的思想根源和内心活动，力图创造一个他认为是真实的斯大林的形象。而且我们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比较丰富的艺术形象。

作者对历史沉思，怀着沉重的心揭开了，30年代现实中的另一面，那是在苏联当前不少文章中接触到、议论到，而在小说中则少见的。作者的视野开阔，以审视的眼光面对严峻的现实，并以严格现实主义的精神将那表现了出来。读完了这部小说以后，读者也不能不感到心的沉重，也引起了深思。

这部小说有什么意义？或者可以问：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作家认为：过去是不能忘却的，历史的教训是必须记取的，今天的现实正是从过去发展演变而来的。要敢于正视过去的某些消极的因素和血的教训。个人崇

拜，缺乏民主政治，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是造成许多无辜者的牺牲和悲剧的根源。有一位研究斯大林传记的苏联教授沃尔科戈诺夫说过：“人们的裁判会是清澈透明的，历史的裁判是永恒的。”对于斯大林及其时代的探讨以至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无论如何这种探讨和争论是必要的，雷巴科夫以小说的形式参与了这种探讨。他的目的是在于要抛弃那些年代所积淀的沉重的负担，要摆脱不正常的心理气候，要净化和改善精神道德气氛，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时代前进的步伐。作者回顾过去，正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未来的。

作者还说：“通过讲真话培养出来的人，是有道德的人。社会也是这样。如果它用真理去哺育自己年轻的公民，那就是有道德的社会；如果灌输谎言，那就是不可避免地会使公民对社会本身漠不关心，缺乏责任感，玩世不恭”。那么，作者以审视的眼光面对严峻的现实，并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将那表现了出来，除了作品本身的意义外，也是为了培养青年的道德品格和社会的道德风尚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为什么作品被压置了20多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他仍锲而不舍。那根本的动力就在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我不能评价这部作品所达到的真实性的程度，但我赞扬作者所追求的目的和他的坚毅的态度。一个作家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不能不关心他们的祖国，不能不关心人民，不能不关心现实，他应该有他的爱憎，他的追求。他是一个作家，所以要通过艺术将他的感知表现出来。当然，那应该是真正的艺术。我不大能理解“纯艺术”是什么，也不大能理解什么是“为艺术而艺术”，虽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存在，也为某些人所信奉。因为在任何艺术作品中都体现着作者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意向，我不必在这里分析那复杂微妙的情況。我只想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一切能带给我艺术魅力和艺术享受的作品我都欣赏，只要那是真正美的。而我更喜爱那使我对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给我以对人生的启迪，激发我生活的力量的作品。比起甜蜜的谎言和逃避循世的怡然自得，我更喜爱苦味的真理。1988年4月30日

“天国”和“圣殿”

——读茨威格的《走向天国》

斯蒂芬·茨威格在一个题名《走向天国》的短剧中，赋予了自己一个奇特的、也是艰难的任务：为列夫·托尔斯泰一个未完成的剧本《在黑暗中发光》写一个尾声。从艺术观点看，在托尔斯泰的剧作中，它不是很出色的。但从研究托尔斯泰晚年思想来说，它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为那是一个自传性的剧本，剧中的主人公尼古拉·米杰拉耶维奇·萨雷左夫可以看作是托尔斯泰本人的化身。萨雷左夫的生活十分优裕，但内心极端痛苦。经过了长期的思考、反省，他深刻地批判了自己过去的的生活，想重新作人，以适应他所创建的信仰。他认为自己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从老百姓手中掠夺过来的，应该分给周围的穷人。然而，他的思想不为他的亲属所理解，从而引

起了家庭矛盾。——这与晚年托尔斯泰的状况极其相似。通过萨雷左夫，他表达了对生活和宗教道德的观点，而且，他想探求剧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探求自己生活的结局。但是，如茨威格所指出的：“不论是在这部作品中，还是在真实生活中，不论是在1890年（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还是在十年后的1900年，托尔斯泰都没有找到下定最后决心结束这一切的勇气和方式。正是由于这种意志不坚的将就态度，使这个剧本的创作中途搁笔，成为残稿。最后的那个片断中，主人公完全无能为力了，只是哀求着，双手伸向苍天，祈求上帝帮助他结束这自相矛盾的生活。”

但是，托尔斯泰终于以他的实际行动为这个未完成的剧本，也就是为他自己的生命，写出了悲壮的结束：在经过长期的思考、犹豫、自我斗争后，在1910年的10月，毅然离开了他生活了多年的、心爱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仓惶地弃家出走了。几天后死在一个小火车站里，一个陌生人的床上。

托尔斯泰的出走已成为人们多次探讨过的课题：从事实真相到他晚年的思想状况，家庭状况，特别是他和妻子的关系——茨威格则以一个独特的方式接触到这个课题。托尔斯泰为《在黑暗中发光》这个未完成的剧本最后两幕留下了一个提纲。他多次想完成终于没有做到。茨威格并不是依照这个提纲去补写这个剧本，而是直接以托尔斯泰作为主人公，描写了他的出走到他的死，作为这个剧本的“尾声”。他说：“我在这里所做的，不能看成是对剧本的完成，而应当看成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和一个未解决的冲突的独立的尾声，仅仅是要使那个未完成的悲剧有一个庄严的收尾。”他的确是以严肃的态度，力图忠实地表达托尔斯泰当时所面临的矛盾，他的苦恼和追求。

这个“尾声”的第一场，写到了两个大学生对托尔斯泰的访问，这两个大学生都是由于受托尔斯泰著作的影响而认识了现实的不合理，并促使他们投入反对黑暗势力的战斗的。但是，他们现在对托尔斯泰不满，由于他宣扬“勿抗恶”，宣扬“为着一种信念去忍受苦难，要比为了一种信念去杀人要好上一百倍”。其中一个大学生激愤地反驳他：“假如受苦受难是这么美好，这么有益，那么为什么您不身体力行呢？……为什么您总是喋喋不休地宣讲，而不能亲自去实践您的学说呢？为什么您不做出榜样呢？”这一质问深深刺伤了托尔斯泰的心。他痛苦地说：“我应当完全照您所说的，像一个朝圣者那样走到大街上去。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才好。我在灵魂的最深处感到羞愧，我为自己的卑劣深深内疚……也许我还是受苦的……由于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诚实当众实践自己的主张，我也一样备受折磨。也许因此我在良心上所受到的折磨要超过肉体上的苦楚，也许主给我铸造的恰恰就是这个十字架，还有使我遭受无穷痛苦的府邸，我好像是被禁锢在监狱中，戴着沉重的镣铐……”

这两个去拜会托尔斯泰并与他争论的大学生当然是虚构的，但他们的确代表了当时某些激进的青年，他们曾是托尔斯泰艺术的热爱者，从中受益，激发了他们向黑暗势力作战的激情。现在又不满足于托尔斯泰所倡立的教义，也不满足于他的态度。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责难的回答也是完全合乎实际的，从中暴露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接触到了托尔斯泰出走的真正的核心原因。他与妻子和家人之间的关于对于他的书籍的版权的争执和其他的一些隔膜和纠纷只是在这一矛盾中派生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托尔斯泰果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放弃了自

己的财产，那结果又将如何呢？那完全不可能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只是会使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生活陷于难堪的困境。在那样的社会里，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家庭是难以生存下去的。我们也很难想象，托尔斯泰自己去种地，修炉灶，做皮靴，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心的安宁。——他的教义是不现实的，是谬误的。他的毅然弃家出走似乎使他实践了自己的教义，其实并没有解决任何矛盾，虽然他自以为是得到了解脱。结果，他死在一个小火车站里，一个陌生人的床上。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但我读到茨威格的这个“尾声”时，还是感到了心的震撼。我不仅为托尔斯泰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所感动，而且，对于这样一个82岁的老人，已经有着崇高声望的艺术家，却依然怀着对生活的激情和探求生活真理的精神，不惜放弃一切，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使我不能不在他伟大的人格前低下头来。他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

如果说，他虽然有着对生活的激情和探求生活真理的精神，但在对人生的认识上，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却只是误入了歧途的话，他的这种激情和精神却是使他创造出伟大的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他的教义也曾在他的作品中投下了阴影，留下了裂痕。

他的作品能够那样深刻地反映现实，具有那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是与他精湛的艺术素养和他的生活经验分不开的。而同样重要的是，跳动在其中的作者伟大、仁厚的心，和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爱憎。他自己说过：“在艺术作品中主要的是作者的灵魂。”“作者对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各种描写，对读者来说至为重要，最有价值，极有说服力。”罗曼·罗兰在比较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创作态度时说：“福楼拜竭力要不爱他书中的人物，故无论这种态度如何伟大，它总缺乏光明的存在！太阳的光明全然不够，必须要有心的光明。”他指出正是由于爱，托尔斯泰才能够参透生命的根源。同时，托尔斯泰对生活的探求精神一直贯穿在他主要的作品中。他说：“思想家和艺术家并不总是像我们习惯想象的那样安详地端坐在奥林匹斯山巅，思想家和艺术家应该同人们一起受苦受难，以便找到解救和得到慰藉。”他指出：“为了影响别人，艺术家是个探索者，他的作品便是探索。倘若一切真理都被他发现干净，倘若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从而教训人或者故意安抚人，那么他就无力去影响别人了。唯有当他在探索之中的时候，观众、听众、读者才会跟他在探索之中心心相印，携手共进。”这种探索精神包括他在作品中无情地解剖自己。以他三部著名的长篇为例，《战争与和平》中，在彼埃尔身上；《安娜·卡列尼娜》中，在列文身上；《复活》中，在聂赫留道夫身上，都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的身影，他和他们一道在生活的激流中经受锻炼，和他们一道在困惑中思考，承担烦恼、痛苦、疑虑，一道探求人生的意义。那些篇章读来是如此亲切，而且激发读者的思考。

我无意在这里去研究托尔斯泰的艺术观点和艺术实践，那是一个浩瀚的海洋。我只是在读了茨威格的《走向天国》这个短剧后感到在这个老人悲剧性的行为中，还是可以看到他的仁厚的心，他的对生活的激情、对人生的执着，他的真诚，他的探求真理的精神——一句话，他的伟大的人格力量。作为自己的教义和信念的“殉道者”，他并没有能走向“天国”，但是，凭着这样的人格力量，在文学的道路上，他却通向了“圣殿”。他在这方面所留下的许多宝贵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意大利作家皮奥维尼曾经谈到过，当代西方的批评家和活跃的艺术家

们，在十九世纪的俄国灿烂的小说家星群中，基本上只提出了两个名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大部分西方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譬如从卡夫卡到贝尔纳诺斯。而要在新一代的小说家中找到托尔斯泰的文学传人，就不那么容易了。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数不清的支流，乃是我们的现实，而托尔斯泰却是理想。对我们来说，按照托尔斯泰的方式，如果不是形似，写满一张纸，要困难得多。而要做到在我们身上也具备足以容许我们真诚地写下这张纸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力量，那就更难了。”——这谈的是西方的情况，但恐怕也是值得我们的作家想一想的。

托尔斯泰的出走和他的死，当时是震动了俄罗斯大地的一件大事，也使全世界瞩目。茨威格通过戏剧的形式，在浓缩的篇幅内，再现了这一历史事实。因为究竟是文学作品，这里面有一点虚构。但从总体看，它是真实的。对于托尔斯泰，茨威格当然是崇敬的，而他并没有“拔高”他。这种严肃、认真、力求符合真实的态度，也值得我们传记文学的作者们参考。

悲剧与赞歌

——关于卓别林的《舞台生涯》

不能将《舞台生涯》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悲剧。——它是一个悲剧，但也是生的赞歌。

在这部影片里，卓别林不是以他已为全世界所熟悉而且喜爱的流浪汉的形象出现，而几乎是以他本人的形象出现的。也不像他过去的影片，它不是喜剧。它在风格上更严肃，而且带着一种悲怆的气氛。比起他的别的作品来，卓别林在这里进行了更深入的人生探索和更强烈地表现了他的人生信念。因而，对于了解卓别林，它是重要的。影片在艺术上达到了诗的高度；但是，也表明了由于作者的思想的限制而来的艺术成就上的限制。

这是关于一个年轻的舞剧女演员和一个年老的丑角的故事。影片描写了这两个萍水相逢的艺人的不幸的遭遇，他们的相互帮助和他们之间的纯真的感情。

舞剧演员梯丽是令人同情的。她由于贫病交加而企图自杀。她还那么年轻，而对生活却已那么绝望。那个丑角卡伐罗也是令人同情的，他曾经是一个名震一时的伟大的演员，而今他老了，潦倒了，连挣得一次演出的机会都这样困难，在演出的中途又被撤换了下来，他终于只有混迹在街头艺人中。一代伶人的下场竟是如此。

卡伐罗将自杀的梯丽从垂危中救活了过来。为了替她治病，他忍痛卖掉了心爱的小提琴。他细心地照料她，使她恢复了健康；他想尽一切办法鼓舞她，使她恢复了再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正是由于卡伐罗的帮助，梯丽又重新走向了舞台，而且获得了成功。于是，她又想尽一切方法去帮助卡伐罗。从这中间，我们看到了“天涯沦落人”之间的动人的情谊。

但更使人感动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关系。梯丽成名以后，提出要和卡伐罗结婚。卡伐罗感到温暖而且深受感动。他对她当然也是有感情的。但

正因这样，他不能接受她的感情。

他认为梯丽只是——仅仅只是——想爱他。不是么，他是太老了，而且身体这么坏。他知道梯丽过去悄悄地倾慕过一个年轻的音乐家，机缘使这个人现在正和梯丽同在一个剧团中，而且是她的舞蹈的钢琴伴奏者。在一个夜半，醉酒的卡伐罗无意中听到了那个音乐家对梯丽倾诉他的爱情。那么，他也是爱她的。卡伐罗喜悦（因为梯丽将有一个可以为她带来幸福的伴侣）而又痛苦（因为他不得不离开梯丽），为了成全他们，为了使梯丽忘掉自己，卡伐罗孤独地走进了茫茫人海中。

梯丽没有接受年轻音乐家的爱情。卡伐罗的出走真正伤了她的心，使她大病了一场。她对卡伐罗的爱可能只是感激的升华，但她提出要同卡伐罗结婚并不是虚伪和矫情。她的名声遍及欧洲，她更惦挂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的卡伐罗。她跑遍伦敦全城，终于在一家小酒店里找到了他——他穿着街头艺人的服装正在卖艺。少女含泪微笑着，坚决要与老人生活在一起。她说：“只要能使你幸福，我做什么愿意。”而老人说，正因这他才痛苦，才不得不离开。他们之间的纯真的、高洁的感情使他们的灵魂发出光辉。卓别林自己在未成名前也经历过穷困的生活。他深知沦落江湖的艺人的辛酸和痛苦。他是带着深厚的挚爱和同情来刻画这两个受着生活重压的小人物的。

但影片更可贵的是表现了对于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于命运的不屈的精神。卡伐罗向躺在病床上，对于生活已感到厌倦和畏缩的梯丽说：“幸福，它是存在的。为幸福而奋斗——这是壮丽的事。”他说：“不要对不幸和死亡步步迁就。当然，死亡是免不了的，但是，也还有生活！生活！生活！想想那蕴藏在宇宙中的力量，那使地球旋转、使草木生长的力量……，这同样的力量在你内心也是有的呀！只要你能鼓起这种力量、勇气和决心。”卡伐罗自己，虽然潦倒了，还保持着人的尊严；虽然衰老了，还追求着胜利和荣誉。在梯丽的帮助下，他终于得到了一次为他而举行的隆重纪念演出。梯丽的心情兴奋、激动、紧张，她了解卡伐罗，她知道这次演出的成败对卡伐罗是生死攸关的。而在卡伐罗自己，当他这次重返舞台，只有一个选择，他需要的不是观众的宽宏大量，不是同情和哀怜（他的自尊心使他决不能接受这个），而是真正的成功。在演出前，他偷偷地喝了一些威士忌，他知道这对于他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他有心脏病；但是，为了演出的成功，这却是必需的，他要得到刺激和灵感。

演出真的得到了极大的成功。卡伐罗在舞台上恢复了青春。前台后台都轰动、沸腾了。

——他达到了他的艺术的顶峰，同时，他也堕入了死亡的深渊。他在听到了观众的雷鸣般的掌声和彩声后，在舞台的侧幕边死去，如同一个胜利的将军死在战场上。

这是一个悲壮的象征：为了艺术的胜利，不要害怕死亡；用艺术的胜利去征服死亡。——不，这不仅仅是为了艺术。人，为了真正的幸福，为了尊严和荣誉，要作出最大的努力，要不惜任何代价，去攀登应该达到和可以达到的高峰。

当梯丽软弱的时候，卡伐罗鼓励她站起来。当梯丽病后第一次正式参加演出，临出场前，她惶乱，恐惧，觉得自己的瘫痪病又要犯了。在这关键的时刻，卡伐罗对她猛击了一掌，使她奔向了舞台——人生的战场，而卡伐罗自己，虽然他也灰心过，颓唐过，甚至绝望过，现在又用他的胜利和死，

表明了艰苦、勇敢的搏斗精神。我们（我的意思是，包括那些经受过无产阶级战斗洗礼的人们）不能不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而且，我们也不是不能从那当中汲取力量的。

所以，我们说，不能将《舞台生涯》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悲剧。它赞美了生，表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追求，对人的荣誉和尊严的渴望，歌颂了不屈不挠的搏斗精神。——这应该是这部影片所想表达的真正主题。

然而，《舞台生涯》又不能不是一个悲剧。在繁华而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处于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不能不笼罩在阴影中。他们的个人搏斗虽然惨烈然而却是无力的。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获得成功的只是少数。有几个登上了艺术宝座的卓别林呢？而无数的梯丽在青春年华就走向了毁灭；无数的卡伐罗还流落在街头，度过他们凄凉的晚年……这部影片的片头上写着：迷人的脚光之下……年老的死去，

让年轻的登场。

卡伐罗弥留时，梯丽正在舞台的明亮而柔和的灯光下舞蹈。她跳跃、旋转……她正当艺术的青春。——就这样，卓别林通过卡伐罗歌颂了老人的悲壮的死，而对年轻的梯丽们表露了衷心的祝福。

然而，悲剧是不应该延续下去的。卡伐罗的潦倒的暮年，不应该是将来的梯丽的命运。

而为了这一点，那些小人物应该有新的理想，新的搏斗方式。——但这却是卓别林没有想到、在影片中没有探讨到的。这里就正显露出卓别林的思想限制。

同情那些小人物，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命运；赞美生，赞美不屈不挠的搏斗精神。这都很好。从这中间表明了卓别林的人文主义精神。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放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面，他借卡伐罗对梯丽所说的那些鼓励的话，如前面我们所引的，虽然好像很豪壮，却是空洞的。仅仅只是争取个人成就的搏斗，并不能改变卡伐罗们和梯丽们的命运。那样，生活延续下去，搏斗延续下去，而悲剧也同时将延续下去。卓别林有一颗善良的心，但他对梯丽们的祝福，只能是美丽的泡沫。有人指出过，《舞台生涯》带着一些自传的性质，在卡伐罗身上可以看到卓别林自己的影子。这话是有道理的。当然，卓别林不同于卡伐罗，他在年轻时就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和声誉。然而，卡伐罗的那种对生活的信念和搏斗精神，应该也就是卓别林自己的。卡伐罗说：“年龄愈大，愈想活得热烈些。”我记得卓别林晚年也对人说过：即使拄着拐杖，也要拍好最后一部影片。这种“壮心不已”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在《舞台生涯》中，卡伐罗最后的演出是成功了。那是卓别林为了鼓舞人们，也为了鼓舞自己，不能不叫他成功。但卓别林的最后几部影片却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水平，那不是由于年老才尽，而是因为他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没有达到这个时代可以达到的高度。

卓别林不愧为一代艺术大师。他受到全世界千千万万的观众的喜爱和赞扬，这不仅由于他的卓越的辉煌的表演艺术，也由于他对小人物的同情和热爱，人文主义的精神渗透在他的许多作品中。然而，我们也看到，不是安身立命于坚实基础上面的人文主义，有时又会反过来成为他艺术斗争中的限制和负担。1979年北京

阴影中的《凯旋门》

《凯旋门》的主要情节是：恋爱与复仇。作者雷马克在另外一部小说《流亡曲》中，借一个人物的口说过：“恋爱与复仇是人生最快意的两件事。”但读完《凯旋门》后，却没有使人感到快意，充溢和笼罩着全书的是低沉伤感的气氛。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雷维克是作者的英雄。他是一个德国人，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善良，正直，勇敢，慷慨。在纳粹初上台时，他帮助过几个受通缉追捕的人，因此自己被关进了监狱，经受了酷刑。妻子遭牵累也被捉了去，受尽折磨后自杀了。雷维克经过极大的艰危越狱出来，逃亡到巴黎，没有护照，非法地过着极不安定、毫无保障的生活。

他从前曾经有过的很多东西——安全、希望、信仰、抱负……现在都没有了。他自己说：“至多有一点儿绝望，一点儿勇气，否则便是内在和外在的生疏。”他只能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也从一些还算正直、善良的人那里，从一些与他处境相同或类似的人那里，得到一点儿温暖和帮助。他将这样生活下去——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在他的非法处境中，这种意外出现的可能是太多了），一直到他的暮年，到死。不，连这些都是他很少想到的：没有明天。

但一个女人撞进他的生活中来。在寒冷的黑夜中，在赛纳河边，他同一个刚到巴黎的女子邂逅。一个偶然的意外，使这个意大利籍的女子孤独无倚。雷维克出于同情帮助了她，一如他帮助任何人。那个女子琼恩，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受过一点教育，凭着她的美丽和一点小的才能，在繁华而又黑暗的大都市中出没，在人生的海洋上浮沉。她渐渐地爱上了雷维克。雷维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一向将爱情当作负担，却也渐渐爱上了她。琼恩对雷维克有着真实的感情，在生活上却是比较随便的。雷维克并不追究她的过去，但当他发觉，彼此相爱后她还与人同居，他的心灵就受到深重的损伤了。不过，也不能完全怪罪于她，这是由于雷维克在一次意外的放逐中所引起的。谁让他在街头去抢救一个因偶然事故受伤的老太婆呢。他被带到警察局去做见证人，却暴露了非法的难民身份，以致被驱逐出境。琼恩焦急地等待了几个月，毫无音讯，以为他不会回来了。

雷维克真心爱着她。他是先感觉到真正为她所爱，因而渐渐地爱上她的。在动荡的艰难的生涯中，能够真正为人所爱是一种幸福，一种慰藉，一种温暖；是夜行中的星光，是风雪中的茅屋，是沙漠中的清泉。那个女子虽然过着放荡的生活，却有着了一颗还算是纯洁的心。

而雷维克在玩世不恭的掩盖下也还有着了一颗热切的心。由于他是认真爱着，因而对那个他认为是损伤了他的女子就采取了抗拒的态度。这不是嫉妒。他自己也有过露水似的情谊，随风而逝的爱情。只是由于他现在是认真地爱着，于是他要求完整的爱：全或无。

几乎与这一场惨淡的恋爱进行的同时，他遇到了那个在德国曾审讯他，对他施过毒刑，逼死了他妻子的纳粹军官。那个人负着秘密任务被派到巴黎来。这次偶遇使雷维克热血沸腾，复仇的渴望甚至超过了恋爱的激情。鲁迅

先生在他译的契诃夫的小说《坏孩子》的后记中就说过，复仇的欢乐是大过爱情的欢乐的。爱情是对寂寞的心的一种安慰。而复仇也是一种安慰：对带创的心，对屈辱的灵魂；而且不仅对受难的生者，也对含冤怀恨的死者。他将爱的纠葛推在一边，集中全部精力，作出种种努力，经过煞费苦心的安排，经过坐卧不安的焦躁的期待和守候，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终于将那个纳粹军官暗杀了。

他享受了复仇的欢乐，但这不是兴奋和狂热，而是心灵得到了某种平静。也许，他甚至感到有一点茫然和空虚吧。事情往往是如此的，奔赴目标时的激动，甚至超过了到达目标以后。对于雷维克来说，他亲手杀死了敌人，却在生活中失去了目标。而另外，他还没有——至少暂时没有别的什么目标可以奔赴。

而这时，给予他复仇的胜利以嘲笑似的，在乌云翻滚的欧洲，纳粹德国将战神的车轮转向了巴黎。他杀死了一个纳粹，但依然没有逃脱纳粹的魔影。杀死了一个敌人，但一个强大得无比的敌人又逼近了。

不久，又一个人死在他的怀中。这一次是他的情人。琼恩被与她同居的那个男子开枪打伤了。琼恩带着伤打电话请雷维克去。雷维克以为她又和以前一样在玩鬼把戏，想骗他到她身边。但是，当他一知道情况属实以后，就立即改变了冷淡的、抗拒的态度，显得十分慌乱了。他急急忙忙地赶了去。爱者在血泊中。他是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曾经救活过许多人，在这最需要他的能力的时候，他却束手无策了，情况实在太严重。在垂危中，她喃喃地说：“我还不够好——配你。我爱你。”雷维克一向是不大透露自己的感情的，而此刻在深深的悲痛中也向她倾吐了自己的爱。他说：“你使我活着。我本来只是一块顽石，是你使我活着的——没有了你，我什么都完了。你是一切的光明、甜蜜和苦涩——你震撼了我，你给了我你自个儿和我自个儿——。”他经历了死别。在他的飘泊、艰难、寂寞、无望的生活中，他失去了曾经温暖过他、他虽然抗拒着但却震撼了他的生命的爱。

雷维克和琼恩的爱情是与一般的爱情很不同的。在浮华的巴黎，两个飘泊的异邦人，他们的爱情不可能笼罩在诗意的光华中，不可能是充满欢快的夜曲。它的滋味苦涩，情调凄凉，气氛哀愁，但却比一般幸福的爱情更触动人心，因为它更能引起同情。事实上，即使琼恩不死于意外，他们的爱情也不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的。不仅因为飘流不定的生活不容许他们有一个真正的家，还因为他们不同的性格。琼恩不能够，也不会安于作一个家庭主妇。她是一个从生活到灵魂都受到大都市腐蚀的女子，她只能自得其乐地沉醉在、也自我毁灭地浮沉在糜烂的生活中。只是她总还算是比较单纯，即使她做出不对的事，似乎也完全出于自然，使人不忍深责她。正因为她的这种单纯，她才爱上了雷维克。她感觉得到与她所遇到的那些花花公子比起来，雷维克是不同得多的人。她对雷维克的真实的爱是她破损的心中的一线生机，一片光辉。至于雷维克，他的思想修养和人格修养都达到了一定高度，虽然那当然也带着资产阶级的烙印。由于他的遭遇，他愤世嫉俗，而这种态度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多少是一副防腐剂。他在无可执著中执著于爱情，在对于爱的抗拒中体验着爱的激动。雷维克不仅与琼恩所遇到的那些花花公子不同，而且与她本人也很不同吧。如果他们真正生活在一起，他们会渐渐地彼此厌倦的，除非雷维克能使琼恩提高一步，或者是琼恩拖累得雷维克下降一步。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将是另一个悲剧，一个平凡得多的悲剧。而现

在，雷维克虽然失去了她，却得到了她的真正的爱。他将感到孤独，但有着爱的回忆。这对于他可能更幸福一些吧。

恋爱与复仇，这是雷维克在这一段生活中的主要内容。现在，他的情人和他的敌人都在他身边死去了。

面对着雷维克看，他是勇敢而坚强的：他忍受和承担了多少东西！在最危险、艰难的情况下，他也并没有垂下头来，没有灰心丧气。但是，站在高处看，他又是孤独而无力的，他没有找到可以照亮他的人生道路的理想，他没有找到可以充实、丰富他的生活内容的事业，他远离真正的战斗集体。他只能带着一种深刻的颓唐甚至绝望的心情，得过且过而又愤世嫉俗地活着。偶然地、两个人几乎同时撞进他的生活中来，搅乱了他的心。一个人带来爱的欢欣和苦恼，一个人激起了他复仇的渴望。他的生活似乎充实了起来。但是，这是因为不幸才显得美丽的爱情，这是看来果敢却显得虚弱的复仇。

善良、正直、勇敢的人受到迫害，这是可悲的。在受到迫害以后，找不到自己的道路，只是依靠个人的奋斗和反抗，愤世嫉俗、得过且过地活着，这是更可悲的。

但恋爱与复仇至少搅动了，使他热烈的内心从外表的冷漠中显露了出来，如同火焰从灰烬中升腾了起来。一个人复活了他的感情，另一个人殒灭了她的往事。他已经“没有一件未了的尘缘”。过去的过去了，现在，他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当然，他也可能又回到他原来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不，甚至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在思想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时代没有允许他这样。由于德国进攻波兰，法国对德国宣战了。作为一个从德国集中营里逃亡出来的反纳粹的难民，雷维克却又被送进法国的集中营里。

集中营是一个受难所。雷维克又必须忍受和承担许多东西，这是我们相信他能够有力量做到的。集中营也是炼狱和熔炉，他终于将被锻炼成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的战士吧。从他的性格来看，从许多与他有着类似遭遇的善良、正直、勇敢的人的例子来看，他应该是这样的。而且作者在书中已经暗示过，雷维克已经认识到被他暗杀掉的仇敌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军官，也认识到暗杀这个渺不足道的人，“不复是他个人的小事情”，而是与更大更重要的斗争有联系的，“这是一个开始——”。那么，他将参加到当时已经浩大的反法西斯的行列中，成为一员真正的战士，应该是他必然的道路——也是他唯一应该走的道路。

不过，那还只是想象中的壮丽的篇章。至于《凯旋门》本身，那调子总还是太低沉了。

无力的个人，飘泊的生涯，无保障的生活，不幸的爱情，虚弱的复仇……。而作为背景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骚动、惊惶、对灾难的预感的那种沉重的气氛，再加上巴黎底层小人物不幸生活的穿插，和对于从德国流亡出来，过着动荡、艰难，几乎走投无路的难民生活的描写，就更加重了全书的悲惨情调。就是作者后来对雷维克将有一个战斗的新的开始的暗示，也没有能够使全书的收尾转为比较高昂的调子。

作者带着深深的同情和爱抚对待他所创造的雷维克——他的英雄。而且我们有理由可以设想，这个英雄在许多精神方面是他的化身，他通过这个英雄说出了自己的生活感受、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这当是这本书有着许多隽语、哲理，震荡着幽深的抒情调子的原因。

作者与他所创造的雷维克一样，是在纳粹上台以后逃出德国的。作为

一个正直的作家，他当然不会见容于法西斯的德国。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他当然也不能忍受法西斯的德国。

而他显然也不满意于苏联。在《凯旋门》中，雷维克最好的朋友、夜总会的看门人莫洛索夫，是一个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出来的贵族。他洞察人情，老于世故，表面淡漠而富于同情，地位卑微而品质高尚。几十年了，他也怀着复仇的渴望。——这是一个看似真实，其实不可信的被作者大大美化了的人物。一个是从纳粹德国逃亡出来，另一个是从苏联逃亡出来，两个人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两个人都怀着复仇的心。作者这样的安排决不是偶然的。

从作者对于巴黎的描写来看，从他对于那些生活于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的描写来看（那个被汽车撞伤后，宁愿锯断大腿，只是为了多得一点赔偿费的少年季诺；那个为了维持职业，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非法堕胎的送货女郎罗茜妮；那些强作欢笑、受尽凌辱的妓女……），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腐行，是也有着深刻的感受的。

痛恨法西斯，又不满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也感到绝望。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呢？作为一个个人民主义者，作者在精神上显得彷徨无依。他只能将同情和爱抚寄托在雷维克这样的人身上，教导人们去做一个善良、正直、诚恳的人；他只能让他的人物去经历苦难，在暗淡的爱情和真诚的友谊中去得到一些温暖；他只能让他的英雄去进行一点惨烈而无力的个人斗争——他只能用低沉的、多少有些伤感的调子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用以抒发自己的悲哀、痛苦、愤懑和内心的寂寞。他深爱他的英雄，他将全身心都沉浸到了他所创造的世界中去，这是《凯旋门》有着感人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也使《凯旋门》的艺术成就高出于我们所看到的他的其他几本小说之上（如《流亡曲》、《生死存亡的年代》。至于《西线无战事》那是他最早的作品，虽然轰动一时，在艺术上就更差些）。但也正因为是这样，作者彷徨无依的精神状态也大大损伤了这本书的艺术价值。他只能使读者感到心的沉重（虽然和作者精神状态相近的人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慰藉和温暖），而缺乏鼓舞人心的激情，缺乏教育人的积极意义。

特别是，这本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的。反法西斯的烽火在全世界燃烧，千千万万的人横遭迫害，千千万万的人壮烈牺牲；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多少英雄的诗篇。我们无权责问作者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这在作者当是孕育成熟了的，觉得必须一吐为快的。但我们有理由对作者表现在作品中的那种精神状态表示困惑。

作者是当代著名的德国作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是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杰出的作品，使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凯旋门》出版后，也受到了广泛的注意，成为一时的畅销书。作者是有艺术才能的，他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经验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同样值得我们借鉴的是，通过《凯旋门》我们又一次认识到，艺术才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好的艺术才能还要看是在怎样的思想感情的支配下面。

作者缺乏理想主义的光芒来照亮他自己、也照亮他的人物道路，这是《凯旋门》成为一个悲剧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作者的悲剧。

我想说，这也是许多资产阶级作家的悲剧。1975年

高龙巴——复仇女神

梅里美的中篇《高龙巴》虽不像他的另一部中篇《嘉尔曼》那样有名，也是他重要的著作之一。这两部小说都是以女主角的名字作为书名的。这是两个国籍不同，有着各自独特性格的女性。她们的性格我们未必完全能接受和喜爱，但同样闪耀着令人目眩的光彩，不能不引起读者的赞叹。

故事发生的地点在法国的科西嘉海岛。那是拿破仑的故乡。发生的时间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拿破仑失败以后不久。当时资产阶级文明还远远没有能够越过大海征服这个海岛。那里保留着古朴的、带点中世纪野蛮的民风。岛上当然也有法律。但人民往往不顾法律，而凭着他们的良心和古老的遗风行事。这古老的遗风之一就是“愤达他”，意为复仇。

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复仇，还有着特殊的涵意，即一人受辱，及于近亲，所以近亲也有报复的责任；报复的对象也不限于仇者本人，也及其近亲。——这部小说叙述的就是，高龙巴如何促成了一次“愤达他”，如何导演了一曲惊心动魄的复仇的戏剧。高龙巴，从外表看，是绝伦的美丽，而且端庄、大方。但她是在这座海岛上生长的，是海岛的真正的女儿。平时她是温顺、有礼的。而当她激动，特别是当她面对仇人时，眼中就闪耀着奇异的火焰。她没有受过什么正式教育，在一些涉及文明的常识方面惊人的无知，但她能够对所接触到的人事说出最准确的意见。她同情那些绿林中的土匪——在科西嘉，土匪并不是一个坏的名称，她说宁可出卖自己的面纱，也不能不以面包和枪弹接济他们。而对那些官兵们，她有时倒加以嘲弄。她从小就东抹西涂的写诗，她是一个有名的挽歌女，善于临时编唱出动人的挽歌。

就是这样一个村姑，她发誓要为被暗害的父亲复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她终于达到了目的。

她家的家世，可以追溯到七百年前，一直在岛上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有一个仇家：巴里岂尼家族。由于年代久远，结仇的原因已弄不清了。高龙巴的父亲台拉·雷皮阿曾在拿破仑军中当过上校，后来因拿破仑倒台而被迫退伍，隐居在乡间，经常受到当了村长的仇家瞿弟斯·巴里岂尼律师的刁难。后来有一天，雷皮阿被暗杀了。有证据证明，那是当地一个著名土匪干的。那个土匪在几天以后为巡逻兵打死。人们认为这件凶案已经了结了。但高龙巴则认为那证据是巴里岂尼伪造的。就在父亲的尸体前，她编唱了一首“巴拉太”（即挽歌），当众指出真正的凶手是巴里岂尼家，并表明了复仇的决心。这首“巴拉太”流传开来了。一种紧张的气氛笼罩在这有着旧恨新仇的两个世家之间。

当地的习俗使她——一个女子不能与她的仇人血刃相见。她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军队里当上尉的哥哥奥索身上。她等待了两年。奥索终于退伍回来了。

奥索是很年轻时就离开了家乡参军的，长期受到了资产阶级文明的熏陶。他勇敢，重视荣誉，只是在他身上已很少具有他妹妹的那种野性。他不相信巴里岂尼家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所以当他得知父亲的凶讯后，并没有急急从部队赶回家乡。这次退伍回来，也并没有怀着复仇的要求。而且，他已不太习惯于岛上的那些野蛮的民风了。使他谨慎行事的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他已倾心于和他同船上岛的一个名叫丽弟亚的英国少女。那少女再三劝告他不要为岛上的野蛮的风习所左右。她还送了他一枚戒指，要他时时记住她的劝告。不过，这一枚戒指可能还有她没有说出的涵意吧。

然而，他终于不能自主地沿着他妹妹所布置的复仇的道路走去了。高龙巴精心策划所产生的效果压倒了丽弟亚小姐赠送的戒指的魔力。

高龙巴初与哥哥见面时，她一句也没有说到复仇的事，虽然奥索在她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中都觉察到了她的意图。她的避而不谈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和气氛。几天以后，高龙巴将哥哥带到父亲的坟前，为亡父的灵魂祈祷。她又让他看了父亲遇害的血衣和两颗致命的枪弹。她充满激情的悲痛的倾诉使他感动而且搅乱了他的心。已被压服的科西嘉人的本性在他的血液中翻腾了起来。高龙巴又设计将州长和村长瞿弟斯律师与他的两个儿子诱到了家里来，拿出了有力的证明，指出原来的罪证是瞿弟斯伪造的。同时她还大胆地请来了两个绿林土匪作证。奥索不得不相信父亲的遇难是出于巴里岂尼家的阴谋。当瞿弟斯的两个儿子恼羞成怒，企图杀害他时（是高龙巴及时地扭住了行凶者的手臂救了奥索的），奥索终于立下了复仇的决心了。

但他还想以比较文明的方式，通过一场光明正大的决斗，而不是以野蛮的暗杀来解决问题。然而，当他独自一人去迎接将到他家作客的丽弟亚小姐和她的父亲时，遇到了巴里岂尼两个儿子的埋伏。他在左臂受伤的情况下，用丽弟亚小姐的父亲赠送给他的长枪，以快速的两次射击结束了那一对兄弟的生命。

奥索成为了人们夸耀的英雄，高龙巴也以有这样一个哥哥而自豪。其实，这更是高龙巴的胜利。她的决心，她的智谋，她的勇敢，使她成为了这一次复仇事件的真正的主角。与奥索比较起来，她更是一个强者。她实现了她自编的“挽歌”中的话：“我要那只放枪的手，我要那只瞄准的眼睛，我要那颗起这个恶念的心……”

穿插在这一幕戏剧中的英国少女丽弟亚和她的父亲奈维尔上校，只是陪衬人物，增加了一些色彩，一些情趣，也帮助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丽弟亚与高龙巴是一个强烈的对照。一个是资产阶级的贵小姐，一个是带着野性的村姑。她们都美丽、聪明、热情。然而，丽弟亚颇有一点娇气、任性，相当浓厚的虚荣心。在高龙巴闪闪发光的形象面前，她要黯淡得多。

在小说中，还出现了两个生活在绿林中的土匪。其中一个曾经在拿破仑手下当过兵。另一个是更奇妙的人物：在学院里研究过神学的大学生，他懂得好几国语言，能随口引经据典。他希望得到的礼物是荷拉斯的集子。他粗犷、豪迈、而又温文尔雅。他们都有命案在身，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公开反抗社会，过着随心所欲，但也是动荡、危险的生活，遵守着他们自己的荣誉观念和道德观念。他们受到群众的掩护和帮助，高龙巴就经常接济他们面包和弹药。而在必要时，他们也肯为了帮助高龙巴，冒着风险挺身而出。他们的形象和高龙巴的形象是互相辉映的。

一个美丽、端庄、热情、而又勇敢、野性未驯的少女，一个惊心动魄的复仇的故事，其中还穿插着一场奇异的爱情，背景又是在一个有着野蛮古风的海岛上，这样就使这部小说具有很大的吸引读者的力量。梅里美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但内容却富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他极善于安排情节，制造情势，从而表现出人物的性格。正像一切艺术大师一样，他能够用寥寥几笔就使一个出场不多的人物栩栩如生，而对那些主要人物的性格则更是精心

刻画。他是通过了自己的体验去创造他的人物的，因而读者也能够体验到人物在各种情势下的心情，虽然他并没有过多地去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卢那卡斯基谈到梅里美的创作方法时说：“这些作品表面上极为冷静。……在他那整个精湛的艺术里，作家们的感情不是短缺，便是被深灭地隐藏着。”我倾向于后一判断：他的表面的冷静下面是隐藏着激情的。这一点在《高龙巴》里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他的文笔又是那样洗练、生动，还掺杂着一点幽默感，就更使这部小说成为了艺术中的珍品。

不过，这部看来并没有什么深厚的社会内容的小说，除了为我们带来了一幅动人的风俗画，给了我们一些艺术享受以外，有什么更多的积极意义呢？

可以借用卢那卡斯基的话来回答：“如果说他喜欢描写凶狠的男男女女，如果说他醉心于作奸犯科的事情，如果说他不顾道德的话，那么这首先是为了用他的优越感做鞭子，从远处去抽打心怀偏见的庸庸碌碌的俗流；他了解的近在他身边的俗流，由中上层阶级代表构成的俗流。”这是十分精辟的见解。梅里美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学者和作家，长期在法国政府中任官职。但他从幼小时起就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资产阶级腐败的社会风气是不满的，对那些虚伪、浅薄、骄奢淫欲的资产阶级的绅士、淑女是鄙视的。不过，他也并没有为自己寻求一个可以追求的理想，并没有向现实斗争的决心。他过着优裕的生活，内心却是寂寞、苦闷的。他在直接描写资产阶级人物的小说中，都带着批判和嘲弄的语调。

他更多的作品却都充满异国情调，他赞赏那些淳朴、勇敢、生气勃勃、带着野性和反叛精神的人物，用以发泄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高龙巴》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那么，在今天，这一部作品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除了是一次很好的艺术享受以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教育意义。但我还是想谈到一点：我们可能觉得高龙巴的野性稍稍重了一些，甚至于感到她稍稍冷酷了一些。然而，她那种为了复仇而全力以赴的精神，为了达到目标不避任何阻挠和艰险的勇气，还是激荡着我们的心的。1982年11月30日鄂城墩

美的寻求者

——关于巴乌斯托夫斯基

在和一位友人的谈天中，议论到小说中的“美”的问题，使我想到了苏联的一位老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印行过他的选集，后来，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又印行过他的文艺短论《金蔷薇》，当时都很受读者的欢迎。

他是一个带牧歌情调的诗人，但以小说家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的作品大都浸润在一种诗意里面。

他不以艺术为神明，他是一个生活的赞美者。只是，他如此的善良而

温情，以至血与火、人世的纷扰和苦难，似乎是他柔和的心所无力承担的，因而往往为他所无视或回避。他所追求和喜爱的，是他的心所能感应的东西，而他的心是过于柔和了。他的作品单纯、明净，有着诗意，然而在题材的选择上就有了很大的限制。他寻求美、发现美和歌颂美，在他的标准和他能达到的范围内。

他并不想粉饰现实，但当他在表现和描述他的世界的时候，有时就不能自己地将他心境中的色彩和情调去涂抹在上面，使之闪烁着浪漫的光辉。可以设想，他曾深受过去时代的那些优美的艺术的影响和熏陶，他的作品往往有一种古朴的牧歌风味，即使他歌颂的是新的生活和新的人。

他的作品在情节上几乎没有波澜壮阔的开展，人物的个性生动但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

一般说来，他的作品没有深刻地反映现实，也没有强大的思想力量。不过，他所追求的原也不是这些。他表现的往往只是一种情调，一种气氛，一种微妙的情绪，企图从这中间去体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的长篇（就我所看到的说），虽有一些片断的闪光，总体看来却是散漫无力的。有一些短篇，由于情节的平淡和人物性格的简单，也显得肤浅和腻味。但当所要表现的题材与他的心完全交融无间，可以让他的想象奔驰的时候，他就能达到艺术的峰巅。《盲厨司》、《一篮枞果》、《雨蒙蒙的黎明》，特别是《夜行的驿车》，给人如此深的艺术感染，有着这样强的艺术魅力，那是可以与任何第一流的短篇比肩的。

他不是伟大的作家，但我觉得他作品中的某些素质，正是我们的许多作品中所缺少、然而应该具有的。我所指的是对生活的美的追求，洋溢着对生活的激情。他的作品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的美，加深了我们对生活的爱。我喜爱那些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作品——在那些作品里面，也达到了诗的高度，如契诃夫的《第六号病室》、莫泊桑的《羊脂球》、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但我也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形式的诗篇。

我想抄引一段话在下面，这是他的小说《一篮枞果》中的主角、作曲家爱德华·葛利格写一支送给一个守林人的女孩的乐曲时，想向她表达的思想感情，我觉得这也正是巴乌斯托夫斯基自己向年轻的一代说的话，从这中间可以感受到他的心灵，也可以看出他的风格：“你像太阳，像柔和的微风，像清晨一样，你心灵中开放出一朵白色的花，使你身上充满了春天的芳香……我经历过，见识过，而且也懂得生活；不管谁对你讲什么话，永远要相信生活是美妙的珍贵的东西。我是一个老人，但是，我把我的工作，我的才能，我的生命都献给了青年……我毫不吝惜地献出了一切，因此，也许我比你更要幸福一些。

“你是黎明的光辉，北国夏夜迷人的幽光。你就是幸福，我的心弦随着你的声调而颤动。

“祝福造成你的生命的一切，祝福你所接触到的一切，或是一切接触到你的东西，祝福使你欢乐的一切，以及一切使你沉思的东西。”

这实在说得很好，也说得很美。如果我是一个青年，我将衷心地感激他，而在我这样的年龄，则很喜欢他的这一句话：“我毫不吝惜地献出了一切，因此，也许我比你更幸福一些。”这使我感动，也得到了启发。1975年小阁楼

最好的礼物

——献给参加琴台音乐会的音乐工作者

守林人的女儿达格妮十八岁了，她第一次离开了挪威西部的海港卑根近郊的森林，来到了首都克立斯坦尼亚（奥斯陆的旧称）。这座美丽的雄伟而宁静的大城市，处处让她感到新鲜，发出赞叹。几天以后，她去参加一个在公园举行的露天音乐会——她热爱音乐，也欢喜唱歌，但是参加音乐会，这在她也是第一次。

六月，正是“白夜”的时节。她穿着一件柔软的黑丝绒长袍，那是她的在大剧院管服装的姑妈借给她穿的。周围的人们望着她微笑着低语，赞叹着她的惊人的美丽，而她一点也不知道。公园菩提树间的灯光，庄严而华丽的舞台，交响乐的美妙的旋律……这一切都使她沉醉，使她感到有如在一个梦境里面。

忽然，她很快地坐直了身子，睁大了眼睛，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那个穿着礼服的报幕人微笑着的确是这样说的：“下一个节目是爱德华·葛利格的得意作品：《献给守林人哈格勒普·彼得逊的女儿达格妮·彼得逊，当她年满十八岁的时候》。”

她竭力抑制住喉咙里引起来的呜咽，弯下身子，把脸埋在双手里。

这是真的么？是怎么一回事？爱德华·葛利格，那个有名的音乐家，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而且将一支他最得意的乐曲献给她呢？

由于心情的激动，起初，她无法静听音乐。后来，她不由自主地沉浸到乐曲中去了。她听到了森林被风吹动时的喧哗声，海的咆哮声，小鸟的颤音鸣唱，清晨牧童对他的羊群吹奏的笛声，小孩们游戏时的呼叫，少女在她情人向她的窗口投掷石子时的歌唱……这一切都是她从幼小时起就熟悉的，而在乐曲中又是那样的动人和美妙。

呵，她明白了。她想起了当年的那个人——也就是为她作了这支曲子的音乐家爱德华·葛利格；想起了十年前的那次邂逅。那时，她还是一个八岁的金发的小姑娘。秋天，带着篮子到森林中去捡枞果。在林间小道上，遇到了一个穿着风衣的人在那里散步。一看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本地人她不会不认识的。但她一点也不惧怕他，因为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高贵的城里人，却异常和气，眼睛里也含着微笑。那个人说：“咳，真糟糕，我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给你。我口袋里连一根丝带也没有，更不要说会唱歌的洋娃娃了。”那个人答应送给她一件很好的礼物，“但不是现在——大约十年以后。”

这使她口呆目瞪：“啊，十年，那可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呢。”那个人帮她提着装满了枞果的篮子，送她到森林边她住的木房子门口，然后就向海边走去了。

当她渐渐成长的时候，她有时微笑着想起这次偶遇，“那个人真会哄我——哄一个八岁的小姑娘。送我一件很好的礼物，在十年以后！就算他有这样的心吧，他将怎样把礼物送到我手中呢？”

现在她知道了，那个和气的人原来就是大音乐家爱德华·葛利格，而

且他信守了他的诺言，用这样奇妙的方式将礼物送给了她。是的，这是最好的礼物——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少女来说，这是比华美的衣服，比手镯和项链更珍贵无比的礼物了。

她流着感激的眼泪。这时，音乐响彻了大地与悬在城市上空的云彩之间的空间。她觉得音乐已不光是在演奏曲调，它在发出邀请，邀请人们到一个地方，那儿人们的脸上没有愁容；那儿谁也不会夺去你的幸福；那儿的太阳像仙后的王冠一般照耀着……。那音乐也是一个嘹亮的呼唤，呼唤人们向奔腾的大海、向开花的草原、向雄伟的高山奔去……。而且，她从音响的洪流里感到了作者对她的祝福：“你是黎明的曙光，你就是幸福。”

达格妮听着乐曲，眼泪流满了她的双颊。她梦游似地从音乐会中走了出来，在落漠的街道上徘徊。她要走遍天涯海角，去寻访那位音乐家，吻他，向他说出她的感激。

她走到海边，望着还在沉睡的大海。她觉得有一种什么她所陌生的感情在她心中萌芽了。

“生活啊！听我说——我爱你！”她面向着大海说。

于是，从这个美丽的白夜起，她带着无比的热情和勇气走上了人生的长途。

在我所读到的爱德华·葛利格的传记中，没有看到这段轶事，我是根据苏联老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小说《一篮枞果》转述这个故事的。

我好多次翻读这篇小说，每一次都像初读时那样受到了感动，一个美丽的旋律在我心中回荡。

我转述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音乐怎样影响人的心灵，说明音乐能够使人热爱生活——有什么比这更神圣的呢？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为了使人热爱生活，音乐家心里首先要有对生活的爱，他要有丰满的心灵，能够敏锐地听到生活中、大自然中的音响。

而且，他要能够爱那些勤劳的人，爱那些平凡的人——即使她是一个八岁的守林人的小姑娘。1980年10月

爱的童话

我喜爱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夜行的驿车》。这是诗。而且它引起我思索一些问题。

—

一八××年。一个秋夜。在从威尼斯通往味罗纳的驿车上，一个男子爱上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

那个男子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当半途因他的允诺和帮助得以搭上车上的三个农家姑娘感激而又好奇地问他：“您真的是一位外国王子吗，或者只是一个普通的旅客？”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是一个预言家，我能预测未来，能在黑暗中观察。可是我不是骗子，我只是一个诗人。也许，我是那个国家里一个特殊的、可怜的王，汉姆莱特就曾经在那个国度里住过。”——原

来，他是著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

那个女人是怎样的人呢？

安徒生应那三个农家姑娘的要求，预测着她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事实上，是对她们的赞美和祝愿，鼓励她们勇敢地面向生活。他对其中的一个说：“有一些女人具有真正使人震惊的美丽。这几乎总是些性格孤僻的人。她们孤独地忍受着能使她们自己焚毁的热情。这种热情仿佛是在内部烧灼着她们的面颊。您，玛丽亚，就正是这样的人。这种女子的命运往往是不平凡的。或者是很悲惨，或者是很幸福。”这话似乎不仅是说给那位农家姑娘听的。所以同车的那位太太问了：“您曾经在什么时候遇到过这样的女人吗，先生？”

“正是现在，”安徒生回答说，“我的话不仅是对玛丽亚说的，而且也是对您说的。”

那位太太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想，您讲这些话并不是为了消磨长夜，对这样一个美丽非凡的姑娘来说，这未免太残酷了。对我也是一样。”她低声补充说。

答复是：“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肃过，夫人。”

这是一段简短的对话，然而有弦外之音，有内在的含意。可以将这看作是一个渴求着的灵魂的呼唤，一个期待着的灵魂的回声。

二

安徒生的爱是怎样突然发生的呢？

他当然不是那种轻佻无聊的人。在旅舍中，那些年轻、活泼、好闹的侍女们是这样看他的：这是一个奇怪的诗人。他既不和着吉他唱那些裂人心肺的船歌，也没有一个一个地欣赏她们这些女人。他也不是那种仅仅注意外在的美丽的人，他曾经把一朵红玫瑰，送给一个最丑的洗碗盏的小女孩。

他说自己是一个游荡诗人，他热爱旅行，在生活中到处寻求美。他爱上了这一位太太，是因为他的心中满溢着爱情。

旅程的开始，在车上只有三个人：除了他们两人外，还有一个神父，他道貌岸然，满身陈腐的气息，是这首夜曲中的不谐和音。他带着责怪语调说：“太太们旅行应当找个亲戚护送。或者，至少也要带个仆人。”

“我的护送人，”那位太太说，并且狡猾地笑了起来，“就和我并排坐着。”

她说的就是安徒生。

异国的大地。驿车的轻脆的铃声和得得的马蹄声，在林梢流走的轻微的风声……山上湿润的空气和甜美的花草的气息，星星在深蓝色的天空中闪耀，和三个纯朴的农家姑娘的生动的对话……。这一切诱发了他的激情，他不自觉地开始编造一个以他自己为主角的故事。而坐在他身边的、在朦胧的烛光中的俏皮女子，就成了他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角。看来这位有着精致的感情的贵妇也正是适合于当这一主角的。——一粒种子在他心中迅速地开出了美丽的花。

三

驿车在黎明时到达了味罗纳。梦幻似的一夜过去了。

安徒生一整天都怀着隐秘的不安想着那位同车的女子，他狂热地爱上了她。

然而，黄昏时他怀着坚定的心情来到一所古老的房屋前，掀响了门铃。他是来向那个女子（现在他知道了她的名字：叶列娜·格维琪奥莉）告别的。

因为，他想，如果他让这样的爱情燃烧起来的话，他的心是无法容纳的。

而且，谁知道呢，也许，由于这样的爱情，他那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童话说不定会变得黯然无光，并会离开他一去永不复返了。

而且，他骇怕，终于会有这么一天，在一个黯淡的日子里，叶列娜·格维琪奥莉将发现，他原来是一个畸形儿。他知道自己长得很丑，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敌人。而他知道像叶列娜·格维琪奥莉这样的女子都是任性的。

那位贵妇亲自为他开门，她认出了他是著名的童话作家和诗人安徒生，而从他的眼睛和神情中猜着他心里所想的一切。她微美着但凄然地说：“看来您在自己的生活中却骇怕童话。您缺少爱的力量和勇气。”

安徒生承认这是他沉重的十字架。

她将一只手搁在安徒生的肩上，悲伤地说：“噢，怎么样呢，我亲爱的游荡诗人，走吧！解脱吧！让您的眼睛永远微笑吧！不要想我。但是假如以后您由于年老、贫穷或疾病而感到苦痛的话，那时只要您说出一个字，那么我立刻就去，徒步走过积雪的高山和干旱的沙漠，到千里之外去安慰您。”安徒生扑倒在她脚边，跪下。她含着泪吻了他，轻轻地说：“去吧，愿诗神饶恕您。”

安徒生在全味罗纳晚祷的钟声中走出了她的家。他是在向她告别，也是向一个青春的幻梦告别。

萍水相逢，心灵上偶尔的闪光。这样的爱情只能是一个幻梦。他们的分离虽然飘荡着忧郁和惆怅的调子，然而美丽的，是恰到好处的落幕，是这支梦幻曲的久久回荡着的尾音；他们终生彼此思念着。

是不是如叶列娜·格维琪奥莉所说，如安徒生自己所承认的，他缺乏爱的力量和勇气呢？可以这样说，但也要看怎样说。在那样的社会里，往往是通过悲剧的形式（如玛格丽特与阿芒，罗米欧与朱丽叶）来显示爱情的力量和光辉的。而安徒生（如作者所刻画的）是一个在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沿路抛洒花朵的诗人，却未必是一个为了爱情勇于跃马操戈的骑士。他满怀爱的心，却又畏惧爱的波折、烦恼和失望的痛苦，怕因而失去了一个童话作家所必需有的纯真、欢乐、和谐的心境。

安徒生在临终前不久对一个年轻的作家说：“我为自己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甚至可以说是无可估量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拒绝了自己的幸福，并且错过了这样的一段时间，那时，尽管想象是怎样有力，如何光辉，它还是应该让位给现实的。”

不要以为他是不珍爱自己的艺术。这是一个垂危的老人强烈地对青春的缅怀和对生命的留恋。

不过，他的确为自己的艺术付出了巨大代价（想想看，在那样的社会中，有多少艺术家为了自己的创作而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家庭），因而我们就应该能够感受到他如下的话的分量：“要为人们的幸福去想象，而不是为了悲哀。”四

我是根据《夜行的驿车》所提供的情节来谈安徒生的。也就是说，我所谈的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所理解的和想象中的安徒生。

如果有人认为这篇作品并没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他是有理由的。不过作者所追求的，是表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是那样一种境界，在那当中使读者得到感情的净化和灵魂的澄清。这一旅途上的过眼烟云的爱情，没有使

我们感到轻佻和无聊，而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而且喜爱了安徒生的诗人的性格，我们在一点淡淡的惆怅中却体会到了爱的美丽和人生的严肃。

我感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与他笔下的安徒生在气质的某些方面是相近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在生活中寻求美。他在创造安徒生这一形象时，显然也将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和追求融合了进去。正如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一样，他也可以说“安徒生就是我”的。

正是由于他有着美好的心灵而又将自己的激情融合在作品里，再加上他的美丽清新的文笔，因而这篇作品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读后感到一种难言的喜悦，一种轻微的心的颤动。

在如何探索和表现人的心灵中的那种微妙的感情，如何将作品提到诗的高度方面，我们的作家们是应该可以通过这篇作品学习到一点东西的。

我不是说要用玫瑰、白云、大海……华丽的语言和诸如电影慢镜头之类的东西将作品装饰起来。真正的诗是不需要装饰的，那样就反而破坏了诗。诗只能是将一切有机地融合在自己里面。

我不是说只有像巴乌斯托夫斯基这样的风格才是诗。果戈理将他描写丑恶的地主生活的《死魂灵》也称为诗篇，而且那的确是诗篇。问题在于作者有没有纯洁、丰富的心灵，能不能将对象提到诗的高度。1980年10月5日 31 曾卓文集

生活的美和生活的爱

——关于《雪》和《雨蒙蒙的黎明》

我在好几年前写的一篇介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短文中，曾经这样说过：他的作品在情节上几乎没有波澜壮阔的开展，人物的个性生动但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一般说来，他的作品没有深刻地反映现实，也没有强大的思想力量。不过，他所追求的原也不是这些。

他表现的往往只是一种情调，一种气氛，一种微妙的情绪，企图从这中间去体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

现在，我来谈谈《雪》和《雨蒙蒙的黎明》，这是很能代表他的风格的两个短篇。

两篇都是以卫国战争为背景，写的都是人生中一次偶然的邂逅而引起的心灵的颤动，一个朦胧的爱情故事。

《雪》的简单情节是：海军中尉波塔波夫从医院里养伤出来返回部队的途中，绕道回到了他的家乡。他想去看看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也还常常想念着的小镇和有着一个小花园的他的住宅，想去看看常常想念着的父亲。但是，一下火车，他就听说父亲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去世了。从莫斯科疏散来的一位青年歌唱家和她的女儿住在他家里。在沉重的悲痛的心情中，他感到自己回来得太晚了，而且感到他曾经那么熟悉和那么想念的市镇，似乎对他都有些生疏了。在苍茫的暮色和轻轻飘飞的雪花中，他慢慢地朝着家宅的方向走去。一想到跟他和他父亲毫不相关的陌生人住在他父亲的房子里，他心里

就觉得很难受。他决定不进里面去，只在古老的凉亭里站一会儿。他摘下帽子，凭依在栏杆上，望着在暮色中的寂静的小花园。他觉得肩膀上有谁轻轻地触摸了一下。转过头来，看见了一个头上缠着一条头巾、面容苍白的庄重的少妇，她的双颊上有雪花在融化着。他猜到了这就是那个女歌唱家。她柔和地说：“进屋来吧，不要着凉了。”她拉着他的手，穿过已打扫干净的小径，向屋里走去。不久前在医院里他曾写信给父亲，告知他可能回家一趟，并回忆和想象着屋里的情景。现在，他发觉，一切都如他预期看到的那样：钢琴上仍旧摆着从前的乐谱；同样的黄色的蜡烛照亮着他父亲的小书房……他被一种奇异的感觉纠缠着，仿佛生活在一个影影绰绰、却很真切的梦境里。后来，他看到了那一封自己最近写给父亲、显然已被女歌唱家拆看的信，在感动的心情中明白了一切。女歌唱家那样亲切地接待了他。那一夜，书房里的躺椅当作了他的床铺。他睡不着。他原来不想进到屋子里来，而现在他感到在这屋子里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每一分钟都舍不得白白过去。他从门底下看见了隔壁房间的一缕光线，听到了翻书页的沙沙声——显然是那位女歌唱家在看书。他猜想她不睡是为了到时候就唤醒他，好让他赶上黎明五点钟的火车。穿过晨光中的市镇，她将他送到了车站。在第二遍铃响以后，他们才告别。“给我来信，”她说，“我们现在差不多成亲戚了，是不是？”几天后，她果然收到海军中尉从途中写来的信，告白了他对她的感情。信的最后说：“如果一切事情结果都很顺利，你愿意要我的生命的话，我的生命当然就属于你。”

我们再来看看《雨蒙蒙的黎明》。

养好了伤，从医院出来的军官库兹明，在乘船去某地休养的中途，一个落着细雨的夜间，来到一个小镇上，为的是把同病室一位军官托自己转交的一封信送给他的妻子。库兹明雇了一辆马车从码头来到一所带小阁楼的屋前，敲醒了沉睡的门。受信者是一位年轻的妇人，一双既深邃又带点儿朦胧的眼睛闪耀着光辉。她将那么珍重地转交来的信没有看就随手放在了钢琴上。而且说：“您别生气。有邮局，也有电报局，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麻烦您。”库兹明从那位同病室的军官交给他这一封信时的郑重态度和所说的几句话中，知道那位军官是如何深恋着他的妻子。而他从这位少妇对待这封来信的冷漠神情和不满的语句中，感到这中间是存在着某种悲剧：她并不爱她的丈夫，对她的丈夫没有相应的感情。他对少妇说，特为送信来并不算什么麻烦，相反，这倒挺好。少妇问：“为什么？”他的脸红了。当少妇又一次追问他时，他沉思着回答说：“怎么对您说呢？……一切好的东西，总是在身旁一闪就过去了。”于是他叙说了在人生的长途上，一些转瞬间一闪而过，但一生都会记得的情景。“在我的一生中，我永远期待着有像这样意外而又单纯的事情。每当我找到它，我就觉得幸福。幸福的感觉不长久，可是常有。”年轻的妇人问他：“现在也是这样么？”他回答：“是的。”但他无法说清他此刻的幸福的感觉。他看着少妇，心里想，要不是有同病室的那位军官，他就绝不离开这座小城到任何地方去了，他就会留下来直到假期结束，怀着激动的心情来生活，由于有这位可爱的、此刻显得非常感伤的女人生活在近旁。黎明在雨蒙蒙中来到了。他们像古时那样，在临出门前默坐了一会。女主人送他到码头。他现在就要同这位素不相识却又这样亲近的女人告别。他的心都紧缩了。难道说在这时候，在这一分钟，一切都将成为往事，无论在他的或她的生命中，都只成为一个沉重的回忆么？他吻了她伸过来的手。

当他抬起头来，少妇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话，他没有听清楚，好像是两个字：“徒然……”。船在雨蒙蒙的黎明中开动，愈走愈远了。

在这样简短的叙述中，是无法传达出原作那种幽美的抒情的格调和气氛的。但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短篇（都是以卫国战争为背景，男主角都是在战争中受伤的军官），并没有去反映严酷的斗争现实，没有去刻画英勇的战斗者的形象，却讲了这么两个近乎爱情的故事——这样的作品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它是不是冲淡了战争的严峻的现实，歪曲了战斗者的形象呢？

作者在本质上是一位抒情诗人，他有着一颗柔和的心。在这两个短篇里，他没有写到战争的苦难和严酷，写到英勇的斗争。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他所探求和企图表现的是一种情调，一种气氛，一种微妙的情绪，从这中间去体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应该承认，作者相当成功地达到了他的意图。我们读完这两篇小说时，也引起心灵的颤动，激发了对生活的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雪》中的那位女歌唱家，在拆看了海军中尉给他父亲的信以后思索着，说不定哪一天一个沉着勇敢的人，从前线到来，一看到他房子里住着一些陌生人，各种东西都和他预期的不一样，他会难过的。她因而依照信中所说的布置和安排了一切。这是体现着对战士的崇敬的感情。海军中尉归来后，从她对待他的亲切的安慰和照顾中，从她为他所布置的一切中，看到了一颗美好的心灵，因而使他滋生了一种感情和想象。

女歌唱家在海军中尉归来之前，有时候仔细端详着写字台上的他的照片，并且思绪万端地皱了皱眉头，觉得在她不遂心的婚事以前，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可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呢？她见到海军中尉后，问他记不记得？海军中尉承认他也有这样的感觉，接着他又说：“不，我不记得了。”然而，在他离开以后写给女歌唱家的信中，写着：“我们在什么地方相遇过，我当然没有忘记。但是我觉得在家里不愿意谈起那件事。”于是，他说到了一九二七年秋天在克里米亚海边，他遇到一个十六岁的姑娘的情景。“那位姑娘就是你。我不会弄错的。……那时候我心中想道：一个可以使我一生毁灭，或者使我得到幸福的女子，从我身旁走过去了。我觉得我可以对那个女子爱到神魂颠倒的地步。我祝福她的每一个脚步，她的每一句话，她的每一个微笑。我那时就知道，不惜任何牺牲，我一定得找到你不可。……人生对我是仁慈的，我又见到了你。”他说得如此恳切。然而，女歌唱家读完信以后，喃喃自语：“我的天哪！我平生从来没有到过克里米亚，从来没有！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值得把真情告诉他，让他失望，或者使我自己失望吗？”

那么，他们以前究竟见过面吗？谁能说清呢！我们记得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见面时，两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在想：“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这是由于气质相近，由于一种愉悦的感情波动所引起的心灵感应，它是微妙的，但并不是神秘的。

《雨蒙蒙的黎明》中的那位军官库兹明，是一位富有感情的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一直还过着独身生活，当他受伤后躺在医院里时，同病室的所有的人都接到过信，但没有人写信给他。他躺着，想象着自己战后未来的生活，那一定会是幸福的，不寻常的。现在当他伤愈后去休养的旅途中，在雨蒙蒙的夜间，一辆马车把他拖到一所带阁楼的小屋里，面对着一个可爱的，然而因为不幸的婚姻而有些感伤的少妇，有了一种异样的，而又使他感到幸

福的感情。可以说那是一种朦胧的爱。

他们的感情是不健康的或是轻佻的么？不，无论是那位海军中尉还是军官库兹明，都并不是真正地沉入了爱情的漩涡中。海军中尉少年时在克里米亚海边偶然见到一位姑娘，狂热地爱上了她，那不可能是真正的爱情。那只是刚刚走向生活的少年对爱的向往，也就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他认为现在的女歌唱家就是当年的那位姑娘，事实上并不如此，然而他是真实地这样想的。因为在女歌唱家身上，他看到了一颗美好的心灵，因而也寄托了爱的向往。

他的美丽的梦想是他少年时的梦想的继续和发展。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他不自觉地将当年的那位姑娘与现在的女歌唱家联系起来。军官库兹明对那位少妇的朦胧的爱的感情，则是由于他从战场、医院来到了一个如此宁静的和平环境中，面对着如此可亲的而又感伤的少妇，而他是一向珍惜那些在他身边一闪而过的美好的事物的，他的朦胧的爱的感情，事实上是对和平的生活的珍惜，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爱。

我们的解释并没有能够真正说清他们的那种微妙的感情。有时候，人的复杂的感情真也是难以说清的。但是，我们却能够体会。因为，不妨冒昧地说，虽然情况不同和性质不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微妙的感情。在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以及许多文学大师的作品中，也接触过和描写过这一类的微妙的感情。杜勃罗留波夫曾经说过，没有诗人，人类“许许多多美妙的感情与高尚的愿望，都会被我们遗忘”。我觉得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这两个短篇中所描写的那种微妙的感情也可以说是“美妙”的。它可以激发我们对生活的爱，对美好事物的爱，而且能培养我们对生活的感情的敏锐性和丰富性。它们并不是单纯的爱情故事。这当是这两篇小说为许多读者喜爱的原因。

那位海军中尉是单纯而热情的，那位女歌唱家对他也有着相应的感情（她说：我何必使他失望，或者使我自己失望呢？）。他们的邂逅可能是他们真正恋爱的序曲。而军官库兹明已四十多岁了，阅历丰富一些；那位少妇则是深沉的。而且，她的丈夫是他同病室的战友。

因而，他不会向她倾吐感情，她也不会接受他的感情（她说，或者她以为她是这样说：徒然……）。他们的邂逅好像是飘泊在人生海洋上的两只小船，偶然相遇又离开了，留下了一点怀念，一点回忆。《雪》多一点温暖和亮色。《雨蒙蒙的黎明》则漂浮着淡淡的惆怅。两篇都是美丽的，而《雨蒙蒙的黎明》更美一些：在人的感受上，美好事物的失去或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比美好事物的获得，要更美一些，因为它更激动人心。

要表现和传达这样微妙的感情是不容易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这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

他并没有细致地去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没有写到感情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只是写出那气氛，那情调，让你沉入了进去，因而也就体验到了人物的心情。而且，对人物的经历和身世也写得极少，甚至没有写。他只是顺便提到了女歌唱家曾有过不遂心的婚事；他只是写到那位少妇对待她丈夫那么郑重地带来的信的冷淡态度，因而我们想到她的婚姻是不幸的。什么原因我们却无从知道。作者也无意让我们知道，因为作品的重点并不在这方面。在别的小说中可能是缺点的东西，在这两篇小说中却是优点。也许只有在朦胧的色调当中才能更好地烘托那微妙的感情。主要的是依靠读者的体验和想

象，容许读者有体验和想象的余地。

当然，在这两位军官身上都有着巴乌斯托夫斯基自己的影子，他自己没有那样的感情是不可能表现那样的感情的。而且，可能他将他们“诗化”了，将过多的想象和自己的气质放在了人物的身上。但作者是以真诚的态度拥抱了他的人物，沉浸到了他所创造的天地中去，作者的情绪和描写的对象溶化在一起，作品虽然有些“诗化”了，却还是有着生活的实感。

巴乌斯托夫斯基是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他有着他的喜爱，他的憧憬。他怀着柔和的心在生活中去追求美和发现美，在他的标准和他能达到的范围之内。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没有为我们带来时代的丰碑，生活的浪涛。他是一个（如同他说苏联作家普里什文那样）“被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他为读者献出了许多美丽的花朵，那上面的晶莹的露珠是他的生活的爱的泪珠。有许多作家的作品使我们在激动的心情中对生活产生了沉思。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如这里介绍的《雪》和《雨蒙蒙的黎明》，则使我们的的心灵轻轻颤动，使我们在愉悦的心情中激发了对生活的爱，认识到生活中的美。他的作品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82年5月1日鄂城墩

艺术家的悲剧

——关于果戈理的《肖像》

果戈理的中篇小说《肖像》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洋溢着由于对生活的热爱而发出的青春的欢笑。《外套》、《鼻子》中则闪露着由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同情而发出的含泪的笑。《钦差大臣》、《死魂灵》中响彻着对官僚、地主们猛烈抨击的辛辣的笑。《肖像》却是沉重、暗澹的，而且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小说描写了一个青年画家的悲剧，其中流露着作者自己思想中的一些消极因素。这些因素后来的发展，也导致了果戈理自己的悲剧。在小说中，果戈理以作者的身份，有时是通过人物的口，表达了许多对艺术的卓越的见解，虽然其中也夹杂着需要加以分析的意见。小说的第一部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在第二部中，却明显地可以感到思想中消极因素对创作方法的影响，使作品偏离了现实主义的轨道。

《肖像》分为两部，并不是一个相互衔接的故事，使两部贯穿起来的，是一幅人物画像。画的是一个穿着南方服装，有着紫铜色的脸，颧骨高耸、形容瘦削的老人。看来肖像没有完工，笔力是令人惊奇的。最奇特的是一双眼睛，艺术家似乎在这双眼睛上用尽了他的全部才能和全部心血。那完全是一双活人的眼睛，像是从活人身上剥下来，嵌在画上的。

青年画家恰尔特科夫为这一双有着奇异的泼辣神气的眼睛所打动，掏出了他仅剩下的二十戈比购买了这一幅肖像。

夜间，在简陋的画室里，在朦胧的月光下，青年画家偶然接触到那一双眼睛时，不寒而栗，脸色陡地发白。他从床上跳起来，拿一床被单把肖像

蒙住。然而，他的心情并没有恢复平静，一夜为恶梦所扰。

这幅肖像却为他带来了意外的财富。在那偶然被折断的画框的裂缝中，落下一个装着一千金元的纸包。从此，他的命运改变了。他欣喜若狂。他没有想到的是，最终却导致了他的毁灭。

他搬进了涅瓦大街华丽的住宅。开始有顾客来光顾他，逐渐地他的名声愈来愈大，财富愈来愈多。然而，在艺术的道路上却愈走愈偏。他放弃了对于艺术的追求，迁就顾客的低劣的口味，只要对方希望把自己画成什么样子，他就画成什么样子。以至他的作品连最普通的优点都看不到了。真正的鉴赏家和画家看到它们只会耸耸肩而已。他却陶醉在上流社会的一片赞扬声中，吹嘘自己，以轻蔑的口吻谈论那些古代的艺术大师。

但是，他的艺术良心和艺术鉴赏力还未完全泯灭。有一次，当他去看一个青年画家的画展时，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在那些像处女般纯净、完美、秀丽的画像前，茫然失神。他在一瞬间觉醒了过来，仿佛熄灭了的才能的火花陡地又燃烧起来。

他的醒悟应该使他回到正常的艺术创造的道路上来。但他已糟蹋了自己的青春，再开始是艰难的。而且，他在浮华的生活中是陷得这样深了，简直没有再复生的可能。失望、嫉妒和痛苦使他萌发了最邪恶的念头。他开始收买艺苑中的精品，不是为了欣赏和珍藏而是撕毁消灭它们。不久，他终于在这种半疯狂的状态中发病致死。

果戈理描绘了这样一个年轻的画家——他远离人群、财富、纯洁而无私，孤寂地在一间破陋的小画室里默默地工作着，他是有才能也有所追求的，但无力也无法实现他的抱负。意外的横财使他从贫困的深渊中飞腾了起来，同时也诱发了他所有尘世的俗念。他享有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却失去了一个艺术家所应有的素质，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艺术匠人。果戈理对他这时的心理状态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他的生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一切热烈的冲动都萎缩了；有力的琴弦很难打动他的灵魂，他的心也不再被锐利的声响所盘绕；接触到美的东西，已经不能使纯洁的力量勃发为熊熊的火焰；可是，只要一听见金洋的声音，烧残的感情就会死而复燃，就会留心倾听它的诱人的音乐，慢慢地，在麻木中让这音乐完全把自己催眠。……他的全部感情和冲动都转向了金洋，金洋变成了他的情欲、理想、患得患失的对象、享乐、人生的目的。

他的成就和声誉令人眩目，事实上，那只是闪光的泡沫。他似乎达到了一个顶峰，事实上，却是陷入了一个泥潭。那幅肖像为他带来的不是幸运，而是灾难。

果戈理深刻地刻画了这个有才能的年轻的艺术家一步一步堕落的过程，他的心理变化，从而对那个摧毁艺术家的腐朽的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揭发和强烈的抗议。同时，也对浮沉于拜金主义浪潮中的艺术家们，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

在小说的第二部，果戈理企图解决腐朽社会与艺术家之间的矛盾。隐藏在思想深处的弱点使他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看清艺术家应该走的道路，他只能求助于“理想”，而那理想是违背了历史的方向的。因而他从现实主义的大师一变而为苍白无力的说教者了。

在这一部里，写了那幅画像的来源。那画的是一个来历不明的高利贷者。他为人似乎是慷慨、平和的，但向他借钱的人都遭遇到了不幸的命运，

以致人们很难把这看作是偶合，而从这中间感受到了某种神秘可怕的玄机。

一位画家为了要在一幅画上描绘一个魔鬼而想到要以那个高利贷者做模特儿，奇妙的是，那个高利贷者这时主动来找他画像了。画家兴奋地画着，为对方魔鬼般的神色所倾倒。

可是，当他的画笔一接触到那双眼睛，他的心里就涌起一种古怪的憎恶，一种不可名状的慌乱。以致他终于扔下画笔，实在不能画下去了。

那幅未完工的肖像第二天被送到画家家里，因为那个高利贷者已经在头一天夜间死去了。那以后，画家就感到莫名其妙的不安和烦忧，而且性格也起了显著的变化，他原是一个正直、诚恳的人，却变得妒嫉、粗暴，耍起各种阴谋权术来了。

而且，他创作的画中，开始流露出一种邪恶的感情。一位牧师批评他画的一幅宗教画：“人物的脸上没有圣洁的表情，恰恰相反，眼睛里倒有一点儿鬼意。”他自己也发觉，几乎给画中所有的人都装上了一双高利贷者的眼睛。他在气愤和疯狂中想将那幅高利贷者的画像焚毁，一位朋友拦阻了他，将那幅肖像要走了。画家的心理逐渐恢复了平静，而且为过去的行为悔恨。但是，那画像却为他的朋友和后来辗转成为画主的几个人都带来了不幸。知道这一情况以后，画家感到了强烈的震动。他认真沉思起来，整天神思恍惚。最后，他完全相信他的画笔做了魔鬼的工具。接着发生了三件不幸的事：他的妻子、女儿和小儿子接连不断地暴死。他认为是上天对他的惩罚，于是下了决心离开尘世，将仅剩的一个儿子安置在美术学校，自己隐遁到一个冷落的修道院里，不久削发为僧。后来又遁迹到荒山野地去，完全离群索居起来，历尽了各种程度的忍耐和只有圣徒传记中才找得到先例的自我牺牲。终于有一天，他回到修道院，又拿起了画笔，在禅室里关了一整年，以耶稣降生为题材画了一幅画。

修道僧们不大懂得绘画，可是都被画中人物的异乎寻常的圣洁感动了。

画家对到寺院来探望他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要求：“你可能会在什么地方遇见我对你讲过的那幅肖像。光看那一双异乎寻常的眼睛和非人间的表情就可以把它认出来——无论如何你得毁掉他……”他儿子终于在一个拍卖场所找到了那一幅画。他向几个竞争者说明了他必须得到那幅肖像的理由。但是，故事刚刚讲完，他和听众把眼睛移到墙上时，发觉那幅肖像已经不在——它被偷走了。

就从这简短的叙述中也可以感到，这故事是笼罩着浓厚的神秘气氛。在小说的第一部里，也飘浮着一种神秘性，那主要表现在对肖像的那一双眼睛的描写上，和在深夜里那双眼睛在恰尔特科夫精神上所引起的强烈的反应。在第二部里，这种神秘性加强了：凡向那个来历不明的高利贷者借贷的人都落得一个可怕的命运。而那幅高利贷者的肖像，影响和改变了画家和每一个画像的持有者的个性，并为他们带来了不幸和灾祸。在第一部里，对于那双眼睛的描述还可以看作是为了烘托气氛；恰尔特科夫因那双眼睛所引起的反应，还可以看作是为了表现他的性格。这样是加强了艺术效果和艺术魅力的。但在第二部里，神秘性却带着宗教的气息，是作者为了宣扬他的教义的一种需要，一种渲染。事实上，整个第二部都可以看作是为了宣扬一种教义而编造的一个故事。它不是从现实出发的，生活气息淡薄。

在这篇小说里，果戈理阐明了许多关于艺术创作的见解，其中有着他自己的宝贵的经验和体会，值得我们注意。他指出，艺术应该忠实于现实，

然而，“在创造和单纯模仿之间横隔着怎样不可估量的距离”。他指出，“画家是先把从外部世界吸取到的一切蕴藏在自己的灵魂里，然后再从灵魂深处，把这些东西谱成一支和谐的庄严的歌”。“艺术创造者即使描写低微的事物，也像描写伟大的事物时一样伟大；在他笔下，卑贱的事物已经不显得卑贱，因为无形中已被创造者的美丽的灵魂所渗透；卑贱的事物获得了崇高的表现，因为流过了他的灵魂的炼狱”。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艺术家们还是应该虚心地倾听并认真地思索的。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他所指出的道路：脱离现实，在苦行和对上帝的祈祷中去求得“宁静的高尚的激情”，要求艺术“发出奇妙的抚慰的声音……永远像祷告似的奔向上帝”。作为作家果戈理自己的道路和《肖像》第二部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小说第二部里那位画家的形象，远不及第一部那位青年画家恰尔特科夫的形象那样丰满。恰尔特科夫是一个有血肉有性格的人物，我们可以理解和体会他的思想感情。那一位画家是一个“理想的人物”，他高超脱凡，不能为我们带来生活的实感。在第一部里，果戈理对那个腐朽的社会如何摧毁一个艺术家的揭露是深刻的。在第二部里，果戈理所指明的艺术家的道路却是虚浮而错误的，他将古老的宗法制度美化了，宣扬了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由于作者不是着眼于现实，不是从生活中去发掘和提炼，作品在艺术上也是失败的。

读着恰尔特科夫的悲剧，我们不由联想起果戈理笔下的另一个画家的悲剧，我指的是《涅瓦大街》中的庇斯卡辽夫。这个短篇与《肖像》的写作是同一时期。庇斯卡辽夫真诚、热情、纯洁，追求着善和美。他的生活是贫困的。由于理想的破灭，在深深的失望中自己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他的才能没有可能得到发挥。恰尔特科夫年轻时也一如庇斯卡辽夫，他是被那个社会所腐蚀，丧失了艺术生命，才能也没有可能得到发挥。他们两个人象征着艺术家的两种不同的命运，然而都是一个悲剧。

而果戈理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人物呢？他以有着浓烈的传奇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开始了文学道路。在那里带来了乌克兰的绚烂的色彩，和劳动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同时震荡着青年果戈理由于对生活的热爱而发出的青春的欢笑。但是，当他逐渐成长，深入地面对现实时，他看到的是一个黑暗的俄罗斯。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历史使命。他说：“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节日和宴席被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被叫到这里来是为了战斗。所以，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战斗而来的，因而也不会选择危险少的场所。好像好的士兵一样，非把我们的一切向战争激烈的场所投去不可。”他将他的长剑的锋芒主要指向了残酷、腐化的官僚们和鄙俗、贪婪的地主们。他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第一部）是暴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黑暗、悲哀，并发出了痛切的控诉。但是，在思想上，他却匍匐在沙皇脚前，——而沙皇本人就正是最大的官僚和地主。而且，他美化古老的宗法制社会，认为那是俄国最理想的社会，认为封建农奴制是不可废除的。他提倡信仰主义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以为这样就能够消灭这个社会制度所带来的种种罪恶。他的这一切观点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与友人书信集》中。他对于官僚们、地主们的愤怒的揭露，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当时进步文艺界的一致好评，却受到了反动集团的疯狂的攻击。而他的《与友人书信集》，在上流社会中引起一片喝彩声，却受到了别林斯基的严厉的批判。果戈理在自己的思想的矛盾当中，也在社会对他的全然相反的评

价当中，感到深深的疑虑、不安。他说“我已经痛苦到极点了。我的精神和肉体都感到十分痛苦，一切都陷在跋徨中……工作就是我的生活，不能工作了，也就无法生活了。”在他四十三岁的壮年，在应该是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他却结束了生命，而且很可能是绝食致死的。

果戈理世界观的矛盾的复杂的内容，一直是文学史家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只想在这里指出，他原是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对劳动人民满怀同情的开朗的人。他理应成为一个真正的抒情的歌者，为我们带来灿烂的阳光和美丽的歌声。但是，严酷而黑暗的现实却扭曲了他的性格，使他的灵魂上沾染了一些庸俗的和错误的东西。在批判、攻击丑恶的现实时，他不愧为真正的战士。当他想指明通向将来的道路时，他却是一个浅薄而无能的说教士。

这一点，在他的力作《死魂灵》中表现了出来。小说的第一部，他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黑暗、腐朽的俄罗斯的现实，在辛辣的笑声中揭发了地主们的贪婪、猥琐和寄生性。但在第二部里，他却想臆造出几个正面的地主形象，“想要复活或救活那整个地主阶级”（阿垅）。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他不能不感到，这是艺术的堕落和虚假，因而，他在死前，焚毁了多年来惨淡经营的手稿。火光照亮了他受伤的灵魂和艺术家的良心。谈到《死魂灵》的第二部，我们就容易联想到《肖像》的第二部，在思想根源上，它们有相通的地方，而且都是由于屈从于错误的思想而损害了现实主义，因而都失败了。

在《肖像》的第二部里，果戈理创造了这样一个“理想人物”，一个认为自己是充当了魔鬼的工具的画家，到人迹罕见的荒野中去苦苦修行，终于达到了人的圣境，由于他已得到了不是混糅着世俗欲念的，而是宁静的高尚的激情，他在艺术上也达到了高峰。——但是，果戈理自己，却一直没有能够摆脱人世带给他的痛苦和烦恼。而当他想在作品中发出“奇妙的抚慰的声音”表现出“神圣的崇高的力量”时，他的作品却失去了光彩。

果戈理的悲剧应该引起我们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的强烈的憎恨，而且也应该引起我们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深思。1981年12月2日

雨果的沉思

——读《九三年》

《九三年》中有一节的题目是：《沉思中的郭文》。事实上，那也是作者雨果自己在沉思。在他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中，雨果提出了一个问题：人道主义（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他自己作出了回答。

他所提的问题是有着某种重要性的，而且他是通过比较丰富的艺术形象和生动的情节提出问题 and 回答问题的，因而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也引起了读者的沉思。

由于读者不同的立场、态度和看问题的不同的方法，关于这本书一直有着一些争论。

《九三年》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这次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

大的转折。它不仅使法国的封建社会彻底崩溃，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整个欧洲封建体系，开辟了一个资本主义更加广泛发展的时期。《九三年》指的是一七九三年。从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经历着复杂尖锐的斗争，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在这一年的一月，挣脱了封建枷锁的法国人民，愤怒地将路易十六的头颅像手套一样抛掷在全欧洲君主的脚下，向专制政体和贵族政治挑战。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封建王朝结成了反法同盟，派出几路大军向法国逼近，想将不满一岁的共和国淹没在血泊里。在国内，反动分子与国外的敌人相呼应、相勾结，阴谋活动日益猖獗。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纷争和矛盾也更加深化。在这种情势下，共和国确立了雅各宾专政，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这是著名的“恐怖时期”。

旺岱地区是共和国不得不带着忧心注视的地区。它在海边，交通闭塞，城镇很少。在广漠的大地上散布着贫穷的村庄和大大小小的森林、丛林。它像是一个孤岛——一个阴沉、险恶的孤岛，法国各地澎湃的革命浪潮只能在它的岸边激荡。当地最有权势的人物依然是贵族和神甫。长期在封建思想和宗教影响下的农民，保卫着压迫、剥削他们的主子，而与要解放他们的共和国军血战。——在反革命分子眼中，这是一个最好的基地；对共和国来说，这是藏在肚子里的一条毒蛇。

《九三年》反映了当时法兰西的整个形势，而以旺岱地区惊心动魄的斗争作为情节的中心。

有三个主要人物：共和国联队指挥官兼远征军司令郭文，政治委员西穆尔登，叛军领袖朗德纳克。这三个人物都是非凡的。

先来看朗德纳克。他是一个随着皇族流亡在英国的侯爵，现在受命潜回旺岱领导叛乱。

他从前是一个好色之徒，沉溺在花天酒地之中，而今老了，但身体健壮。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保王党，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叛军领袖所肩负的重任。他坚毅、沉着、勇敢，而且富有军事才能，反动集团挑选他担当这一重任是有眼光的。而且，他还有着一个叛军领袖所必需具备的两个因素：他的领地在旺岱，在当地有着巨大的声望和号召力。当他冒险从海上登陆的当天，就有七千人投奔，在一星期内就有三百个教区揭竿而起。他又是冷酷、残暴的。

他下令焚烧村庄，杀死伤兵，屠杀俘虏。他的残暴不仅是由于他的本性，也由于他对革命的刻骨的仇恨。他是共和国的最凶恶的敌人。

他的对手，共和军年轻的司令官郭文，也出身贵族，而且是他的侄孙。郭文在一个有着共和思想的家庭教师的教育和熏陶下，成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无比纯洁、善良，而又勇敢。现在，这两个贵族：祖父和侄孙，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各自为了自己的信念，在战场上兵刃相见。两个人都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不过，在惨烈的斗争中，几乎总是郭文占上风。

但公安委员会对郭文还是不太信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贵族，又与叛军领袖有着这样的亲属关系，而且，他是过于温情、手软的。在公安委员会的领袖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对敌人的宽大将造成革命的损失，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损失。因而，指派了西穆尔登作为他的政治委员，帮助他同时也监视他。

公安委员会的这一指派是正确的。西穆尔登早年当过乡间的本堂神甫，后来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属于激进派。他生活俭朴，工作勤奋，

全心全意献身于理想的事业。他理解革命暴力的意义和作用，以惊人的慈爱关心受难的人民，对共和国的敌人则是绝不容情的。

但公安委员会不知道西穆尔登是郭文幼年时的家庭教师。他没有家庭，将全部爱情倾注在他的学生郭文身上，将郭文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儿子。他和他的学生的分离曾使他异常痛苦。他没有想到革命的浪潮会又将他们涌在一起。他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看到自己教育的学生成了共和军的一个杰出的军事领袖，同时也满怀忧心注意到郭文对敌人过分的、有时甚至是无原则的宽大。他明确地对郭文指出过这一点，而且郑重地提出过警告：“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

这是三个强烈的性格的对比。这是三种强大力量的较量。在它们相互猛烈地撞击、斗争中，迸出耀眼的火花，那当中又飞溅着血和泪。

使他们之间的纠葛和矛盾深化的原因中，关系着三个天真可爱的小孩。《九三年》是以描写这三个小孩作为序曲的。

一个纯良而又几乎是愚昧无知的农妇带着三个小孩在森林中流浪。她的丈夫是一个已阵亡的叛军。她的家园毁于炮火。共和军的一支联队在发现他们时，他们由于饥饿已濒于死亡。联队出于同情收留了他们。后来，在一次叛军的袭击中，农妇连同三个小孩与一些士兵一齐被俘。朗德纳克下令枪决俘虏，农妇也包括在内。三个小孩则被当作人质带走了。通过几次大的战斗，溃不成军的叛军只剩下朗德纳克和十九个人被围困在他自己的城堡中，进行绝望的顽抗。一个意外的机会使朗德纳克和残存的几个叛军得以通过一条秘密的地道逃走，那三个小孩却被留在叛军放火焚烧的城堡里面。那个曾被枪决的农妇侥幸只是受了重伤，死里逃生。当她能够走动时，她疯狂地到处寻找小孩。她来到城堡跟前，看到了在烈火包围中的孩子，发出了撕裂人心的惨叫，而孩子们也用弱小的声音在呼唤妈妈。在场的共和军用尽了他们当时能够用的方法和力量。但城堡是坚固的，铁门是紧锁的，眼望着三个无辜的幼儿，三个可爱的天使就要被烈火吞噬了。在这紧急、绝望的关头，出现了奇迹：已经逃向旷野的侯爵，那个叛军领袖，竟又从地道中折返，出人意外地在共和军的面前，用钥匙打开了铁门，并且奋不顾身地穿过烈火，将三个小孩救了出来。他自己因而被俘。

当夜，郭文因朗德纳克的行为而陷入了沉思。他面临着一个使他不胜苦恼的问题：是处决朗德纳克，还是救他？

他的沉思是那样的深沉。从良心来说，他认为应该放走舍身救那三个小孩的老人。他在这个老人身上看到了“神圣的光辉”。如果处死这个老人就是“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一种慷慨的行为。……这是革命的弱点，这对共和国是一个贬值”。从革命的责任来说，他认为应该处决那个叛军的首领，因为他曾经犯下了那么多的罪行，今后也还将是共和国的凶恶的敌人。——在激动、痛苦的心情中，他反复深入地思考、衡量。每一面都有强大的、不可辩驳的理由；每一面都有它的严重的缺点和后果。每一个选择都似乎是对的，而每一个选择对他都是深渊。人道主义的良心和革命的责任感在交战。最后，他终于服从了人道主义的良心。像那个老人救那三个小孩一样，去救那个老人；像那个老人毫未考虑后果一样，他决定坦然地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深夜走进了土牢，让朗德纳克披上自己的斗篷混了出去，而他自己来代替那个敌人坐牢。

第二天早晨，西穆尔登十分震惊地发现了这件事，当即由革命法庭对

郭文进行审判。西穆尔登投了决定性的一票，判了郭文的死刑。作为政治委员，他亲自监斩。在晨光中，郭文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最后高呼：“共和国万岁！”正当郭文的头颅滚进篮子的时候，一声枪响，西穆尔登也用一顾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郭文的沉思就是雨果的沉思。雨果年轻时，由于母亲的影响，曾是一个保王主义者，后来才转变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他参与过一八三一年的七月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虽然他从一八六二年就开始搜集《九三年》的资料，动手写作却是在一八七二年，即在巴黎公社成立和失败以后。他所亲见和参与的革命斗争，引起了他的沉思。通过沉思，他虚构了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故事，在这中间寄托和表达了他对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的看法。故事曲折动人，又充满着激情，我们深深地被吸引了，在紧张的地方几乎要屏住呼吸来阅读，在感动之余，也引起了我们的沉思。

但是，我们沉思的结果与雨果的沉思的结果却是不同的。

当我们放下书本来冷静地考虑，首先对小说的艺术真实性发生了怀疑。

朗德纳克去救那三个小孩的行为是感人的。而且，他对西穆尔登说的那句话也是庄严的：“我允许你逮捕我。”他可以骄傲地说这句话。但是，在我们的感受上，他的这一行为太出人意外了。这种感觉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向残暴、毫无怜悯之心的朗德纳克，怎么会由于那母亲的一声惨叫（那母亲还是他曾经下令枪决的），就去援救那三个小孩（也是他下令要把他们烧死的）呢？这样一个思想十分顽固、反动，而且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的叛军首领，怎么会为了三个小孩而背叛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职责呢？

我们不否认，一个恶人有时也会发出一点善心，一个坏人也可能会转变。然而，那应该合乎人物性格的发展，应该有内在的根据。在朗德纳克由一个“魔鬼”变成一个“上帝”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发展和根据。雨果对于朗德纳克为什么会去救那三个小孩丝毫没有作一点心理描写，他回避了一个困难的课题。

那么，是朗德纳克的一时冲动么？但从作者对他的各种行为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就算他是一时的冲动吧，那也太偶然了。艺术创作中当然可以有偶然性，但那种偶然性是为了表现必然性，应该提高到必然性的水平上来。

雨果只是作过一点简单的说明：恶人的内心也会残留有一点慈悲心。雨果在这一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虚构了这一情节，而且在本书中是关键性的情节，以证明他的观点（“一个枪炮不能征服的魔鬼被摇篮征服了”），宣扬了所谓人道主义精神的胜利；同时，也是为了通过这一情节去引起郭文的沉思，以表达他要表达的主题（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种使人物的性格屈从作者的主观意图，使故事情节简单地迁就主题需要的做法，在艺术创作上是致命的弱点。在这里，说得婉转一点，至少也是一处败笔。

同样，西穆尔登的自杀也使读者感到意外。雨果对他的人物的这一行为也未作一点心理刻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投票决定郭文死刑时的痛苦，可以想象得到他望着自己亲爱的人站在断头台上时的悲哀。但我们想象不出他是在怎样的心情下作出决定和在怎样的心情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是因为失去了唯一亲爱的人，自己就无法生活下去了么？是因为感到郭文是圣洁、高贵的，判处了他的死刑，自己良心上不安么？是郭文临死前和他的一

次长谈中将他打动了，甚至说服了么？我们很难揣测。而在我们的感受上，像西穆尔登这样一个有原则性的坚毅的革命者，是不容易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就动摇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职责的。

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主题，雨果却不能不让西穆尔登自杀。因为如果西穆尔登在判处了郭文死刑后还活着，那就削弱了郭文牺牲的重大意义，郭文的牺牲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悲剧。

西穆尔登的殉葬，却会大大显示出郭文的胜利。

雨果钦佩西穆尔登，却更喜爱郭文，对他充满了同情和爱抚，在他身上赋予了各种各样好的品质。他既是一个勇敢的英雄，又是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一个年轻的圣人。他既能英勇地献身革命，又能维护人道主义的原则。雨果再三强调了仁慈和宽大：他释放那些反动的修女，因为她们是女人；他不肯将一整队狂热的老教士送上革命法庭，因为他们是老人；如果可能，他还要把王太子从碉堡里释放出来，因为他是小孩；当一个手执刀枪的俘虏冲过来时，他命令他的士兵闪开一条路，因为他不愿用一千五百人去对付一个人，如果不是西穆尔登的挽救，他几乎因而送了命。在他看来，“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在他的心目中，“恕”字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郭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朗德纳克的善行震动了他，使“他的最坚定的决心，他的最虔诚的诺言，他的不可挽回的决断，这一切都在他的意志的深处动摇了”。从他的性格来看，这倒是可信的。他救朗德纳克，是他的性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郭文就刑前的两次谈话值得注意。

一次是在审判他的革命法庭上。他承认“一件好的行为，离得我太近了，使我看不见一百件罪恶的行为，一方面是一个老人，另一方面是几个孩子，这一切站在我和革命之间。我忘记了那些被焚烧的村庄，被屠杀的妇女，我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英国，我放走了祖国的凶手。”他把自己的错误思想完全亮了出来，我们要批判他，大致也只能说这样一些话（另外只需加上一点：那个祖国的凶手将继续作恶，给祖国和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事实上，在郭文决定救朗德纳克前的沉思中，也考虑到这一点）。他是光明磊落的，勇于承担罪行，主动请求给自己判处死刑。

另一次是当夜他和西穆尔登的一次长谈，事实上是一次思想交锋。西穆尔登到土牢去看他时，他正在熟睡。一个第二天早晨就要走上断头台的人能够安然入睡，这正说明了他的从容和镇定，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品质。但是这也说明了他并没有因为认识到他对革命所造成的恶果而有所不安。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些话并不是虚伪的，在雨果笔下的郭文是太高贵了，他决不会欺骗。那是他在对革命的责任发言和认罪。他的从容和安然，则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是献身于一个更高的真理：人道主义。他在和西穆尔登的交谈时就说到：“既然我有了指南针，风暴对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变对我又有什么影响！”这里的“风暴”和“事变”指的是革命和现实斗争，而“指南针”和“良心”则意味着他的人道主义原则。

在郭文看来，革命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人道主义则是永恒的真理。革命是绝对正确的，但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它之上。因而在革命和人道主义发生矛盾时，他当然就必须站在人道主义那一边。

不过，使我们困惑的是：这种损害和背叛了革命利益的人道主义算得上什么人道主义呢？这种为了报答一件善行而宽恕一个曾犯下百倍罪行的敌人，让这个敌人去继续作恶、造成更多无辜者流血的人道主义，算是怎样的

人道主义呢？

无论郭文用了怎样动人的美丽的言辞，他并没有能说明这一点。

那个孤身一人，几乎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乞丐退尔马克，曾经营救刚刚从海上登陆的朗德纳克，因为朗德纳克过去对他作过施舍，他觉得应该回报；也因为在在他看来朗德纳克是一个“人”，出于同情，他应该予以帮助。但是当后来看到朗德纳克杀人放火的行为，曾两次痛心疾呼过：“我要是早知道啊！”——在他朴素的感情和真诚的悔恨中，要比郭文的那些漂亮的言词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孤立地看，郭文为了救朗德纳克而牺牲自己的行为是感人的；正如孤立地看，朗德纳克为了救那三个小孩而情愿牺牲自己的行为是感人的。而且，我们早已看到郭文是一个那样纯洁、善良的人，那样可爱可敬的人。看到他因而被判处死刑，看到他从容地一步一步走上断头台时，我们很容易产生同情。这正是作者雨果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郭文救朗德纳克和他的死，是一个悲剧，我们可以从中汲取重大的教训，然而却不是如雨果所期望的那样的教训。

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常常引起讨论的题目，特别是在一场大革命进行的当中和那以后，这个问题就常常被提了出来。不但是敌人用人道主义的名义对革命进行攻击，就连某些善良的，甚至为我们所尊敬的人，也都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对革命进行了批评，乃至否定。雨果在《九三年》中，也认为人道主义与革命不能两全，他将人道主义置于革命之上，指出了它们的矛盾，宣扬为了人道主义的原则可以放弃革命和背叛革命。

但是，雨果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也认识到革命暴力的作用和意义。在《悲惨世界》中，他借一个老共和党人的口说过“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中会被人谅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前进了。”在《九三年》中，他又借西穆尔登的口说过：“革命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革命在文明身上割开一道很深的伤口……”郭文在临死前也说过：“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指革命——引者）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有别的办法吗？它所担负的是那么艰巨的清洗工作！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这些话说明了革命的意义，采用暴力的必要性和不得已性，也说明了革命的成果“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不正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吗？然而，雨果没有从这一点深入下去得出应有的结论。看到革命有那么多的流血和牺牲，他的良心总还是有些不安，有些不忍。也可能革命暴力中某些偏差和某些过火的行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和假借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一些罪恶（这是应该避免的，但历史的错误有时也会重复），使他有些不满。于是，希望用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来唤醒人们的良心，希望用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来代替暴力。由于他的思想上的矛盾，他并不是那样雄辩的。从艺术上看，他编了一个多少有些牵强因而也就是不够真实的故事，不得不有意无意地违背了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主题思想上也是无力的，经不起深究的。雨果所宣扬的人道主义胜利了么？否！英雄郭文的高贵的灵魂连同他的神圣的理想，在他的教师的灵魂的陪伴下面，飞升到无极的天上去了，在还充满着苦难的尘世的大地上，让他们过去的战友（他们已损失了两个优秀的领袖）去同敌人（其中有被救的

朗德纳克)进行血与火的斗争。郭文不仅背叛了革命,也背叛了真正的人道主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郭文的死连同西穆尔登的死,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它对我们的教训是:浅薄的人道主义一超过某一种限度,就暴露了它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但是,对于雨果这种浅薄的人道主义,或者说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我们在给予必要的批评的同时,也须作出具体的分析。我只想指出一点,在认识这种人道主义的浅薄,有时还是虚伪和反动的实质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完全抹煞它对受难的人民的同情和对暴政压迫的不满。雨果用仁慈、博爱、道德这样一些药方来改革旧社会的想法,其本身是幼稚的,可笑的,但他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批判旧社会的罪恶,还是应该加以肯定。他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不过,在那些作品中,他的人道主义的批判对象是旧社会,而在《九三年》中,和人道主义发生矛盾的却是革命,所以,这种人道主义就大大减弱了它的光芒,而显出了更浓重的暗影。

雨果的一生几乎占据了整个十九世纪。在他的晚年,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已广为传播,无产阶级已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登上了政治舞台。雨果却还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思想上还有着很深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不过,他终究还是一个有着进步理想的政治斗士,他对受难者和被压迫者怀着深厚的同情,对人类的将来有着巨大的信心,而且在探索着人类前进的道路。他的思想、性格上的弱点和进步的方面,都明显地反映在他最后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它还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它反映了那个重要的时代。问题在于,我们对它所宣扬的那种人道主义必须有清醒的认识。1979年10月小阁楼

在大海面前

——从《迷人的海》谈到《老人与海》

看完邓刚的《迷人的海》,我很自然地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在这两个中篇里面,都写到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角:海;都写到了人与自然的搏斗,与生活的搏斗。这两个中篇在写法上也是有些相近的,都极省略地写到人物的身世、社会关系,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却又带着强烈的寓言色彩,表达了人生哲理。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1899—1961)晚期的作品,发表于一九五二年,那时候,他早已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大家了。这篇作品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也由于他长期以来在文学上的贡献,和他在当代文学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邓刚,用我们当前的标准来看,还算是青年作家:三十七岁,在文学事业中刚开始他的道路。《迷人的海》不是他的第一篇作品,却是他最初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我设想,他写这篇作品时,是多少受到了《老人与海》的影响的。

然而，这两篇作品又是不同的。题材不同，人物性格不同，那是当然的，我主要指的是，作品本身的主题意义和蕴含的感情的不同。那原因，不是在于两位作家年龄的差异，而是根源于作家本人的精神态度，他们对待生活的理解和对待生活的态度。

海，是多少古往今来的诗人、作家歌颂的对象。我们可以将许多美丽的形容词放在她的身上：辽阔、庄严、温柔、奔放、深邃、壮丽……然而，有时她又是凶恶的，有着狂风、暴雨、巨浪、暗礁、漩涡……我曾在一首小诗中说：多少人，多少人

在风浪中苦斗

在海的怀抱中沉没

在海水的咸味中融合着多少眼泪但是，海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她的美丽，而且也在于她的凶恶，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更在于她的凶恶。如果仅仅只能欣赏海的美丽的一面，那么，这样的人是并没有理解海，也不能真正地爱海的。

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记述过，在某一处的海岛上，渔夫们在一块巨大的圆花岗石上刻上了一行题词“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这题词使巴乌斯托夫斯基感到忧伤。而另一位作家却认为这是一行非常雄壮的题词，他是这样理解那意义的：“纪念那些征服了海和即将征服海的人。”

这位作家的理解是对的。

许多水手、渔夫决不会因为畏惧风浪就不到海上去；决不会因为畏惧死亡就不到海上去。当然，他们需要在海上谋生。但是，也因为他们对于大海有着深厚的感情。即使在岸上休息时，即使因年老不能再出海时，他们也常常向往着海，听到大海的呼唤。他们的雄心，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趣，就在于和风浪搏斗，和大海搏斗。在这搏斗中，显示出他们生活的力量，也显示出他们对自己的信心。

而大海，也正是生活的象征。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生活的海洋中。我们欢喜阅读描写海的文学作品，不仅是由于对海本身的喜爱，也是由于往往能从其中获得对生活的启示和激发在生活中搏斗的力量。《迷人的海》写了一老一小两个“海碰子”。他们从事的是这样一种行当：凭一口气潜入海水的深处，捕捉海珍。这是辛苦的，要在冰冷的海涛里浸泡，然后，爬上岸来，点燃事先准备好的柴草堆，让冻僵的身体在几尺高的火苗堆上反复烧烤，再跳进冰冷的海涛中去。这也是危险的，海上不时有风暴，海下有刀锋箭簇般的暗礁，而且还有着凶狠的狼牙鲛和鲨鱼……海碰子，那是将生命抛进大海碰大运的人。

那个老海碰子身形魁梧，有岩石般坚硬的骨架，牛筋般扭紧的肌肉，伤痕累累的身躯，黑胶板一样富有弹性的皮肤，那是五六十年来他在冰冷的海水里和灼烫的火烟中锻炼出来的。关于他，流传着一些传奇式的故事，在这一带海岸线上享有盛名。

而那个小海碰子看样子不到二十岁，几乎还是个孩子。翘起的鼻头和红嘟嘟的小嘴，脸蛋上还毛茸茸的，像一个注满汁水的小香瓜。他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家伙。

《迷人的海》是在这两个海碰子的关系上展开的。

这一带有两个海湾。在山那一面的，叫半铺坑，是一个平静的海湾，

即使风起浪涌，也伤不了筋骨。在山这一边的，叫大石湾，这里的景色雄伟、壮阔，只是海上海下都有着更大的危险。然而，这里有着更多更好的海珍，还有传说中的神物——为有着钢刀一样的身子，一公一母交错立在那里的错鱼守护着的神物。老海碰子一向是独自在这边——在这他认为男子汉的海中活动。而这一天，一个年轻的海碰子闯了进来，他也舍弃了那温柔的海而选择了这男子汉的海。

这一老一小两个海碰子开始是冷淡、疏远、相互轻视的。老海碰子不满意小海碰子的服装（穿着那样一身小挽领、紧贴身的摆浪的衣服，来逛海么？），也不满意于小海碰子手中的亮铮铮的鱼枪（世世代代的海碰子都使鱼叉，叉的鱼还少吗？那可是腕上的硬功夫，练不出来，便想新花样，懒人懒招儿）和窄窄的小脚上套着的大胶皮脚之类的“新式武器”（什么玩意儿），更不满意于小海碰子的傲慢态度（不先来拜上两句，就随便地摆开了架势，立了门户，真是太放肆了）。而小海碰子初初见到久已闻名的老海碰子时，也感到很失望：人们把老海碰子说得那样威风，那样神能，原来只是一个使着锈斑斑的鱼叉和可笑的葫芦头的老头子，他断定自己比老海碰子强一百倍。

但是，他们的关系终于逐渐转变为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结成了通过生死考验的情谊。

小海碰子虽然富有进取精神和勇气，装备了具有更大威力的新式工具，却究竟缺乏经验，在多次失败后，使他不能不像一个见习生那样向老海碰子学习。而且，有时是依靠了老海碰子的帮助，他才得以从困难和危险的状况中摆脱出来，他从内心滋生了对老海碰子的钦佩和感激的感情。虽然，他一方面还是在暗暗地与老海碰子较量。

不管怎样，老海碰子对小海碰子是怜惜和关心的，他不满意于小海碰子的自负、冒失，却也喜爱他的朝气和勇敢。所以，即使是开始的那种冷淡、疏远的关系中，他也还是在必要的时候帮助他，用威严、简单的话语教导他。他知道小家伙正在暗暗地与自己较量。这是一种挑战。于是他拚足了全部气力。他是不会让小海碰子超过自己的，他要永远是强者。但他从观察中终于知道不能小看对手。小海碰子的火枪的确比自己的鱼叉有着更大的威力和准头。虽然他是深深地爱着那生锈的鱼叉的，那上面有着他祖父和父亲的血，他拿着它战斗了一生。但它显然是落后了。而他自己也显然一天天衰老下去，小海碰子虽然嫩稚，却正是开始。当他意识到这些，一种痛苦的绝望的情绪就涌了上来。

而同时，在他的内心渐渐滋生着对小海碰子的一种愈来愈强烈的全新的感情。那原因是，他知道了小海碰子也正在寻求着、向往着那为错鱼所守护着的神物——那也正是他的先辈和他自己所寻求和向往的。当他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少年，就常常跟在村里送葬的队伍后面胡乱哭啼，后来，他自己也还是勇敢地扎进了这个浸着先辈的血水，凶险而迷人的海湾。现在，与他抱着同一愿望的青年出现在他的身边了，而且，是带着全身新的武装。他感到了两代人之间的联系，他在小海碰子身上看到了希望，寄托了希望。

所以，在那一天早晨，当他发觉小海碰子没有接受他前一天的警告，冒失地投入到风暴席卷的海中，面临着灭顶的危险时，他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危，跳进了噬人的激浪中，救出了小海碰子。而且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小海碰子的冰块一样僵冷的身子。

后来，他们又经历了一次为箭鲨追袭的危险。是小海碰子绑在脚蹼上的两块红布吓退了箭鲨。老海碰子原本是瞧不起这胆小者发明的玩意儿的，在那次经历以后，当小海碰子也在他的脚蹼上绑上两块红布时，他却觉得那像两股火焰在他脚脖上燃烧，他的整个身子发热了。

这一老一小两个海碰子，在一个共同的追求下，有了血肉的联系和通过生死考验的情谊。他们并肩战斗在浪涛滚滚的大海中……

这是一曲嘹亮而雄壮的赞歌。

这是对大海的赞歌。听说作者在少年时就从事海上生涯，对大海熟悉而且热爱。他细致、生动地刻画出了海的性格：美丽、温柔而又凶恶——因而是迷人的。

这是对为错鱼守护着的神物的赞歌。神物，永远闪耀着神秘的光辉，吸引着、鼓舞着世代的人去寻求它，去获得它；它引导人们永远凝望着前面，为人们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天地。

这更是对大大小小的海碰子们的赞歌。他们以寻求和获得神物作为希望，在蓝色的大海——那浸透着先辈们的血水中搏斗着。面对困难，是那样勇敢；面对危险，是那样无畏；面对将来，是那样充满了信心。前一代人哺育和教导着后一代人。他们都是强者，一代又比一代强。因而，他们总有一天会达到他们的希望——获得那“神物”。

用不着解释，这是对生活、对理想、对在生活的海洋中为理想而战斗的人们的赞歌。海碰子的那种精神是能够也应该体现在一切在生活的海洋中浮游着的人们的身上的。这曲赞歌也是对人们的热情的呼唤和激励。

《老人与海》也是一曲赞歌，在调子上就要低沉得多。

海明威也歌颂了一个老人，他衰弱、孤独，几乎为一切人所遗弃。他独自驾着一叶小舟在茫茫的大海上，先是与一条捕得的大鱼搏斗，后来又与一群追食着大鱼的鲨鱼搏斗。他失败了，鲨鱼吞食完了他捕得的大鱼，留下来的只是一副鱼骨。他也胜利了，因为他能承担各种痛苦，因为他以坚韧的精神与困难、艰辛、死亡战斗过，他失去了一切，却并没有被打垮。

这个老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但比起老海碰子来，他就缺乏那样一种昂扬的气概。老海碰子对自己的力量、对将来都充满了信心，无论情况是怎样困难，他永远在一个希望的召唤下抬着自己的头。而这个老人，在茫茫的大海上，却时时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和渺小。在一个紧接着一个出现的困难中，他常常渴望休息，渴望得到好一点的“运气”，而且常常不自觉地呼喊上帝，这不仅是出于一种宗教习惯，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和无力感。并没有任何美丽的希望激励着他，他所要求的仅仅是起码的温饱而已，而这也是如此不易。

《迷人的海》中写了一老一小两个海碰子。在《老人与海》中，除老人外，也写到了一个少年。那两个海碰子寻求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都是强者。小海碰子从老海碰子的经验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而他有着更新式的装备，因而将是更强的，他将沿着老海碰子踏着的浪头干下去，更接近于那个目标。《老人与海》中的那个少年只是老人的陪衬。他是老人最亲近的伙伴，和老人一道出海打过鱼。他关心老人，给予尽可能的照料。他敬佩老人，看到老人的失败和那双满是伤痕的手，他哭了。当他长大后，他也会像老人那样在海上斗争的。然而，可以预感到，他的命运也只将是老人命运的重复。

《迷人的海》和《老人与海》都是带着寓言色彩的小说。在那中间，各自体

现着作者对现实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态度。在海明威的眼中，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困难、厄运和危险的。他歌颂那些坚韧不拔地搏斗着的人们，用以激励读者，也激励他自己。然而，他又感觉到，即使个人是强者，在茫茫的海洋中，总还是太渺小、太无力了，他可以承担一些痛苦，克服一些困难，他在精神上不会被打垮，但终究是不可能战胜生活的。他命定只能做一个失败的英雄，做一个有顽强精神的弱者。海明威的心情是沉重的。而我们年轻的邓刚对于生活是充满了乐观，他相信人的力量，他相信理想的力量。他满怀希望地眺望着将来。——与那个老人和那个少年比较起来，一老一小两个海碰子是真正的强者。我们也可以说，与海明威比较起来，邓刚是更开朗，也更幸福。

这是两篇带着强烈寓言色彩的小说。它们都没有展开主角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也极少接触到人物的身世，而是将中心放在人物与大海的搏斗上。因而，我们无法谈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只能比较体现在作品中的作家的精神状态。那是由他们的世界观决定的。同时，这里面也还有社会因素：海明威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家，看不到他笔下的英雄在他们生活其间的那个社会中的出路，他的迷惘的心情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个社会的否定，虽然是一种消极的否定。而邓刚则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祖国光辉前途的坚定的信心。

当然，在艺术手法上，海明威是比邓刚成熟、老练。我只想指出一点，在《老人与海》中，生活气息是更浓厚一些，老人的性格也较丰满，而《迷人的海》在情节的安排上有点过于追求寓意的表达，那两个海碰子的性格是稍嫌单纯了。但是，邓刚对待生活的激情和昂扬的精神是可贵的，他使我们更热爱那迷人的海，使我们也向往那为错鱼所守护着的神物…… 1984年3月9日鄂城墩

深沉的灵魂

——读休士的《黑人谈河流》

我熟悉河流：我熟悉那些像地球一样古老的河流，比人类血管里流的血液还要古老的河流。

我的灵魂成长得像河流一样深沉。

我在幼发拉底河中沐浴，当朝阳还是年轻的时候。

我在刚果河畔盖小茅屋，河水抚慰我进入梦乡。

我眺望着尼罗河，在河边建起金字塔。

我倾听密西西比河的歌唱，当亚伯·林肯顺流而下新奥尔良，我看见它的浑浊的胸膛在夕阳中闪着金光。

我熟悉河流：

那些古老的幽冥的河流。

我的灵魂成长得像河流一样深沉。这是美国著名黑人诗人休士（1902—1969）发表的第一首诗，题目是《黑人谈河流》。写这首诗时，他还是一个中学生，不到二十岁。而这是他著名的诗篇。

我初读这首诗，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当时不大能领会诗的涵意，但感觉到了诗的美，感觉到了流动在诗中的真挚的情绪，受到了感动。几十年来，我曾多次重读——这是一首经得起多次重读的诗，而由于多少地接触到一点黑人的历史，对于这首诗的感受逐渐更深刻了一些。

近两百多年来，一部黑人史是血泪斑斑的受难史。黑人受到侵略、镇压、剥削，而且成千上万的人被强迫离开了他们的故土，主要是运到了美国，成为奴隶，像牲口一样地被拍卖。他们的悲惨的命运在小哈里特·比彻·斯托的著名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近几十年来，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状况逐渐地有一些改善，但还是受到歧视、迫害。

但同时，黑人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了一部斗争史。他们在受难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还爆发过几次震动了美国的起义。在黑人文学中，就有着不少号召黑人起来斗争、反对种族歧视的作品。休士自己也写过不少这一类的诗篇。其中著名的如《让美国重新成为美国》、《我也歌唱美国》等。在《黑人谈河流》中，作者没有接触到黑人的受难和斗争。它只是通过黑人种族与几条河流的联系，象征性地然而又是形象地表达了它的历史行程。但是，这首诗却是有助于激发黑人的斗志的。

诗人所要表达的是：黑人是一个古老的种族，曾经有过比较平稳的岁月，在大地上辛勤地劳动，对人类历史也作出过贡献。作者用充满了诗意的形象和深挚的感情叙说着黑人的过去，可以说，年轻的休士是有些将那美化了。他不是故意这样做的，而是由于目睹了当前的黑人的悲惨的命运，使他在眷恋的心情中回顾了过去还没有沦为奴隶时的黑人的生活，而且不自觉地赋予了它以诗意和色彩，用以来同惨痛的现实相对照。诗里面还写到了为黑人的解放斗争过的林肯从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新奥尔良时，“我”倾听密西西比河的歌唱，而河流的“浑浊的胸膛在夕阳中闪着金光”。这里闪耀着——虽然是朦胧地——斗争和希望的光波。

诗人通过具体的形象将黑人的历史与几条古老的河流联系起来，这构思是巧妙的。而全诗的重点更在于表达这一点：

我的灵魂成长得像河流一样深沉。

短短的十几行诗中，两次重复了这句话，而且是将它作为全诗的收束：一个回荡着的余音……受到歧视，受到迫害，然而，我的灵魂是你不能摧毁的。事实上，诗里的河流我们还可以赋予它另一个含义：生活的河流。我是在那些古老的河流中，也是在生活的河流（那里面浸透着我的血水）中成长得更为深沉的。

这首诗，没有直接号召斗争，但对于黑人，这可以起到启发和激励的作用，使他们觉醒起来，增强自信和尊严感。这正是为了进行斗争所需要的。而对于迫害他们的人，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虽然受到这样的歧视和迫害，我们还有着像河流一样深沉的灵魂，因为我们没有被征服、而且不可能被征服的。

诗里面的“我”，是指的黑人种族，年轻的诗人所表达的情思，凝聚着个人的独特认识和感觉，但那的确同时表达着广大黑人的思想感情。通过抒发自己的认识和感觉，达到将自己与“大我”融合在一起的境界，这正是诗人最可贵的品质。

记不起是哪一个美国诗人，当人们要他解释他的诗时，他说：你要我用笨拙的语言将诗复述一次么？而我在这里，确实是用笨拙的语言复述着休

士的诗，其中还可能有一些牵强附会甚至歪曲了原意的地方。但是，我表达的是我自己读了这首诗后的感受。至少，我的感受有一点应该是对的：遭受过无数苦难和有着悲惨命运的黑人，有着人的尊严感，是永远不会屈服的。而且，他们一定会有他们的光明的将来，一如休士在另一首诗中所歌唱的：

我们应当有一个太阳的国土而不是这个生命寒冷的地方《黑人谈河流》这首小诗，是单纯的，然而并不简单。在诗里面，单纯是力图将丰富的生活体验通过凝练的方式传达出来。

而且，既然是生活体验，那当中当然也就流贯着真实的感情。这感情表面舒缓、平静，却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力量，显示着深沉。这诗的节奏是并不强烈的，而在这并不强烈的节奏中，内在情绪的回旋却达到了一种超出一般的力度。它像一条河缓缓地、缓缓地流进读者的心中，在读者的心中激荡着……

《听笛人手记》后记

这本小册子中的短文，都是关于外国文艺作品的读后感。其中《在大海面前》虽主要是谈我国青年作家邓刚的《迷人的海》的，因为也联系谈到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以也收进来了。

写得最早的一篇是《阴影中的凯旋门》，在一九七四年。十年浩劫中期，我因有病，得以走出了“牛棚”，摆脱了劳役，在家里休养。我的书是早已被抄得一干二净了。病中寂寞，也由于积习，很想读一点什么，就向几个还敢于和我交往的年轻的友人求助，他们是还有办法弄到一些书的。在借来的书中，就有雷马克的《凯旋门》。这本书我早在解放前就读过，也就是一般地看看，觉得写得不错，但内容早已忘记了。这次仔细地重读了一遍，引起了许多感触，就在激动的心情中写下了那篇读后感，其中是寄托着自己的某些情怀，融合着自己的某些心情的。当时当然完全没有想到发表，只是和另外写下的几篇短文以及一些诗，悄悄地在几个接近的人中传看过而已。

没有想到，五年以后，在一九七九年的四月，正在筹办的《外国文学研究》来约稿，我就带着试一试的心情将这一篇送了去，后来就在该刊的第一期上发表了。当时我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因而，我不能不感激该刊主编徐迟同志和其他几位编者的好意和感佩于他们的勇气。在被迫离开了二十多年后，我是带着这一篇文章重新走向文坛的（那以后不久，《诗刊》也发表了我的诗）。

这篇东西在读者中引起了一些反响，有几位我所尊敬的友人也表示了兴趣。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后来，《文汇报》的主编梅朵、谢蔚明同志约我辟一个专栏，我冒昧地答应了。专栏定名为《听笛人手记》。那是因为在写《阴影中的凯旋门》的前后，我还写过一篇短文，介绍了柯罗连科的中篇小说《盲音乐家》，用意在于表达我对当时虚伪的创作倾向的厌恶，那收尾是这样的：“我多么希望，在我的窗口也能听到那样动人的笛声，有着特别真挚的感情、有着纯洁诗意的笛声……”。我想在《听笛人手记》的

总题下，写一点有关外国文艺作品的读后感。

开始，我还能坚持一两个月写一篇，后来就时断时续，几乎停顿了。

这是由于我还有一些别的杂务，当然也是由于我的懈怠。但也还有一个原因：写这样的东西，我感到很吃力，而且并不是随便选一篇作品，就可以提笔写的。我不是作一般的作品分析，而是想写出自己的感受，并寄托自己的情怀，通过对作品的解释，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生活、对艺术的某些追求。甚至有时只是借题发挥，介绍作品倒是在其次的。

因而，我只能评介使我激动，并引起了我的深思的作品，它可能并不是长篇巨著。

所以，我是毫无计划性的。我写《海的沉默》，是想探讨一下“人”的问题；写《悲剧与赞歌》是关于人生与艺术的思索。我想到要谈一谈《沉重的时刻》，则是因为有时候我也经历着对自己失望、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刻，想通过托马斯·曼笔下的席勒的奋起来鞭策自己。谈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文章有好几篇。他作为一个有独特风格的作家，是值得注意的，而我对他确实也有所偏爱。

考虑到我所介绍的作品未必都是读者读过的，而且，也为了写得较为生动，我对作品都作了简短的复述。这是一项看来容易而在我是异常费神的事。我不仅要表达出那主要情节，而且想传达气氛和情调。在情节的复述中，也就夹杂着我的议论和感想。总之，我试图不要写得那么干燥和枯涩，不要败坏了读者对原作的印象。

我不知道我的努力收到了怎样的效果。当一位前辈友人告诉我，他看了我的介绍以后，又重读了一遍《海的沉默》时，我感到欣慰了。我也很感激一些友人的鼓励，使我有勇气将这本单薄的集子奉献给读者。

曾卓 1984年12月15日 门槛

山 居

——小记之一

如一只小帆船，搁浅在沙滩上，我在那所空落的房子里住了半月，现在又移居到山中朋友家来了。

孤零的一排平房坐落在山腰。屋前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园子，零乱的栽种着一些我喊不出名字的花木；野草丛生，衬得非常荒凉。其实，这就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前前后后都是山，虽然下山再走不多路就是大街，但这里毫无市声的喧嚣。日夜只听见树木为风所欺凌而发出的哀鸣。想起两句诗：“夜坐听风，昼眠听雨”，就常悠然地笑了。

朋友是一个不多见的沉默人。如我一样恰恰只有一个年轻人的年纪，却为一些不当烦恼的事烦恼着，常常有一支烟吊在嘴上。看他在暮色里，一人独坐在园中，青烟从口中缓缓吐出，迷惘地看着远山，若有所思。他的苦痛我了解，按说是应该劝一劝他的，但这两天，自己也因一点小事感到郁郁，有时且不免要从他手中将烟卷接过来。所以开口不得。

来到山中不满十日，已像挨了好久的岁月。才一到这里，风雨也就跟着到了这里。白日，坐在窗前，看苍白的天空，细细的雨丝。夜来，山居习惯早睡，朋友和朋友的家人都安寐了。我独自坐在山屋里，将正在看的书合拢，将烛光吹灭，夜色就漫进了屋子。站在窗前看看，四面黝黑，不见一星灯火，如站在稀有人迹的荒野中。曾听友人说，月圆的夜间，还听得见狼嚎与猫头鹰的悲啼，那境界想起来很神往。此刻却有松涛声与风声令人觉得凄凉。

这样的白日与黑夜，冥坐室中，很易有所思念。离开原来住处的前两天的黄昏，和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在田埂散步。绕了一个不小的圈子，又望得见她的家屋的时候，她说她该回去，握着我的手说：“再会。”走了几步，却又回头问我此后将到哪里去。我笑着讲：“不知道，大概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吧！”她睁大了眼睛，似乎奇怪我的“不知道”。接着她指着远远的山峦和白云：“比那还远么？”

现在想来，似乎有点悲哀，正如和她散步一样，我还在这连接着的山中绕圈子。“远方！”好响亮的名字。但也如同她所指点的白云一样，给我多少异样的想往呵。我只能遥遥的看一看，低头瞧瞧自己踏破皮鞋的双脚，因而羡慕在天空任意飞翔的巨鹰的双翼。

我想到许多世事实太难说，譬如住在山间友人家，饱食终日，应该算是属于所谓“享清福”的了，我却常常有着一些难言的感情。

原因呢？

莫非我是想起黄昏时陪我散步的小女孩？也许是的。孩子们的天真与纯洁，明明使我看到了未来的日子。

莫非我是厌恶自己在这样的夜间，写着这样的文字？也许是的。我不说文字无能，它能够做到刀枪所不能做的事。但我还有应该做的事，我怎能久居此地。

还是推开窗子看一看吧！怎样的一天星斗！但愿明日好晴，我真该去了，肩我的行李，告别好心的朋友，走我的路……1941年8月

星

——山居小记之二

夜间，几个朋友摆几把竹椅在山头纳凉。山中不知早暗。满山虫声“唧唧”，四野却依然显得十分寂静。四面都是山，缀着参差的松林，黑黝黝的，比天空还黑。偶有几粒灯火，也不及满天的星亮。

提到星，是的，这两天的星星繁多。也许是因为久雨新晴，于我特别感到亲切。朋友们谈着天，我却沉默不语，仰头看星。

听到旁人提及童年，母亲向他们指点那些星的名字时，我总感到一些惆怅。我的母亲是苦命人，整日劳碌，一任我的童年消磨在顽皮与撒野中，不必说教我认识星，连她自己都可能不认识。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我爱上了星。她们遥远而又亲近，古老而又年轻，

明亮而又神秘，引起我许多遐想，并给我以心的安宁。

现在，星星就在我头上。除了北斗外，我一颗也叫不出她们的名字，却又似乎如此熟识。我有着一些关于星夜的回忆。我默念着一些关于星星的诗句。

然而，唉，看：那边有一颗星，曳着长长的银色的光尾划破长空落了。如此美丽，如此响亮。

那颗落的星叫什么名字？……且住，我记起了谁的一句话：流星来去，自有她的方向，不用人知道。

自古以来，许多星曳着最后的光落了。而依然有无数的星用生命的光照亮长夜。如果没有星，夜将多么黑暗，多么寂寞。我仰头看星。她以清辉照我。我们无言地相互诉说…… 1941年8月

过 客

这是在山里很难遇到的好天气。夜半慢慢积砌起来的雾已经散了。太阳显得分外明朗，像一只温暖的手，一直烫到人的心上，伤心痒痒的。江水奏着的也是轻快的曲子。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下午，我和我的朋友在散步中度过去。这里的冬天没有雪，却常有阴霾的天。在这样的天空下叫人有笑容似乎也很不调和，不过就是在像今天这样好的天气，我和我的朋友也都没有笑容。

这朋友平常是欢喜跳跳闹闹的，和他在一起，会使你永远感不到沉闷。你和他从那阶梯上走下来，他就会在石级上跳舞。你的忧愁刻在脸上，他就轻快的唱着：来呀，把你的忧愁扔到一边乐，乐，乐，

把你的脸儿乐得大又圆，就是这样乐

……

但今天他却变得异常沉默。只是随手摘几枝野花野草，玩玩又随手扔了。

“生活要就是一瓶果子汁，要不，就是瓶老酒。”他说：“然而我们目前过着的呢？——一杯白开水。”

我有些奇怪这样的话会出自他口中。但生活的平淡是谁都感到的。这对有些人很适合：有着不算太好而也并不算太苦的日子，无风无浪。日子是静静的溪水，轻轻地平稳地流走，世界上大的变动如一块小石，投下来也会使水面起一点波纹，但不久又平息，如什么都没有过一样。

“唉，生活的寂寞，谁懂得？”

我的朋友对着一抹紫色的远山，发出了喟叹。

年轻者谁没有热烈的梦呢？无垠的沙漠中一扬鞭，沙尘随马蹄飞起，或是冰天雪地中，黑夜摸索行军，虽不免痛苦，却是谁都渴望着的。既是如火如荼的时代，年轻人就应该有着如火如荼的日子。然而，我们却只是将青春的岁月消磨在这小镇中。在江边的沙滩上晒太阳，在小酒楼上吃酒，在月下的石桥边谈情。——这是怎样的日子呢？我用一篇小说的题目来称呼我和

我的两个同伴：“《三个无聊的人》。”

中世纪的骑士梦是应该被抛开的，然而要求的也决不是这样清闲的如隐士一样的生活，原是被放逐来这里的，此刻我想着：“我该走了。”和朋友在长长的散步后都有些感到疲倦，各人想回自己的地方休息去了。我将我的意思说出，他似乎有点惊愕，但随即就说：“嗯，走了也好。”

“我要走了。”这话多少含着悲凉的意味。走了，到哪里去呢？各地原都不缺少遮拦人的眼光和锁住人的脚步的山。独坐小屋，就静静地思索。其实，要走，也不全是我的意思：有时人们常是在莫名其妙的情形下被人撵走的。但思索得毫无结果。年少闯荡江湖，几年来，一地不容安身即挥袖而去。但这里既不容，他处也难留。就是这样，匆匆地来来去去。现在又嚷着要走了，一面就捡点行装：一背包，一小箱，如此而已。心情随着散乱的行李而紧缩，而沉了下去，我渐渐地感到悲哀了。

用一些感伤的字眼来形容对一个将离别的地方的留恋，原是多余的事。但虽是曾经感到厌倦，临走时，对留下的一草一石，却无不觉得可亲。何况这里还留下了许多好心的友人，留下了谈过多少蜜语的石桥，留下了徘徊过多少次的黄昏的林子，留下了青春的脚步和荒唐的心……我说过我永远是一个过客，负着沉重的祖国的与感情的重担，在沙漠中，艰辛地蠕动着游走。风大路长，多少次被迫倒下，而又痛苦地挣扎站起，继续走我的路。

我自己也惊奇会写得这样感伤，然而也并非不可解。是感情的脆弱或浪费么？但请申斥者看我年轻的心。——而且，我想，明晨的太阳会将我身上的阴郁洗去。一切苦难原是预料到，也可算是自己安排下的。既是从战斗中来，也将勇往直前，战斗下去。

是怎样悄悄地来的，也将是怎样悄悄地走了，虽然还不知明夜落谁家。我想为好心的友人留下一点惜别之情，执笔在手，却什么也写不出。临了，还是引了庄子的几句话：“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

于是，明晨，我将如一支启碇的小船，将手帕如长帆那样高高扬起，而且轻轻的挥一挥…… 1941年1月黄桷树491曾卓文集

门 槛

屠格涅夫有一篇以《门槛》为题的散文诗，那里面将门槛象征为走向前进的道路。那个站在门边的女郎，虽明知门槛内是寒冷、饥饿、危险……却还是勇敢地跨进去了。据说这首散文诗是歌颂苏菲亚的。——我这里所说的门槛却是另一种。

我幼年时的大多时光，是消磨在门前的行人道上：打弹子、踢小球、捉迷藏……有时还打架。当同伴们零落地散去以后，我就欢喜独自守坐在门槛上。看看天上的云，看看落日光跨过大街，又跨过对面的屋顶，渐渐地消失了。小小的心里，似乎也感到了寂寞。于是又回过头来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我想，他们这样匆忙地是要到哪里去呢？——这类似的语句我后来曾

在一篇散文中谈到过，那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生的苍凉之感。而我那时所有的却是对那些自由行走的人的羡慕，想着他们是见到过一些很美丽很新奇的地方，而又在向更美丽更新奇的地方走去。于是暗自发愿，当我长大后，也要走出这条大街，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自然，后来我是长大了，而且，也走出来了。但一切却并不如童年时所想象的那样美丽。倒是如大家所知道的，在行走的路上，我们就要遇到荆棘、小坑、沙漠、山谷、绊脚石……和偶一不慎就要失足的独木桥。以致我们疲乏，浑身布满了创伤，脚上不停地滴血——然而，我们也还是在这样地走着。

有时候，在几乎要被疲乏、创伤压倒的时候，我就变得有些脆弱了，渴望休息。于是像幼年时一样地又在门槛上静静地坐着，看天，看云，看落日光，看旁的人们在大街上行走。

这一次，对于那些行走的人，我感到的是另一种羡慕：我知道这一条路并不平坦，我钦佩那些毫不气馁的过客。同时，我也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痛苦。

昨天，读到一个外国剧本：《生命在呼喊》，描述一个重病的老教授，虽然他的女儿和友人都劝他好好休息，他却坚决地要在他临死之前完成他的一个有益于国家的科学报告。结果，他以生命为赌注，完成了志愿。他对女儿说：“假使风瘫只留给我一只眼睛来看世界，一只耳朵去听它的声音，就是这样我也不会放弃生命的……当我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我还能够跟着这个世界前进……你还记得我的祖父吗？他整天无所事事，习以为常地坐在门槛上面，瞧着马路，我不能够像他那样生活下去。”

他，这个垂死的害着风瘫的老者，对于生命有着这样坚强的执著，而我——二十岁的年轻人，却因疲累而像那个老人的祖父一样，坐在门槛上，眼看着无数的人们，包括那个垂危的老教授在内，跨越我前进。我能够不感到惭愧吗？那么，肖镑，离开你罪恶的门槛，站起来，走过去！从荆棘、绊脚石上跨过去，从沙漠和荒野上跨过去…… 1943年12月13日深夜附注：这篇小文发表时用的是肖镑的笔名791曾卓文集

秋 天

落着雨。几天来都落着雨。乡村的道路非常泥泞。我和我的同伴只有困坐在阴暗的小屋里。天空阴沉沉的。窗外，一棵高大的黄桷树兀立在风雨里。

我坐在窗前读着托尔斯泰的《幼年》。我的同伴靠在那边的躺椅上，默默地抽烟，似乎在想着什么。

托尔斯泰伯爵带我走入了古老的俄罗斯，走进他童年的家庭，看他们一家人愉快地进餐，我和他们一道乘着马车到莫斯科去，参加他们的舞会，感到了新奇的快乐，又伴着他们回到乡村别墅……

但是，在半途突然被惊醒了。惊醒我的是一种广大的空虚的寂静。

我抬头四望，想要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我困难地认出了这是一个星期前我来借住的我的同伴的家。我的同伴还是躺在那边，默默地抽烟。蓝色的烟雾在小屋里飘浮着，像飘浮在山谷中的薄雾。

窗外的雨还在落。细细的雨，飘下来没有声音。

我想继续读我的书，但已读不下去了。沉重的寂静使我烦乱。一些杂乱的片断的回忆浮现在我眼前：童年的大街，我曾经路过的一座小城，一个被遗忘的友人，一次偶然的邂逅……凡是我想起的，都使我忧郁。落雨的秋天的回忆是很忧郁的。

我以祈求的眼光望向我的同伴，希望他向我说一点什么。就是说“我们多寂寞呀！”也好——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发现我在看他，又燃上了一支烟。

我坐着，望着窗外的雨。就像一个人在荒凉的河岸上，要过河去，没有船。就这么坐着，望向不可知的对岸……

听 歌

有一段日子，我漂泊在贵州的一座小城里。如贵州的其他的许多小城一样，那座小城是荒凉而寒伧的。它座落在一个深谷中，四面都是荒秃的高峰。除了夏季，山上始终披着白雪，在有阳光的日子，闪烁着刺眼的光芒，美丽得如一篇童话。但小城的生活却沉闷寂寞。

就在那里，我看到过好几次苗女的歌舞。

那都是在僻静的街上。黄昏时，三个或四个头上高高地盘绞着英雄髻，胸前交叉着十字白布的赤脚的苗女，静静地走来了。吹响唢呐。于是人们渐渐地围紧过来。当一个小圈形成的时候，歌舞就开始了。一个中年苗妇吹着音色单调、有点悲凉的唢呐，其他的苗女应合着节拍，唱着苗歌，摇摆地跳着。那歌声和跳舞的步法都非常简单，却有一种动人的风格。

观众们，我是说，小城中的人物们，在灰色的冷淡的日子中，任何一点娱乐，甚至纠纷，都是他们的节日。当苗女们歌舞着的时候，他们鼓掌，叫嚷，高笑，说着轻薄的语句……苗女们，都健康而年轻，在戏谑的喧闹中，她们红脸，闪动着怯生的眼光。她们表演歌舞，在我的感觉上，有点生硬，缺少流畅的旋律。那原因非常明白，是由于她们此刻不是在她们的故乡，在深山密林中间，在月光下面，在熊熊的篝火或情人的窗前，而是在小城的街上，在陌生的人们面前。她们表演歌舞，不是因为青春的强烈的欢乐，而是卖艺……歌舞完了。吹唢呐的苗妇，用一个布袋向观众收钱。其余的少女们就站在一边，低垂着头，有着不自然的、羞怯的表情。但掏钱出来的观众很少，人们大都一轰散去了。这时候，我总是凝视着悲哀的、失望的苗妇的脸，从那上面，我读出了使我深深感动的东西……

前天，在一个幽静美丽的晚会上，我听到了一个老年的歌者的弹唱，他是新疆人，听说是极受崇敬的有名的歌唱家。不知在什么情况下面，他流落到这个喧闹的、没有绿色的城市中来了。他不懂汉语，却穿了汉人的衣服。

矮矮的健壮的身体，光着头，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白色的胡须飘在胸前。在屏息的群众面前，在金色的烛光的闪动中他开始了歌唱和弹奏。我不知道那长长的、类似琵琶的乐器叫什么名字，它发出轻微的，颤抖的声音，配合着老年的歌者的低沉的歌唱。这古朴的音乐是苍凉的，有着大沙漠的气息。琴声渐渐变得响亮，老人也放高了歌声。音乐中燃烧着青春的火焰，生命的欢乐。老人歌唱，微仰着头，眯着眼睛，面部的表情非常严肃，烛光在上面跳动。当歌声放大的时候，老人脸上流露着微笑。他是在歌声中记起了什么，怀念着什么？……他的在烛光中微笑着的脸上，突然映着泪珠。老人微笑，歌唱，弹琴，眼泪缓缓地滴落。歌声和琴声停止了，一片大的寂静。接着，是狂热的掌声……在上面，我记述了两件事情：苗女的歌舞和一位新疆老人的弹唱。这两种不同的表演，所引起的我的某一种感触是一致的：这种古朴的野生的艺术，使我想往大沙漠、大草原、深山、原始森林……和活动在那里面的人民的强力，欢乐。而另一面，我感到，这种古朴、野生的艺术，一当它离开了它的故土，也就同时失去了光泽。表演者自己也因而有他们的悲哀。于是，我们看到了苗女们的羞怯，苗妇的愁苦面容和老年的歌者的眼泪…… 1945年4月5日

病 房

我依着看护的指示，穿过暗寂的长廊，停止在七号病房门口。叩门，没有回声。再叩，才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进来吧。”

我看到了我所要看望的病人，她的病床靠近窗口。她似乎刚从微睡中醒来，看到我以后，流露出喜悦的眼光，挣扎着要坐起来。我赶过去阻止了她，将在郊外采来的不知名的野花放在她床头的小几上，同时，在床边坐下。

病人微笑，说：“接到了我的信了吧？我知道你会来的。”声音轻微，还有一点嘶哑。

她看着小几上的花，说：“拿过来，我看看。”

我将花放在她手中。她微微抬头嗅着，笑了，说：“多美丽的花！……真想到外面去走走呢。”

我看了看这个不大的房间。墙壁白色。品字形地放着三张床。另外两张，一张空着，另一张躺着一个中年妇人，她正熟睡。

这是教会所办的一家医院，医疗设备还不算太坏，也比较安静。

医院特有的药物气息，和寂静、严肃，与房间耀眼的白色织成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里的一切，连说话和笑，都有了别样的意义。

“我过去从来没有住过医院。这次也是同事们硬送我来的。我真住不惯。难受死了。”她喃喃地说。突然又问我：“你看我好些了吗？”

我点头——我只能点头。我看着她披着长发的瘦削的脸，在白色的枕头上，更衬出了她脸色的苍白。

“我觉得我渐渐地好起来了……我下星期想出院。”我说，再好好休养一

阵吧。我说，你是好多了，但现在还不适宜去讲课。学校已经请了代课老师了，你急什么呢……看到她的脸色沉了下去，我就住口了。

她不肯说出经济情况的困难。学校和朋友们为她凑了一笔钱，而现在，她还拖欠着相当大的住院费，所以她急着出去。我也避免说起这个。朋友们也都穷困，虽然都在为她焦急，都在想办法，但那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沉默。

那边床上的中年妇人醒来了，向着我们看。

“她是什么病？”我转换了话题，悄悄地问。

“一个企图自杀的妇人。被救活了，神经还有一些不正常，常常突然地哭。”她低声地说。

“为什么自杀？”

“她原来是一个农民。丈夫被拉壮丁，死在战场上。后来嫁给一个小商人，又被遗弃了。”

“呵！”我想仔细看看那妇人，恰好她的脸又侧向这边，我遇见了她的敌意的眼光。

“都是不幸的人呵！”我来看望的病人在叹息。“我流落了八年……躺在床上，真无聊。夜里常常梦到母亲，梦到故乡。”我望向窗外。秋天的下午，天色阴沉。对面远远的山峦间，飘着淡淡的雾。

“那些小学生们一定常常问，郁老师怎么还不来上课？一定的。昨天还有两个孩子来看我……我想，下星期我可以去上课了。”

最后的那句话，她几乎是用哀求的声音说的。显然地，她希望我同意，那将是一种安慰，可以使她相信自己真的已经好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说话？”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我想起刚才那个女护士向我说的她的病况，感到了心的悲凉。我勉强笑了笑，将她的手放进被子里。

她看着我，用那样的眼光：少女眼中特有的光辉，病中特有的温柔，而那当中又闪耀着泪珠。我感觉到，在我们无言的凝视中，生命流过。而那边，那个曾经想自杀的妇人，突然从床上坐起，大哭起来了……1945年10月重庆

求 雨

四月底，因为某种原因，我离开重庆到另外一个小城去。这正是暮春，却有着像盛夏一样酷热的天气。有一个多月没有落雨，报纸以显著的地位在报道着四川的旱灾即将形成。坐在公路车上，我就特别注意观察车窗外的田野。在高阔的刺眼的蓝空下面，谷物已经枯萎了，东歪西倒地垂着头。高地和山坡上，田地都空着，没有栽种什么。所有的田里都已有了龟裂的痕迹。在有的田边，戴着大草帽的农民们在踏着水车车水，而许多龟裂的田地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因为没有水可车，这种景象是非常荒凉的。这种在强烈的阳光下的赤裸裸的干旱景象深深刺痛着人的心。坐在我旁边，一个农民模样的

老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回过头去，看见他正眯着眼睛望着窗外，在马达的吼声中，他喃喃地说：“大难之后，必有凶年。”

大难之后，必有……”他的布满红丝的浑浊的眼中突然闪着泪光。我问他乡间的情况。他说好多人家已经断炊了，不少的人出去逃荒。我说难道政府就不设法救济么？他说：“救济？不找你多要几个就是好的。”我默然。

黄昏，我们的车憩落在一个小镇上。大概由于干旱的影响，小镇是冷落的，很少行人。

而且，我所看到的脸：无论是老年的、青年的、男人的、女子的，甚至儿童的脸，都是愁苦的。我在一家小饭店里吃了一点极为简单的面食，就出来了。晚上七点多钟，那仅有的一条长街上，店铺已都关上了门，只有茶馆和小酒店里，还有着暗淡的、苍黄的灯光，阴郁地照着稀落的客人。深蓝的天空有着繁密的星粒，清脆的更柝声，在沉重的寂静中异常响亮，我独自在冷漠的暗黑的街上走来走去，感到了在旅途中常常感到的那种荒凉和寂寞，而且，也由于想到了四乡的农民的命运，心情是沉重的。

突然，一阵整齐的悲凉的呼喊声从那边的黑巷中震荡出来。我被吸引着走过去，隐隐约约地看见那边转出来一群小孩。我走近时，看见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把或一根点燃的香，另外几个没有拿香的小孩手里举着一条小小的、扎得简单而笨拙的草龙。他们大约有三十多个，有的穿着破旧的短衣，大多数赤膊，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只有五、六岁的样子。一边走，一边喊着，同时将手里的香向天举一下，几十条红线在暗黑的长街上闪动，弥漫着浓厚的、苦辣的蓝烟。

先是一个清脆的，然而悲凉的声音：“苍天！苍天！”

于是别的孩子们用整齐的悲凉的声音应和着：“苍天！苍天！”

接着是：

“百姓可怜！”“百姓可怜！”

“求天落雨！”“求天落雨！”

“插秧种田！”“插秧种田！”

这像歌唱一样的悲凉的呼喊和悲凉的词句，在浓厚的烟气中，在冷漠的、暗黑的长街上震荡着流动。我不知道是谁组织他们出来的，不知道是谁教他们这样唱的，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理解他们所唱的。但他们都有着同样虔诚、严肃的态度，似乎是在进行着、面对着什么重大的事情。他们的态度使他们的呼喊声有着更丰富的意义。而这种虔诚和严肃，因为是表现在小孩身上，就显得更动人。

不知为什么，很少有旁观者，那些破烂的木门都还是紧关着。只有我跟随着他们走了一段路。那当中，一个最小的女孩子，喊着跑着，不小心摔了一跤。她手上拿着的香显然烫着她，她发出了可怕的尖锐的喊声，接着扔掉香，大哭起来，队伍前进着，没有停留。只有一个较大的孩子愤怒地叫喊着跑过来，鲁莽地拖起了她，同时，厉声地喝叱：“哭啥子？哭啥子？这里有你哭的？要哭就回去哭！”于是，那哭声突然被割断了。小女孩用手揉着眼睛，不能自制地抽搐着，我走过去，摸了摸她的头。她仰望了我一眼，接着拾起了香，跟着那男孩跑着赶进队伍，用含泪的声音跟随着呼喊：“苍天苍天！”

他们呼喊着，在暗夜，在荒凉的小镇的长街上。包围着这小镇的，是枯萎的谷物和干涸的田野。前面，是饥饿、死亡和严寒的冬天，他们求告、

向苍天，以幼小者的悲凉的呼喊，以散发着苦辣的蓝烟的红香，以不能飞舞的简陋的草龙，以纯真的虔诚和严肃——以他们可以供奉出的这一切。

苍天应该会受到感动的——如果真的有苍天的话。不过，这些幼小者，如果他们能够渡过这一次灾难，如果他们能够在他们今后将面临的无数的灾难中成长，那么，他们有一天终将认识到，他们应该呼喊的不是向苍天求告，他们应该举起的也不是手中的香吧。

在我借宿的小旅舍的门前，在红灯笼的凄凉的薄光下面，我站住，望着他们在暗黑的冷漠的长街上，在苦辣的烟味和香火的晃动中，渐渐走远，一直到看不见他们了，那清脆的、悲凉的呼喊还隐约听得见：“天上落雨，”“天上落雨。”

“地下涨水，”“地下涨水。”

“青龙头……”“青龙头……”

“白龙尾……”“白龙尾……” 1945年5月

战栗的城

我的桌上的时钟，两根针都正重叠在“12”字上面。就是说，从此刻起，在这个大城中，霓虹灯将突然失去光华，喧闹和交易停止，车辆和行人禁行……在大街小巷中，将没有人能够动弹了——在白天里，那些惊惶的、叹息的、耳语的人们，将带着他们的痛苦入梦；或者，更不幸的，在床上不安地翻侧，熬过长夜。

窗外，是深蓝的、高洁的、有着稀疏的星粒的天空，和沉重的黑夜。除了轻微的风声，和偶尔有一声惊心动魄的“口令”的喊声像利剑刺破寂静外，在我的周围没有一点声音。我独自坐在小房中。

这许多天来，我都是这样孤独地坐着，到深夜。有时候，我长久地站在窗口。我的面前，是一座战栗的大城。这座大城，在十年前，是年轻而英勇，面迎着民族的灾难屹立，日夜都飘浮在热情雄壮的歌声中。现在，这座大城，在八年的浩劫后，在新的灾难面前，是喑哑了。我的窗外，隔着一个空阔的广场，是大街。那曾经走过五万人举着火炬的行列的大街，现在，在路灯的微弱苍凉的薄光下面，看不见一个行人，除了那个寂寞地站在街心的荷枪实弹的哨兵，和他的修长的影子。

在这座孕育了我的童年的城市中，在这座我用少年的手，高举火炬照耀过、保卫过的城市中，我在风吹雨打中成长而又回来了。却像一个流放的囚徒，被黑色的眼睛监视着，连寻找一片遮雨的屋檐都是如此艰难。我巡礼过这曾是我梦中的城池，我发觉，我痛苦地发觉，八年的血汗都是白废，一切都还停留在原来的状况上面，甚至还要更坏。百万人的尸骨，高叠成别人的繁华，在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数被敌人烧毁了了的房屋的废墟上，建立了别人的高楼……受难的人民没有得到生息。新的战争在百里外惨烈地进行。

我站在这个覆盖着灾难的阴影的大城面前。我是孤独地站着。而我不

是孤独地站着。我知道，在我背后，站立着在流亡途中倒毙，连尸骨也不知下落的我的母亲的幽灵；我的被敌人虏去杀害的叔父的幽灵；和无数牺牲的人民的幽灵。他们与我同在，以另一种情怀，另一种姿态，守望着这一片神圣的土地，和在这一片破碎的土地上，缀补破碎生活的善良的人民。

我凝望这座站在黑夜中的危城。我在幽灵们对我的期待中有所期待。

我期待，我渴望一次大火：一次曾经照耀过古罗马的大火，一次营造一个广阔的废墟的大火，一次愤怒的爆烈，一次残酷的破坏。

我期待，我渴望这座大城为了新生的毁灭。

我们将再到大街上去集合，不仅是用火炬，而且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神圣的火焰，照亮大城，照亮黑夜…… 1946年9月4日深夜武汉 212
曾卓文集

沫

××：

看报，知道汉口这两天也下过大雪了。我们这边也下了的。前两天是细雨，第三天就飘起了雪，愈下愈大，当天就铺了两寸多厚。好几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了。坐在窗前，望着在风中飞旋的雪花，积雪的屋，披雪的树，白色的草场……是感到了一种奇异的情趣的。夜间，和几个朋友喝酒，一小盘花生米和几块干子就是下酒菜。没有钱买炭，就用了一台自制的电炉烧了一盆开水。大家就围在冒着热气的水盆旁边，边吃边谈，似乎也颇为惬意。后来，我又冒着雪独自到街上去看看。街上所有的店门全都已紧紧关闭住了，每一个窗口都铺满了温暖的灯光。寒冷的、闪着白光的长街上，没有别的人。雪飘着，静静地、紧密地，飘着。我有了很多温暖的回忆：童年时在雪地上打雪仗、堆雪人；一个在遥远的山区的除夕夜，我冒着大雪，跋涉几十里路赶回家去……就在这种温暖的心情中，我回来睡了。在棉被上盖了很多衣服。我睡得很好，很甜。

第二天，放晴了。阳光照在积雪上面特别耀眼。我还是维持着飘飘然的心情。拿过当天的报纸来看，知道就在昨天的风雪里，有十几个难民冻死了；另外还有几百个难民将要冻死，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济的话。但是，有一些新近拥挤到这座城市的“要人”们，却在忙着赏雪。当时，我是冷笑了的。但随即我就想起了自己。昨天我不是还在大雪中感到了“温柔”么？！当天的黄昏，收到了你的信和一束《长江》的单页。你的信的开头一段是：“和你们信同时，收到了上帝寄给我这个庶民的西伯利亚的寒流。我这个除了妻儿别无亲人的庶民，就受到了好好的惩罚了……所以，心情既坏，咳嗽又发。”那么，可见，不但是“要人”和“难民”，就是亲近的朋友之间，对于同一事物，也就有着这么不同的感受了。

因而，也就有了对于你和别的几个友人的怀念，有了对武汉的怀念。日子真快，离开你们和那座大城，已经是整整一个月了。记得我开初回到阔别了整整八年的武汉时，我是激动的。我当时曾写过一篇短文大约地叙述了

我的心情。但是，那激动不久就消失了。继之而起的是愤懑。同时，我也感到沉闷，沉闷得很。武汉，据说，也有一个文坛。我却没有看到。

我所看到的，只是有着这么几个友人，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默默地耕耘，发出一点声音。相濡以沫，歌者和听者都因而感到一点温暖。难道不就是这样么？！你还记不记得那难得的几次聚会？记不记得，有时候，在深夜，我们在苦恼地高谈之后，是怎样地相对默然？记不记得我和你常常在各人工作完毕后，相伴渡江，一路长谈？……这些，我是记得的，怀念的。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琐碎地说到这些呢？你也许将问。我也同样地问我自己。这就像看到雪而感到“温柔”一样，人们，至少是，我自己，有时是容易在小小的事情上动情的。这说明，在感情上，我们仍残留着一些弱点。离开武汉的前一天，我结束了事务上的手续，从汉口独自渡江回武昌。那时，已是黄昏。倚在船栏边，看着展览着灿烂的晚霞的蓝天渐渐黯淡下去，两岸景色苍茫，大江上船桅如林……我想到，明天，就要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的友人了，感到了一阵酸楚。你看，有时候，我就会这么脆弱。

但自然，也还是走掉了。那种小知识分子不健康的情绪也终于渐渐淡漠了下来。但是，怀念还是有的。原以为这里该好一点吧。这里却是更沉闷的。真是如爱罗先珂在旧北京所感觉到的，只是嚷嚷而已。在武汉时，还有几个在默默地工作着的朋友。在这里，默默地工作着的人当也有吧，我却不认识，因而更感到寂寞。每次接到你寄来的《长江》和H寄来的《北辰》时，我是感到了亲切和喜悦的。

那么，你们还是在勤劳地工作。而有时从你的来信中，却又谈到了你的苦恼和烦躁。我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也有类似的心情。你在《长江》五五二期的《编后记》中说：“我们所机杼不安的，是在这汹涌澎湃的浪潮里，我们付出了什么？我们所能付出的又是什么？虽说我们是全力以赴，而检讨起来，恐怕是寒伧而褴褛的吧。”是的，是寒伧而且褴褛的。但是，只要我们是“全力以赴”，只要我们是工作中寄托了热情和追求，那么寒伧也就是收获，褴褛也会发光的。在目前，我们岂不是只能守着我们所能够做的工作么？也正如你所说的，我们的命运，“正是注定了要在各个角落，各个泥潭中挣扎着跃进的。”

离开武汉的那个晚上，我就说了要给你写一点当时的心情。因为忙乱，也因为懒，一直没有写。这回提笔了，却又写得如此琐碎，如此零乱，并没有将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但我想，你所注重的，还是远地友人的那一点切切之情吧。

问好你和别的友人。 1946年12月南京

冬 夜

我和阳在街上散步。晚饭后，宿舍的电灯突然灭了，既不能够做事，就只好到街上来走走了。更好的当然是找一个小小的咖啡馆坐一坐，在音乐、一杯浓烈的刺激物、和闲谈中消磨一个晚上。那其实也不需要多少花费的，

节省一点，两千元也就够了。但是阳的身上只有一千块钱，而我的身上一个钱也没有。

也好，就到街上去散散步吧。

冬天，一到夜间，这里是很冷的，尤其是在我们刚从南方来的人的感觉上。开初，我简直有一点抖瑟。看一看阳，她的姿态也正说明了她的寒冷。我真想向她说，那么，我们回去吧。宿舍里虽然杂乱，我们还各自有一个温暖的小床的。但我没有说。走了一段路后，就冷得好一点了。可怕的只是拐角处，那里总有一阵巨大而猛烈的北风在守候着我们。

我们选择了最长而又最热闹的太平路。在人多的地方我们身上似乎也暖和一点。而且那里有几家书店。我们就站在书架旁边翻了好一会书。这是很好的：我们常常这样不必花一个钱就浏览了新出的书籍和杂志。自然，看得很马虎。有一些书籍和杂志应该买下仔细看看才对。在那里盘桓得太久了之后，遇到店员过份关切的眼光时，也不能不有一点难为情。我们就走出来了。

看看一家店铺挂着的钟，短针刚过七点。在冬天，这是夜市最高潮的时候了。我们在喧闹的播音机的嘶哑声和匆忙的行人中慢慢地走着，偶尔也在霓虹灯装饰着的商店的橱窗前站一下。那些橱窗内陈列的物品五颜六色，那么有诱惑性。如果是食品店吧，你就会觉得那些蛋糕、巧克力非吃一点不可。而百货公司橱窗内所陈列的东西，几乎全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些物品与我们的距离是这样小，好像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取到了。有一次我真的就伸出了手去，碰着的不是物品而是冰凉的坚硬的玻璃。

在一家时装公司的橱窗内，一个木制的女人（我不知道人们叫它什么）披着的一件皮大衣，式样和质地都很好。阳对那端详了好一会，然后，她说：“这件大衣还不错。”是的，我也觉得很不错。我问她：“你想要么？”她身上穿的大衣实在是太旧而且也太薄了，早就应该换一件。她看了我一眼，摇摇头说：“我不想要。”她是对的，她说不想要是对的。因为，在一件价值几十万元的大衣面前，“想要”和“不想要”，对我们只是一个意义。我说：“这样的大衣是专门给没有灵魂的女人穿的。”话一出口，我就感到了阿Q气。

我们向回学校的路上走去。现在，我是在盘算着怎样来用掉阳身上的最后一千块钱了。

我常以为如其身上只有着少数的一点钱，就不如完全没有。我决定到学校附近的小食摊上去一个人吃一碗汤团。我向阳说出了我的意见。她说：“还是留着这点钱发几封信吧。”我说：“吃掉好了。”她就不作声了。她的沉默表示的往往是反对而不是赞成。我觉得有一点不高兴。

我们已经走进了一条僻静的暗黑的巷子。穿过这里，再拐一个弯，就可以望到我们学校的大门了，而那旁边就是食摊。在被拒绝以后，我特别感觉到在寒冷的冬夜临睡之前，吃一碗热烫的汤团是多么幸福。我的不快逐渐加深。在猛烈的北风中，困难地点燃了一支烟。

一堆围在巷心的人妨碍了我们。我们挤穿过去时，我借路灯的微光看到一个老人卧倒在地上，正在呻吟。他显然是被饥饿和寒冷压倒的。人们似乎正在商量救济的办法。有几个人在老人身边丢下了一点钱。我们已经走过去了。我突然站住，向阳说：“把那一千块钱给那个老人吧。”她望着我，没有做声。我又说：“给那个老人吧。”她将手从破旧的大衣的口袋中抽出来，伸向我。我接过了那一张折叠着的钞票，那上面还留着她的体温。当我将钱

丢给老人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有了要流泪的感情。

我和阳默默地走着。我狂热地抽烟，以致呛咳。走过亮着昏黄的灯光的食摊时，我俩相互看了一眼。

宿舍里还是暗黑的。这个冬夜是多么荒凉，多么寒冷…… 1946年
12月7日南京

祝 福

接连下了几天雨。天气突然冷起来了。早晨睡着还没有起身，就听说外面在落雪。不大相信，抬头向窗外看看，果然看见了稀疏的雪花。——不料今年的雪竟来得这样早。

下午，雪是愈下愈大了，地下已积了两寸多厚。好多年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大雪。坐在窗前，看着披雪的屋，披雪的树，白色的郊野，感到了异样的情趣。想着，如果我们的小房内能够有一盆火是多么好呢。——当我们希望有盆火的时候，就正说明我们是无能力置备一盆火了。在抗战期间，我们是将一切希望交给了胜利的。但现在，当胜利已到来后，大雪的冬天有一盆火，对于我们仍然是一个梦想。看到同宿舍的几个同伴们，围着一盆热水，那奇怪的笨拙的取暖的方法，使我忍不住笑了。我想，我是笑得有些凄凉的。

但也许我们的这一点梦想也是奢侈的。对于那些新的流亡者，能够回到自己残破的家乡过一个并不温暖的冬天；对于那些贫困无告者，能够有一件——破的也好，能够有一件棉衣过一个冬天，应该也就满足了吧。呵，我们善良的子民们！

那么，当无数的人们正冻僵在低矮的屋檐下，流落在风雪的郊野中，我们——坐在窗内的人们，还企求什么呢？当无数的人们是在痛苦中，我们能够企求的，是怎样的幸福呢？“祝福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是的，我们祝福。在这个落着大雪的冬天的黄昏。

决不是虚缈的愿望。当该诅咒者受到惩罚时，受难者就将有一个灿烂的春天 1946年12月南京

偷书贼

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几本便宜书。虽然穷，但买书的习惯却一直改不掉。在我们的生活享受上，除了偶尔吃一点零食、玩玩桥牌、看看电影之外，就是买几本书了。买书而称为“享受”，大概不太妥当，但捧着几本爱读的书回家，那喜悦的心情，是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的，虽然往往只是翻一下就放下了，从头到尾仔细看完的时候总是很少。但有本值

得一看的书可买，而价钱又便宜，那机会还是不愿错过。晚饭后，借到了一点钱就一个人向书店走去了。

在书店里盘桓了好半天。书店里的人不能算少，但大都只是站在书橱前翻看一本，真正掏钱出来的主顾是不多的。当我选定了两本书买下的时候，我竟有了一点骄傲的心情。但这种骄傲不久就消失了：我在一堆旁人寄售的旧书里，找到了一本我极想买的书，其实在旁人的眼里也许是不值一顾的，那是北欧一个小国的小说选集的译本，出版年月已经很久了。但我对于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却有一点偏爱，而且过去已经开始收藏了一些，所以极想将这一本也买下来。但是，当我向店员询问的时候，也许我的态度过于迫切吧，他所说的价目大得出我意外，远超过身上所剩余的钱。我只好默默地将书放回了原处，另去翻看别的书。但不久后，我的手又将那本书抽出来了，打算先在那里站着看完序言，明天再借一点钱来买。

……我突然被一声狂吼惊吓了。抬头的时候，一个店员急速地从我的身边挤擦过去，同时，他喊着：“做什么？做什么？我随着他的移动转过头去。他走近了一个站在书橱的青年旁边，手用力地拍了一下那个人的背。

因为他的吼声，所有的眼睛都从书上移到这边来了。店中一时显得非常寂静。我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就向那边走了几步。

那个店员鲁莽地伸出了手去，那个青年——他是背向着我的，我不能看到他的脸——挣扎了一下，随即，“拍”的一声，一本书从他的身边落下来了。原来如此，一个偷书贼！

当那个店员俯身下去拾书的当儿，那个青年突然向门外冲去，还没有到大门口，就为另一个店员拦住，拾书的店员迅速地跟了过去。

“妈的，你偷书！跑得掉吗？”他喊。接着，他回过身来，摊开手，以讲演的姿势面向别的顾客：“各位，你们不知道，我们店里天天丢书，一月损失几十万！生意不赚钱，赔不起！”他又回过身去，以凶毒的语调向那个青年说：“抓一个算一个，今天捉到你归你吃点亏。……跑？哼，跑得了？好大的鬼！”说最后一句话的同时，他用手抓住了那个青年的领口。

那个青年深深地垂着头。虽然并不明显，但我看得出他的身子在颤抖。他穿的是黑布的破旧的中山服，左边挂着一个——呵，他挂着的是我们学校里的校章！我不自觉地又向前跨了一步，想看清他的脸。

回答另一个店员的询问时，那个拾书的店员说：“怎么办？”

要他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不惩一回以后怎么得了？”

那个偷书贼抬起头来，脸色可怕的苍白，恐惧的眼里闪着泪光。他似乎企图申辩，紧张地开合着嘴唇，但没有说出一个字。——是的，我认识他，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却常在校园和参考室见到他。我们的同学是贼！我的心里有着异样纷乱的情绪，但这里面没有愤怒。当我走上去，预备为这个无告的罪犯调解的时候，他那对我注视的眼光里，流闪着畏惧和羞愧，他的脸突然转红，头又沉重地垂下去了。他显然也认识我。在这一刻间，我变得犹豫，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参与到这个纠纷中间，我深怕我的好意加重了对他的伤害。我相信，在此刻，他宁愿在十个陌生人面前受到鞭打，而不愿一个熟识的人为他求恕……我退下来了，看了一眼那个店员手中拿着的书，那不是一本文学作品，书名是：《物理学原理》。

当我走出书店大门的时候，那个店员又在凶狠地叫嚷了。

他的每一句话都沉重地鞭打在我心上，我加快了步子……夜市正当峰

顶。霓虹灯愉快地流动着，无线电播送着低俗的乐曲……我走在人群中如同旷野。1947年2月27日

在我们的校园里，有两座猴笼。一座装着的是一只老猴，另

一座装着两只小猴。老猴的

笼外比较冷清，人们从那旁边走过，偶尔停脚站一站，向里面张望一下，也就走过去了。老猴静静地坐在里边，有时也跳跃几下，样子显得很寂寞。

那两只小猴的笼外就热闹得多了，那旁边总聚拢了些个闲人，和好些不知从哪里走进来的小孩。他们的手上大都拿着一点饼，一包花生，或其他的什么食物。两只猴都蹲坐在笼边，伸手接取人们递过来的食物，随即就吞下。为了逗弄它们，那些小孩就有意将食物丢在两只猴子的中间，看它们争抢；或者只将食物递给一只猴子，激起另一只的妒忌和愤怒，在铁栏上迅速地攀跳着，发出哀鸣，后来，就和那一只猴子厮打起来了。笼外的人们于是鼓掌，高笑。

我有时也在笼外站着看一下。我是常常在人群中感到寂寞的，有人的沙漠比孤独更可怕。眼前正是可爱的秋天，学校上课还不知将拖到什么时候，我就有了许多独自在阳光下散步的闲暇。因而也就常常成了猴笼外的观众之一。看那孤独的老猴的寂寞，它是在怀念着什么：古老的森林、深谷、月光下饮水的溪流，或者是旧日的同伴们吗？我想，在这个狭的笼内，它大概是会怀念旷野的，它静静地坐着的姿态，和向远方凝视的眼睛，也正说着它的寂寞，——那另外的笼中的那两只小猴大概还太年幼了，它们却只是为一点点食物向游客们敬礼，献媚，或者是自己彼此争闹着。

我终于看见了它们打得最厉害的一次。其中较大一只得到了一个女孩送过去的很多食物，那较小的一只却一点儿也没有得到，就在铁栏上翻跳着，最后，那小女孩也就递了一点面包给它，不幸却又为另一只抢去，于是，它们就打起来了。它们相互撕咬，在人们的哂笑中发出惨痛的叫声。那较小的一只倒在地上，占了显然的劣势，无法还手。它的哀切的惨叫声刺人的心。那较大的一只就松开了手，突然坐起，静静地看着它，看着它腿上的血渍，相对好久后，又将手伸了过去，这一次——是为它抚摸伤痕，接着，又在它身上探索起来，是在捉蚤子了。人们对打闹和流血有很大的兴趣，但当那紧张的场面突然转换为温柔的爱抚之后，他们虽然感到一点惊异，却终于变为冷淡，渐渐地走散了。后来就只剩我一个人，在那里还站了很久。1946年11月13日

女 客

她没有叩门就一直走进来了。

窗子是关着的。外面漆黑，听不到雨声。但从她的滴着水珠的头发和潮湿的衣裳上，我知道连绵了几天的雨还在落。她随手关上了门，倚靠在门上，用一种奇异的眼光望着我们。

“你找谁？”老焦从桌前站起来，走近她问道。

“我找一个睡觉的地方。”她说。听她的口音不是本地人。

她的话使我们惊异。老焦回过头来望了望我们，他显然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位年轻的女客提出的奇怪的要求。他犹豫了一下，请她在床边坐下。

看来她不到二十岁，像一个中学生。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那里面燃烧着一种不寻常的火焰。她的脸是瘦削的，嘴唇苍白。淋湿的头发耷拉了下来。她的蓝色的旗袍和黑色的布鞋上都糊满了泥浆。她接过了我递给她的一杯开水，一口气就喝完了。随手将杯子就放在床上。

“我找一个睡觉的地方。”她又说，她望着我们，奇异的火焰在眼中闪动着。

我们问她从哪里来的？她说：“你们别管！”到此地来做什么？她说：“你们别管！”在这个学校里有熟人么？她提高了声音，尖锐地喊起来：“我说了，你们别管！”她突然转过身去，斜躺在小木床上，闭上了眼睛。看来她是太累了。

我和同室的人互相望望。我们的眼光相互说着：这是一个疯子。

自然，我们不能把她赶出去。外面是黑夜，又下着雨，但我们又怎么能把她留在这里呢？这是大学的男生宿舍。老焦走近我，低声地问：“怎么办？”

我也低声地说：“先让她休息一下吧！”

而我们的女客突然又坐了起来，用警惕的而且是含着仇恨的眼光望着我们。接着，她将身边的茶杯向地上一扔，迅速地站起来，拉开门冲出去了。我追到门外，她已消失在黑夜的风雨中……

同室的人纷纷谈论着这个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的女客，猜测着她的遭遇，而且担心着她的命运。

是什么使一个美丽的少女疯狂，在这样落着冷雨的夜里，走进陌生的门扉，寻找惊异？“少女”这名字本身，不是意味着快乐和幸福吗？而为什么，中国的那么多的少女是站在，或者即将站在，命运的黑手下面？

我站起来，走过去，打开窗子。风夹着雨丝吹过来。我望向沉沉的夜，而且，通过这沉沉的夜，我望向更远更远的地方…… 1944年冬

江湖客

我和我的朋友站在一个破旧的、古老的舞台前面。

黄昏时，我们在街上散步，偶尔经过这座十年来除了更破旧一点外没有什么改变的小戏场。黑黑的墙壁更颓落了，那一面黄色的破烂的绸旗飘扬在高高的竹竿上。门栅外，高木椅上坐着两个抽着烟的彪形大汉。左面是一

个窗洞，里面坐着面带愁容的售票员，大门上的灯光暗淡，门内有着喧闹的洋鼓洋号的合奏。十多年前，当我们还是少年时，它是我们的乐园，使我们有过许多快乐的晚上。现在，当我们经过了长久的苦难的漂泊又回到这座大城时，我们发觉这个小小的戏场仍站在小街的中间。我的朋友向我微笑着说：“进去看看吧，”我们就进去了。

现在我们站在破旧的、古老的舞台前面。那舞台，这些年来我当然已将它忘了，但现在我看到它时仍感到熟悉，感到亲切。我回头打量四周，池座里只有一盏高高地悬着的电灯，微弱的灯光照着前面几排的稀落的观众和后面的零乱的竹椅。只有几个在舞台前跑叫着的儿童使剧场有一点生气。舞台的一侧，坐着三个潦倒的乐师，没精打彩地在吹着洋号，敲着破大鼓。一个奇形怪状的小丑在鼓号声中来回地翻着筋斗。

鼓号声突然停止了。在寂静中，从后台走出一个穿绿绸衣服的女子。“那不是绿牡丹吗？”我的朋友惊异地说。那自然不是。曾经是我们心目中的“仙女”的绿牡丹应该老了，这也许是她的女儿，也许是另一个少女，穿着和她相似的衣服。有几个观众发出刺耳的怪叫声。新的绿牡丹微笑，鞠躬。她的电烫过的头发，脸上廉价的脂粉，闪亮的耳环，这种打扮使她像一个少妇。但我估计她不过十七八岁，正是一个幸福的年龄。但是，她幸福吗？停止了翻筋斗的小丑向她走近，企图抚摸她的胸部，被她拦阻了。台下发出哄笑和掌声。小丑得意地笑着，用怪样的语调说着洋泾浜的英语，“I love you, Do you love me?”

台下的笑声鼓励了小丑，他做了一个更下流的动作。那女子并不在乎，但装出了害羞的表情。观众中爆发出掌声、怪叫和尖锐的口哨声。场面渐渐热闹起来了。小丑下场，新的绿牡丹用嘶哑的声音唱了几支流行歌曲。而台下有一个“歪戴帽、斜穿衣”的“好汉”喊了：“来个黄色的！”新的绿牡丹微笑，鞠躬，又唱了一支什么小调。

我感到了痛苦，想离开，而又不愿意。我知道下一个节目是武术表演。那曾经使年幼时的我惊心动魄，因而也就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在新的绿牡丹退场后，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穿着中国古代武士的服装跑出，向观众鞠躬。观众冷淡，只有几个少年鼓掌。他在台口走动，踢着飞脚，翻着筋斗。最后，他的正式的表演开始了。几个大汉在台上叠起了两个方桌，上面又加了一条长凳。他被扶着爬了上去，颤颤巍巍地站在长凳上，叉着手，向后弯腰，他的头慢慢地已与脚跟相齐，再向下弯去，用双手按着桌面，他的嘴唇接触到了放在上层方桌上的一个茶杯……终于，他将茶杯衔住了，又慢慢地伸直了身子。他的小小的身体站在那么高的凳子上是显得更小了，他的稚弱的脸上挣得通红，观众鼓掌，几个少年观众快乐地高喊着。

当他鞠躬的时候，长凳晃动了一下，他跌了下来。一片欢呼声。当他快接近地面时，站在旁边的一个大汉托了他一把，扶着他站住。他的脸由红而变得苍白，向观众鞠躬，并且恐惧地斜望着身旁的大汉……

我将朋友拉着走了出来。我一点也没有寻找到我童年时的温柔的回忆，而且破坏了这种温柔的回忆。夜风清凉，我们默默地走在暗黑的小街上。远远地，我还听见了那喧闹的、粗野的洋鼓洋号声，使我感到了古国的某一种悲凉…… 1946年7月

邂 逅

下午，我走在山城最热闹的街上。——在寂寞时，我是常常这样无聊地走来走去的。一对久别的眼睛吸引住了我。眼睛还是几年前的眼睛，人的变动却太大。我站住了，对着眼睛的主人，不知该招呼一下呢，还是不？那眼睛分明也看到了我，惊奇和好多别的成份的眼光投向我身上。在打量我么？我低头看一看自己破旧的衣服，想走开了。然而——“××！”

喊的是我的名字。要伸出的脚步又收回了。同时一个勉强而又多少有些羞涩的笑送了过去。我也喊出她的名字。

那双白嫩的手伸来了，我也将粗糙的黑手伸去。握在一起，太不相称，迅速地又收回了。

“没有想到……”她带着颤抖的语音说。

真是没有想到。一别五年，过去的事太近又好像太遥远。在武汉，那个不大不小的都市里，几个太年青的朋友，在一个相同的兴趣，一个高贵的然而在当时却是一知半解的理想下，过了几个值得珍贵的年头。那时我们都是刚进初中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文艺社，课余忙着看书，写文章，做一些自以为庄严而现在不免认为幼稚的事。朋友们都怀着一些浪漫的幻想，将苏菲娅（当时仅知的女革命家的名字）的头衔放在眼前的女郎身上，各人对她都有一份心思，而都缄口不言。

她真是可爱的少女：大眼，长发，苗条的身材，也聪明，也调皮，被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少男们追逐着。我已不能记忆我们最初相识的情景，只记得因为我是朋友中最小的弟弟，常分派到的工作是骑自行车到她家前，叩着她的窗子，而且轻轻地吹着口哨催她出来。我们每一次文艺集会或读书会，她必到席，比起发言，沉默倾听的时候更多。她也帮忙编一编刊物，写一点稿子。朋友们对她的任务，据说是：“教育她！”

和一般的初中学生一样，她那时常穿的是蓝色或黑色的长衫。——此刻她站在我面前，穿着重庆最为摩登的时装。我也说：“没有想到……”

“在东湖那次分手后，就没有再碰见过了，是不是？”还是过去的习惯，问着话，头就歪倾，我看看那烫着的卷发，涂着脂粉和口红的脸，觉得很不自然。

“喂，自从那次分手以后。”

那是初夏。春日的余寒已消失，柳叶已下垂，郊野的草已碧绿，太阳温和地照着，是一个好天气。朋友们到离城二十里地的东湖去旅行。湖水真绿呢！小舟轻泛，在船中不觉就唱了起来。上岸时，她走急了点，船身一闪，几乎跌到水里去。我赶忙扶了她一把，那通过我全身的温暖似乎还留在我手里。“五年了，一晃。”她轻轻地说：“连你也长得这么高了。”接着又说了些感伤的语句。

因为站在街心妨碍交通，我们缓缓地走在拥挤的人群里。

自然首先被问起的是分别后的生活，我简略地说了一点，然后问起她的。

“先别谈我。我问你：浩他们呢？”

浩是朋友当中的大哥。我们在文艺和社会科学上有一点浅薄的知识，那应该是他的功绩。说是大哥，也不过才长我们三四岁。人稳重，并不喜欢沉默。他比朋友们更加狂热地爱着璞——就是眼前的这位女郎。在一个大雪的冬夜里，围灯不睡，他整夜向我倾吐着他的心情，他的苦恼。他同我说着璞对他的态度：“是倾心，就该热烈，是不愿，就该冷淡。然而都不是。然而也许爱正是这样，倒是我自己不懂的缘故么？”——他为她写过好多长篇的说教的信，借了很多书给她看。“一二·九”的浪涛波及到武汉时，浩首先参加，因而也影响了我们。自然也影响了璞。她比谁都更忙碌，出席着会议，到各女中接头、联络。大游行的晚上，因轮渡封江，不让学生由武昌过河到汉口去参加整个的游行行列，一万多学生在码头上过了一个寒冬的夜。因为太兴奋，而也因为太冷，一直到夜半我还没有闭过眼睛，只是在街上徘徊又徘徊着。我遇见了她。

知道女同学是安排在码头附近一个中学睡觉的，看见她我很惊奇。她告诉我她无法安心睡眠——“因为我兴奋。我好多天就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你说，我们干得还算有一点成绩吧？”她指一指江边一群一群的学生，又指一指那些一直在送着茶水、饼干的老百姓。接着她向我谈着她的工作，她的成绩。——一个严寒的夜，一群狂热的不睡的青年，一个美丽的少女激烈的谈吐，那一夜我有了深深的感动。

在那时的环境里，我们是会受到当局注意的。结果，朋友各自走开，而浩则被迫销声匿迹了半年，“七七事变”后出来与朋友们作了一个短时期的聚会，就回家乡去了。他的家乡沦陷后，他曾经想组织领导一个游击队，但没有成功，却招惹了一部分地方权威人士的不满，于是偷偷离开白发的父母，千辛万苦，兴致勃勃地跑到重庆来，一切却都不理想，乃又匆匆离去，现在还困守在北方的一个小城里。

我惊喜她还没有将浩忘却。就尽我所知，详细地将他的情况告诉了她。

她沉默着听着我的叙述。有时像在回忆思索着什么，有时却又像是漫不经心。到我住嘴时，她望着我，好像用眼睛在问：“说完了么？”轻轻地，然而我听见她叹了一口气。

接着她又问起了几个朋友。我告诉她谁在战区奔走，谁在勤于写作，谁已不知去向……“好的，老朋友们都还是那样努力。”她用着忧伤的调子说。我想问她的情况，而她又接着说了下去：“只有我，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已没有过去的那种干劲了，这几年，在我只是生命的浪费。”

这些话，使我想起了过去摇旗呼口号的她，在千万人群中高声讲演的她，在寒风积雪中奔走的她，——就是她，就是被朋友们称为苏菲娅的她，但这样的话却出自她的口里。我感到了一点悲哀。

“你看我变了，是不是？”

对她不知是不是残酷，我只能点一点头。

街上的人这样多，因为只注意到谈话，好几次不留神的碰撞了别人，于是她说：“街上不方便，到我家里去坐坐吧。”

“那伯父母，还有你的弟弟都来了么？”我问。

“不，他们都不在这里。”

“那么？……”

“我已结婚了，”她犹豫了一会又说，“我嫁了一个——朋友们一定不赞成，而我也并不满意的丈夫。”

我怔了怔。

“那么，我不去了吧。”我说。

“为什么？”她带点惊异，看着我：“不要紧的，去坐坐吧，朋友们难得见一次面。”

我考虑了一会，随着她去了。

于是她告诉我在武汉撤退时，她如何想加入一个战地服务团而受到了家庭的阻止。她的父母因为无离开武汉的路费，逼迫她嫁给了目前的丈夫而得到了一笔钱。

“我哪里愿意？父亲整日的叹气，母亲哀哭，还有那么年幼的弟弟，局势又一天一天地严重，那时我的心真要碎了。”“于是终于答应了？”

“不答应又能够怎样呢？”接着她告诉我婚后她是如何的痛苦，告诉我她随丈夫到香港后是过着怎样奢靡的日子，告诉我她的丈夫是如何地约束她。……“我只是一个弱者，在生活面前战败了，时代的轮子我跟不上，一想起过去，就像一个梦。”

“……………”

“在香港过了几年舒适的生活。说是厌弃，但叫我突然地改变生活，怕也难。一句话，人变得麻木了。这都是——生活。”

一个弱者，一个以生活为挡箭牌的残兵败卒，一个我们过去称呼过的苏菲娅，我难道还给以一点同情吗？

沉默。

由大街拐进了一条小巷。穿过去，我们停在一所房屋前，那是一所很漂亮的大楼，夹在矮小的瓦屋中很不相称。“这是我的家。”

我们正预备沿着阶梯上去，红漆的门咿哑地打开了，一个穿着很漂亮的大衣和西服的男子，口里衔着烟斗，一个机关的牌子在胸前闪光，匆匆地走出来。那人抬起了头。——好熟悉的脸。我突然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想走开又终于没有动步，我回头看她，她已满脸笑容地在招呼那男子。“介绍一下，”她向我说，“这是我的丈夫——x先生。”而后回头向那男子：“这是我的老朋友……”

我不知她向那男子说了些什么。我心里想，不用介绍，我认识他。怎么不认识呢？在五年前的武汉，那曾经极力破坏我们的行动的，——就是他。

她的丈夫！

在混乱的情况下，我接受了那男子有礼貌地伸过来的手，那男子好像还客套地说了些什么，走了。

她轻快地走上石阶，回头看见我还呆呆地站在原地。“上来吧！”

我摇头。

“怎么不上来？”她走下两级石阶问我。

我告诉她，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必需马上赶去的约会。无论她怎么说，我坚持着要走。

她有一点失望。“好吧，那么，以后常来玩，我寂寞得很。”“……………”

“朋友们如果需要钱，我想，我是可以帮一点忙的。”

需要钱么？正对，朋友们离家流落在外，实在苦得很！——我几乎要挥手给她一个耳光。

“朋友们虽然穷，但还可以过去。”我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冷冷地说，“用不着你的帮助。”

她大概有点奇怪我态度骤然的改变，又看见我已迈开脚步，就将那白嫩的手伸了出来，“那么再会吧！”“再会！”我的粗糙的黑手也伸出来了，却没有握住她的，只是随便地摇了摇…… 1941年2月

晴 朗

黄昏时，我和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在郊外散步。

白天又落过微雨，道路泥泞。初冬了，树木裸露着干枯的身子，在风中颤抖。天色沉重而阴暗，田野是荒凉的。我是临时借住在一个友人家中的，因为一点事情，也因为这连绵的阴雨，心情有些悒郁，烦躁。黄昏时，雨住了，友人不在家，我不能忍耐独自守在窗前的寂寞，就邀了邻居的一个小女孩，一道走出屋子，在泥泞中——散步。

我手中提着一根与我的年龄和身份都不相称的手杖，高高地卷着裤脚。我的小同伴也高高地卷着裤脚。为了迁就她，我走得很慢，但她有时还是得加快步子跑几步，所以她的白而胖的小腿上很快就溅满了污泥。

她牵着我空着的那只手，不时仰起脸问我一些可笑的问题，或是讲述她的希望、苦恼和快乐。她习惯于将她的某些话悄悄地告诉我，因为，除了我，她就没有人可以告诉。她只有一个一岁的弟弟。同屋住的没有别的孩子。她的母亲又整日忙着家务，从来没有听她的童话的闲暇。所以，我来了几天以后，她就和我很熟了，把我看作她的朋友，虽然也许我太大了一点。她讲说着什么的时候，灵巧地活动着小嘴，转动着黑而明亮的眼珠，而且用小手比着手势。她的态度是严肃的。我呢，作为一个忠实的听众，我的态度也严肃。

现在她向我谈着她的学校。她是附近一个小学校里一年级的学生。

“那就算操场，你看，”她放开了牵住我的手，用两只小手比画着，“这么一点小院子，滑梯也没有，跷板也没有，哼！”她冷笑着，噘着小嘴。

那学校我去参观过，有着一般战时设立的学校的简陋。校长是本地一位科长的太太。如果我们要她在牌桌和学校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她一定是选择牌桌的，因为她花在牌桌上的时间远较花在学校的为多。但现在这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而且配合得恰好：她将学校所弄来的钱消耗在牌桌上。

“老师常常不来。鬼学校。”我的小同伴一生气，说话就更零乱。突然，她抬起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老家去？”她的眼睛和她的脸上亮着一种奇异的光芒。

“明年。”我说，

“几月？”

我知道不说出确定的月份她会不甘心的，于是，我说：“五月。”

“回去就好了，妈妈说的。”她跳了一下，为了躲避一个泥潭，但还是落进了一个较小的泥潭，溅了一脚泥水。她跺脚，骂那个泥潭：“鬼东西！”她继续说：“回去就好了，妈妈说老家的学校好，有滑梯，有秋千，有花园……明年五月，十二，一，二，……还有六个月就回去。哈！”

她回到哪里去呢？不错，她的老家是南京，但她是生长在这儿的，从来没有见过南京是什么样子。而她说“回去就好了”。我想笑，然而不敢，怕她生气。

“我告诉你……”她站住，严肃而又有些紧张地，“你说不说……”。

她的意思是要告诉我某一种秘密，而不要我转告别人。我向她保证，我不说。

“来呀！”依照习惯，我知道她是要我弯下腰。她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不要告诉妈妈，我攒了五百块钱。”“呵，那么多！”我做了惊诧和羡慕的表情。五百块钱是可以买五根油条的。

她因兴奋而说出了秘密，脸上泛着红色，快乐地笑着，又开始走动。

“妈妈给我的早点钱，我慢慢地省下来。好多天，我只吃一根油条……今天，我数了的，嘿，五百多！这么多！”她将小手伸进她衣服的右口袋，但迟疑着，又收回来。

“钱藏在哪儿呢？”我问，虽然我已知道了它们藏在哪儿。“在……在枕头下面。”她笑，偏着头望我。

“呵。”我点点头，“要藏好。放在枕头下面，不怕妈妈发现了吗？”

“哈！”她站住，大笑起来，用手在口袋里摸出一把折叠得很整齐的旧钞票，“她找不到，钱在这里。”她随即又懊悔于她的鲁莽，用激怒的、含泪的声音问我：“你会说吗，你？”我坚决地否认。

“你要是说了呢？”

我起了一个誓。

“对了。你好，你不说。我晓得你不会说的。”她又恢复了她的快乐。“我有这么多钱。回老家，我要买一盒颜料，不，我要买一个洋娃娃……五百块钱只怕不够，我还要再攒……”她沉醉在希望的幸福里。

“为什么不告诉妈妈呢？”我问。

“我怕……，问你，妈妈要是晓得了，还给不给我早点钱？”我还来不及回答，她又问，这次带着愤怒：“你不是说你告诉吗？你不是说……”她突然停住了。

我顺着她的眼光望过去，一个比她更小的男孩——但比她稍大也说不定，这样的孩子是很难让人猜测出他们实际的年龄的——躺在一棵大树下的泥浆里。他穿着的只是一件破烂的单衣，身体蜷缩着，轻微地颤抖。

我的小同伴没有理我对她的答复，向那个小孩跑去。我也跟过去。

我们似乎惊动了她。他无力地睁开眼。那是一种怎样的眼睛呵：无神、冷漠、痛苦、惊恐……这一切绞缠在一起，他在勉强地看了我们一下后，眼又无力地闭上了。显然，他已接近死亡：比他活着更幸福的安息。

“他，你看，”我的小朋友惊恐，退后，贴住我的身子，“怎么弄的？”

这在我自然只是很平凡景象，看到的太多了。我说：“一个小流浪儿，一个小叫化子。我们走吧。”我想拉她走开。

她不肯。向那个小孩凝视。她的流露着惊奇、恐惧的明亮的大眼睛，和那个小男孩刚才的暗淡，无神、痛苦的眼睛成了强烈的对照。

“他怎么睡在这里？”她回头问我，她的脸上充满了困惑、苦恼、同情。“他病了吗？”

我摇摇头。我无法回答。

“他的妈妈呢？他的家呢？他的……”

我终于将她拉开了。我不愿使一个幼小的心灵过早地理解不幸。虽然，那个和她差不多大小的男孩就正陷落在不幸的泥潭里。

她不再快乐地说道她将买的玩具了，只是带着小孩子的固执，问着关于那个小男孩的情况，几乎都要哭了。我不得不告诉她，那个小男孩可能已经没有父亲母亲了，没有人照顾他。他太冷了，太饿了，因为他没有钱。

她迅速地将手伸进衣袋：“我把我的送他，好不好？”我怔住了。想阻止，但不能够。

她在我的犹豫和沉默中转身跑去，跑得那么快，似乎正被追赶。路滑，她踉踉跄跄，我担心她将跌倒，就赶过去。她在那小孩的面前停住，俯下身，用喘息的声音喊：“喂！”

喂！”

那小男孩又微微睁开眼睛，困难地扭动着身子。

她忙乱地将钱从口袋中掏出，放在那小孩身边，小声地、害羞地说：“给你！”于是回身向我跑来。

我怀着激动的、而且有些愧疚的心情迎着她，紧紧地握住她的小手。她的发红的脸上有一个灿烂的笑。

我们向回家的路上走去。她说：“妈妈晓得了会不会骂我？”接着又摇头叹息：“颜斜合买不成了，唉！”于是安慰自己：“不要紧，再一个星期，少吃一点早点，又有钱了。”

暮色苍茫。乌云在沉重地移行，一角深蓝色的天空亮出。田野静默，枯树在风中发出轻微的呼喊。

我们缓慢地走着，都不说话。我偷眼看她，她似乎正在苦恼地思索。

“你说，”她突然紧紧地拉住我，“你说那小孩站起来了没有？还冷不冷，饿不饿？”她的焦灼的、关切的语调使我弯下了身子，我想亲她一下，我看见了她的眼角在闪亮，那是泪水。

天色已完全晴朗，夕阳已落近地平线，那一面的天空呈现着瑰丽的彩霞。另一面，最先出现的一颗星星在闪闪发光。黄昏美丽而庄严，是我所遇见的黄昏中最好的一个。我的心胸，因久雨而悒郁、烦闷的，也突然宽畅，开朗，我走在我的小伙伴的身边。1944年11月重庆

祖 父

当为我领路的堂妹指给我看，说那边当中的一间矮屋就是祖父的住处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加快了跳动，呼吸也急迫起来了，我几乎是跑着赶了过去。

我已经整整有十年没有见到祖父。十年前，我带着少年人的悲痛和梦想离开了这个大城和家。我还能够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景：在码头上，当开船锣已经敲过后，祖父捏着我的手，笑着说：“好好读书，不要辜负了爹爹的指望。这也是为你自己好。爹爹老了，只怕享不到你的福了。”祖父笑着，眼睛却已经潮润：“记得爹爹疼你一场，将来常常到爹爹的坟头上看看——”

他的话没有说完，我就倒在他怀里哭了出来。现在，十年过去了。这是一个壮烈的、惨痛的、有着惊人变化的十年。我回来了。这个大城接待这个青年有如一个陌生的客人。

而且，我将要怎样来述说家中的变故呢？战争使我们失去了一切。而在接近胜利的一次大撤退中，家里有四个人死亡，两个人不知下落，这当中包括我的母亲。不知是在一种怎样神奇的情形下面，七十岁的祖父和一位婶娘逃过了劫难，像乞丐一样地从桂林徒步走到了贵阳。胜利后，由于几位亲友的帮助，他们比我早两个月回到了故乡。在这个他勤劳地生活了四十年的城市中，祖父已没有一片可以遮雨的屋檐了。现在，他和我的婶娘寄居在一位老街坊的家中。我和妹妹走进小屋，那是一个冷落的镶牙店。老板显然以为我们是主顾，笑着有礼貌地站起来了，我却还能认出这位已经苍老了的、善良乐天的牙医师。我向他说出了我的名字后，他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接着，发出了惊喜的呼声：“是你呀，青凡，我还当是哪个！这哪里认得到，简直是大人了啦。你出去的时候还只这么一点高。”他比着手势，一面叹息着摇头：“日子快，日子快！……坐哇，坐，老弟，我听你爹爹说这两天你要回……”

在他的宏亮的呼嚷中，一个中年妇人从后面屋里跑了出来。我站起，认清了她就是那个在撤退中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婶母。当我离开家时，她还是结婚不到一年的新妇，现在，她的面容和神情却已如四十多岁的妇人了。她穿着破旧的蓝色的衣衫，头发已经有一点发白了。当我招呼她时，她怔怔地望着我，困难的喊出了我的名字后，就突然大声地哭了出来。

我明白孤独的婶母的悲痛。在我的身上，她是生动地记起了过去的幸福的岁月，和失去的丈夫和儿子。不知该怎样说出安慰的话才好，我问：“爹爹呢？”

牙医师在婶母的哭泣中，大声地摇头叹息。当他听到了我的询问后，他笑着说：“我还忘了，他老人家在隔壁，我去请。”婶娘抬起了头，以含泪的声音说：“青凡，你看，完完整整一大家子人出去，稀稀落落的几个回来……人，人死了；房子，房子炸了……”

我在婶母的哭声中沉默。我示意妹妹走近婶母，给这位不幸的妇人以安慰。

黑影一闪，牙医师走进来了，他说：“去去，你爹爹来了。”

我赶紧向门口走去，一个有着满头白发和齐胸长髯的老人正匆匆地走来。

“爹爹！”我喊，心里也惊异着祖父的苍老，十年前，他是那样的健壮，常常领我到各种热闹的场所去，见到每一个熟人，他都含着得意的笑容，拍着我说：“这是我的大孙子，初中就要毕业了……”

老人站住，眯着布满红丝的浮肿的眼睛，凝望着我。

“爹爹！”我又喊了一句，走近他身边，要流泪。“……”老人张合着嘴，但却没有说出一个字。他点头，眼睛红润。我扶着他进屋。

牙医师笑着说：“爹爹，你这该好了吧，这回青凡可回来了。”接着，他回头向我说：“青凡，你不知道你爹爹是怎样念你，天天只巴着门望你回。”

我扶着祖父坐下。他久久地微笑着凝望我，泪光在浮肿的、布满红丝的眼中闪动。婶母的哭泣已停止了。小屋里有令人窒息的寂静。

“好，好，成人了。”好久后，祖父点头，说，声音是颤抖的，他像小孩那样用手背擦着眼睛。在以后的谈话中，老人的闪着泪光的眼睛一直没有离

开我。

开始了十年流亡生活的倾诉。那是平凡的，每一个当年逃难的家庭几乎都有着相同的经历。但这当中却饱含了多少灾难，苦痛和血泪。

七十岁的祖父，孤寡的婶母，他们的面容上，神态上，破旧的、沾着异地的风尘的衣裳上，都写着这十年来他们生活的艰难，精神上的负担的沉重。现在，他们所祈望的胜利已经获得了，他们在多种困难的情形下面回到了故乡，而他们的贫困、痛苦，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这责任是谁的？我能向老人和妇人说什么呢？

“不要怨爹爹。”祖父发出了叹息，说起了母亲的死：“你妈的事，怪不得爹爹。你想，逃难，人挤死人，没有钱，没有车，你妈又病着……我也是九死一生……”

婶母也插过来说，“可怜你妈苦一生，只巴望你成人……眼望到你就要做大事，她又……”

我用一个手势打断了婶母的话，我不愿意再加深自己的悲痛。

“你看，青凡，你看爹爹怎么办呢？连一个落脚地都没有……，乡里倒还有一点田，那里又在开火，回不去……不是刘先生照顾，眼望要讨饭……”祖父沉痛地说：“唉，”牙医师大声叹息，在小屋内来回走动，以苦涩的声音说：“老爹，莫说这些客气话，只要过得去，这年辰！”

我知道，年迈的祖父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是由于我，他才感到他的暮年有一点温暖，有一点光辉。他没有，也不能想象，他的孙儿在这个国度中，也只是一个受难者……“你还要走？”祖父问。

“嗯，学校就要开学，我坐的是学校的专船。”

“走吧！”在痛苦的沉默后，祖父说：“还有一年，把大学好好念完。爹爹再只有你这个长孙了。”

我告辞。祖父和婶母送我，依依地伴着我走完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狂风随着冬天的黄昏起了。祖父和婶母在我最后的坚持下站住，当我走得很远后回头，看见那个不幸的老人和孤寡的妇人，还在风沙和暮色中站在原处，遥望着这边……以上所记的，是半年前的情景。因为接到妹妹的一封信才想起的，妹妹的信中说了这样的话：“……祖父的健康最近是更显明的退步了，每天吃饭很少，常常突然昏倒。我看他心里是怎样难过呵。前三天，他真的病得不能起床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昨天，大伯和三舅才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生也说不出是什么病，只说人老了，心境又不好，营养又不好，所以身体衰弱了。祖父在昏迷中，老是叫你的名字，他老人家真想你呵。你能不能回来一次呢？……三婶在医院里照顾祖父，好几回我看见她一个人躲着哭，你想，如果祖父有什么变故，她怎么办呢？……”

读着信，我的心沉了下去，我似乎听见了祖父的对我的呼唤，看见了婶母的绝望的面容……如果能够，我自然希望还能见到祖父；如果不能，那么，死去也好，对他，这可能倒是一种解脱。1947年5月

那个脸色苍白、披散着火烫的头发、整天穿着香云纱短衫裤的中年妇人，又在那边哭泣、咒骂了。

这对我已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苦刑：每天午饭后，或是深夜，她就哭泣着，咒骂着，或高声地述说着什么，夹杂着尖锐的哭声。我不能想象她那样瘦弱的身体怎么会有这样惊人的精力。她的哭泣和吵闹的声音总是愈来愈高，似乎将永不停止。而隔开我们的又仅只是一层薄薄的板壁，当她拍击着床板、顿脚的时候，我这边就会受到震动，以致我不能不锁上门逃走。唯一留给我的宁静是在上午：那时候她还在床上做梦，因而我可以看一点书，写一点什么。

我出门下楼，必须要经过她的门口。像我住的那间屋子一样，那个女人的房间也只有一个小小的木格窗户，因为对面有着一堵高高的墙，阳光永远不能从窗口射进来。阴暗的小房内零乱地放着一些什物和两张床。陪伴着这个妇人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那个女人的哭泣和谈话都是对着她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位老太婆原来是她的母亲。年老的母亲整天操劳：生火、烧饭，或是坐在后门的阳光下缝补衣服。那女儿什么也不做。有时候，我在门口遇见她，脸上抹涂了廉价的脂粉，换上了绸衫，出街去了。

就因为她上街的这种打扮，我以为她是一个妓女，虽然又不大像，因为很少看见陌生的男子进她的屋去。有一次，我和楼下的一位女佣张嫂谈起了她。

“别人是营长太太呵！”张嫂努努嘴说。

“那个营长呢？”我问。

“上火线去了，连信都没有一封。我看，男人不是死了，就是把她丢了。”

营长太太似乎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很少和邻居们来往。但有几次我也看到她在后门口和别的太太谈天。“我们过去呵，”她说，挥动着手臂，“那是什么日子呵！我的营长一请客就是十几桌，尽些些官太太、科长太太、将字号的人物。不是吹的话……”她说，眼圈子有点红了，接着，发出叹息，“那个背时的，这回一走连信都不丢一个，害得老娘一个人受苦哇，落得这个地步哇，在这个鬼巢里和这些鬼人住在一起呀……”她显然不能控制自己的激情，她的最后的一句话触怒了听众们，于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似乎就要打起来了。但以后不久，我就又看到她们在同样的地点谈着同样的话。

在营长太太每天的哭闹声中，我很少听见那个做母亲的出声。老太婆只是偶尔叹息一声：“造孽啊！”

今夜，我又被营长太太的哭闹声惊醒了。意外地，这一回，年老的母亲也大声地叫嚷了。

“不卖，随便怎样，我不卖！”老人以干哑的声音说。在静夜中，我听得见她沉重的叹息。

“那我们就饿死算了，饿死！”女人以哭声说：“那个狗×的没良心的东西呵，我这是哪一生造的孽呵……”她唱歌似地哭喊着。

“饿死就饿死，我活了六十岁，六十……死得着。没有那个话，卖房子！”老婆婆在妇人的哭声中，自语似的说。“那你就死啊！”妇人突然终止了哭声，大声地、疯狂地叫。接着是床板的响动，她大概是坐起来了。“你死，死了我嫁人！”“嫁人，哼，你嫁人！”老人以轻蔑的语气说。

“嫁人没人要，我卖×总卖得！”妇人疯狂地喊：“你老不死，我活着跟你受罪呀！不是你，我会落得这个惨下场呀！皇天有眼啦！”她又开始歌唱

似地哭，一面敲着节拍似地拍床板：“那个没良心的呵，（拍）那个当炮灰的呵，（拍）丢下老娘受罪呵，（拍）……”

“我老不死，……跟我受罪？！”老人唠叨着，声音颤抖，突然她大声地吼：“我走就是啊！……搬，明天搬，我一个人照样过日子，你这样的女人没见过……房子是我的，房子卖了喝西北风啊？……我跟你说，做娘的苦了一辈子，死了我要睡口好棺材！”说到最后一句时，老人哭了起来。

……在唱歌的哭声和干竭的哭声中，我又睡着了。不久，却又被一声巨响惊醒，我听见了脚步声，大概是那个妇人在黑暗中不小心撞翻了什么。

“什么撞倒了？”做母亲地问。声音是平和的，显然，刚才的风暴已过去了。

“凳子！……呵，姆妈，这个帐你听我算，”妇人的脚步声静止了，她大概是坐到了母亲的床边。“房子收租钱，一个月只收得到二十万，这年辰，你老人家自己想，二十万管什么用？再说，房子是老房子，几十年了，还住得几天人？”女人以亲切的低声调说，似乎一点也不记得刚才的争吵。“你再听，卖可以卖得八百万，人家张先生出了价钱，八百万！这样的主顾哪里找？一栋破房子！”

“你莫瞎话，房子还是好生生的，一点不破！”老人不满地说。

“是的，是的，房子不破！”女儿敷衍着母亲。当她说下面的话的时候，她的语调充满了诱惑，她说得急促，紧张：“姆妈，你听我说，八百万，我们拿两百万过日子，一百万买东西，五百万放利，大二分，二五一十，一个月就是一百万。”她甜密地重复着：“哈，一百万，你老人家天天吃肉！”

“我倒没那么好吃，”老人笑着说，她的笑说明她已动了心。

下面接着是冗长的低语、计算。

“靠不靠得住呵？”老人问。

“你老人家又说瞎话，人家那个大铺子还跑得了几百万块钱！……你老人家莫担这个心。”

……第二天我出去吃早点，遇见那个营长太太，这是我搬来第一次见她起得这么早。像过去一样，她穿上那件绸长衫，涂抹着脂粉的脸上有明朗的笑容。当她看见我的时候，意外地，竟向我笑着点了一个头。下午，她和一个胖胖的，穿着哗叽长衫的中年人回来了。在隔壁，他们高声地、愉快地谈着放利钱的事。

“任先生，我妈说钱放在你那里不太放心，你看老人家呵，不放心……嘻嘻。”女人快乐地笑着。“姆妈，人家任先生来了，你再问问看，你看人家好大铺子。你老人家自己问么。”女儿笑着说。

“你这个傻女呵！”老人愉快的骂着。接着，是那个男子宏亮的笑声。

这以后不久，我的隔壁，代替哭泣和吵闹的是母女之间的亲热的对话和妇人的尖锐轻快的笑声。我觉得日子清静了一些。因为笑声比哭声究竟容易忍受一点。但好景不常，那以后，却又加上了从午后开始一直继续到深夜的牌声。做母亲的仍像过去一样地操劳。有几次我听见女儿主张请一个佣人，老人都拒绝了。老人大概不习惯清闲的日子。当女儿坐在牌桌上时，她都坐在楼下后门口，缝着或洗着衣服，和邻人们谈天。“你老人家后福好呵！”人们称赞她。

“哪里话！”老人闭目，微笑着摇头，但显然是乐意于别人的赞美。

她们的突然的阔绰是显明的，特别是表现在女儿身上。她重新又烫了

头发，换上了新的绸衫和新的高跟鞋。在后门的集团中，是不大看到她出现了。再以后不久，她们就搬离了——用营长太太的话来说——“这个鬼巢”。临走时，大概是由于积累起来的仇恨，她以傲慢的姿态，没有指明地高骂了一场。太太们以轻蔑的沉默应付她的叫骂。只有张妈冷冷地说了一句：“你又发财了，营长太太，何必跟这些人吵呵！”张妈特别着重地说“营长太太”。

女人不屑地哼了一下，没有答理，走了。我终于有了一段清静的日子，一直到我搬家。

我终于要辞别那个大城了。忙着买东西，弄船票。当我从一条热闹的大街走过的时候，在一家紧关着的店铺的门口，围着一大堆人，里面还有嚎哭的妇人们。我向里面张望了一下，突然，我发觉原来是我的邻居的老太太也站在人群中间哭着。“怎么回事？”我问一个站在我身边的人。

“什么事，铺子倒了老板跑了，这些存钱的人倒了霉！”那人大声地吐了一口痰，摇着头走开。

“天啦，皇天啦！”我的老邻居以干哑的声调叫着，没有眼泪地哭着，“你黑天良的东西啊，你杀千刀的呵……可怜我老人呵……叫我怎么活呵！”

我以沉重的、悲悯的心情凝望老人，我叫了她一声，她没有听见。

突然，有一个女人向门上撞去，用手脚同时推撞着门。接着，第二个人也上去了……我的邻居也上去了。门上发出一阵狂暴的雷鸣，几乎要破裂。人群中走进来了几个警察，大声吼叫着阻止受害的人们。

“你们乱叫什么？退开！你们吃了亏政府当然晓得，法院会传你们的。站开，站开！”警察们吼。

人群有着严肃的寂静。突然，我的邻居发出狂笑，双手击着掌，以头向门上撞去。人群中发出轻微的惊呼。老人倒下了。笑声却没有中断，那是疯狂的、比哭声更悲惨的狂笑：“我的房子，我的棺材，我的女呵！”

我不能不掩着耳跑开。1947年4月

拜 访

……现在，我和我的朋友都迟疑地站住。在我的面前，是一座院落的黑色大门。我的朋友伸出手去，快要挨近生锈的门环时，又缩回来了。他回过头来看我，呈露着那样困惑、苦恼的脸色，似乎正面临着什么不幸。接着，他做了一个可笑的鬼脸，轻轻地问：“怎么样？”

这一次拜访是他提议的。我们在一个悠长的、艰苦的八年之后，又回到这个大城来了，我们惊异着这个城市的巨大改变；当幼年时的朋友偶而重逢，我们惊异着各自巨大的改变。

于是，我们谈起许多年前的一些事情。当我们面对过，而且也正面对着鲜血淋漓的人生，童年在我们的回忆中，是亲切、灿烂而动人的。那以后，是狂热的少年时代，在民族的灾难面前，我们真诚而努力地贡献我们的热情，抛开了学校的课本，四处奔走，组织集会，参加浩荡的游行行列……自然，这一切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当我们现在谈到时，仍旧有着说不出的感动。

我们相互说起那些已不知去向的友人，最后，当我问起那个时候曾经被我们每一个人都悄悄地爱着的叫做江叶的少女时，意外的，我的朋友告诉我，她就住在城外，并且，他提议，不妨去作一次冒昧的拜访。我自然同意了。我们大都愿意享受这种——就说是“罗曼蒂克”吧，以好奇和激动，去看望一个十年前被我们悄悄地爱过的、勇敢而热情的少女。

在路上，朋友——我一直忘了介绍他的名字——周大杰向我述说着江叶的情况。他们曾经在路偶然遇见过一次。她苍老了，她曾经使我的眩目的奇异的火焰，已经熄灭了，他说，她现在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妇人”。——她是带着一个孩子在街上买东西时，与周大杰遇见的。

我沉默地听着我的饶舌的朋友的述说。他的夸张的形容好几次使我忍不住发笑；而这笑声并不能表明我的快乐。我的朋友自我述说着那个少女巨大的变化，而他似乎忘记他自己，十年前那么顽皮、活泼的少年，现在已经是周大杰先生：一个机关里的小公务员，一个“妇人”的丈夫，和一个孩子的父亲。而我，虽然现在我还是一个流浪汉，而当我现在思索着这一些“现实的残酷”的时候，说明我已失去了少年时单纯幼稚的欢乐了。

现在，高高兴兴地一口气跑完了近十里路，我们反而迟疑了，周大杰甚至不敢伸手敲门。是什么力量阻止他？我们相互沉默地望着，站了一会。回过头去，黄昏正好：灿烂的落霞，在蓝天上涂抹着瑰丽的色彩。远山，树丛，茅屋，池塘……都静默着。晚风掀起稻田中金黄色的波浪。在寂静中，我的面前的一颗大树，发出轻微的呼喊。

“怎么样？”周大杰第二次问，微微提高了声音。

我生气地看他一眼，举手轻轻地敲门。门环发出凝重、暗哑的声音。

没有回答。

半晌，这一次是周大杰敲门，敲得很重。“谁呀？”我们听见有人走过院落，门打开了，一个穿得很破乱的中年妇人站在我们面前。她显然是一个女仆。

“找哪个？”一点没有礼貌地询问。

我和我的朋友又相互看了一眼。周大杰告诉她，我们来找“江小姐”。

“江小姐？这里姓张，没有什么姓江的。”那个女仆粗鲁地回答，门几乎就要关上了。

但是，从门的隙间，我看见了一张脸从院内一个窗口伸出来，向着我们这边张望。是的，那是已经有一点苍老了，但我还是认得那张脸，因为我认识那一对还是很大的眼睛。

“什么人哪，刘妈？”那张脸问。同时，我听见里面有个小儿的哭声。

“江叶！”我几乎就要喊出来了。我鲁莽地推开了那个女工，向院落里跨进了一步。我正预备开口说话的时候，那女工打断了我。她大叫：“跟你说过了，这里姓张，没有什么姓江的！”我已用不着回答，那张脸突然有着惊异和快乐的表情（那是如此奇异地混合在一起），告诉了我它已经认出来站在这里的是什么人了。

“呵！”那脸发出尖锐地呼喊：“马莱，还有——”她看清了在我后面走进来的周大杰，“大杰！……刘妈，刘妈，引他们进来！”

那女工惶惑地看着我们，接着歉意地笑笑：“呵，你们是来找太太的。”她说着道歉的话，引我们走向院落。

一个妇人从门里迎出来，一面在扣着长衫肋下的纽扣。在她背后，一

阵风似的跟着三个孩子，从她身后探头向我们望，如同一个巢里面的三只小雀。屋内传出来更大的小儿哭声。

“想不到，马莱……呵，房里坐，马莱，你看……”她显然是慌乱了，招呼着身边的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去，大傻，去招呼妹妹。”

我们在房里坐下了。这间屋，如所有的乡下的屋子一样，是潮湿而阴暗的。仅只靠天井的那一边，有着一个钉着木格的窗子。四边的土墙已经有一些颓落了，露出竹篾。左面的墙上，有着一张六寸大的照片，光线太暗，辨不清那是什么人。屋内有着只有乡下才看得到的庞大、坚固、古老的木床，和一张污黑的歪倾着的方桌。大床上有一个正在啼哭的婴儿。女主人慌张地跑过去，露出胸部喂着奶；一面回头为我们张罗着茶水。

我们接过女工为我们递过来的茶杯。我环顾，感到了某种局促和不安，这是在拜访之前没有想到的。而且，虽然我先前就知道她已结了婚，有了孩子，但在这个小屋内，我仍有着惊异和凄凉的感觉。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马莱？”女主人询问。我听得出她的声音有一点颤抖。我简单地答复了她。她抱起婴儿，正面坐在床沿上。在这个阴暗的屋内，我不能好好地看清她，但感觉这是一个陌生的妇人。她，这个妇人，使我温柔的回忆变得凄凉而黯淡。

我们沉默着。这沉默是生硬而痛苦的。女主人忘记了收回她的笑容，忧郁地凝视我们。

周大杰低头长久地玩弄着那只粗糙的茶杯，我躲避女主人的凝视，想起了十年前的欢乐，和一些久已忘却了的细小的故事……火热的场面，风雪夜的奔走，激情的歌唱……那些青春的诗。现在，那时候最出色的女郎就坐在我们面前——以另一种身份。我觉得，我是走进了一篇小说中间，痛切地感受了时间鞭子的抽打……“我们九年不见了，不是？”

“是的，整九年。”

“时间过得好快呵！”女主人叹息：“这九年，你过得好么，马莱？”

我自然过得不好，我简略地说了一点我的情况。接着，问起她的情况。

“我么？”她凄苦地笑：“你看见的，就是这样……许多话，一时也无从说起。”

我们又沉默了，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我们是生疏的。我感到这一次的拜访是不必要的，我们不能得到什么，除了失望和痛苦。我想告辞，却又一直犹豫着，如一种什么力量拉扯着，没有开口。

女主人也显然地感到了局面的僵硬，她低头喊一直惊异地望着我和周大杰的三个小孩：“来，喊伯伯，喊马伯伯，周伯伯。”

孩子们畏缩，害羞，不肯喊。

“他们的父亲呢？”周大杰问。

她望着周大杰，似乎不明白他的问题。接着，她又望着孩子们。

“死了！”好久后，她轻轻地回答，垂下了头。

“死了？”我不自觉地惊问。在说出口后，我就知道我的发问是愚笨的。

“在一年前，”她抬起头，用异样的音调回答。我看不见，但感觉到了她的眼泪。“敌人投降前两个月。”

暮色下沉，屋内更暗黑了。女工掌着油灯走进来，将灯放在桌上后，又在我们的沉默中退了出去。

“他是做什么事情的？”周大杰借着桌上的灯点燃了烟，递了一支给我。

“一个军官。”

在油灯的暗弱的黄光下面，这阴暗、古老的土屋，是有了另外一种气氛。我们渐渐地不再感到窘迫。女主人轻言细语地谈了这九年中的她的经历：战争初期，像那时候的多数年轻人样，她是狂热而感动，抛弃了幸福的家，投奔到此方；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一位军人，发生了爱情，结婚不久，有了孩子。因为战争的变化，她随着丈夫，移到了华中，胜利前两个月，他，那个军官，在一种极端残酷和壮烈的情形下面，死在另一种战场上。

“因为孩子太多，和一点别的原因”，她压抑着激情，低声地说：“我无法继续工作，回到了这边。现在，看起来，像一个贤妻良母了。”沉默了一会后，她抬起头来，“对我失望了么？”我没有回答，我不能回答。点燃了第二支烟。

“这八年，”她说，“对我是一个艰苦的磨炼……现在，因为孩子，只有暂时守着。有时候，心里，苦得很。只要孩子有个交待，我还要再走出去。”

她的热情的低微的谈话，她的在油灯下抱着孩子的姿态，和她的经历，使我们因久别和别的原因而来的距离，渐渐缩短了。她对我，已不是一个生疏的主妇，而是，像九年前一样，仍是我的亲切的友人；我想到，先前以“罗曼蒂克”的心情来拜访她，因为她的苍老而失望，是一种罪恶。

我站起来，走近她，问：“还记得九年前的许多事情么？”“忘不了！”她点头，“回到这个城市来时，我很激动，是希望着什么，期待着什么的。但我发觉这个城市给我的只是冷漠。老朋友也都不见了，——仅只在街上遇见一次周大杰。我也就不大出去了。每天黄昏就这样坐在这个阴暗的窗口。”“还有过去的那种豪情么？”

“相信我！”她语调是坚强而痛苦：“还是像九年前一样，帮助我！”

我们站起来告辞，她将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掌着灯送我们穿过院落。田野已溶化在黑暗中，一片寂静。她伸出另一只手来：“那么有空再来玩，我——寂寞。”我紧紧地还握她的手。“再重复一次，”她沉重地说，金色的灯光，摇晃在她有一点苍老、沉毅的脸上，“相信我，帮助我！”

当我想回答一点什么的时候，眼睛突然湿润，就放开了她的手，走了。

她将手上的油灯高举，为我们照路…… 1946年

哀悼以外

上星期天，接到一个朋友的信，里面提到另一个朋友的死讯。当时我颇有一点惆怅。在目前的中国，一两个人的死自然不值得惊奇，我虽离中年的大门还颇有一段距离，这几年也就默默地经历过好几次死别的悲哀了。但这一次却想写下一点哀悼的文字。我和死者有十多年的交往也应该有这一点情谊。但我提笔的原因，有一半却是为了生者：现在还健在的友人和我自己。

死者的名字是蒋良华，我初中时的同学，一个非常——用老师的话说——调皮的学生。

上课不用功不必说了，而且常常要做出一些小小的恶作剧。他的小足

球踢得很好，在初中一年级时已经是校内出名的球员了。另外，他又是很出色的话剧演员，代表学校出席讲演比赛的选手。总之，在课外活动中他往往占一个显要的位置，成为我的和别的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

因为住处的相邻，也由于性格的相近，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谁起得较早时就去邀约另外一个，一道骑着自行车上学，晚上又一道回家。我还能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些大雪的冬日，天还没有大亮，他就站在我家的窗口低声地呼唤。低声，是为了怕惊醒我的祖父（祖父不喜欢蒋良华，老是说他把我“带坏了”）。他的声音虽然那样低，我还是在警觉地期待中被惊醒了，悄悄地爬起床，因为寒冷而颤抖着，披上衣服，走向窗口向他做手势，一面忙乱地扣衣服。他也做手势回答我，意思是要我快一点。我们表现得紧张而又神秘，那景象现在想来还非常生动。很快地我就穿着好了，轻步下楼。一到门外，我们就跳上各人自己的车子，飞快地骑走了，同时吹着口哨，唱着歌……

蒋良华的家庭曾经富有过，后来衰落下来了。他的父亲曾经是政界的红人，因为风云的变幻，加上一点别的什么打击，倒了台，在家里闲住着。他看去很苍老，很少说话。良华是他最小的、也是仅剩下来的儿子，受着老人衷心的爱抚和严厉的管束。他的母亲（老人的第三个姨太太）的出身听说不大值得尊重，因为她的善良和慈祥，我是非常欢喜她的。再加上一个远房的孀居的姑母，就组成了他们冷清的家了。——他们的屋外是一个没有人经营的废园，有着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阳光不易射到屋内。那高大幽暗的房中，常常寂静得只听见窗外鸟雀的喧叫声。后来，我想，也许正因为在家中是这样的局促，所以，一跑到外面，良华才反叛地变得那样顽皮吧。

那个失意的老人，在凄凉的暮年，给予他安慰的，除了独子外，就是书籍。他收藏了好几柜子的书，大都是线装的，也有一些文学读物。因为在家里不能胡闹，良华就只能在书本中来开拓他的天地了。他后来喜爱文学，这种孕育是很有关系的。常常，在晚间，我和他站在椅子上在大书橱中东翻西找，有图画的，故事性的，就都取了来看。开初我们还轻声说话，后来就都沉默了，两人都沉进了悲哀的或是美丽的故事中间，一直到他母亲再三来催促他去睡觉。

在我们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北方学生运动的狂澜卷到了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在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的影响下面，我们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参与了几次全市学生的示威游行。良华很少出现在球场上了，他常常埋头啃着一些厚厚的理论书籍，开始成熟起来。初中毕业的那一年，芦沟桥的炮声在北方震响。良华异常地狂热和激动。他参加了一个流动宣传队，到邻近的县城和乡下去进行各种救亡宣传活动。常常，深夜他来敲我家的门，告诉我他们工作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灯光下他的燃烧着热情的脸。

战局激剧地转变，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已处在紧急的状态中。他家决定搬迁到桂林。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来向我辞行。我们在街上边走边谈。他显得有些忧郁、焦躁，说他原来准备到遥远的北方去，但又觉得完全丢开父母不顾是不对的，想等他们安顿下来以后再说。他向我说了将来的打算和计划。那时候，他是有着迫不及待地这个时代献身的激情。我们热情地谈着，一直到深夜。店铺的大门一家一家地关上了，街上行人已逐渐稀少。我们沿着幽静的街道走着，哪一家窗口飘吹过来一个少女的歌声，唱的是忧愤的《松花江上》。最后我送他到家，紧紧地握手，两人都流泪，相互叮咛永不相忘。当他走进去后，我还站在阴暗处，久久地凝视在夜色中的荒凉的废园和楼上

窗口不安的灯光。……不久后，我沿江西上到了重庆。有三年多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后来他从另外一个朋友处打听到了我所进的学校，给了我一封很长的信，告知了他这几年的情况：他的父亲在一年前去世了，家境非常困难。他原也进了学校，现在已经辍学，打算先将母亲安顿在一家亲戚处，他好走自己的路云云。信的语气已不像过去那样爽朗，甚至有一点阴郁，但还迫望着进步。我想，这个社会的某一面的现实已在他面前揭开了。这是残酷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一个充满幻想的热情的少年的发展道路上，一点痛苦和一点折磨也正是养料吧。我很快地给了他一封信，却没有收到回信。我想，也许他已离开了原地，而开始了悲壮的飘流了吧！我为他祝福。这样不知音讯地又过了两年多，我们却在一个意外的场合下重逢。

一个秋天的黄昏，我搭公共汽车去城里。同车的两个乘客因为一点什么事争执得很厉害。那其中的一个人的语调我似乎是熟悉的。我在人丛中挤了过去。我谨慎地打量了好一会后，就兴奋地大喊了一声。那果然是他——蒋良华，他已变得多了，戴上了黑边的眼镜，穿起了长袍，神情像一个中年人。但我还是从他的脸上的某种表情认出了他。

他也显得非常惊喜，向他的对手道歉，结束了争闹。我们在最近的一站下了车。我引他走进了一家小小的冷酒店。我们之间有一点拘谨，一点矜持，这是久别的友人之间常有的情形。当喝下两杯酒之后，话就渐渐地多起来了。在我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后，他向我诉说着这两两年间的遭遇。辍学以后，为了负起家庭的重担，他做了半年的小公务员。接着湘桂战争爆发，无法买到车票，他和母亲只有随着逃难的人群步行。因为沿途劳累和积年的忧郁，在途中母亲病倒了。到南丹时，母亲的病更严重。他说：“母亲实在不能再多走一步了，坐在地上，倚在我的怀中喘息。她的脸色苍白得真像一张纸，额上一颗一颗的汗珠。那时候要弄一杯水都非常困难，还谈什么治疗呢。而且也没有钱。我眼望着她受苦，没有一点办法。我心里纷乱极了。你相信么，在刹那间，我甚至希望她快点死去。而她终于死在我的怀里。弥留时，她只是断断续续地说：‘你走吧，华，你妈一生也苦够了，你走吧，妈会保佑你的。’你看，她还是只记挂我。”他的眼睛湿润，低头呷了一口酒，接着又说：“我草草地埋葬了她，在坟前做了一个记号，打算有机会再去看。而我看这样的机会永远不会有了。”他呛咳着，脸上泛着激动的红色。

我告诉他我的母亲也是死在那一次逃难中。后来问到他在重庆后的情况。他说他在重庆的熟人很少，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小学教员的位置。

“也只是混一碗饭吃而已，这年头……”我惊异于他的语气，“少年人的那种单纯的热情我已经消失了。人生的道路原来是这样艰难。父亲一死，我开始认识了这个社会的残酷；想将母亲寄居到一家亲戚家里，那家亲戚曾经得过我父亲很多帮助，在抗战中发了国难财，他们却只给我白眼。母亲的死，更使我感到了人生的凄凉。而生活又是这样不易……”

我沉默着，在我面前坐着的是我少年时的同伴，而且我们是一道谈到过理想和追求的。

现在他的雄心是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我不知道我是应该给予安慰还是责备。当他低头喝酒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在酒楼上》，虽然我并不认为他就是吕纬甫。

“我相信对这个社会和它的前途，我是还有所认识的。”他以兴奋的语调说，“目前的处境我真不甘心。有时候，我自己问自己，难道就这样消沉下

去么？我的少年时的梦想呢？”

我想到了一个脱离集体的孤独者斗争的艰难。但一时又不好向他多说什么，只是泛泛地说了一些鼓舞的话。他用那样不满的眼光看了看我，好像说：“你向我谈这些空话干什么？！”我只好住了口，在沉重的心情中和他分了手。以后，我又和他见过几次面，有过几次长谈。对他我了解得更多了一些。我明白了他的不甘沉落的悲哀。另一面，他变得渐渐有些愤世嫉俗，在生活的泥潭中挣扎着，却愈深地陷了下去。他有时也谈到理想，但却已失去了当年的热情，有时甚至是以嘲笑和虚无的口吻谈到当年对他是神圣的东西了。

他因为常常发点牢骚而又自傲，和学校的同事相处得不好。学期终了时，他被解聘。在一个远房亲戚处呆了半个月，又到附近一个小学教书去了。在那座小城中，自然更寂寞，心情也变得更荒凉，给我来信很少。

去年我离开重庆时，他赶来送行。当我们沿着一条僻静的街道散步时，我想到了九年前在武汉为他送别的情景。那时候，他是一个满怀热情的少年，而现在他已只能以悲愤哺养自己。那时候，他要告别的城市因危急而渐渐冷落了，但我们的国家是以英雄的气魄在灾难中屹立，上升；而现在，我要告别的城市因战争的胜利而渐渐冷落了，但我们的国家却被覆上了巨大的新的战争的阴影，有的人想独占胜利而置人民于深渊。……呵，九年！我似乎听到了时间河流的汹涌澎湃，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情怀。他很沉默。我了解他的心情。我叮嘱他珍重，应该看到自己身外，应该看到将来。分别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以被压抑着的颤抖的声音说：“你回去看一看我们过去的城市，看一看我家的废园。我大概一两年内走不掉了。回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哪里都是一样……记住我，常常给我信，我……”他没有能够说完下面的话，我的眼里也充满了眼泪。

我回到故乡后，给了他几封信都没有收到回复。一直到两月前，才接到他一封很长的信，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我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是老肺病，吐血，恐怕是好不起来了。因为空闲，我思索了许多事情。过去，我自暴自弃，甘愿灭亡，甚至多次想到过自杀。病了，却又特别感到生命的可贵。每天早晨，睡在床上，听见小学生们在操场上唱歌，我就有着强烈的生的欲望。迫望着追回失去了的少年时期。我的心中，有一股神圣的火焰，照明一切，向我指示了未来。我已经痛切地知道，这几年，我是错误的。我的消沉和堕落不能也不应责备生活。战败者不应埋怨敌人的强大……我想起了你对我的几次长谈和我们之间的争论。我现在是真正地理解了这个世界痛苦和庄严。如果能够，如果我能够从生活一次，我该是多么快乐呀……但是，我怕已经晚了。

这一封充满了生命的呼喊的信，给了我强烈的震动。我张罗了一点钱为他寄去，安慰了他，希望他好好养病。

这以后，他就没有信来了。我不知道他的病好了没有？在异地的小城里，谁照顾他呢？……当我再知道他的消息时，却已是死讯了。

我有一点惆怅，却并没有流泪。这个时代已将我们的感情锻炼得粗糙了。但我却立意要写下一点哀悼的文字，为过去美丽的少年时期的友谊，为死者的受伤的灵魂，而且——也为生者，为我自己。

我痛切地感到，死者的悲哀也正是我和一些年轻的友人多多少少所共有的。谁不曾有过灿烂的年华，少年的梦想？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有

多少人是在生活中沉沦了。有的一心经营自己的小巢，成了安分守己的小市民；有的在一点挫折和打击下退缩，在暴风雨中将头缩进折断了的翅膀中去；更有的走上了背叛的道路，卖身投靠……在看到这各种各样的变化时，是不能不感慨或愤懑的。良华则是属于另外一类。他还是比较真诚的，也还没有忘记自己当年的梦想。但他也在生活的重轭下苦苦地挣扎着，迷失了自己的道路，耗尽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悲剧。但我想这不应该是一个宿命性的悲剧，并不是就不能找到出路的。当我前夜重读良华的信时，我战栗。为什么我们在死前才忏悔，在不能挽回时才觉到自己错误。我觉得我也真正懂得这个世界的痛苦和庄严了。

我简单地、零乱地作了这样一点追述。窗外，是夏初的黑夜，白日的燥热是已经过去了。乌云沉重，预告着深夜的雷雨…… 1947年5月23日

破楼拾记

旧历的新年，或者说春节，总算平平安安地过去了。由于前不久看来势将燃烧到这里的战火有短暂的平息，这城市又恢复了平静，至少是表面的平静。在当局的命令下，店铺又先先后后地打开了大门，霓虹灯又在暗空中闪亮，到处又在播送着“可爱的香格里拉，美丽的香格里拉”或是“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歌曲。春节前曾经枪毙过三个人：两个“抢米犯”和一个“乱匪”，看来果然起到“治安”的作用了。自然有一些人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他们坐着飞机、火车或是轮船，带着他们的大箱小包，金条银元，甚至抽水马桶，在这一片沸腾的国土上去寻求他们的乐园。那里面有肥头大耳的富翁、知名的绅士、淑女，还夹杂着被自己的影子吓昏了的小市民。真的，乐园在哪里呢，让我们祈祷吧：“上帝保佑吾人！”

我在异常冷淡中度过了春节。只是关在小房里读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事。但当邻居的一位大嫂告知我今天的米价时，我还是忍不住抽了一口冷气。

今天上午，张先生来了，这是某局的一位科长，平时是很有办法的，这回想走却没有可能走。在照例的“恭喜，恭喜”之后，他问：“有什么消息吧？”我摇了摇头。“谣言多得很啦！”我还是摇了摇头。“听说有一个从天津逃到这里的人说，像我们这样的人非走不可哇！”他将头逼近我，用紧张的口气告诉我一些辗转听来的流言。

我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我不能回答他的任何问题。我知道，在这个大城市里是有一些刚刚出笼的谎言在散发着热气。张先生向我表示了他的苦恼：机关不发应变费，高级官员的家眷都已到广州去了，“到紧急时，他们有小包车坐，有飞机坐，我们怎么办呢？叫我们留在这里送死哇！”

大概终于感觉到了我的冷淡，他叹了口气，站起来告辞了。

下午，因为一点事上了一趟街，看来依然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电影院前半裸体美女的广告画下，依然围着一群闲人。街头巷尾的黑市买卖兴旺得很。但是，总还是可以感觉到一种骚动、惊惶的气氛，从人们的面容上，

从那些装满行李在大街上急驰的卡车上，从“你打算怎么样”的见面寒暄中，也从到处可见的官方的紧急告示中……在民生路附近，看到一个军官在痛打一个人力车夫，人们即刻围起了一个小圈圈，观看这一场平凡的“街头剧”。

“他妈的，你敲老子的竹杠，你竟敢敲老子的竹杠！”每吼一声，皮带就猛烈地在车夫身上响一下。军人是暴怒的跳动，挥舞着手臂和皮带。而车夫却显得奇怪地镇定，不说话，也不躲避皮带，静静地站在那里，只是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周围的人们也默默地站在那里。

军官突然停住了，在沉重的寂静的气氛中环顾了一下，似乎不知道怎样收场。他又低声地骂了两句，束好了皮带，穿过人群走了。人群为他让开一条路。所有的眼光都盯在他的穿绿军服的背影上。车夫用手揩了揩脸上的汗和血，低声地喷出了一句“老子记得的……。”

是谁说过：沉默也是一种力量，是向对手猛扑过去之前的那种凝视。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在我们的眼前，是常常可以感受到这种沉默的。人们艰难地生活、挣扎、受苦、流血……每一个人都是见证人。是的，我们记得的……夜间，才只九点多钟，这个城市已经非常寂静。偶而有几下稀落的鞭炮声。黑暗和烟雾笼罩着这个寂静的大城。我和家人对坐着，感染到这种寂静，没有说一句话。我不知道那些出外寻找乐土的人，此刻在拥挤的车上或船上，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也不知道那些留守在这个城市的一百万市民有着怎样的心情。古老的中国已经残破，到处是火光和歌声，无数的人们倒下，无数的人们在沉落，渴望安全的——坟墓，也有无数的人们站起来……时间在前进，让我们加鞭，中国，你破旧的马车是在废墟间飞驰！1949年2月15日
匆草新的歌

母 亲

当我为了练练笔，立意写几篇往事回忆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题目是：《母亲》。在同样的题目下，我已经先后写过两首较长的诗，一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次是在一九四五年。

但我还是想再写下一点什么。回顾幼年的生活，母亲当然是常萦绕在我心间的一个人。母亲去世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中，我的生活充满了变幻和波折，我也常在不同的情景中想起她。——好多年了，我不大写什么，近几年来甚至完全抛开了笔，因而受到了亲近的人的不满和指责。这一次想写几篇往事的回忆，是对于关心我的人的一种回报，而在我自己，这也是艰难地再探步的尝试。那么，让我把首篇奉献给母亲吧。

在题名《母亲》的第二首诗的开头，我说过：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

坐在阴暗的小窗前的
中国的可怜的母亲们
是没有名字的。

……

我的确不知道母亲的名字。我问过我的长辈们，他们也都不知道。父亲是应该知道的，如果母亲真的有名字的话。但我没有好问他。在过去的苦难的中国，在重重压迫下的广大的劳动妇女们，名字对她们也是奢侈品。她们还未成年时，大都叫什么妹、什么娃，或大丫头、二丫头之类，这不过是为了呼唤。当她们嫁出去以后，就变成了“孩子他娘”，在某种比较正规的情况下，就是××氏。如果她们有一个名字，也很难用上，等于没有。我的母亲，是这样广大的妇女中的一个。

我也不清楚母亲在来我们家之前的生活。只听说她是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大概父母很早就去世了。由“媒妁之言”嫁到我们家里，那时还不到二十岁。我的祖父原也是乡下的贫农，因为天灾人祸，实在生活不下去，逃荒到汉口来，做过苦力，当过菜贩，摆过烟摊，后来家境稍好一些了，开了一家小小的百货店，也不算是怎么宽裕。所以三个儿子中，只有我父亲（他是长子）得到了在正规学校里读书的机会。由于他勤奋用功，在祖母的支持下，一直读到了大学。另外两个儿子就只不过在私塾混了几年。母亲嫁过来的时候，父亲是大学生。那正是“五四”运动时期，像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父亲是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的，对于这种包办的婚姻，当然不会满意，母亲受到了冷淡、鄙夷，她当然也不会感到幸福。但她默默地承担起她的命运。后来，大约当我四岁的时候，父亲遗弃了我的母亲，离家出走了。这对于母亲是致命的一击。她也还是只能默默地承担起她的命运。她还年轻，不到二十五岁，带着流血的心，低着头站在阴暗的漫漫的岁月面前……父亲另外成了家，也住在汉口。母亲带着我跟随祖父祖母生活，一直到死，母亲再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我的庶母有时倒来看看祖父祖母。母亲对她是亲切的。庶母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孩，她后来有了一个职业，就将女孩送过来由母亲抚育。母亲接受了，而且对女孩异常慈爱，如同自己的孩子。我的三婶（她和母亲感情最好）感到很不平，我好几次听到她埋怨母亲说：“你这是为什么呵，还为她带小孩？！你怕她还享福！”母亲总是即刻打断她的话：“莫这样说……”接着就凄凉地笑笑。

由于父亲的出走，祖父祖母对母亲有一种歉疚的心情，对待她比对待另外两个儿媳要照顾些。家里的别的人，对母亲也是尊重的。母亲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她是极好强的，一言一行都非常注意。除了和两个儿媳外，在人前很少说话。在我的记忆中，她几乎很少走出大门，我不记得她进过戏院和电影院。她和两个儿媳轮流做饭，洗衣，或是低着头静静地坐在窗前做针线。窗外是大街，喧腾着市声。在这个繁嚣的大城市中，她的天地只是污黑的厨房和破旧的小楼。她唯一的消遣就是一字一字地低声地念着质地恶劣的石印的《珍珠塔》一类的弹词书。——母亲没有上过学，不知道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依靠自学，能够认识一点字。

那些古老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显然深深地感动了她，有时候，我听到她低低地哼唱了起来，声调是那样地悲凉。

当我七、八岁时，已经略略地知事，三儿媳和别的人，又不时在我面前责难我父亲，这使我同情母亲，而对父亲有着反感。有时在三儿媳或别的人半开玩笑的鼓动下，我就说出一些对父亲不敬的话，如果母亲听到了，她总是用眼神或一个手势阻止我，事后就背着人责备我：“这些话是你能说的？！你……”她的声音哽塞了。当我不用心做课时，母亲常常说到父亲过去是怎样勤奋地读书，深夜还坐在灯前。有一次，我匆匆地跑进房里，母亲正坐

在打开的箱前收拾着衣物。她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当她发觉我跑近时，急忙地将照片塞进了箱底，但我已看到了那照片是父亲的。——那么，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中间，或者，正由于是在那样的处境中间，母亲对父亲也还是有着感情，有着怀念……

母亲还有一个姐姐，年龄比她大不了两三岁。她的婚姻也是不幸的，她的丈夫是农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吧，不劳动，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而且常常虐待她。我的姨母往往穷困得无法开锅。她有时就投奔到我家来，小住几天。母亲和她见面，两人都异常欢喜和亲热。

姨妈、母亲和我都挤睡在一张大床上。一个深夜，我醒来，听到她们在各自诉说着自己的遭遇。这一对不幸的姐妹都在呜咽着，而又相互安慰。我紧闭着眼，不敢动弹，唯恐她们知道我是醒着。我已不记得她们说了一些什么，但我将永远不能忘记她们的谈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所留下的对于人世的凄凉而沉重的感觉。姨妈常常拉着我的手，轻言细语地叮咛：“冠，你要好好读书呵。你妈就只有指望你，你要替你妈争一口气呵。冠，你将来做了大事，我做姨妈的也光彩呵……”我总是默默地点着头，而且暗地立誓要在将来做“大事”，为母亲，也为姨妈。姨妈终于要回乡下去了，两姐妹都恋恋不舍，母亲从箱底掏出一个小纸包，我知道那是母亲积存下来的几块银元，她塞到姨妈手里。姨妈很不安地推辞着说：“你也难。”母亲说：“我有吃有穿，你比我要难得多……”于是她俩都低声地哭了起来，我站在一旁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像那些在悲惨的命运前感到痛苦、绝望的妇女一样，母亲是信佛的，从宗教里面去寻找对自己不幸的解释，而且寻求慰藉和渺茫的希望。母亲在阴历的初一、十五和春节期间，都吃斋。对于穷苦的人们，只要做得到，她从不吝啬一点帮助。她这样做，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修来生”。这里有一颗善良的心在跳动：正因为自己的不幸，因而同情别人的不幸。

我当然是母亲唯一的安慰和希望。我四岁时，一个春天的黄昏，跑着穿越马路，被一辆急驶来的汽车撞倒，卷入了车下。坐在路旁乘凉的人很多，掀起了一阵惊呼声。母亲正在厨房里，一听到这消息就昏倒了。那次我侥幸只受了一点外伤。但母亲从那以后就容易心悸、惊惶，精神上的创伤久久不能平复。当我在病中，特别容易感受到母亲对我的温暖的爱抚。

但平时，母亲对我的爱往往是无言的，有时甚至是以严厉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少年时是贪玩、顽皮的，有时母亲忍不住责打我。但往往流泪的不是倔强的我，而是母亲自己。母亲常常含泪说：“娘是苦命人，只指望你成人争一口气，而你……。”母亲的眼泪比她的责打更能触动我的心，我仍倔强地沉默着，但对母亲的怜爱，对自己过失的自责，由于伤了母亲的心而引起的愧疚，这种种感情从我的心中升腾起来，我真想扑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但也许我在幼小时就“不堪改造”吧，我的种种过失总还是一犯再犯。母亲还常以“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一类故事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类的古训教育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我在一家报社的儿童副刊上登了两篇稿件，得到了一个烧有我的名字的小茶壶做为奖品；读初中时，我被学校选派参加全市讲演比赛，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支带有黑色剑鞘的七星剑。

那个小茶壶被祖父常常捧在手中，而那支七星剑则由母亲悬挂在床头。当我将那两件奖品带回家时，母亲没有说什么，只是微笑地看着，而她眼中有着泪光闪耀。可以想象，在母亲喜悦的泪光中，是浮现着我的灿烂的前程，

是梦想着有一天我真能成为“人上人”，同时也为她带来一个幸福的暮年。

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是深爱着母亲，朦胧地意识到母亲的不幸和屈辱，这使我在有人谈到母亲时特别敏感、易怒。有一次，当我十一岁时，为什么事和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少年争闹了起来。他鄙夷地说：“你爸爸不要你妈妈嘛！”我奋力打了他一耳光，接着就拚命地和他扭打起来，闻声而来的大人们费了好大的劲将我们拉开了。我带着流血的嘴唇和被扯破的上衣回到家去。这场生死的决斗就发生在我家后门口不远，母亲立即知道了。我一拉开门，她正在门边守候着。她的脸色苍白，一言不发。我也咬着嘴唇沉默着。母亲俯下身来查看我的伤口，通过她扶着我的肩的手，我感到她全身都在战栗……我进入初中以后，使母亲失望的不仅是我依然还是那样贪玩，大部分时间都奔跑在小足球场上，而且，渐渐地又有一种新的阴影蒙上她的心头：那正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夕，由于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的影响，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接着又卷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中。学校当局向家长发出了警告。我的一些狂放的言论也使大人们惊骇。母亲为我很担心，她好多次劝说我，要我少和“坏人”来往，要我专心读书，都被我极不耐烦地用几句简短的话顶回去了；真是，怎么能跟你说得清楚呢，最好别管这些事。危险么？危险就是考验，爱国无罪！母亲往往只是深深叹一口气。有两次她似乎要发火了，但终于克制着自己：儿子已经是一个中学生，是不能随便责骂的。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我的三个友人被捕了。那年暑假开始时，我接到了学校“默退”的通知单。我气愤，而又不安：怎么向家里，特别是向母亲交代呢？我知道，这会很伤她的心。通知单在我手中压了三、四天，母亲从我的神态中感觉到出了什么事，几次询问我。实在拖不下去了，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将通知单拿给母亲看，准备接受责备，或者，更糟的是，母亲会大哭一场。但意外地，母亲反复地看了通知单后，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那下学期怎么办呢？”她甚至连望都没有望我一眼。而且，那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她对我比平时更亲切，在生活上对我照顾得更细心。但我发觉，她是突然憔悴了，话更少了，而且常常在做活当中停歇下来，失神地想着什么。

那年秋季，我被祖父强迫送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的中学去继续念书。离开武汉，离开我的友人们，离开家，离开母亲，这使我很难过。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了，古老的中国显得年轻了起来。我所在的那个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那种闲逸和沉寂，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震荡着雄壮的歌声，小街上常常走过举着救亡团体旗帜的队伍……。我被弥漫在全国的那种巨大的热情所感染，所鼓舞，所振奋，卷入到了那浪潮中，兴奋地忙碌着。这虽是我初次离家，但很少有时间想到母亲。只是当我偶而回到武汉，因为可以很快就见到母亲而引起的喜悦总还是充满了我的心胸，快近家时，就不自觉地半跑起来。

战火逐渐地逼近了武汉，父亲一家已经迁到四川的一个小县里。为了让我能够继续求学，祖父决定让我到四川去找父亲。一九三八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后，只身登上了西上的轮船。送我上船的是祖父。母亲一连几天忙着为我收拾行装，缝补衣服，反反复复地叮咛，要我好好听父亲的话，不要惹父亲生气，要我用功读书，也要我好好注意身体，千万不要和“坏人”来往……。她的神情显得凄伤、黯然，但没有眼泪。她为我将行李提下楼，和家人一齐送我到门口，看我坐上人力车。我走了好远后，回头看到她还站在门边。我的心情沉重、纷乱，但没有想到，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

武汉沦陷的前夕，祖父祖母和母亲、叔婶们逃难到广西的一个小县里。我则去重庆念书。祖父每个月总要托人写一封信来，有时寄我一双布鞋或是一件毛线衣，我知道那是母亲亲手做的，一股暖流漫过我的心。有时还寄我一点钱，我知道逃难在异地，祖父维持一家的生活已经很艰难，我感到了那少数一点钱的重量。在每封信中，祖父总会谈到母亲的情况，说她很好，要我不要挂念。每次家信的到来，总是使我喜悦而又有点哀伤。但我很少及时复信，有时甚至两三个月不给家里一点消息。我正是在青春的激情中，我有许多友人；我有虽然穷困但是欢乐的生活；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写诗、演戏、开会、办墙报……。我往往决定当晚要为家里写一封信，却又因为一点什么事情耽误了。

但我还是有时怀念母亲。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我住在重庆近郊的乡间，在一个落着细雨的夜里，我写了一首题名《母亲》的诗，后来发表在和几个友人合编的诗刊《诗垦地》的第一辑上。现在我已经找不到这首诗稿了，但还大致记得那后面的两段：

母亲，
只是因为深深地爱你，深深地爱着这一代
像你一样的
被时代的车轮轧伤了的母亲们，为了给你们带来幸福的暮年，为了后来的母亲们

不再有像你们一样悲惨的岁月，我，无数的你们的孩子，都在用如石工一样的手，一凿一锤地敲打着
通向光明自由世界的路。

因而，我不能回到你的怀抱不能走上你希望我走的道路，不能戴上奴隶者的王冠而又将那光荣分给你，我不能呵！

母亲
请信我：
当祖国的大地
挣断了几千年的锁链，当故乡的林间，
不再拴有敌人的战马，当你又跋涉着迢迢的路回到故居时，
我一定要随着黎明的光去叩开故居的门，

我一定要跪倒在你的脚前求你：即使是一点头的宽恕……一九四四年的冬季，日寇向湘、桂发动了一场攻势，国民党军队毫未进行抵抗就一泻千里地败退了。我接到信，知道祖父已带着母亲、叔婶等从广西逃了出来，计划到贵州找我父亲。我一面注意报纸上关于战局的报道，一面期待着祖父、母亲等的平安音讯。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十天、半个月都过去了，我没有得到一点消息，而关于湘桂撤退中的混乱、悲惨的情况却不时传来。一个多月以后，我才接到祖父的信，他们丢掉了一切衣物，一直步行逃难，在半途，和母亲、叔婶等失散了，祖父历尽千辛万苦到贵州毕节找到了父亲。他在信中问我母亲是不是到了重庆，或是不是接到母亲的信。但我哪里知道母亲的消息呢？我非常焦虑，但一筹莫展。

后来，和母亲同行的叔婶等也到了父亲处。至于母亲的下落，他们是这样说的：在途中，母亲就决定不去父亲家，而要到重庆找我。母亲的身体原来就虚弱，在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她得了重病，但每天还是挣扎着和叔父、婶娘一同步行。几天以后，她终于支持不下去了，而当时又风

传敌人即将到达。母亲不愿拖累叔父和婶娘，要他们先走。她摸出了一个金戒指要叔父带给我。母亲身边留下的唯一的東西就是我中学讲演得到的那件奖品：七星剑。她倚坐在一座破屋的墙边，扶着七星剑，望着叔父、婶娘等人在人群的洪流中渐渐走远。那地点，是在贵州都匀附近。

竟是这样的！

在异乡的土地上，没有一片遮蔽风雨的屋檐，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甚至没有一张熟识的脸，眼前流过的是惊慌的逃难的人群，耳边响着的是凄惨的呼喊声，而敌人的铁蹄随时可到……。我不能想象孤独地倚坐在墙边、扶着儿子的一件纪念品的病危的母亲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不能想象那以后母亲的遭遇。我的心沉重、悲痛，却又暗暗地期待着，也许，母亲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因为一点事，我短暂地停留在长江上游的一个小城里。八月十三号的晚上，传来了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顷刻间，全城一片欢腾，到处是鞭炮声、欢呼声、锣鼓声，我怀着狂热的喜悦挤在人的洪流中走遍了全城。深夜，回到借住的友人家中，已经很疲累了，却毫无睡意。八年！血与火，斗争与牺牲。我想到祖国的前途，想到很多人，很多事，也想到母亲，呵，如果她还活着……。在激动的心情中，我开始动笔写第二首题名《母亲》的长诗。我想通过母亲的遭遇去暴露那个黑暗的旧社会，并寄托对光明的未来的追求。

后来，在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我回到了孕育了我的童年的故乡。我去看了已经成为废墟的故居的遗址，我在童年时嬉戏的大街上徘徊。对于过去，我引起了一些回忆，但无所留恋。

不久，一场新的战争又在这片国土上进行了。我的故乡也就是我的生死场。武汉解放前夕，每夜都实行戒严。我常在深夜，站在小楼的窗前，凝望着在幽暗中的大城：空阔的大街，暗淡的路灯，沉重的黑影，一片寂静。但有时走过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有时传来一声尖厉的“口令！”的喊声，说明这座大城正在恐惧地战栗。战争在百十里外进行，在这里，在表面的硬壳下面，地下火正在运行，燃烧……。这座大城正急待毁灭也即将新生。我想到母亲，我想，这是她过去所不能理解，不敢想象，但终究应该是她所期待的。从小楼的窗口，我守望着故乡的土地，我感到母亲与我同在，在沉寂和黑暗中，渴望着霹雳的春雷和壮丽的黎明……。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多年，我自己也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没有想到又会写一篇有关母亲的文章。在执笔时，一些久已淡忘的往事又涌上了心头。我哀悼着母亲，也追念着逝去的青春。我想，这将是我在文字上最后一次纪念母亲了。我决不应该仅只是回顾过去。我还不是那样苍老，也并没有失去希望。无论怎样艰难，我是生活了过来；不管前程是怎样的坎坷，我将一步一步走去，一如生我育我，在我身上寄托过深爱热望的死者。那么，你将永远与我同在，母亲！1947年初稿1979年12月改

和最可爱的人相处的日子

——赴朝日记

小记：这里发表的是我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去后的日记的一部分。限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大都写得异常简短。现在稍稍整理一下发表出来，是因为这些简短的记述里面，多少反映了朝鲜战场上的一些生活风貌，或者也还可以略供读者参考的。当然，也因为记述的简短，就妨碍了内容的深入和发展。

我离开朝鲜已有两个多月了，而在整理这些日记的时候，当时的情绪就又涌进了我的心中，有一些印象还异常鲜明地在我眼前闪耀。对于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对于在艰苦中战斗过来了而且还正在继续战斗着的朝鲜人民，我谨在这里说出我的最大的怀念和敬意。

——作者

四月八日

终于要出发了。五点四十分离开我们住宿的地方。天落着雨，还夹着雪花。我们坐在搭着油篷的卡车上。每一个人的心情都非常兴奋。什么人低声地哼了一句歌，有几个人应和着，很快的，就成为一个大合唱，歌声从这一辆车上流到另一辆车上：“我们祖国多么伟大……”，雄壮的歌声盖过雨声。

车在大桥边停下。大桥昨天上午遭受了敌机的轰炸，经过铁道兵团同志和工人们一天一夜的努力，已经修复了。我听说有好多同志们从昨天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合过眼。我爬到车顶上去看大桥，它屹立着，联结着两岸。桥上还有一些工人在忙碌着，不时传过来吆喝声和呼喊声。

雨住了，天色暗下来。马路的那一端，有一座用树枝搭成的牌坊，上面有用电灯排列成的三个字：“胜利门”。那大概是为了最近返国的志愿军架的。七点四十分，我们开始过桥。再见，祖国！我回头，凝视“胜利门”，它的光芒照耀着我们前进。车在桥上缓缓前进。黑暗中常常有人高声喊：“熄灯，”“慢慢走”。在喊声的间歇中，桥上异常寂静，当车偶尔停住的时候，可以听见江流的声音。车平安过桥，我们进入了朝鲜。现在，她是全世界人民注意力的集中点，一场伟大的战斗正在这一片国土上进行。英勇的战士们保卫着和平和真理，并以他们的英雄行为和辉煌的胜利鼓舞着全世界为保卫和平而奋斗的人民。我思索着这一切，面对着寂静的大地，有一种神圣的、庄严的感情在我心中升起……车亮着小灯在大路上行驶，可以隐约地看见公路两旁的残破的房屋和废墟。不久，车转入一片山丛中，路边一片白色，不知道是积雪还是夜霜。晨四时，车停在一座小村落前。我们帮助司机同志将车隐蔽好，去敲开一间草屋的门，被惊醒的主人和我们的翻译交谈了几句简短的话后，点亮了油灯。油灯的微光照着他的多皱纹的、浮着亲切的微笑的脸，同时，我看见了睡在炕上的另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主人热烈地招待着我们，安排我们在另一间房的炕上睡下。

非常疲乏，虽然睡在热炕上不大习惯，虽然这是进入朝鲜的第一个晚上因而有些兴奋，但还是很快地就睡熟了。四月九日

十一点钟醒来。门外，是在金色的阳光下的静静的田野，可以看见少数的白衣人正在他们的土地上耕耘。我们的主人正在屋前一棵大树的浓荫下面敲打着什么。后来，我知道他是在利用被击落下来的敌机的残骸在改做着水桶之类的用具。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亲切的微笑又在他的有着深深的皱纹的脸上浮现了出来。他的妻子在厨房里烧饭，他的十岁左右的小女儿用头顶

着一大桶水从外面的井边走来。她那样小，却顶着那样一大桶水，那样子是很有趣的。但我却在这个勤劳的小女孩的面前感到了一种严肃。

简单的吃了午饭后，和主人谈天。知道他姓全。在“八一五”解放前，他是一个佃农。

土地改革时他分到了两垧田。他的大的男孩在半年前参加了人民军。他自己在村人民委员会也担任了一点工作。当我问到他解放前的生活情况的时候，他的脸色是沉重的，谈了一点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面所遭受的痛苦。他的话很简单，显然的，老人不愿意回忆那些阴暗的岁月。他也承认目前的生活也还是很艰难。“打走了美国鬼子就好了”，翻译转达他的意思。我们的谈天一直都是经过翻译的。后来，当我问到他志愿军的观感的时候，他才说了一句中国话：“中国人民志愿军，顶好！”他又露出了那种亲切的微笑，并且用诚恳的眼光长久地看着我。

和同伴们到田野中去走了一下。虽然是白天，偶尔还可以看见我们的大卡车在公路上驶过。遇见了一支打着红旗和朝鲜国旗的行列，行列中走着的都是穿着朝鲜便服的青年们，他们胸前都挂着红花。显然的，他们是去参加人民军的。我们不自觉地鼓掌，他们也鼓掌来回答我们，并唱着《金日成将军之歌》。

五点半钟，太阳还高，我们的车就出发了。在村口，有七八个朝鲜儿童站在那里，当我们的车开过的时候，他们挥舞着小旗，用清脆的声音喊：“中国人民志愿军曼（万）岁！毛泽东曼（万）岁！”为了欢送我们，孩子们大概已经在那里等得很久了。孩子们的诚恳是令人非常感动的。我们也高喊着口号回答他们。当我们的车走得很远以后，还看见他们站在原地，向我们舞着小旗，挥着小手……车在大风沙中急驶，翻过一道山又一道山。天黑下来了。月牙的淡淡的微光照耀着峰峦和深谷。我们的车开亮了灯走，因为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上，摸黑是很危险的。有时候，突然一声枪响，车很快地就停住，灯也同时熄了。因为枪声是有敌机的警告。在寂静中，可以听见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的声音。

十二时半，到达宁边。在夜色中，只看见一些残破的楼房和瓦砾废墟。我们去借宿的那一家，房内还有着电灯。主人和他的妻子在朦胧中醒来，灯光照着他们疲乏的脸。另外还有两个小孩在炕上酣睡。主人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后，就以非常热诚的态度招待我们，并且用中国话说：“辛苦，辛苦。”女主人坐在炕上，露着善良的笑容，我们请翻译转达我们深夜打扰了他们的歉意。主人大不以为然地摇头，他不愿借助于翻译，而在一张小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来答复我们：“朝鲜人民和中国志愿军亲切！”

四月十日

七时醒来，和房主人谈了谈。他姓刘，担任这里一个规模不大的精工厂的厂长。他的妻子在民主妇女同盟做班长。他告诉我，敌人曾经两次来到这里，这座小城原来有两千多户人家，现在只剩一半了。青年被杀掉的有八百多人，有大批的妇女被强奸。老百姓的粮食和较好的东西大都被抢走或烧毁了。

我到街上去走了一下。小城残破，一半以上的房屋被毁了。在残剩的矮屋中，偶尔还可以看到几家店铺，卖着板栗、烟丝一类的简单的东西。这里居民所需用的粮食和油盐都是配给的。

除了人民军外，看不到穿便服的青年们。妇女儿童很多，妇女们在小

溪边洗衣，或是在从事着别的劳作。儿童们在废墟上游戏，当发现了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奔了过来，围住我们，用朝鲜话向我们说着什么，因我们不懂而嬉笑着。最后，用相当准确的中国话唱着《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今天一连发出了好几次空袭警报。但人们都不以为意，照样地走路、工作。朝鲜人民，在灾难中，是显露出来了那种惊人的力量。他们坚强地生活在他们故国的废墟上，走过他们亲人的坟场，工作并且战斗。

下午六时离开宁边，我们向主人告辞。当我们出门和上车以后，一直都有小孩子围绕着我们，笑着摇手、唱歌。

车又是在大风沙和山丛中急行。过界川，这个在公路边的城市全部被炸光了。看不见一间完整的房屋和一个居民。

天黑以后，看见远处有好几处火光，敌人又在进行着破坏和屠杀。我们的车子从一间燃烧着的房屋边冲过，有一堆人正在那里救火，人群中，有一个妇人张开双臂在呼唤着什么，我想，她大概是受难者中的一个吧。熊熊的火焰所映照着的，她的有着汗珠和泪珠的悲愤的脸，她的张开双臂呼唤的姿态，虽然一闪就过去了，但留给了我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十点多钟，在警报的枪声中我们的车熄灯停住了。几乎是同时，四颗照明弹挂在我们的右上方。我们的车是裸露在明亮的照明弹的光亮下面，离我们很近的飞机的隆隆声也听到了。司机同志阻止了我们跳车的行动，将车迅速地向前冲去，在路旁一间茅屋的阴影下面停住了。我们从车上跳下，分散匍匐在附近的草沟中。隆隆的机声还在震响，我抬头，看见了在我们头顶上掠过的敌机的暗影，它徒然地搜寻着。五六分钟后，照明弹先后灭了。我们上车时，司机同志问：“人不缺吧？”我们答复他后，他说：“对，走吧，开灯干！”我们的车又打亮了灯，轻快地在公路上行驶。

晨二时半，在一个村落前停住车。司机同志告诉我们，这是模范村，这里每一家都有一个以上的劳动党党员。四月十七日

在××已经工作了五六天了。今天，我被分配到附近的一个野战医院去慰问伤病员。

下午六点半钟出发。大月亮。我们同行的有六位同志，其中一位是向导。踏着月光下山，进入到一个大的峡谷中。残破的村庄，大的林丛都已沉睡。峰峦的巨大的黑影沉重的压着地面。小路两旁都是高高的白杨树，上面流走着轻微的风声。月光斜照着这个寂静的巨大的峡谷。没有人会在这里记起美丽的牧歌。峰峦的背后，衬映着红色的火光，它提醒着我们，这里是受难的朝鲜和战斗的朝鲜。

听到了清脆的马蹄声。一个战士——大概是通讯员，骑着一匹白马越过我们前去。当他从我们身边擦过的时候，他回头，向我们挥一挥手。白马飞驰，月光照着白马和它的骑者，渐渐远去了。

经过了一个大的沙滩，就穿出了峡谷。已到达了××火车站。时间已将近十点钟了。这座车站，曾经一再遭受过敌机的轰炸。几天以前，在它的周围还有过一场大火。而在此刻，车站仍站立在废墟间，并执行着任务。高高的搬运机的钢线上，在运送着大包的什么货物。

在地面上，有着一簇一簇的人群，有的人在肩负着沉重的大包缓缓前进。当我走近的时候，我看见她们全是朝鲜妇女，是在运送着从搬运机上卸下来的粮食。搬运机发出单调的吼声，而妇女们因紧张的工作而沉默着。

一位朝鲜妇女在路边休息。我走过去用双手提了一下她身边的那一大包粮食，那是如此沉重，使我要提起来感到有些困难。当我放下大包时，那位朝鲜妇女因我的吃力的姿态而露出了善良的笑容。

我们沿着铁路线旁边的公路继续前进着。这是一个小小的平原。公路上不断地有大卡车和大车来往着。公路两旁的田地中，人们借着月光在播种、耕耘。

我们听见了火车的汽笛声。火车的汽笛发出雄壮的长鸣，划破寂静，在空中久久地震荡着。这声音在我们当然是很习惯的，但在朝鲜听到，这还是第一次。它使我们感到了极大的惊喜。我们不自禁地发出欢呼向铁道跑去。长长的列车轰响着，一个象征似的在朝鲜国土上前进。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经过一片很大的废墟。向导告诉我们，这里原来是一个大的工厂和工人宿舍。现在工厂已被破坏，宿舍被炸毁。那些工人大都参加人民军去了。那么，那些现在拿着枪的工人们，将来他们会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他们新的工厂和新的宿舍来的！而现在，我们站在这一片蒙着月光的广大的废墟上面，不能不感到心情的沉重和悲愤。

午夜，到达了医务所。我们走进一间有电灯的小屋子。被唤醒的医务所连指导员开始是用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些夜半的来客。当向导和他简单的谈了几句话以后，他就温和地微笑着，紧紧地和我们握手，用低缓而诚恳的声音说：“好，好。早就巴望你们来了。”接着，他就喊醒了睡在炕上的另外几位同志。

无论我们怎样推辞，连指导员和另外几位同志还是坚决将他们睡的炕让给了我们。并为我们换了被褥。那些被褥洗得很干净，但还是可以看到大片淡淡的血的印痕。那么，这是我们的伤病员盖过的了。

四月十八日

上午和连指导员谈了一下医务所的情况。这个所的任务是接受前方下来的伤病员，转运回国去。他们有两位医生，十一位护士，十五位护理员（其中有八个是朝鲜女同志）。就目前的工作任务来说，人手是很不够的。由于辛劳，工作人员中已经有十二个病倒了。他们的医药和必需的用具也都非常缺乏。

连指导员年约四十岁，是农民型的干部，朴质而诚恳。在他的黝黑的脸上，经常有着温和的、亲切的微笑。他不大喜欢说话，回答问题的时候，也非常简短。“当然，困难是有的，”他微笑着说，“但也是可以克服的——抗美援朝嘛！”他加上一句说。

是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举出了一些实际的例子：他们是怎样用罐头盒改做为便器，怎样剪开自己的衬衫蒸煮后改做为绷带……。但他有意地没有说到那基本原因，就是：人们的高度的服务精神和牺牲精神。我各方面探问后，知道他们每个人的睡眠一般不超过七小时，少的只有五小时。而工作却几乎是整天没有休息。至于他们的牺牲精神，我只想举出一个小例子：护理员王颖同志，半年前还是湖南一个女中的学生，平时算是比较胆小的，而有一回敌机对医务所的轰炸中，她一次又一次地穿过密集的机关枪的火网，冲进烈火中，抢救出了八个重伤员。

连指导员领我们到门外去看了一下。医务所的病室、办公室和医疗室，就是散布在这附近的民房。有一些轻伤的同志们散落地坐在他们各自的屋前晒太阳。护士和护理员们从这一个病室到那一个病室，肩挑着水桶，端着面

盆或别的用具，忙碌地来来去去，工作着。

当我们回到房间的时候，那里已经坐着好几位伤病员同志。他们是听说有“祖国来的人”特地来谈谈的。其中有一位是××师的营级参谋。当我们简单地说明了慰问团到朝鲜的意义后，因为病弱，也因为激动，他用低沉的、微微战抖的声音说：“我们非常感激祖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和关怀。”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们只有更好地努力来报答这种支援和关怀。”

我们带着非常大的兴趣听他们说着他们的战斗生活和战斗故事。有一些情况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但由他们自己讲出来，那就依然是亲切而感人的。

我特别注意到一位姓刘的同志（我没有听清他的名字）。他是在汉江前线受伤的，是一个功臣。他讲话很多，但因为说的是道地的辽东话，所以很难听懂。好几次，他提出来：“同志，你们看，什么时候我们的飞机能够出动呵？”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鬼脸，说：“他妈的，我看我赶不上五次战役了。”夜间，医务所的几位负责同志、功臣、伤病员代表，和我们一道开了一个座谈会。地点就在我们住的那间小屋里，二十多个人把两间相通的小房挤得满满的。有一些人就不得不坐在院子里。因为怕空袭，房子的门窗都是用防空布遮得严严的，炕烧得极热，房内闷得难受。但会始终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我们两位同志介绍了国内一般抗美援朝运动开展的情况和生产建设的情况。他们一直用几乎是贪婪的眼光注视着说话的人，常常发出满意的惊叹声和鼓掌声。

医务所的几位功臣、伤病员代表和一位朝鲜女护理员都说了话。散会前，我们分送了带来的一点简单的礼物和纪念章。他们所表示的喜悦和感激是远超过了那些礼物的份量，而他们尤其欢喜那个纪念章，我想，那该是因为纪念章上有着毛主席的像的原故。

四月十九日

早晨落着细雨。医务所的同志领着我们去看伤病员。当我们走进第一间病室的时候，看见金贞子同志正在将两束花插到当作花瓶用的罐头盒中去。她起身，向我们微笑。我看着放在炕上的那两束花：一束杏花和一束不知名的野花。在这间简陋、低矮的小屋里，在我们的受伤的战士的身边，看见这两束美丽的花，我是异常感动的。

室内有着浓厚的药的气息和血腥的气息。炕上的五位重伤员同志都在熟睡。我们严肃、静默地站着，看着这几位同志：他们有的是被燃烧弹烧伤的，浑身扎着浸着血的绷带，有的残缺了四肢，有的胸部负伤……。我们长久严肃、静默地站在门前。我的情绪逐渐激动。一种强烈的对敌人的仇恨和一种强烈的奔赴战斗的欲望同时在我的心中激荡着……。一位靠近门边的伤员同志突然醒来。他凝视着我们。当他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后，他挣扎着要坐起来。我们阻止了他。他气喘着说：“同志，对……对不起啊，同志！”他的苍白的、瘦削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没有答复我们对他的伤势的询问。他说：“辛苦了吧，同志。”他问“祖国人民好吧？”他问：“毛主席好吧？”我们回答了他。他的苍白的脸上笑着，不断地微微点动着头。我有了眼泪。

我们走遍了所有的病室。面对着这些为了人民，为了祖国，为了崇高的信念，流了血，作了最大的奉献的我们的最可爱的人，这些质朴、英勇的战士，我是用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才按压住自己的激动，而在他们面前保持平静的态度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以充满热情的语调说着“祖国”。听了他

们的话，你就能够更深刻的感觉到，什么是祖国，什么是祖国爱。

在病室里，也就看到了那些护士和护理员工作的情形。他们有的在那里换药，有的在替伤员洗脸，有的在为伤员换着衣服。而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个场面：一个伤员背部受伤，吃饭的时候需要依靠才能坐住，因为伤处是在背部，又不能靠墙，于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护理员，就站在他背后，用双手扶住伤员的双肩。她做这个工作显然是很吃力的，脸都挣红了，而她一面还在微笑着安慰那个觉得很不安的伤员同志：“你吃你的饭吧，我连这一点气力都没有吗？真是！”

下午，和两位朝鲜女同志谈了一下。这是很不好的，就是说，要她们丢开繁忙的工作来和我们谈话是很不好的。但我们又实在无法按捺住和她们谈一谈的迫切愿望。在这个医务所里，负责同志和伤员同志都用非常热爱和敬佩的口吻说起在这里工作的朝鲜女同志。伤员还联名要求为她们记功。她们一共是八位，在这里担任护理员的工作。她们的年龄都在二十岁上下，因为几乎是日以继夜地工作，现在有五个人病倒了。其中有一位，没有肯接受别人的劝告，因为工作的需要，今天还是带病工作着。那就是现在坐在我们面前的黄永子同志。她的脸色是很不好的。另外一位同志是分队长金贞子。

金贞子和黄永子两人的经历大致是相同的。她们的家都在汉城。同在一家纺织厂做工，先后加入了劳动党，从事着地下工作。两人都被捕过，在监狱中受尽了各种毒刑。但敌人不能从这两个十七八岁的女工口中得到什么。后来通过各种关系，她们被释放了。依然继续从事着地下工作，迎接了汉城第一次的解放。当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她们参加了女性游击队，除了队长是男同志外，其他一百五十个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女工。她们穿便衣，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各种方式的战斗。“我们开始都是不会放枪的，”答复我们的询问时，金贞子同志有些羞涩地微笑着。“为了锻炼我们，男游击队抓到了几个特务，送来要我们枪毙。大家都有些害怕，谁也不敢动手。后来，我们枪也会放了，勇气也大了。”

“她的枪就打得很好呢！”黄永子同志指着金贞子说。金贞子又羞涩地笑了一下。

女性游击队因为某种原因解散了，她们两人又一同加入了红十字会，由于她们的要求，她们被分发到这里来工作。“现在，你们的家呢？”一位同志问。

“我们不知道家的消息，”金贞子同志说。“现在，这里也就是我们的家。”她又加上一句。

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大家都沉默着。我不知道别的同志们有着怎样的心情。对于坐在面前的，曾经是工人、战士，而看上去像是中学生的女护理员，我有着极大的敬意。而我觉得，我不必将这种敬意用言语表达出来。在真正的同志之间，有时静默是能够传达出更丰满的感情的。

最后，我问：“你们现在觉得有些什么困难呢？”我的意思是说，在这里，周围全是异国的同志，她们应该有一些生活上的困难需要解决或是照顾的。

金贞子沉思了一下才开口。她说：“我们共同感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学会说中国话。这就很难做好照料伤员的工作。伤员们向我们提出什么需要，我们听不懂。这使我们感到很痛苦。为了不让伤员疑心我们是不肯好好照料他们，我们就整天微笑着。”

在她们，困难的不是她们生活上有什么不便。不，在这一方面，完全没有什么是值得考虑的。重要的是工作，一切是为了工作。“我们就整天微笑着。”在这一句朴素的话里面，是表现了多么崇高的服务精神和多么诚恳的服务态度。

因为怕下雨晚间不好走，在下午三点钟，我们就准备动身回去。连指导员，其他的几位工作同志，金贞子同志，都送了我们很长一段路。经过病室时，伤员们纷纷向我们招手。四月二十五日

我们已经在出发到前线的途中走了三夜了。今天黎明时，到达××后勤部。这里已经迫近前线，白天停留在屋中是很危险的，而且，事实上，在这里也简直看不到什么房屋。后勤部的同志领我们走进一个极深的山沟中休息。同志们分散各自找隐蔽的地方。在紧密的林丛中，有着许多铺着稻草的小坑洞。我钻进一个用松树掩盖的小坑洞躺下，看看表，已经六点钟。听着松涛，很快就入睡了。

在朦胧中被唤醒，才只睡了一点多钟。后勤部的同志送了早饭来，是大饼和用罐头牛肉做成的汤。吃完后，和两位同志在山上山下跑了一阵。只看见了一两栋孤立的草房。这一带的老百姓大都是住在小洞中，我们去看了一个，只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陪伴着一个病弱的老人。老人躺在狭小、潮湿的洞中，小女孩在洞口架着柴枝烧着什么黑色的杂粮。翻译不在身边，无法进行谈话，我们静静地站在那里。小女孩专心专意地眯着眼睛低头吹火。她抬头，发现了我们，并没有表现一点惊异的脸色，继续吹火。当她再一次抬起头来的时候，她的污黑的脸上露出了纯真的笑容。“毛泽东，毛泽东！”她轻轻地喊。我走了过去，取出了我随身带着的一包干粮放在她的手中。她先是惊异地看着我，接着微笑，用力地摇头，将干粮还给了我，同时说着我不懂的话。她端起煮好的食物走进洞去了。我听见了小女孩低声地对老人笑着说话的声音。我站着，犹豫了一下，将干粮放在地上，就和同伴们走开了。

六时集合。我们的带队同志宣布，前线已于本月二十二号打响，我们已包围敌人一个团和三个营，并缴获了大批汽车、坦克和大炮，并宣布，我们要去慰问的那个部队，大概已经前进了，我们马上出发，追上去！

那么，我们赶上第五次战役了，这正是我们所渴望的。我们将与我们伟大的战士们一道生活，并一道进军……。在兴奋的心情中匆忙地吃完了晚饭。八点钟整，车出发了。沿路都看见火烧的山和火烧的城镇。大片大片的红光燃烧着沉重的黑夜，有时可以嗅到焦糊的气息。敌机的飞行也比我们过去行军时频繁。公路两旁都是高大、紧密的树林，车停下时，可以听见林内布谷鸟的呼唤声。

在伊川与平原的中间，有一个三四十里长的高原，那里是敌人的空中封锁线。我们看见有九颗照明弹分散地挂在前面的公路上。我们的车停住了，听得到飞机盘旋的声音。司机同志走下车来，他向前面张望了一下，低声地说了句什么，接着，就用坚定的语调对我们说：“同志们，挂灯了，镇定一点就没事！”他重新爬进了车厢。当离我们较近的三颗照明弹刚刚先后熄灭时，我们的车子迅速地冲出去。前面在照明弹下面的公路异常明亮。我们的车子飞驰。听到了机枪的声音。我们的车子飞驰。在紧张的心情中，我突然想起了司机同志们常常爱用的那句术语：“借光！借光！”

夜半三时，车拐出公路，开进一个山沟中，道路狭小而崎岖，车跳跃、颠簸着，进入到一座广场，这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带队的同志跳下车

去办交涉去了。半小时后回来，他说，军部已经迁移了，但离这里并不远，留在这里的只有少数人员。我们就将装慰问品的木箱从车上卸下。现在要将木箱搬走是不可能的，而如果就散放在地面上，白天就一定会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于是我们匍匐着或是跪在地上，因为没有工具，用双手挖掘着溪沟边和山脚下的松泥和乱草，将那些木箱掩埋隐蔽好了。大家坐在地上等向导来领我们前进。在祖国，应该是温暖的春夜，这里却还是这样的寒冷。

头上是繁星的天空。寂静中可以听见隐约的隆隆的大炮声。飞机的声音也不时可以听到。

四点多钟，向导来了，领我们上路，穿出峡沟走上公路时，天已黎明。有敌机正在我们头顶上。突然，一个巨大的火球射向天空，一片耀目的红光，接着是一声震耳的巨响。我们怔了一下，立刻就明白了这是我们的高射炮在发炮。敌机很快就窜走了。

愈走天愈亮了。

四月二十六日

上午七点多钟到达××军部，那是在靠近一座山脚下面的散落的几间民房中。听说首长们昨天深夜才睡，此刻还正在休息。当我们的介绍信递进去后，我们马上被接待到屋中。和几位首长谈了一些国内的情况，他们向我们说了一些最近战局发展的情势。他们今天晚上又要继续向前进，追击敌人。我们决定分到两个师部去工作。谈话一直进行得很愉快，大家随便地坐在热炕上，小房内弥漫着烟雾，常常爆发出笑声。好几次飞机从我们的上空飞过，但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只是有时候什么人随便地向窗外的天空看一眼而已。

下午躺着休息了一下。五时许，军部的同志准备出发了。我才发觉，在这附近看去完全是荒凉的、不见人影的破房中、山坡上，都驻扎着我们的战士。现在，他们从各个角落中涌现了出来，肩挑着、背负着各种用具、弹药、武器，有的牵着马，一齐汇合到大路上，向前行进着。人群中，偶而有低低的谈话声，歌唱声，一般的说，是严肃地、沉默地、坚定地，向前行进着。我们夹在他们中间走了一节路。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和军队一道行动，而且，又是和他们——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欢呼的最可爱的人，英勇的志愿军。我是和他们穿着同样的制服，走在他们中间，向着敌人的方向挺进。我很难恰当地说出我的欢欣的、骄傲的心情。

走出山沟，到达公路后，我和全国劳动模范李德心同志上了一辆小吉普车。我们两人被分派到××师去工作。

吉普车在公路上急驰着。在暮色中，还可以看清四周的景物。公路附近全是瓦砾场。田地荒芜着，上面散落着许多敲打坏的敌人的汽车、坦克、大炮的残骸和繁密的巨大的弹坑。

除了偶尔看到几个我们的志愿担架队员外，看不见一个人影。司机同志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四天前的战场。我在庄严的心情中环顾四周的一切，设想我们的战士们是怎样在这里打败敌人，并踏着敌人的死尸前进。

黑夜覆盖大地。我们的车停在一个岔口上，司机同志告诉我们应该下车了。我们站在黑暗中正感到茫然的时候，听见有人喊我们的名字。两个人影走近我们，原来他们是××师派来接我们的两位同志。夜间看不清他们的脸，而他们紧握着我们的手是热烈的。他们抢着把我和李德心背着两个小包接了过去。我们一道在黑夜的小路上摸索着行进。他们说，他们的师部今天从四十里外进驻到这附近的一个地方，而他们是一出发就和师部分手，抄

小路特意赶来迎接我们的。这一带，他们曾经在战争中往返过几次，所以已经很熟悉了。

听到了江流声。我们已到达了北汉江。走到一座桥边，才发觉桥当中有一大段已被破坏了。江面并不宽，但不知深浅，所以不敢涉水。而一时又不知道别的道路，我们只好找了两根很长的竹竿架在桥上，摇摇晃晃地从竹竿上爬了过去。越过河滩，就一直是山路。走得满身大汗。到半山腰，知道队伍也已到达了。今夜就在这儿宿营，战士们正在找寻住宿的地方。

我和李德心和政治部宣教科的几位同志一道被安排到一间草屋中。简单地与他们谈了一些情况，喝了两杯开水，就睡了。

四月二十七日

天还朦朦亮，那几位同志就起身了，我们也挣扎着爬了起来。有敌机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我走到屋檐下站了一会。我们住的屋子是孤立在一座山脊上，环绕着我们的都是高山。

遍山撒满了一些白纸，拾了两张来看，才知道是敌人无耻的宣传品。山上的树木都烧毁了，留下东一块西一块的黑色的焦痕。工事、掩蔽体和巨大的弹坑到处都有。显然的，这里也是几天前的战场。

落起了细雨。坐在房内和宣教科的几位同志交谈。他们拿出了一些他们编印的报纸给我们看。都是八开油印的，生动地记述着战士们在每一次战斗中的英勇的事迹。他们的记者深入到连队中，与战士们一同生活、作战，而报纸印出后，在有战斗时，就一直送达到火线上，所以对于战士是有着极大的鼓舞作用的。报纸上面，也还刊登着一些在收音机里收听来的祖国的消息，和战士们自己创作的快板、诗歌之类的文艺作品。这一张小小的油印报，记者们亲身参与战斗将稿件写回来，而另外的同志往往是利用两次行军之间的短暂时间来编印它，然后又分散出去……因而这些报纸不仅是战斗的记录，而且它本身就是战斗的结晶品。

这几位同志都是知识分子。看上去，身体都很弱。但他们是热情、质朴而单纯的。我想，他们也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奔赴到这伟大的队伍中来的，经过激烈的战斗的考验而成为坚强和勇敢的人了。

政治部×主任走进我们的小屋中来了。亲切地与我们交谈，并布置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得到了允许今夜就下到一個团里面去。

然后，他领着我们到另一处的一间房屋中去，见到了师长和政委。政委在忙着打电话，师长在墙边看一幅极大的军用地图。从政委的电话中，知道我们在西线又已取得了大的胜利。

因为在落着雨，所以提前吃了晚饭，四点半钟我们就和师部一同出发了。×主任坚持要将他的一根木棍给我用。

和师长、政委、×主任一道在雨中走着，我们的前面和后面，都是长长的行列。走过我们昨夜来的那一条小路，发现已有七八处做了地雷的记号，有几处的地雷已挖了起来，幸好昨夜我们没有踏上。

沿着一座大山的山腰前进，路极泥泞，我手中的那根木棍对我有了极大的帮助。在山脚下，就是北汉江。师长指给我看，说桦川就在那边。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在暮色和镑镑的细雨中，我看见了在江的那边的一座全部毁灭的城。

从便桥上越过了北汉江。天黑了，一直落着雨。行列静默着前进。人们也必须一个紧跟着一个，因为一尺以外就无法见人。寂静中只有雨声，江

流声和远远的炮声。

到了一个小村庄，师部继续前进，我们——李德心、师部陪伴我们的宣教科夏副科长和我，三人坐在一片屋檐的下面。我们是在等候约好在这里碰面的×××团。

满身是雨和汗。坐了一会，又冷起来了，大地黑暗，看不见一点灯光，我们三个人互相靠着坐。在这个黑夜，正有无数的我们的战士在向着前面挺进。

四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今晨一点钟才睡下。四点半钟就醒来了。×××团的政治处陈主任正在屋角打电话，通知各营各连的功臣代表来和我们开座谈会。他压低了声音，显然是怕惊醒了我们。屋内没有点灯。纸窗上，亮着黎明的微光。门外有淅沥的雨声。我是非常疲乏，但恐怕躺在这里会妨碍他的工作，就起来了。

原来是预定正午开会的，接到了师部的电话，因为天雨，要团部准备在正午出发，我们的会就提早到九点钟开了。屋外落雨，屋内又坐不下，开会的地点就是在院子四周的屋檐下面。出席的功臣和代表有八十多人。陈主任讲完话后，由我和李德心报告了国内各方面的情况。接着，就是功臣们讲话。他们几乎是争着发言，一个人刚讲完，第二个人又站了起来。

这些英雄们，曾经在战斗中，在艰难和危急的情况下面，以他们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于理想的坚定的信念，创造了奇迹，得到了胜利。现在，他们是在激动的情绪中，用质朴的、诚恳的话，说着对祖国人民的感激，并说出豪壮的誓言。一个战士说：“美国鬼子再猖狂，蒋介石就是他的榜样，朝鲜就是他的坟墓！”一个战士说：“我们要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光，功上加功！”而所有的战士说到最后都是以这同样的两句话结束：“我们向祖国和祖国的人民宣誓，不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决不回国！”我站在他们面前，意识到我是祖国人民的代表，意识到他们的话所包含伟大的意义，因而，感觉到一种神圣的、庄严的力量。

最后，我为一位功臣代表佩戴纪念章。他从屋檐下走出，将身上穿着的那件美军短大衣脱下，扔给了别的同志，站在雨中，我走近他。我听到了他的急促的呼吸。人们静默着，注视着他们。我的手颤抖，好久不能将纪念章挂好。我与他紧紧地握手，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祖国万岁！”我看见了眼中放射出幸福的光。

正午，雨住了，有着隐约的阳光。出发的时间因而又有了变动。我们就到驻扎离团部最近的一营去。在半途，意外地看到了一位朝鲜老头和一位老妇人，看样子，他们是夫妇，两人身上溅满了泥土，慢慢地走着。来到一片废墟上，停住了。他们相互低语，呈露着悲痛的神色。不一会，那老头先走了，老妇人在废墟上坐下。她喃喃独语，后来，就发出了干燥的哭声，似乎是在诅咒着……

到一营，见到了营的负责同志。今天上午我为他佩戴纪念章的功臣也在那里，他的名字是赵春，原来是三连连长，现在刚调为营参谋长。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地热烈握手。他领着我各连走了一趟。战士们分散地住在这附近的民房中，有的在编织着草鞋，有的在抄写或阅读着什么，有的在开着小组会。当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即刻停止了活动，露出亲切的微笑站了起来……

黄昏，营教导员邀我为全营作报告。全体战士们坐在广场上，后面站

着的是马队。当我报告的中途，好几次爆发出雄壮的口号声。我说着祖国人民对他们的敬爱！战士们喊：“我们感谢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关怀！”我说着祖国人民对他们忍受困难、克服困难的精神是如何敬佩，战士们喊：“我们不怕苦！我们不怕难！吃苦是光荣！克服困难就是胜利！”

会刚开完，就接到了准备行动的命令。夜九点钟，出发了。因为是大队行动，天又黑，走得很慢。十一点半钟，开始爬一座高山。我们在一条险峻、曲折的山道上行进着，有瀑布的喧哗声。四面都是高大的森林。夜两点多钟，到了山顶，浑身大汗。坐下来休息，在人群中优美的口琴声，有低低的歌声和笑声。一位同志告诉我，说我们此刻正在三八线上。我站在一块大石上，环顾四周。下弦月升了起来，照着森林和峰峦。我想着，我们现在所站立着的地方，曾经是幸福和痛苦、自由和奴役的分界线。

继续行进。下山的途中，到处都看得见工事、炮弹坑和被打断的树木。四点钟到山脚。

连夜都没有睡好，又走了一夜路，我困极了，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勉强睁眼，在朦胧中，看见山坡上到处都是人影。凝神一看，才知道是乱石。战士们一个一个越过我们前进。我尽力振作起来，和两位同行的同志一道，跑着追上去。天渐亮，精神比较好。穿出山沟，我们到达了南朝鲜。这里战争的痕迹是更明显，可以看见成堆的炮弹筒和未用过的炮弹，坦克和汽车的残骸比过去所看见的更多。敌人是前天刚从这里撤退的。

天已经完全明亮了。我们找了地方宿营。一坐下，反而一点也不瞌睡了。阳光辉煌。我抽着烟，战士们忙着洗脸，煮饭。有几架飞机在头上飞过，战士们继续着自己的活动。当我们坐在大树下面吃饭的时候，有两架敌机在我们四周盘旋，一个战士抬起头望了一下，说：“妈的，你也想下来吃两颗黄豆么？”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躲一躲，一个战士说：“飞机尽装模作样的吓唬人，其实没什么！”

找了一个小防空洞睡了一觉。下午，到各连去采访了一些战斗英雄的事迹。当我们刚准备动身回师部的时候，有一位战士赶了来，他大声喊：“同志，来来来，领你们去看一件事。”他的严肃而愤怒的态度使我惊异，而当我进一步地问他的时候，他只是说：“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被带进一间小屋中。那里已围着一群战士。我们进去，人们闪开。我看见，在炕上，躺着一个头发蓬乱身上赤裸的妇人的尸体，双手被缚，下身有大片的血渍。女人的头向里面歪着。我低下身去，看到了她脸上干涸的泪痕和下唇上留着的深刻的齿印。我感到我的周身冰凉。我慢慢地站了起来，久久不能说出一句话。敌人的无耻的暴行，我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当我面对这个被侮辱的妇人的尸体，我却经验了少有的激动。人们静默着。有一位战士走前一步，手指着尸体，用低沉的声音说：“同志们，这也是我们的姊妹……要复仇；要复仇的！”

战士们忙着对尸体进行安排，我们向他们告别到师部去。一路上，那个妇人的尸体都在我的面前摇晃着。是的，要复仇的，不是用挽歌，我们要用更顽强的战斗来哀悼你。死者呵，安息！

五月二日——三日

今夜我们又要到另一个团去进行慰问工作。这一个团是正在火线上。师部派了一个联络员（翻译）一位马案同志和两匹马送我们。夜间十点钟，我们上路了。一想着我们要去的地点是在火线上，我就有着狂热的激动。因

为只有两匹马，我和李德心就也不愿意骑，与联络员边走边谈。他们也不认识路。但是，已与那个团约好，过昭阳江后，就有人来接我们。

在我们的正前面的天空上，有着五六条敌人的探照灯的白光，分散作扇形辐射过来。我们迎着白光的方向进行。到了昭阳江边，找不到过渡的地方。没有桥。我们找了一根竹竿沿着江边探寻河水较浅的地点。江流湍急而深，无法涉水过去。

我们感到非常焦急，疑心是走错了路，这附近不可能找到问路的人，而如果我们不能早一点赶过江去，那么，就将与在江的彼岸等着接我们的人错过。在几乎绝望的时候，看到在沙滩的那一头蠕动着的一长排黑影。李德心跳上马赶上去，一问，知道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团到师部领粮回去的同志。那么，这是最好的向导了。我们与师部送我们的两位同志分了手。

随着领粮的同志们一道走到一处河水较浅的地方，脱下了衣裤，开始涉水。江底很多圆石子，极滑而又刺脚。一步一步探摸着，几次踉跄着险些跌倒。河水冰凉，流得很急。我突然想着，在那些落雪的冬夜，我们的战士们是怎样的在冻冰的河水中前进，追击着敌人。敌人探照灯的白光反映在河中，我们就借着这光探路，只有五六十米的江面，我们走了四十分钟。

过江去，已经是午夜两点钟了。没有看到来接我们的同志。我们跟着领粮的同志们上路。这一路全是平地。为了要在黎明前到达目的地，我们走得很快。晨四点钟，天已微明。

看到从一片竹林中，走出了——一个顶着一桶水的朝鲜妇女，她的白衣在绿色中无声地移动着。

我转过头去，看见在另一面一间孤立的茅屋中有着红光，一个老人正在炉灶前生火。听到了脚步声，他回过头来望我们。红光映着他的头发。在迫近最前线的地方，这个妇人和这个老人，在曙色中静静地在劳动，这景象我将永远记得。

又开始爬山了。领粮的同志告诉我们，已到了目的地。我们听见了飞机的声音和机枪的声音。一拐弯，看见在对面山头上，挂着六颗照明弹。天已明亮，但挂着照明弹。领粮的同志告诉我们：那座山头就是我们的阵地。敌人的飞机现在来骚扰我们，因为他们估计黎明时是我们的战士换防的时间。

奇怪的是，在这里——最前线，还有着一些完整的屋子。而且每一间屋子的门前都有人影晃动着，那都是我们的同志，他们大概刚刚起身。我们被领进一间小屋，见到了政治处的亚主任。他告诉我们，昨夜他们派了一位同志和两匹马去迎接我们。等了好久没有接到，就先回来了。他即刻为我们准备了早饭。当我们谈话和吃饭的时候，敌机的响声是那样迫近，似乎就正在我们的屋顶上，机枪的声音不断地响着，还夹着平射炮的声音。而在我们的窗前，一位战士在磨着石磨，他是那样全心全意地在工作着。

吃完早饭，我们被送到一个小防空洞去睡觉。飞机的声音已停止，突然显得这样地宁静。一躺下，就睡熟了。

被惊醒过来，飞机和机枪的声音之外，又加上了大炮的轰击声。看表，已经是下午一点钟。再也无法入睡，就走出洞去看看。在离我们约两百码的对面山坡上，冒起一排一排大炮的白烟和火光。三架敌机围着山头盘旋扫射。我们的战士就在那里坚守着他们的阵地。离我们五六里远的对面另一座山头上，是敌人。战斗正在壮烈地进行。

我忽然发觉，在另一个防空洞口的大树下面，坐着五六个年轻的男女同志，他们大概是文工队的队员，在那里弹奏着各种乐器，演奏着一支什么曲子，女同志们还低声地合唱着。

在开始，我感到惊异，我觉得，在大炮、机枪的轰响声下面，他们的音乐是不调和的。但即刻我就感到是我错了。在战斗的生活中，人们不可能选择时间和地点。而且，他们的从容和镇定，就正是战斗的乐观主义的表现。

亚主任陪着团政委来了。我们在洞中谈着怎样展开我们慰问工作的问题。政委说：“你们亲自到这里来了，这就好。祖国来的人在火线上，你们就是不进行任何工作，战士们也是很感激的。”但是我们还是谈定了两天的工作计划。主任和政委走后，我又小睡了一下。六点钟，我们出洞。今夜是预定有一个晚会的，我们走到作为政治处办公室的那间小屋时，政委正在那里等我们。他说：他们的团接受了新的任务，今晚就要离开这里。现在的阵地只留一个营守着。因而，晚会是不能举行了。

政委向在阵地上的那个营摇电话！接电话的是那边的教导员。

“你们那边的情况好么？”那边答复了什么，政委满意地点了点头。政委说，团接受上级的指示，今夜要向另外一个地方出发，原来是整个团担负的阵地，要他们用一营的兵力坚守，并机动出击，消灭敌人。他说，这个任务是光荣而艰苦的，“你们有信心么？”接着，政委说：“那么，好，祝你们胜利！”

我问政委，营教导员的答复是什么。政委轻轻地笑了一下：“就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

天黑了下來，大队开始行动。那一面是七八道探照灯的白光和闪动着的红色的炮光，我们要通过的那一面，是一长排照明弹：敌人企图封锁昭阳江。

大炮震响。大队静静地急行，经过春川的城边。十一时，抵达昭阳江。在江的另一头，照明弹还挂着。我们是特意绕到了这一面来。我原以为又会涉水过江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已搭起了一座浮桥。一过江，就遇见了一长排大车的行列，那是运送弹药的。人声喧嚣，马鞭在空中挥舞，发出尖锐的长啸声。午夜，星光消失，吹起了大风。爬一座高山，山坡极陡。吃力地爬到了山顶。渴极了，用双手捧着泉水喝。大风吹着，夹着雨丝，接着就是哗哗的大雨。我的衣服即刻就湿透了。在一棵大树下面休息。乌黑的天空上，敌人的探照灯还亮着，山下远处，好几处浓烈的火光。大队又集合了，我们在雨中前进着。

申信子

当我们到志愿军第×兵站医院进行慰问时，医院的领导和伤病员们都向我们谈到了申信子——这里的护理员，谈到她的勤恳、亲切、耐心的工作态度，谈到她的“传奇”式的遭遇。使我们也急于想见一见这位朝鲜姑娘。而不巧的是，她那天有事出差了。

第二天上午，当我们正在和医院的领导老郭同志谈话时，一个穿着白护士服的姑娘轻轻地走了进来。老郭立即站了起来，迎向她说：“你回来了？”那位姑娘微笑了一下，当她看到有别的人在座想退出去时，老郭拦阻了她，回过头来对我们说：“这就是申信子同志。”呵，就是她！我们都赶紧站了起来。这似乎使她有点不好意思。她的脸有点微微泛红了，微笑着向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当她坐下后，我仔细地打量着她。人们告诉我她二十七岁了，而且受过那么多的磨难，但看上去，她还是显得那样年轻。圆圆的脸上一直带着微笑，明亮的眼睛下面有着一抹淡淡的青色，那是睡眠不足的象征。她只能听懂简单的汉语，所以常常不得不以求救的眼光望着跟我们来的一位小翻译同志，而且有点愧疚似地微笑着。听到我们对她的赞扬和慰问的话后，她用力地摇头，用汉语说：“我做得不够，真的，真的，很不够。”她低下头时，我看见了她的激动的泪光……就是这位朝鲜姑娘，曾经是被敌人判过死刑的“囚徒”。

她住在汉城东面五十里，家里是贫农。当她念书到初中三年级时，父亲在劳累中去世，她也就失学了，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过得异常艰难。那时候，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面。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她像朝鲜所有的劳动人民一样，用最大的喜悦迎接了祖国的解放。但是，在南朝鲜，在汉城，代替日本强盗的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李承晚。依然是黑暗的统治，依然是剥削和压迫，依然是艰难的痛苦的生活……她从别人的口中，偷偷地知道了许多解放后的北朝鲜的情况。过去，她体验到什么是仇恨。现在，她理解了什么是幸福，因而，也懂得了什么是斗争。她终于寻找到了她的道路，在一九四六年参加了地下的劳动党。那时候，她二十二岁。

她和同志们在敌人的刺刀下进行着地下工作。她在党的教育和壮烈的斗争中受到锻炼，逐渐担任了比较重要的工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六日，她和几位同志在离汉城四里地的一间小屋中开会。特务嗅到了什么气息，包围了小屋，他们被捕了。

暴徒们大概认为女子是比较容易突破的，在申信子身上用了各种各样的刑罚：她挨过皮鞭的毒打，她被灌过辣椒水，她上过老虎凳，她受过电刑，她被送上刑场陪斩……但敌人没有从她口中得到一个他们需要的字。

他们决定用一种新的刑罚来对付她申信子从监狱中被拉了出来，走进一间空阔的房子。

她奇怪地看着这个场面：房子的正中是一面大镜，四周站着男难友们。她不知道敌人又将玩弄什么花样，但仍从容地走进房内，与难友们交换着亲切的询问的眼光。

“把衣服脱下来！”那些狗们对她大声地吼。

她没有理解敌人的意思。

敌人又重复了一次，迫她面对大镜，将衣服脱下，让她自己看见，也让她的难友们看见她的赤裸裸的身体，他们要用羞辱来折磨这个不肯在肉体的痛苦中屈服的女劳动党员。

她愤怒。她张口将要痛斥这些野兽……但随即，她露出了轻蔑的冷笑，面对大镜，在沉重的寂静中，开始从容地脱衣，虽然，她的手在轻轻地颤抖。

当敌人要申信子脱下衣服的时候，每一个难友都屏住了呼吸，一种被

压抑着的悲愤的低沉的吼声在他们中间滚过。现在，当申信子真的开始脱衣，他们感到了惊异。几乎是同时，每一个人都用手蒙住了眼，有的人还转过了背。

皮鞭落在那些蒙住眼的手上，落在那些转过去的背上。挥舞着的皮鞭发出尖啸声。没有一支流着血的手落下来，没有一个淌着血的背转过来。不，他们宁可忍受无论怎样的痛苦，宁可死亡，但决不放下手，决不回过背。

而一个声音响起了，皮鞭因而停住。

“同志们！”裸露着血印和伤痕的神圣的肉体的少女发言，用那样低沉、缓慢、饱含着热情的声音，“放下你们的手来吧，你们应该看一看，站在这里的你们的女同志，你们的亲姊妹。你们看看她是曾经受过怎样的酷刑，而现在又是受着怎样的羞辱。而站在这一边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同志们，你们爱护我，你们用血来回答敌人。我衷心地感激你们。但你们放下手来看一看吧！”

慢慢地，所有的手落下来了，所有的背转过来了。难友们用含着感动的泪珠的眼，看看那个裸露着布满血印和伤痕的身体的少女，他们的难友，他们的同志，他们的姊妹，她是如此圣洁而光辉。

完全没有想到情况会是这样发展的敌人们，开始是狼狈地发怔，接着又疯狂地挥舞起皮鞭。在皮鞭的呼啸中，申信子提高了声音：“那么，亲爱的同志们，斗争，更坚强地斗争吧，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祖国的每一个受难者，我们必须继续斗争——直到我们胜利！”

在这个由刑场升华成殿堂的大房中，每一个难友都永远记住了这几句誓言。后来，这血的故事和血的誓言在更多的人中间传颂。

敌人又曾试用过利诱的花招，同样失败，于是作了这样的判决：申信子将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正午和其他几位难友一道被枪决。

她的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的那个黎明，在枪炮声中，监狱的铁门大开，一群武装的士兵跑了进来。他们是谁呵？这些与她所见的敌人完全不同的士兵。铁栏外“庆祝汉城解放”的欢呼声解答了她的惊异。她含着泪用艰难的脚步和难友们一道冲出了监狱。她看见了在六月的美丽的晴空中飘扬着的，啊，她久久渴望着的旗……她向上级要求参加人民军。这个曾经是刑场上的死囚要在战场上与敌人相见。但因为身体太弱，要求没有得到批准，她被送到满浦去疗养。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的消息传来后，她异常激动。她，这个在病院中休养的病人，向上级请求到志愿军的医院中去——工作，她要为那些为了她的祖国流血的国际战友服务。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个风雨之夜，她和五十多个朝鲜女同志，带着朝鲜人民政府的介绍信，来到了志愿军第×兵站医院，伤病员告诉我们，她带着病弱的身子成天忙碌，除了护理工作以外，她为伤病员洗脸，到寒冷的小溪为伤病员洗衣，到山中去捡柴。有时候，她坐在屋前敲打着空罐头盒，为伤病员做大小便器……。每天深夜，她都还在病室里照料着，而每个黎明，她都是微笑着最先走进来。

现在这位姑娘坐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听到我们赞扬的话而不安，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很不够……”。她很简单地回答关于她自己的一些问题。后来，她微笑着表示歉意，告辞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想着，曾经有着“传奇”般的经历的这个姑娘，竟是这样质朴、腼腆。

而且我想着，她在敌人面前所进行的英勇的斗争，是一种英雄主义的

表现，而她能愉快地从事平凡的护理员的工作和那种勤劳、诚恳的工作精神，也正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表现…… 1951年5月

火 车

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

这是美国女诗人米莱（1892—1950）的两句诗。我很喜欢。

火车当然意味着旅行。米莱的这两句诗就是从题名《旅行》的组诗中摘出的。旅行可以跳出日常的生活，看到高山大海、新的城镇、乡村；可以增加见闻，启发智慧，而且，仅仅只要坐在奔驰的火车上，也就能使人有一种兴奋、愉悦的心情。所以一般人都喜爱旅行。我们的古人将“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放在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那是大有道理的。想起了一个人告诉我的一个小故事：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和他的病弱的母亲住在一个广漠平原的小小的火车站附近。母子两人辛勤地劳动着，还是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邻近人家很少，日子又是过得单调、枯燥的。对于这个少年，他的仅有的欢乐时光是当火车在小站停留几分钟的时候。不管他手头正做着什么活路，一听到汽笛的长鸣声，就停下手来，飞快地向小站跑去。他计算得这样精确，几乎总是和火车同时到站。车厢里响着音乐，亮着灯光，拥挤着各样的人，汇集着不同的方言。那是一个生动、活跃、热闹，对他来说，是梦境似的世界。他由于奔跑，也由于激动而呼吸急促，贪婪地观望着，引起许多想象和渴望。但仅只是短暂的一会儿，汽笛长鸣，火车又飞奔而去。留下沉寂的平原，灰暗的日子，贫困的生活。有一天，他的病弱的母亲咽了最后一口气。少年在土坟旁的大树下坐了一整天。后来就背着一个小包跳上火车离开了故乡。前路茫茫，举目无亲，但他怀着无惧的心，这样开始了他的真正的生活的道路。——在这个少年，火车又是意味着对于新的生活的渴望，对于新的命运的寻求了。

二十多年前，在异常寂寞的心情中，我勉力写过一本给少年们看的诗，有一首题名《火车、火车，带着我去吧》。其中有这样几句：

黄昏时，我常坐在山坡上，看火车从远方来，又向远方去了，我的心也跟着它飞得很远，很远……火车轰响着在我面前飞奔而过，它在我心中唱着奇妙的歌，它向我歌唱：辽阔的大地和宽广的生活。

这首诗虽然是以一个少年的口气写的，叙说的却是我自己的心情，可以解释我喜欢米莱那两句诗的原因。近年来，我的健康状况不大好，在家休息。好几次，有友人约我出去旅行，我都婉谢了。这有各种原因，其中之一是顾虑自己的身体未必能适应旅途的劳累。事实是，在这以前多少年，我都没有能够享受旅行的乐趣了。当畅游归来的友人兴高采烈地谈着旅途见闻时，我是有着羡慕的心情的。

在病休中，日子过得很平静。但关于心境就未必能这样说了。龚自珍诗：“胸中海岳梦中飞”。我欢喜那意境。但我更欢喜的是，有一天我将跳上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 1974年附记：今年，我终于坐上了火车，

那是向北京开的。1979年10月

无 题

翻检一本参考书时，无意发现了自己写的一张纸片，上面有三段话：

人不是神，不能够承受这样严酷的考验。不，人应该成为神，必须承受这样严酷的考验。

大江流日夜，时间过得很慢也很快……呵，我的年纪，我的年纪，还有我的这颗孩子似的心！

这是什么时候写下的呢？想了一下，记起了那是八年前（一九六八年）的五月十六日。

那时候我被单独关在一间板壁房里，在那个夜间，想到了整整十三年前的情景（我突然失去了自由，接着几乎失去了一切），接着又想到了那以后的境遇，而当时又是那样的处境，借用一句常用的话，真是“心潮如涌”，很想写下一点什么。但不可能，就随手记下了这样三段话，夹在书里了。

第一段话是好多年前从一位青年诗人的书中看到的，后来，在某种心境和情景中就常常想了起来。

第二段话是我自己写的，似乎有很深的感慨，其实不过是惊叹于这些年来生命的荒芜，让大好的岁月白白地流逝了。

第三段话是从萧伯纳的一个剧本中抄来的，说那句话的人物是罗马的凯撒。数十年来，刀光剑影，征尘蔽身，现在英雄老去，但还有一颗孩子似的心。我觉得我很能理解那悲凉的心情。

反复地看着纸片，沉吟了很久。大江流日夜，八年的时间又过去了。我的感受只有比当年更沉重吧。又很想写一点什么。但是，踌躇好久以后，只是把那三段话抄录在这里，加上了几句极简单的说明，这也就罢了。

将纸片又夹进了书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偶尔翻阅出来，那时又将是怎样的心情呢？1976年6月19日

迎接生命中又一个黎明

——我和武汉

武汉是我的故乡。

我在这里出生，成长，度过了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光。

我现在的寓所离我出生的地方很近。我常常走过我童年时游戏的大街，经过我的故家和启蒙的小学——那里已经是新的建筑和新的人家。有一天黄昏，我从那条街上走过时，突然一个什么东西向我的头上飞来……呵，原来

是一个小足球。我气恼地向还在滚动着的球跑过去，想将球拾起扣压住，再和那个恶作剧者理论。但当我刚弯下身时，两支污黑的小手迅速地将球抢过去了。我的面前站着一个小男孩，脸上流着黑汗，瞪大了流露着歉意和惶恐的眼看着我。我还来不及说话，他就转身跑掉了。我生气地望着他的背影，后来却忍不住微笑了，因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童年时的自己。而他的飞跑的脚步使我想到了时间的脚步，所以我笑得有一点凄凉。

前几天，收到了上海一位友人为我从一九四一年的《文艺杂志》上抄寄来的一篇题名《邂逅》的散文，那是我当年的习作，记述着我在重庆与武汉时的一个女友的偶遇。文章当然是很幼稚的，但那里所提到的几个友人和记述的当年在武汉的一些情况，却引起了我对遥远的青少年时期的很多回忆。而且看看自己十九岁时是怎样追述着更年轻时的那些岁月，也是很有意味的。我进入初中时，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看到了残破的古国和新涌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从那以后，我的世界已不再仅仅是所熟悉的那几条街，我热情关注的也不再是明天一场小足球赛的胜负了。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后来又成为一个秘密的救亡组织的成员。在深夜悄悄地聚会，读一些被禁的书刊，骑着自行车在风雪中送信，唱着歌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中……浪漫的气息和朦胧的理想，这一切使我兴奋而快乐。受到大人的申斥，受到特务的警告和威胁，被学校开除，在几个友人被捕后不得不转移，转学到外县，……，这一切打击更使我骄傲地感到自己有点像剧本《夜未央》中的革命者了。

“七·七”抗战一周年的那个晚上，我只身登上了到重庆去的轮船。我怅怅于朋友们没有一人来送行，他们已在白天与我话别，现在都去参加火炬大游行了。第二天黎明，船开动了。大江滔滔，汽笛声声。我倚站在栏杆边，望着飘移着的曙光中的城市。童年、家、母亲、友人……都渐渐与我远离，我忍不住哭了。

就在那一年的十月，武汉沦陷的第二天，我在课堂上和语文教师大闹了一场，因为他像不知亡国恨的商女一样，还有闲情大声地对我们吟哦“落花人独立……”这是一个可以说明我当年的幼稚和狂放的例子，而且还并不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它也表明了我对家乡的感情。

作为一个流亡学生（有两年，是作为失学和失业的青年），我在重庆度过了八年。我常常怀念和梦想着武汉。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终于在东下的轮船上欣喜若狂地看到了江汉关的大钟。一挤上岸，我就急急地在大街小巷中穿行。但仅仅几天以后，我就消失了兴奋、喜悦的心情。我的故家是一片废墟，我的母亲，还有祖母、三叔、几个弟妹，都已死在异乡。而且，我发觉，这个城市不仅好像变小了，它也并不像记忆中的那样美丽，不，勿宁说它是丑恶的。我当时在一篇短文中是这样写的：我在风吹雨打中成长而又回来了，回到了这座孕育了我的童年的城市，回到了这座我用少年的手高举着火炬照耀过、保卫过的城市，却像一个流放的囚徒，在黑色眼光交织成的十字架下，连寻找一片遮雨的屋檐都是如此艰难。我巡礼过这曾是我梦中的城池，我痛苦地发觉，八年的流血都是白废，一切还停留在原来的状况上面，甚至还要更坏。百万人的尸骨上，高叠着少数骄子的繁华，在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被敌人烧毁了了的房屋的废墟上，建立了别人的高楼……。

那后面，我还激愤地写着：战争就在百里外进行。我凝望着这座站在

黑夜中的危城。我在幽灵们对我的期待中有所期待。

我期待，我渴望一次大火：一次曾经照耀过古罗马的大火，一次建造一个广阔的废墟的大火，一次愤怒的爆烈，一次残酷的破坏。

我期待，我渴望这座大城的为了新生的毁灭。

（引自《战栗的城》）

回来后，那几年中，我除了以教书为职业外，大多时间是在编《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大江》。我是从葛琴同志的手中接过这个副刊的。先后编过这个副刊的还有端木蕻良、天风、王采，年轻的诗人牧星一直协助我们。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它被说成是一个“反革命的据点”。我只有苦笑。解放初期我在一篇纪念性的短文中谈到过：“《大江》自然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然而它却是立足在一个伟大的基础上。在反动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一个据点，团结一批友人，这存在本身就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

因为，无论如何，《大江》是与这个时代的命运相结合的，是与英勇的兄弟们的进军相呼应的。”最近，我把那些旧报翻阅了一下，老实说，我惊异的是在那样严酷的政治情势下《大江》还能够吐露出那样一些大胆的呼喊和追求。记得时常受到一些警告和压力，所以我在一则编后记中写着：热心的友人出于爱护本刊的心，投寄来的壮烈的呼喊、血泪的控诉，却有些没有能够刊出。为什么？

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不考虑到现实情况。赤膊上阵有时是必要的，但也要看一看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大江》的不足之处，我愿意承担一切责备。……我们是在夹缝中匍匐着爬行。有时候，在异常悲愤的心情中，我想，那末倒不如沉默好吧：“于无声处听惊雷”！

在另一则《编后记》中我写着：有读者来信说《大江》是武汉的一点光。这在我们，不是值得欢喜的赞语，而是沉重的鞭策。一点光么？那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分热。……当年热心地支持了《大江》的大批青年作者，有的已不幸去世，有的不知下落，还有的分散在不同的岗位上，已经是党的骨干力量了。

我不必在这里详细地谈到那几年中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前面所引的《战栗的城》那篇短文的片断中，已经简略地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在痛苦的煎熬中期待着，在艰苦的工作中追求着，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武汉晴朗的天空中飘扬着解放的红旗！

在新时代的阳光的照耀下，我身上的疤痕就特别明显。我知道我距离时代的要求还有多么远，但还是满怀信心地望着前面。我没有想到——决没有想到，我将在一种寂寞的心情中度过漫长的二十五年。

打击是突然来到的。我痛苦、惊疑地望向四周。接着努力使自己渐渐镇定下来，紧紧按住受伤的胸口，在无望中却还是充满了渴望，在荆棘和坎坷中探求着道路，终于穿越过了我生命的深谷。啊，好辉煌的阳光，她照耀着我的满头白发，我的困顿虚弱的身子，和我的含泪的笑容……回顾我和武汉的关系几乎就是回顾我的一生。美国作家马尔兹将他的一部长篇小说题名为：《短促生命中漫长的一天》。我的感觉倒是相反的：每一天过得太快了。而生命是漫长的。我凝望往昔，有如读一本我熟悉的但淡忘了的书。我有着深深的感动。而且深切地体会到：自由的劳动是多么幸福，生命是多么美丽！

现在这本大书又揭开了一页，新的一章开始了，我想说，在我这是一

个真正的新的开始。

在一首小诗中我写过：怦怦跳动着，我的心在测量时间的脚步。
夜像风溶化在我的怀抱我张开双臂
迎接生命中的又一个黎明。
是的，我张开了双臂，我永远张开着双臂！1980年岁暮

第一课与第一步

我要说的是遥远的过去，谈到少年时在怎样的启发下喜爱了文艺，那算是我的第一课。

谈到是怎样开始蹒跚着学步，虽然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事实上却是为走向文学的道路作了一点准备，这里用了“第一步”这样的说法，是有些夸张了。——是的，我要说的是遥远的过去。也许，我还不应该认为自己已经年迈，但回顾当年，仍不免像一个老人谈到自己孩提时那样，有点激动，有点喜悦，也有点怅惘。

一九三四年的夏天。那时我即将升入小学六年级。也许是要为来年考中学作准备，学校办了一个每天上半天课的暑假补习班。并不是每一个同学都参加了，来补习的只有十来个学生。

为我们补习语文的，并不是原来的语文老师——幸亏不是。原来的的是一个高高胖胖的中年人。对我们极其严厉，一动就申斥我们，而且有时要打手心。同学们，至少是我，对他只有畏惧，毫无感情。为我们补习语文的，是上学期才来的教我们美术的老师，姓刘，瘦小，年轻，只有二十来岁。平时穿一套破旧的黑色的西服，打着蝴蝶结，留着长长的头发，颇有艺术家的风度。对同学们总是笑嘻嘻的。美术又不是主课，所以平时上课时教室里常常是一片哄乱，他也并不发脾气。同学们是喜欢他的。

他没有为我们复习课文，却选了一些课外教材。我记得起的有鲁迅的《故乡》、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孩》、都德的《最后一课》、亚米契斯的《少年笔耕者》（《爱的教育》中的一篇），似乎还有冰心的《寄小读者》。在这以前，我也看过《小朋友》、《儿童世界》一类的少年读物。但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子，真正让我看到美丽的文艺园地，这是第一次。

这几篇作品出之于不同国度的不同作家之手，风格、题材、形式上都有极大的差异。然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着浓厚的抒情性。那位年轻的老师讲解时又满怀激情。我特别记得的是讲述《与幼小者》时的情景。他随便地坐在一个空着的课桌上，用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朗读着。当他读到那位即将抛开人世的父亲对孩子们所作的哀伤的叮咛时，声音逐渐呜咽，终于念不下去了。他走向窗口，望着灼人阳光下的校园。室内一片寂静，接着我听到了几个女同学的低泣声，我自己也泪流满面了。就这样，这些幼小的纯洁的心灵，是与远在大海那边、已经走向死亡的一个长者的的心灵发生了交流。

同样的，我们为那个在落着大雪的除夕，蜷缩在高楼的墙角，用火柴

的微光温暖自己、照亮自己的梦、终于冻死的小女孩流了泪，从这里认识了人生的一角。我们也非常同情那个法国少年，他眼望着全副武装的敌人，以征服者的姿态踏进了他的祖国，在他的故乡的大街上行进……而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也正在风雨飘摇中。我们热爱和敬佩亚米契斯笔下的那个意大利小学生，他为了让家里增加一点收入，减轻父亲的劳累，常常在夜半悄悄地代父亲抄写文件，因而影响了学业，损坏了健康，还要忍受老师的责难和父亲的申斥。当最后父亲发现了真情，慈爱而又愧疚地将孩子抱在怀中时，我们也同声一哭。鲁迅的《故乡》将我们这些在城市中生长的少年引向了破败、荒凉的农村。看到原来活泼、勇敢的少年闰土，长大后却变得那么老实巴巴，喊他幼年时的同伴为“老爷”，我感到失望和悲哀。

老师带着激情讲解这些作品。有时他自己完全沉浸在作品的境界中，忘记了我们的存在，眼睛望着窗外的远空，不断地做着手势，声音激动。有时他没有把我们当作小学生，由作品的内容谈到了人生、社会、将来，说出了一些深奥的话。接着，他又醒悟了过来，微笑着问：“你们懂不懂啊？啊？”我们都齐声说：“懂！”我们是习惯于这样回答老师的问话的。但与平时不同的是，我们感到老师是把我们当作大人那样讲话，有一种骄傲的喜悦，虽然我们只是似懂非懂，却认为自己是已经懂了。同时，也是对老师这样热情、严肃讲课的一种尊重，唯恐说不懂会损伤他的感情。课堂秩序不仅比他上美术课时好，也比那个严厉的语文老师上课时好。大家安静，而且那样专心。通过作品和老师的讲解，我感受到了一些什么，思索着一些什么，认识到一些什么。开始对生活有一种庄严的感觉，对应该怎样做一个人有一种要求，对将来有一种梦想。当然，这些都还是十分幼稚、朦胧的。但是，它在我少年时期的混沌中已射入了几丝微光……

而且，通过这些作品和老师的讲解，开始诱发了和培养了我对文艺内涵的感情的感受力，当然，这也还是十分幼稚、朦胧的。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益的和重要的起点。

老师还让我们自由命题写两篇作文。过去我的作文还算大致通顺，但总是写得十分潦草，而且大都是用一些套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所以往往只能得一个“丙”等。这位老师却要我们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说一点自己心里的话。我开始学着认真地来写。内容是什么完全记不起了。作文本发还给我们的时候，我看到老师写了长长的批语，大加赞扬，其中还用了“小小文学家”这样的说法。当同学们围拢来争着要看的时候，我将作文本合拢来，谁也不让看。作文本终于被抢走了，更可能是我有意让同学抢走的。听到他们装腔作势地大声朗诵着那些批语，我心中是充满了激动和喜悦。这篇经过老师仔细修改过的作文，后来在当时武汉《新民报》专门刊登中小学生的副刊《小国民》上发表了。我得到了一个烧有我的名字的小瓷茶壶算是奖品。这样更激发了我对文艺的喜爱和写作的热情。

那以后，我就搜求一些文艺书籍来看。我找到了《爱的教育》。对于我和当时的许多少年们，这本书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的。我另一本喜爱的书是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前几年我找到了一本重读了一次，依然像当年那样感动。我又从父亲的杂志当中，找到了一期《现代》，上面刊有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它是如此打动了我的心，我反复地阅读着，背诵着其中的一些段落。现在还能背诵那最后的一段：“不是年轻的为老年的写纪念，这些年来，我却看到许多青年的血……”

这是我对人生和生活开始有所认识的一个启蒙期。当然，除了文艺作品外，我所见、所闻的一些黑暗、悲惨的社会情态也对我产生了影响。这也是我后来走上文艺道路的一个准备期。可以说，我现在对文艺内涵感情的感受力和鉴别力，是在当年的那一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对某类风格的文艺作品的喜爱，我对自己写作中真情实感的要求，也都可以追溯到那一个小小的源头。

我对那位姓刘的年轻的老师，滋长了一种热烈的感情。秋季开学时，另换了一个美术教员。我焦急地去找班主任探听，知道他已被解聘。我失望，痛苦，简直想哭了。现在想来，他是一个倾向进步的有些浪漫情绪的青年，在那个黑暗的社会中，在艰险的道路上，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我后来完全不知道他的消息。他可能为黑暗所吞没，也可能在苦斗中成为坚强的战士。他一定完全没有想到，在人生的一次偶然的邂逅中，他自己渴求光明的心曾经照亮了一颗幼小的纯洁的心……

新的歌

人们说，记忆是有选择的。那么，我相信：我将永远记得我所听到的一个“家庭小合唱”，和他们所唱的新的歌。

我从厦门过海到鼓浪屿，去看望两个老朋友：白文和他的妻子舒波。我们已三十多年没见了。原来还保持着断断续续的通信，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断绝了消息。一年前，白文通过一家登载了我的作品的刊物转了一封信给我，这才恢复了联系。

鼓浪屿是一个美丽的小岛，到处是高大的榕树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树木、花朵。顺着山坡矗立着形形色色的、已经显得有些古旧的西式楼房。当我转入铺着青石板路的安静的小巷时，不知哪一家窗口传来了小提琴演奏的舒曼的《梦幻曲》，我真像是走在一个梦境里面。

按照他给我的地址，我找到一幢石砌的、古老的三层楼房，上了二楼。敲门，应声而出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舒波，虽然她的发式变了，而且添了一些银丝；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也“发福”了，体态不像当年那样轻盈……她愣愣地望着我，接着，惊喜地喊出了我的名字。她知道我最近会来厦门，否则她是根本不会认出我的，我的变化比她要大得多。

她领我穿过仅有一张大床的房子，走向里间。那里也只是一张大床，一个小圆桌，一架堆放着书籍和曲谱的缝纫机，两张凳子和一张藤圈椅。这样几件简单的家具，使这不算太小的房间显得有些空落。

她让我坐在藤圈椅上，而自己坐在床边。她笑嘻嘻地告诉我，搬家到这里来还不久。又说，原来的住处是多么阴暗、狭窄，找到这么一个新居是多么不容易。看得出，她很满意这两间现在还显得空落的房子。“而且，这里可以看到海。”我向窗外望去，是的，不远就是大海，现在它正在夕阳的余晖里闪烁着彩色的光芒。

当我简单地谈了我的情况以后，她为说到了他们一家这些年来的遭遇，

那是白文在信中曾简略地告诉了我的。他们在三十年前来到厦门，都在一个专科学校里教音乐。在那场浩劫中，白文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事实是，白文因为有一点历史问题曾受过审查，“文革”中又因为几件小事被无限上纲成“恶毒攻击”。白文当年五十岁，他坐了十年牢，去年复查，这桩冤案平反了，才回到原校继续教书。那些年，舒波作为“反革命家属”，下放到一个山区的中学，工资也降了两级。四个孩子都分别被下放到“广阔天地”去，一家六口人分散在六个不同的地方，依靠着她的一点微薄的收入，度过了那漫长的艰难的岁月。“四人帮”垮台以后，她才回到了厦门，现在已经退休，但还在从事业余的音乐活动。——她平静地，而且常常是微笑着叙述着这一切，还告诉我，孩子们也都先后有了工作岗位。

我无言地听着，心情却不能平静。她的安详和微笑使我不能够深入地看到她的内心。在年轻时，她是活泼、开朗，而又有一点娇弱的。我很难想象，她怎么能够面对那些灾难的岁月，在生活上，而且，在感情上，肩负起那样沉重的担子。

白文回来了。见到我，他没有流露出强烈的喜悦。但我从他对我的手的紧握中，从他的眼睛的闪光中，理解了他的感情。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总还是又见面了。”

我仔细地端详着他：头发已经花白了，黑瘦的方型的脸，一副宽边眼镜，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话语平静，舒缓，还是有着艺术家的风度。我在他身上只看到了岁月的磨损，而没有感觉到风雨的摧折，这真是有一点令人惊异的。

他又简略地说到了他的情况。说着说着，他的舒缓的语调中渐渐有了一种迫人心弦的感情。

他是在一次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捕的。在这个中等城市中，这当是轰动全城的大事。

“我也被命令去参加了那次公审大会，就坐在台前面。我简直不敢抬头看他。”舒波微笑着说。

我问到白文当时的心情。

“我完全没有想到对我会采取那样大规模的方式。当我被拉到台上时，简直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好像是在做一场恶梦。只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只希望舒波和孩子们没有来参加这次宣判大会。我被架着坐‘飞机’，头俯向地面，看着那一滩从我的鼻子和口中流出的血。除了对我的判决书外，我连那样震天的口号似乎都没有听清楚，似乎只是什么遥远的地方有人在呼喊……我回到拘留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一个同监的悄悄地问我判了多少年。我伸出两个指头。那个人说：‘两年？那不算重，你该快出去了，恭喜你呀！’我这才放声哭了。

“在劳改场中，我总怀着一个希望：会突然宣布我是无罪的。我知道这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但又无端相信这是可能的。这一点渺茫的希望帮助我活了下来。另外，我觉得我必须坚持，不应该再为舒波和孩子们增添任何痛苦……在那十年中，像攀登高山一样，我不仰望前面，而只让自己看到面前的那几级石阶，一步一步跨着。跨一步，是一步，过一天，算一天，就这样熬过了三千多天……”

他的声音有一点颤抖，爱笑的舒波也低头沉默着，玩弄着桌上的一根

火柴。我看看窗外，暮色已落了下来。我听到了轻微涛声，忽然想到了少年时读过的一本小说的第一句话：“外面该是海和夜。”

他们的四个孩子都先后回来了。——说是孩子，其实，两个姑娘都已结婚，自己的家也就在这附近；两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了，大的也结了婚，小的也有了对象。大的女儿怀中还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那显然是这一家的宠儿，大家都抢着抱他。

在年轻人到来后产生的那种欢快的气氛中，我们转换了话题，我问到了那几个青年的情况。他们谈到了他们的苦恼、打算和追求。当我回头看看白文时，他说：“我想好好写几支曲子。”沉吟了一会，他又加上一句：“我想我会比过去写得好一些。”我相信他的话。

很自然的，我们谈到了年轻的时候。他们从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刚刚结婚，来到四川东部的一座山城，参加了一个小小的演剧队。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们的。他们演戏（舒波往往是女主角，白文是导演），唱歌（舒波是女高音，白文是指挥），过着动荡、艰苦的生活，密切地注视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并经常梦想着将来，以诗的口吻谈论着将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又相聚在一起。即使不说是老人，也已经历了生命中的大部分途程——并不是很平坦的途程。我们也谈到了一些友人的遭遇：死者和疯者。比起来，我们要算是幸运儿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也许只有那些真正经历了动乱，而又偶然相聚在一起的老朋友，才能深切体会到这两句诗的涵义吧。

舒波偶尔谈起，在今年春天，他们全家曾在一次晚会上演出过一个节目：《家庭小合唱》。由于白文和舒波都是学音乐的，他们的几个孩子也都爱好音乐，而且有着相当好的音乐修养。我提出，希望他们全家为我唱几支歌。于是，开始了表演：白文、舒波、两个女儿和大儿子合唱，小儿子拉手风琴伴奏。

这一对经历了长久苦难的伴侣和这几个在动荡中成长的孩子，他们唱着。我凝视着那白发、那刻满了皱纹的脸，和那有着青春光辉的脸。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在重庆那一场大雷雨中的合唱。我去看望他们，在临江的一座竹屋里谈天时，突然来了暴风雨。舒波走向小窗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在豪放的大雨中，响起了她的嘹亮的歌声。接着，我们，和邻屋中的那些演剧队员，也先后应和着唱了起来。哗哗的雨声和轰响的雷鸣似乎是这青春的歌声的最协调的伴奏。多么遥远了，当年的年轻的大雷雨中的歌手，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劫难后，还是在歌唱着。新一代又成长了起来，也在歌唱，他们在歌声中付与了全部激情，投入了整个生命……他们唱的是几支我也熟悉的歌曲，然而，我却感到那是新的歌。不，那的确是新的歌，而且，那是一个启示和一个象征。

我听着，在我面前，流逝着岁月的河流，闪现着坎坷的人生道路，展耀着希望的光辉……在歌声中，我经验了少有的激动。而且，不自觉地，也参与了他们的合唱。

外面该是海和——美丽的晨曦…… 1981年3月广州

离我家不远，有一条黑色的溪流，实际上，那是一条水沟，并不宽，却很长，沿着这个城市的边缘流过，划分了市内和郊野，那两旁是高低不平的土坡。黑水面上浮动着菜皮、杂物，有时还有小猫、小鼠的尸体；滋养着蚊子，散发着秽气，大雨的时节，黑水就泛滥了开来，有时流到了我家的门前。

那条水沟已流过多少年了，它还因而有了一个名字：黄孝河。

现在，这里已是一条宽阔的大街，马路上是车流的长龙，马路两旁是花圃和常青树。入夜，两长排整齐的路灯散发着温柔的乳白色的光辉，使我想起了北京的长安大街。

难以想象，一两年以前，这里曾是如此荒凉凄清，流淌着污秽的黑水。

鲁迅先生说过：世界上原是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

而我也看到，人也有意识、有计划地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路。

当在我家附近施工的日子，我常常到那里去走走。我看到人们是怎样站在淤泥中劳动，有时在烈日下，有时在风雨中。

前不久，我到这一巨大工程的另一个地段去看过，那是寒潮侵袭的日子，战士和工人们顶着大风雪在泥泞中挖土、挑泥。他们单薄的衣裳上一片潮湿，我不知道那是雪水还是汗水。——大路正在他们艰辛的劳动中延伸，通向更远的地方……

但愿走在平坦大道上的人们，记住那些风雪和泥泞中的日子，记住开路者的艰辛。

但愿走在平坦大道上的人们，也是新的道路的开辟者：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在人生长途上，面向远方和未来。1987年12月9日

好美一个湖

“好美一个湖！”

晚上，我和老朋友方隽在他住的招待所的房间里谈天。已经多年不见了，要谈的话很多。有时却又默默相对。他在窗前站了一会，提出到外面走走。一走出招待所的大门，就感到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穿过了草坪之间的小径，又穿过了晃动着浓密树影的林荫道，来到了东湖边。闪烁着稀落星星的蓝色夜空笼罩着近乎黝黑的茫茫大湖。对岸，是朦胧的山峦和剪影似的高高低低的建筑，其中嵌映着点点灯亮。一片深深的寂静，只听得到轻微的湖水击岸的啪啪声和在那边树梢流动的风声。他自言自语似的说了这么一句。

他和我是初中时的同学。建国以后，由于他所学的专业是地质勘探，到遥远的大西北去了。我们都疏于写信，联系不多。他在1955年的反胡风的风暴中因与我的关系而受到牵累。后来查明无事，却又没有逃过1957年反右运动那一关。其后就完全不知道他的音讯了。我偶尔念及他时以为他已经……前几年却意外地辗转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只简单地谈到他这几

十年中虽颇经劫难却还活着，现在问题都已解决。我很为他庆幸。寄了一封信去却再没有收到回复。一星期前却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 he 已到武汉，是来参加一个专业性的会议的，住的招待所在东湖边。约定会议结束后让我去看他，今天一大早我就赶来了。知道会议中已安排他们参观了黄鹤楼等武汉名胜。他虽住在湖边却还没有好好逛过东湖。于是，我陪他在东湖风景区转了一大圈。这是秋天，武汉最好的季节。这天又是星期日。阳光下到处都是兴致勃勃的游人、欢笑声和歌声。我们在人群中漫步，走过了梨园、行吟阁……还坐着汽艇在湖上飞驰了一圈。到了先月亭。又去了磨山，参观了植物园、盆景园、果树园。进了楚城，逛了楚街。攀爬上朱碑亭。又登上了楚天台，眺望东湖全景……走了这么多的路，又上山下山，我很疲累。看他也常气喘吁吁，却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游兴。“好美一个湖！”在漫游中他好几次轻轻吐出这一句话。这些年，他跑过不少地方，到过昆明的洱海，杭州的西湖，无锡的太湖……因而他的赞叹是有其份量的。

他的赞叹中也许还包含着别一种感情。解放前，1947年的秋天，我曾和他一道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看一位朋友。我们在山上散步时曾看了看东湖，那时这里还不是一个游览地。

湖上漂浮着几只渔舟，对岸丛丛芦苇，散落着一些茅舍……一片荒凉。建国以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我经常有机会来，亲见东湖逐年的变化。他却是在阔别了四十多年后第一次重来，与当年留在他记忆中的荒凉相比，面对着焕然一新的湖光山色，已形成格局的各种建筑设施，看到那么多兴高彩烈的游人，他当然会有意外的喜悦并有深深的感触的。

现在，我们面对的却是夜间的东湖，置身于另一种意境。没有了游人，没有了喧闹。星空。朦胧中的大湖，山影。点点灯光。细雨般的水声和风声……如梦如诗。两个历尽风霜的老人站在这里，默默无语。我回想到四十多年前初看东湖的情景。想到几十年来这位老朋友和我自己的经历。想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很难表达自己复杂的心情。他在想些什么呢？他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好美一个湖！”这句简短的话里当也包含着丰富的感情。

明天他就要离开这里。他说：“真想有机会再来。”我知道，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机会是不多了。好在，他老年在外地，想到家乡的东湖，这一次留下的当是如梦如诗的回亿。

那簇淡蓝色的小花

这十年来，我的凉台、窗前和书桌上，总是放着一些花木和盆景。原先只有几盆，后来，通过移栽、分枝和好心友人的赠送，发展到几十盆了。每一天都要花一点时间去照看、经营它们。这在我算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休息。

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并不是那样特别嗜花，但对花还是有着感情。我喜爱它们的美丽，它们各自的丰姿，它们所显示的生机和象征着青春的绿色。每当一盆花由于我的经营不善而枯萎，而死亡时，心里就滋生起惆怅和惋惜

之情。在这里面，还有这样一个原因——

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有一段时期我是被关在“单人牛棚”（这四个字联在一起显然有语病）里。那是一间堆放杂物的板壁房。门是从外锁着的。由一个负责监管我的“小将”每天为我送饭来。说真的，每当接过他板着脸送来的半凉不热的饭时，我是有点愧疚不安的，因为这真是“有劳大驾”。他有一次冷笑着说：“饭来伸手，我看你倒蛮享福咧！”不过，如果他忘了或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我就只有饿一顿——而这种情况是常有的。这倒没有什么，只是整天被关着，又没有什么书报可看，甚至被剥夺了和其他“牛鬼蛇神”一道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权利，实在感到很寂寞。我对自己的命运倒没有什么特别担忧，因为，反正早已有一顶巨大的帽子在头上了，再严重也不过就是如此吧。我只是感到寂寞。一天，忽然放我出去劳动，这使我感到意外地惊喜。因为，平时只有被审问、被批斗或陪斗时，才准许我走出那间板壁房的。是挖防空洞。别的一些“牛鬼蛇神”已经先在那里了。看见我去，他们大概也感到有点意外，都不理我，只有几个过去与我较熟的，暗暗地做了做眼色，算是打个招呼。我知趣，就到一旁独自挖土了。阳光很好，舒展着酸痛的筋骨，活也不算重，这样的劳动实在是一种享受。有一锄下去，我发觉一簇淡蓝色的小朵的野花被挖了出来，就俯下身去看了看，随手将它仍在一边。当时并没有什么存心——不，也许下意识里我是想着什么。因为，后来我就小心地不让挖出的土将它掩盖住。当收工时，悄悄地将它放进我带在身边的茶杯里，而且还顺便撮了半杯土，蒙在脱下的外衣里面，带回“牛棚”了。

当门被锁上后，我就急忙地将花栽在一个漏底的漱口杯里。花已经有些枯萎了。我在晕黄的灯光下久久地看着它，如同欣赏一件艺术品。我想，我能将它救活的。我一定要救活它！

第二天的黎明，一醒来，我就想到要做一件什么事。但究竟是什么事呢？……呵，是的，花！我赶紧披衣起床到桌前看看，花还是蔫蔫的。漱口时，我又向它喷了些水。

那两天我无数次地看着它，希望看到它的复苏，它的变化，它的生长，我祈求有什么奇迹会突然发生……但它还是那样蔫蔫的。我感到很失望，感到很痛苦，似乎是面对着一个垂危的亲人。而且，我感到有些负疚：是我伤害了它的。但是，几天以后，我看到，它渐渐恢复生气了，花枝慢慢挺直了，小小的叶子伸展了开来，一朵朵小花绽开了笑容。我感到了发自内心的喜悦，久久地凝视着它，泪水蒙住了我的眼睛。呵，复活了，受摧残的小花！又回来了，生命的绿色！

我觉得，那间破陋、杂乱的小板壁房有了生气。这一簇小花抚慰了我的寂寞，带来了光辉、温暖。我觉得，它是一首诗，一支歌。

虽然，那只是一簇小小的不知名的淡蓝色的野花。后来有那么一天——

监管我的“小将”因一点什么事走进了我的小房。当他对我“训话”时，突然打住了。

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果然，他是盯在桌上的那一簇小花上。平时，我总是注意将花藏在杂物堆中的，这一天疏忽了。

“呵，”他笑了笑，“你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呀！”他迅速地伸过手去，当我不顾一切地去阻拦时，他已将花扯了起来，扔在了地上，而且狠狠地踩了

几脚……“你，你……”我简直说不出话来了，不知是由于惊恐还是由于愤怒。

那以后的情况我就不想详细叙述了。当那位“小将”留下了一串夹着咒骂的“革命语言”，并带着威胁地吼叫“你等着看”走出去以后，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环顾四周，我感到那小板壁房是更荒凉了，我被更难以忍受的寂寞包围着。当时，我下了决心（我甚至是通过发誓来表示我的决心的），总有一天，我可以自由地养花，我要养许许多多的花。

是的，现在我已养了许多的花。

但我还是深深地怀念那一簇不知名的淡蓝色的小花。1990年除夕
改旧稿

海 滨

我要写的只是在海滩上的一点遐想。

今年七月到青岛去旅游——这是我第一次到青岛。在这座三面环海的城市里，我当然要到海边散步。正是夏季，几个浴场中都浸泡着人，闪耀着各种花色的游泳服，岸上也是如织的游客。我难以以宁静的心情去面对海，而我以为，正是要在这种心情中才能领略海的神韵的。到崂山去参观，汽车中途休息。一下车就面对辽阔的大海。海滩上只有几个赤裸着身子在奔跑的小孩。我向海走去。后来脱了鞋袜走在湿润的沙滩上，海浪一阵一阵有节奏地涌来，一直扑向我的双腿。蔚蓝的天空，辉煌的阳光，深绿色的大海，远方有几只小渔船……如此庄严而和谐。回头看看，一个孩子用枯枝在沙滩上画着什么，忽然想到上初中时读过的沈从文的一篇小说《八骏图》，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一位每天到海边散步的女郎用木条在沙滩上写了一句话：“这世界有人不了解海，不知爱海；也有人了解海，不敢爱海。”这是有意留给也是每天黄昏来这里散步的一位年轻的教授看的。所谈的海，其实是指她自己。这是一位淑女对一位绅士的爱情的暗示。当时我不大明了这句话的真正的涵意，只是从字面看去觉得话说得很俏皮，而且产生了一种对海的神秘感，一种梦幻的向往。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现在面对大海想到这句话时，我淡淡地笑了。作为一种爱情的暗示，这句话是颇有一点浪漫气息的，但对于真正的人与海的关系来说，它并不是准确的。不了解海，不知爱海的人是有的吧，而一个真正了解海的人，却不会不敢爱海的，虽然海上多雷雨，多风浪，吞噬过许许多多的人。一个爱海的人，不仅是爱海的辽阔，海上的壮丽的日出，海上多彩的黄昏……也爱海上的雷雨和风浪，也许他们正是在雷雨和风浪中，他们才更体会到海的庄严的，而且，他们也是在同雷雨与风浪的搏斗中，体会到自己的力量。

所以，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一篇文章中说到，在波罗的海旁的一个渔村里，渔夫们在海上的一块巨大的圆岗石上刻上了一行题词：“纪念那些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一位拉脱维亚作家是这样解释这

行题词的：“纪念那些征服了海和即将征服海的人。”

当我年少时，曾经很欣赏沈从文书中那位女郎的话，而现在，当我已涉老境，面对大海沉思，我却更能体会渔夫们那一行题词的份量。

马背上的水手

有这样一幅照片：我披着风衣，骑在一匹高大的白马上，背景是苍茫的天空和奔流的黄河，显得颇有气势。这是今年4月去郑州黄河游览区旅游时，画家张善平为我拍摄的。当时我就说，要写一篇小文《放马黄河边》。同游的人都笑了。因为我只是租了一匹小马，在黄河的沙滩上小跑了一圈而已。《三次在马上》，这是几年以前我写的一首小诗的题目。那么，这是第四次在马上了。

第一次是1940年在重庆南岸，当时我是个中学生。在一个星期天，和几个同学各租了一匹马。川马一般都很矮小，不会大跑，但善于爬山路。我们嘻嘻哈哈地沿着南岸的崎岖的山路走了一段。第一次骑马当然很兴奋。我想象着在希腊战场上手执长剑的拜伦，而且默念着他的诗：“在光荣与至善中，我将勇往直前，一无所惧，直到我被阻挡——而没有什么能将我阻挡。”

第二次是1951年春，我作为第一届赴朝鲜慰问团的一名成员到了朝鲜战场上。我和慰问团的另一名成员劳动模范李德心，被派到三八线以南的前沿阵地去。一个夜间（当时我们的行动都只能在夜间），来接我们的战士为我们牵来了一匹马——当然是真正的战马。当时志愿军中的马很少，我感到是太受到照顾了，不大好意思骑。而且，老实说，我也不大敢骑。那匹马就一直由那名战士牵着走。后来到了一个小河边的开阔地，我忍不住骑上去试了试。战马显然感到驮负在它身上的是一个生手，猛烈地蹦跳了几下。由于我抓紧了缰绳，没有能将我摔下，于是它狂奔而去。来接我们的战士的吆喝没有能止住它。呼呼的风声在我耳边流过。我紧紧地伏在马背上，感到一种飞腾的欢乐，但更多的却是紧张。不仅是怕摔下来——那是碎石地，摔下来是够受的；更怕的是不知道马将把我带入什么地方去，我将脱离了来接我们的战士，迷失在战斗激烈的异国的战场上。来接我们的战士和李德心的惊呼声已听不见了。马还在流星般地奔跑……幸好小两边还有一些运粮的战士，将马拦住了。

第三次是30多年以后，我参加了一个诗人访问团，沿着大兴安岭跑了一些地方，并在黑龙江上航行了三天，又去访问呼伦贝尔草原。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神往已久的大草原，当然是喜悦和兴奋的。当地的牧民们是好客的，除了请我们在帐篷中喝羊奶、吃大块的羊肉外，还将他们放牧的马让我们骑着在辽阔的草原上自由地驰骋。牧民们在一旁照料，马很驯良，而且似乎也是好客的，不紧不慢地奔跑着，使我真正享受到骑马的乐趣。

这三次在马上，加起来也不过一个多小时，真是令人发笑的。但我却为之写了一首诗，那是因为这对于我颇有一点象征意义：第一次在马上时是一个中学生，满怀朝气和向往；第二次在马上，我已是一个青年，而且是在

战场上——对于我，那更意味着是人生的战场；第三次在马上，是在我经历了坎坷的险道、绝望的深渊，穿越了20多年的艰难的岁月以后，终于面对在阳光下的浩瀚的大草原。

而这一次在黄河游览区骑马，已是在我逐渐进入老境之时，说是豪情不减当年未免浮夸，说“老夫聊作少年狂”当是可以的吧。

今年秋季，我去岳阳旅游，带着两岁多的小孙子浩浩又骑了一次马，开始他很紧张、害怕，但跑了两圈后他就乐得大叫了。我想，以后我骑马的机会恐怕很少了。让他成长以后放马驰骋吧。

美国作家欧文·斯通写有一本杰克·伦敦的传记，书名是《马背上的水手》，有的朋友称我为“老水手”，那么，我借用这本书名作为本文的题目。

1992年7月10日改旧稿

50多年以前——那真是遥远的过去了，读过巴金先生的中篇小说《海的梦》。这书名

我很喜爱。对于一个少年来说，大海是迷人的，虽然当时我还没有看到过海，只是读到过几本有关海的文艺作品；梦幻是美丽的，我很喜爱萧乾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梦之谷》。将梦和海联在一起，就更有魅力，带给我许多遐想和向往。

我因而也有了我的海的梦。

几十年后，借用《海的梦》作了我一首小诗的题目。内容是表白当年我曾梦想着当一名勇敢的水手，去征服很大很大的海洋。我逐渐长大了，一面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一面欢乐地歌唱，为的是寻找梦中的海，而那始终遥远而又渺茫。有一天，当我在夕阳的晚照中坐在山坡上休息时，遥望走过来的道路，因而惊语：

看啦！波涛起伏，急浪汹涌。

如此壮阔，如此美丽！

呵，原来那正是我梦中的海，原来我一直就在梦中的海上漂航！

我在一则短文中提到这首小诗时说过：“我终于体会到，少年时的单纯、热情的梦想是可贵的。然而梦中的海并不像幻想的那样缥缈。实际上，生活就是海，那是比幻梦中的海更深沉、更辽阔，有着更多的巨浪和风暴，因而是更美丽、更庄严的海。”——人们常说“生活的海洋”，我是通过几十年的经历，付出了许多的代价以后，才真正体验到这个短语丰富的含意和沉重的份量的。

十年前，我还写过一篇题名《海的梦》的散文，那是读了王蒙以这个题目写的一篇小说所引起的一点感想。小说写的是一个在少年时向往海的人，经受了长期磨难后，第一次看到大海时的心情。在大海面前，时时使他想起年轻时的海的梦，时时使他意识到青春的消逝，时时提醒他当年的雄心壮志已磨蚀得黯然无光。然而，这种对年轻时的海的梦的回忆，又激发了他的热情。是的，他已无力在大海中畅游，然而，他有勇气去面对忙碌、简朴、艰窘的日常生活，他还可以游得很远，在那里——在生活的海洋中！小说写

得很有诗意。我写那样一篇读后感，是由于引起了我内心共鸣，并想以此鼓励自己。所以我说，青春是可以消逝而梦是不应该消失的。我说，让我们来祝福一切在海上的人，一切在心中永远有着海的梦的人。

现在，我又以《海的梦》为题来写这样一篇短文，那是因为，偶而翻阅以前所写的那两篇东西时，不免有点感慨。我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老年，日子过得算是比较平静的，心境因而也逐渐平和。回想起少年时海的梦，回想起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和起伏浮沉，有时却又感到一种沉沉的寂寞。难道我现在只能是一个坐在岸边的老水手么？

关于老年的诗文很多，其中大都是能给人以激励的。最后，我常常想起的是惠特曼的诗《给老年》：从你，我看到了那在入海处逐渐宏伟地扩大并展开的河口。

就只有这么一句，气魄恢宏而含义深沉。我以为可以将他所说的海解释为老年本身的象征。人的年龄增大了，也就有了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经验，更丰富的阅历，因而，也就有了明智的眼睛、宽阔的胸襟，生命的河流到了老年，才进入浩瀚的大海。

我的理解错了么？我只是想表明，老年人应该更珍惜逝水般的年华，应该还有新的海的梦。

七星剑

今年夏天到西安，随朋友逛旅游商店，看到有宝剑出售。怦然心动，想买一支。店员取了几支来看，都不满意。然而，从此要买一支宝剑的念头就常常在我心中浮起。

我要买这样一支剑：剑长三尺有余，剑柄是古铜色，挂着一绺红色的丝须，黑色剑鞘上直缀着七颗闪闪发亮的星星。拔剑出来，寒光逼人——我想的是近60年前曾有过的那一支“七星剑”。

在汉口市一中念一年级时，经过了几次选拔，学校派我参加全市中学讲演比赛，居然得了第一名。所得的奖品就是这样的一支七星剑。在大会上为我授奖者名叫陈泮岭。不记得他当时是一位什么官员，但记得他是国术的热心的倡导者。

我洋洋得意地背着宝剑回家。全家人当然欢喜不尽。传观一过后，那支宝剑就由母亲悬挂在床前。她再三告诫不准我动它。虽然那剑并未开口，她还是怕我不小心伤了别人或伤了自己，但我有时还是偷偷地站在椅子上取将下来把玩、舞弄一番。在闪闪的剑光中有过少年人的一些遐想：仗剑远游，闯荡江湖，路遇不平，拔刀相助……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沦陷前，为了继续求学，我只身去了重庆。母亲则随祖父祖母及二叔三叔等逃难到广西省的灵川县。在母亲携带的少量衣物中，就有这支七星剑。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在国民党军队湘桂大撤退中，祖父带着家人又一次仓皇逃难。搭不上车（也搭不起车吧），一路都是步行。在惊慌、混乱的气氛中，在如潮的人流中，一家人被冲散了。母亲还幸得和二叔、二婶在一起。她原来身体就不好，途

中风餐露宿，再加之焦虑不安，终于病倒了。她原是想到重庆找我的。我也一直焦虑地期望着她的到来。但她拖到了贵州省都匀境内，实在无力走动了。当时又风传敌骑即至。她不愿拖累二叔、二婶，就让他们先走，并拿出一只戒指让他们转交我。她一个人倚坐在一面破墙边，以后就没有了下落，当时母亲留在身边的就只有这支七星剑。

母亲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到我家的，几年以后就被我的父亲遗弃，跟着祖父生活。她当时还不过二十五六岁。我是她唯一的寄托和安慰，我十六岁时就与她辞别。阔别六年后，在那样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她凭着那一双包过的小脚想跋涉千里来到我身边，却未能如愿。在那样一种悲惨的情况下，从人间消失，只有那一支七星剑——儿子的一件奖品陪伴她。母亲远去，我不知那支七星剑流落何方。我写过一篇长文和两首诗纪念母亲。而想买一支七星剑也用以来悬挂在床前的念头是最近才偶然引起的，却久久浮沉在心间。母亲逝去将近50年了。我知道她姓段，却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也许我真的逐渐进入老境了，所以有时难免有怀旧之情，我当是想通过一件实物来寄寓我的怀念。而且，那也会引起我对如梦的少年时代的一些回忆。只是，岁月如流，万事皆变，我能在哪里买到一支像当年那样的七星剑呢？

巴金的一封信

前几天，和老朋友朱文尧在闲谈中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一些旧事，谈到当年读了巴金先生的《雾》、《雨》、《电》三部曲后，他深深钦佩书中的杜大心、陈慧等人物，因而鼓起勇气给巴金先生写了一封信。

文尧是我在汉口市一中时的同学，他比我高一年级。同时，我们又都是一个小型读书会的成员。参加读书会的除本校的几个同学外，还有别校的几个学生。这不是严密的组织，每周末集会，交换着看各自写的一些习作；谈谈读了一些文艺书籍和流行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心得，更多的是讨论时局。开会不拘形式，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时随便闲聊。那是1935年，在当时迅速突起的抗日救亡的浪潮中，各地都有不少类似的读书会。

文尧当年不过十三、四岁，但已在一位朋友编的汉口《时代日报》副刊《时代前》上发表了一些小说和散文。他用的笔名是“叶夫”。巴金先生是他最敬爱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和文笔都很受其影响，他在给巴金先生的信中说，他要像杜大心那样为革命而努力，甚至奉献自己的生命，不愿再上学了，想到上海当一名印刷工人，希望先生帮助他实现这一愿望。

他事先没有和朋友们谈到写这封信的事，他以为巴金先生是不会回信的。然而，回信很快寄到了。文尧后来在一篇回忆文中是这样写的：“信封是纯白的。信笺是32开的米黄色的道林纸，流利的钢笔文字满满写了四页，落款是很熟悉的‘巴金’二字的签名。信的大意是鼓励我要干革命的理想是好的，但是要到上海去当个印刷工人，他却没有办法。他劝我这个‘少年’要干革命也要多读一点书。最后，他写道：‘我赠你两句话：奋斗便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

“巴金先生来信了！”不仅对文尧，在我们这些亲近的朋友中也都成了一件大事。这一直成为我们好几天见面时的话题。从这一件事中，可以看出文尧当年（那时他还不过14岁）的热情和向往，虽然不免有一些天真的幻想，但却出自纯洁的心。无妨说，这也反映了当时朋友们共同的精神状态。而已有盛名的巴金先生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初中学生回一封不短的信，给予恳切的忠告，也可看出对年轻一代的拳拳的心。他可能想象不到，他的那封信，特别是最后的两句话，对几个正在人生道路上起步的少年，起到了怎样大的影响。而今，我们读书会的朋友们，作为“老大哥”的熊家凤已不幸去世，也有个别落荒的，但大都经受住了时代的风浪。现在仍留在武汉的只有文尧和我了，两人都已年过七十，相对晤谈，回首往事，想起巴金先生的那两句话，比起少年时来，当然有更深切的体会。即使在今天，那对我们还是一种激励。我并愿以此转献给当代的青少年们。

**“黑龙江，黑龙江！”几个人同时欢呼着。现在，我们是站在
黑龙江边了。**

我们在塔河县停留了三天。下一个目的地是漠河县。这边县委的负责同志已答应派汽车送我们去。就在动身的前一天下午，一位本地区的朋友（他是我们在同住的宾馆中认识的）从呼玛县打来了长途电话，告知从黑河县开向漠河县的轮船恰好明天将在呼玛停靠，问我们愿不愿意改走水路，这样，就可以在黑龙江上航行三天。船票他可以设法，只是，能不能买到有卧铺的舱位，还没有把握，要看船上旅客的多少。我们访问团的领队邵燕祥同志征求大家的意见时，大家一致欢叫着赞成从黑龙江上走，有没有铺位没有关系。

第二天早晨，告别了这几天在百忙中殷勤地接待我们，现在又赶来送行的主人——县里的负责同志们；告别了塔河，我们十四个人乘坐一辆大的交通车，兴致勃勃地上路了。

下午一点多钟，到达了呼玛，在县委招待所休息。两位上任不久的县长（其中一位是女同志）来看我们。他们都只有三十多岁，都是大学生，都已在本地区工作多年了，都显得那样质朴和热情，向我们介绍了本县的一些情况，并招待我们进了午餐。下午四时乘车去码头。于是，我们就面对久已向往的黑龙江了。

我怀着异样激动的心情凝望着浩荡的大江。

江水果然是泛黑的，白色的浪花轻柔地在黑水上翻动。两岸都是长满落叶松、樟子松、白桦树的山峦。百米外的彼岸就是异国，我是站在祖国的边缘线上。

在《山海经》中，就有着关于这一条江的记载。由于它的水色是微黑的，而龙又是中国古代所崇奉的神物，它被人民命名为黑龙江——一条神圣的江。我还看到了这样一个有关它的神话：“在那久远的过去，这里常年有

一条黑龙，后来从北边飞来一条白龙。两龙乘云跃出，激烈相斗。黑龙吐珠为雨，旋尾成风，终于战胜了北来的白龙，此后，它以水为阵，蛰伏不出……”（参看门瑞瑜的《漠河白夜》）

“九一八”事件发生时，我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老师常常用沉痛的语调，谈到被强占的那一片富饶的土地，谈到“白山黑水”——长白山、黑龙江，谈到那里的三千万受难的同胞。“白山黑水”从此深深地铭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抗日战争时期，“辞别了白山黑水，流浪到黄河长江……”的悲壮的歌声又常常在我耳边震响。当我自己也不得不流亡时，也常常唱着这支歌，用以抒发自己对失去的故乡的怀念，对失去的国土的悲痛。我也听说过许多关于义勇军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而现在，我是站在早已解放了的国土上，面对着多少年来在我心中流响的大江，这条环卫着祖国的大江，我兴奋，我激动。黑龙江，是的，一条神圣的江。它是不会被缚住，也不甘心受辱的。它庄严而雄浑，用壮阔的波涛书写着历史，穿过曲折的峰峦，浩浩荡荡地流向前方……

虹 霓

我们将要乘坐的一艘小航船停泊在岸边。没有趸船，一块跳板直接从岸上伸向船上，人们正在忙着上货下货。我们不急于上船，就在岸边散步。

当我们乘车驰向码头时，我从匆匆的一瞥中感到呼玛是我进入大兴安岭后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小城。整洁的街道，高高的行道树，绿叶下一地浓荫。两旁的楼房各有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在参差中形成一种和谐。行人和车辆不多。小城在淡淡的夏日阳光的笼罩中显得那样静谧而安详。而它的江边也是漂亮的，有一条长长的两丈多宽的、石块铺成的林荫道。在这样的林荫道上散步，眺望黑龙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但是，船上的货物已经上下完，我们必须上去了。而那也正是时候，因为我们上船不久，就落起了大雨。我们挤坐在狭小的船舱内，兴高彩烈地谈天，听着江上哗哗的雨声。不一会，雨停了，忽然起了一阵欢呼声。谁在窗外大声喊：“来看虹呀！”舱内的人都急急忙忙地穿过狭窄的过道，爬几步木梯，涌向船面的甲板上。

看，在东面为雨洗净的淡蓝色的天空中，两条平行的半圆的彩虹从我们的岸边一直弯向对岸遥远的丛林中。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虹霓”。内环是虹，外环是霓。

由于大多时间都是在城市中生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条完整的虹，何况是这样两条平行的完整的、瑰丽的虹霓。

我也忍不住欢呼，接着就几乎是屏息地靠在船栏上，凝望着虹霓，凝望着在彩色映照下波光闪动的黑色的江流和绿色的山峦、森林……沉醉在大自然以她豪放而又温柔的笔触所创造的画幅中。

响起了汽笛声，在虹霓的环照下，我们的船慢慢启动了。

暴雨，雨后明朗的天空，瑰丽的彩虹，在激流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这一壮丽的景色和一次难忘的航行溶合在一起，将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此岸和彼岸

在三天的航程中，除了睡觉，我大多时间是倚站在船栏边或是半躺在船头的顶棚上渡过的，有时候还冒着微雨。为的是珍惜这难得的在黑龙江上的时光。

我怀着奇异的心情望向彼岸，那边就是苏联。由于航道的关系，有时我们的船还更靠近那边一些。绵延不绝的山峦和森林，看不到人烟。我们的船在第一天下午经过了他们的一个小镇，可以看到几幢白色的两层楼房和一些木头平房。有几个大人和小孩在岸边望向我们。

另一次是第二天晚上，我们的船经过他们那边一个小城，夜色中只看到一些房屋的黑影和稀落的灯光。曾经有两次，苏联的巡逻小艇在离我们不远的江面上飞快地驶过，两个年轻的水兵都挥着手向我们致意。我不必在这里回顾不愉快的历史，也不必在此刻谈到记忆犹新的流在这条河上的鲜血。我想起了开船时横跨两岸的长虹，那应该也可以说是一个象征：无论如何，人民的友谊是永在的。

我有时在感受上很难相信咫尺之间就是异国。黑龙江上的景象是使我动心的。当我想到我是航行在祖国的边缘线上，就涌起了更为激动也更为深沉的感情。两岸是一样的山，一样的森林，白云飘逸地在两岸间浮动。而这边岸上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棵草，都牵引着我的心。而且，我觉得，我是越过了这些山峦和森林，望到了整个的祖国。

望前方

这是七月底，在内地，正是盛暑，尤其是在我的家乡武汉，当是最酷热的日子。而在这里，在江风和微雨中，我穿上薄毛衣还感到凉意。由于这里是祖国的最北方，夏季的白天也远比内地长，晚上八点多钟还闪耀着落日的光辉，午夜两点多钟，天就开始发亮了。

我们到达漠河的前一天晚上，已经九点多钟，旅客们都已在舱内休息了。我们一行中的大多数人还留在船面，有几个人倚站在船头的铁栏边，我和另两个人站在甲板的小顶棚上。

我们不仅是留恋于在黑龙江上的最后一夜，而且也是为眼前的壮丽的景色所吸引。

天已黑了，两岸是沉沉的山林，看不到一点灯火，黑茫茫的江面上偶尔有航标灯闪亮。

而在西北方，在船的正前面，却还有着一片明亮的天空，布满了彩霞。那下面是凝固的黑云，高低起伏有如山峦，而在那中间又波动着白色的云海……我没有能够很好地描绘出那壮丽的景色，那实在是难以描绘的。我也很难表达出我当时的感受。一种因为美而引起的喜悦，一种为美所陶醉的激动，使我的心轻轻战栗。而这时，站在船头的王燕生在喊：“老曾，唱一支歌吧！唱一支老水手的歌！”

于是，迎着江风，在马达和涛声中，我唱了，用嘶哑的歌喉：

从前在我壮年时，须发未苍筋骨强，朝思暮想去航海，此心哪在故乡？
现海风使我心伤，波浪使我愁，

看晚星引来乡梦上心头……这的确是一支老水手的歌。我唱它，只是因为有着强烈的唱歌的欲望。那首歌的怀乡的感情，并不符合我当时的心情。恰恰相反，我觉得我是为什么所吸引，所召唤，要奔向前去。我们的船正在前进…… 1 9 8 4 . 9 . 1 8

在大江上

黄鹤楼笔会于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日举行。其中有九天在长江上度过。我们乘坐“扬子江号”旅游轮从武汉溯江而上，到达重庆后又返回。这里是我在这次航行中的日记。参加这次笔会的，有公木、阮章竞、邹荻帆、李普、严辰、萧乾、苏金伞、宗璞、罗工柳、杨筠、荒芜、秦兆阳、黄钢、黄裳、端木蕻良、绿原这样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老诗人、老作家、老画家。此外，还有本省的徐迟、骆文、碧野、胡国瑞、黄铁、李蕤、李冰、莎蕤、管用和等（有几位同志因事没有上船）。除宗璞、管用和外，这些同志都是六十岁以上的高龄了。年龄最长的苏金伞已经八十，其中好几位还抱病在身。而他们一直都满怀激情，兴致勃勃。在我的这几则日记中，简略地记述了旅途中的一些见闻，有时也不免谈到同行诸位中的若干情况，或者也可以算是这次盛会的一点侧记吧。

四月三十日

上午九时，登上“扬子江号”旅游船。按发给的编号，各人找到了自己的舱位。两人一间，我和绿原同居一室。“扬子江号”前年八月才下水，往返于武汉和重庆，是走川江的最大的一艘旅游船，设备和各方面的条件都远比一般的客轮要好。有宽阔的餐厅、舞厅，有两个观景台，有理发室、小卖部。我们的住房面积有十五平方米，两个床位，一个小的浴室。

靠江的那一面是大玻璃窗，躺卧在床上可以看到岸上的景色。可以说是一座水上宾馆。萧乾说，他在莱茵河上都没有坐过这样豪华的轮船。

十时半，船启航了。我们一行大都凭依在船栏上，我感到大家都有一些激动和兴奋。这不仅是每次航行前都难免的心情，而且，也因为有的同志，如秦兆阳、黄裳、宗璞等是第一次走这条水路，将穿过三峡，那是他们早就向往的。有的同志，如荻帆、绿原，虽在这条江上旅行过，那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当年的少年已经白了头，而且经历了多少人世沧桑。

今昔对比，当然不免有一些感慨。绿原看着轮船激起的翻滚的浪花说，一九三八年，他是睡在一艘拥挤的轮船后甲板上逃难到重庆去的。那时候，他看到的也就是这样的浪花，这样滔滔的大江。同行中其他在这条江上旅行过的人，也都带着各自的回忆吧。

我们望着高高矗立在龟山前白色的晴川饭店（我们这两天就住在那里），望着对岸蛇山上新建的金碧辉煌的黄鹤楼（我们昨天曾到那里参观）。荻帆前天写了一首诗，将这隔江对峙的两座高楼比之为武汉的两翼。是的，重建的黄鹤楼诉说着武汉悠久的历史，而雄伟的晴川饭店预示着武汉的未来。我们乘坐豪华的“扬子江号”从长江上最早建起的大桥下驶过，那时，一列火车正轰响着穿越大桥。

午休后，我们纷纷走上观景台，那是在船后第四层楼的后甲板上，搭着塑料板棚以便旅客观看两岸风景。船过赤壁时，端木与阮章竞坐在软靠椅上大谈三国，其中颇有精辟之论。

后来光明日报社的老编辑黎丁笑着对端木说：“你路过赤壁，可能有点垂头丧气吧？”因为那是“周郎于此破曹公”的地方，而端木蕨良本姓曹。

在另一处，长江日报社文艺组的张英，在对严辰、邹荻帆进行采访，向他们了解一九三八年武汉的情况。荻帆当时还是省师的学生，严辰则是“八·一三”后，从江苏来到武汉的。他们畅谈了当年武汉热情澎湃的抗战景象。后来我了解到，此行中不少人当年也都到过武汉，如端木、阮章竞、罗工柳、萧乾等。端木在这里参与了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的创办工作，阮章竞曾在这里参与了冼星海领导的歌咏运动，他和冼星海是同乡，冻曾劝他从事音乐工作，后来他却成为诗人了。罗工柳是从武汉到延安的。他们都以激动的心情回顾那难忘的一九三八年。

在观景台上，我们发现了上海作协的几位作家：胡万春、唐铁海、欧阳文彬、陈继光、樊天胜等。这真是意外的相逢。他们是到大宁河（小三峡）去参观的。

晚七时，船上举行欢迎宴会，中外旅客一起，共九桌。由黄船长致欢迎词。他是四川人，看来不到五十岁，身体很健壮，而他在川江上已走了四十年，真是一个老水手了。担任翻译的同志是一个青年，知识面较广，在翻译时常常插几句很有风趣的话，在酒会上还唱了两支英文歌，英美旅客也一道伴着唱。后来听说他是原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曾淳之子。我这才感到他和一年前去世的他的父亲的确很相像，走过去和他谈了几句话。宴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晚上，萧乾到我们房里来小坐。他热情地谈到了我所熟悉的一个年轻朋友对他所翻译的易卜生剧本《培尔·金特》所写的评论，并要我把他的两点意见转告给评论的作者。

尔后，荻帆过来谈天。他和绿原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朋友。四十多年前，在重庆，在嘉陵江边，我们共同度过了许多日夜，共同创办诗刊《诗垦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解放以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每一次都很匆忙，而且难得是三个人在一起。这一次我们终于将相聚半个月了。

五月一日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昨夜睡得很晚。晨五时许醒来，后又假寐了一会。六时半起床，我发觉我是起得最晚的人。在四楼观景台上，我们一行中，有几位同志在甲板上慢跑，其中有李普。他六十七岁了，身体略显瘦弱。我曾问他的健康状况，

他笑着说，除妇科病外，什么病都有。但他精神抖擞，每天都在坚持锻炼。十时半，船到沙市。十一时我们上岸游览。

下午二时，到荆州参观博物馆，后又去看了新修葺的古城门，接着去参观座落在江边的万寿塔。我们一行将小卖部的白折扇购买一空。原因是，可以让同行的作家、画家、诗人在扇上签名留念。一路负责我们保健的彭医生说，那将是一件很珍贵的纪念品。五时许回船。

晚上，秦兆阳同志将写的《黄鹤楼记》给我们看。他是湖北黄冈人，一九三八年在湖北乡师毕业，后去延安。几十年来未回故乡，乡音依然未改。他将近古稀之年，身体不太好，仍坚持工作，是《当代》杂志的主编，还在一直勤奋地写作。这次是由于黄鹤楼这样的盛会，也因为思乡情切，带病来汉。他的《黄鹤楼记》是在北京就写了初稿的，到汉口后又一再修改，并广泛征求意见。

五月二日

夜半，船过葛洲坝。我们预定是返汉途中到此参观的，但同行中没有到过此地的人，都怀着急不可待的心情，披衣起床，要看一看这一伟大的工程。端木后来以《夜过葛洲坝纪实》为题，以诗记其事。这里节录前面的一段：“夜过葛洲坝，情切已非常。工柳欲作画，诗人喜欲狂。端木（诗人公木的女公子）未入睡，公木看表忙。耀群（端木的夫人）三起望，才知夜未央。忽闻铃声响，游侣纷起床。老人寻杖履，外宾加衣裳。援朝（阮章竞的女公子）迎风立，宗璞转诗肠。黎丁举相机，欲将全景囊。张英忆浪花，兆阳凭舷望。滔滔长江水，东去何泱泱。险滩虽已减，水势犹锋芒。远处灯如豆，眼前忽辉煌……”

我五时半起床。窗外阴朦。昨天天气燥热，今天变了。我上观景台去，人已很多。船已进入三峡，现正过巫山，大宁河口。今天的旅行将是此行的精华所在。

匆匆进完早餐后，大家又回到观景台上。一会。飘起了细雨，后来愈落愈大了，但没有一个人回到舱里去。因为峡中风光实在太美，而且即将过神女峰。

大家在雨中各自照相，都想在此留下一个纪念。

我已是三过神女峰了。所以自命为神女的老相识，一次又一次指指点点地说，前面就是神女峰，但一次又一次都不是。大家怀着期待的心情抬头张望，老人们都显得年轻、活跃了。兆阳同志当即念了两句诗：“白发苍苍尚多情，为观神女雨中淋。”终于望到了神女，她在雨雾中安详地站在高山之上，已经多少多少年了。人们都发出了欢呼。兆阳同志又念了两句诗：“欲看神女山太高，只好遥遥把手招。”

下午二时半，船靠奉节。原来安排的日程是要到白帝城参观的。秦兆阳、公木、萧乾、李普、阮章竞等年老而身体又不太好，而他们都决定去，虽然雨还在飘，而且要攀登九百多级台阶。连动过大手术，这几年来第一次出来远游的苏金伞也跃跃欲试。后来，我们考虑到，雨天让这些老人爬这样高的山，不太合适，而且返回途中还有到白帝城参观的机会，所以，这次决定不去了。既然大家都不去，苏金伞这才安心下来。五月三日

今日天气放晴，船还在峡中行。不少人坐在观景台上。还有一些同志关着房门在埋头写作。而湖北、武汉两家电视台的记者在忙于拍摄作家们各种活动的镜头。

荻帆来到我们房中，念了他刚刚写就的《黄鹤楼》。去年十一月下旬，他突然得了心肌梗塞，消息传出，友人们都很震惊，也很忧虑。今年元旦，上十个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老朋友，到他家去看他，他还很虚弱，说话的声音低哑。他说：“我们照几张相留个纪念吧。”我听了感到凄然。这次黄鹤楼笔会邀请了他，我以为他不可能来的，但他居然来了，而且毫无病容，依然精神抖擞。他还保留了老习惯，一本厚厚的本子总是拿在手中，有所见闻或偶有所感，就立即记了下来，每天晨四时即起床写作。他来汉后，已写了两首新诗了。这首《黄鹤楼》是在上船后写的旧体诗，他一向不惯此道，所以采取了“自度曲”的形式，那是写得很有真情实感的。

下午二时，船泊位于四川忠县的石宝寨。我在川江上走过好几次，但只远远地看到过石宝寨。只有这次坐旅游船，才有机会得以去游览。我们一行和外籍旅客一道，坐一小汽轮上岸。离岸不远，一座巨大石山矗立，形如玉印，所以被称为“玉印山”。顺着一条在林荫下的石阶上去，看见了一座古朴的石牌坊，上书“必自卑”。这是鼓励那些到此已感到劳累，望着前面还有高高的山坡，想就此止步的游客的。我们，其中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高笑着从牌坊下穿过。回头看看，牌坊的后面还刻着四个字：“忽焉在后”。妙！

石宝寨未必为很多人所知，但不少建筑学家称它为世界少见的奇特建筑。那是十二层崇楼飞阁，最上面的三层支撑在山顶的石台上，名为“魁星阁”。整个建筑依山就势，石木相含，设计巧妙灵活，丰富多采，的确是很值得一看的。苏金伞、萧乾、端木蕻良都上了最高层，虽然已汗流浹背，却都兴致昂然，笑容满面。

夜八时半，举行联欢会，船上的服务员表演了独唱和舞蹈。一位美国老人异常活跃，很有风趣。他变了两套魔术，后又和他的老伴合演了滑稽哑剧“照镜子”。外宾们还表演了小合唱。我们一行，宗璞和端木夫人钟耀群朗诵了诗。萧乾于四十一年前曾在欧洲美军第七军中采访，在船上他遇到了一个当年在该军服役的美国人，他俩合唱了一支当年军中流行的歌曲。我们笔会的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合唱了“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的作者公木也站在他们一起高歌。而我紧接在那位美国人变魔术以后，也表演了一套戏法，那是我的保留节目：一个指头变两个指头。

罗工柳沿途画速写，并忙于写字赠送求书的诸友人。他是著名的油画家，书法也有功底。承他大笔一挥，送我“神游”二字，笔力苍劲、气势雄奇。

五月四日

晨，船过酆都。《光明日报》老记者黎丁和我谈及在抗日战争时期，作家骆宾基和丰村在此教书，被反动派逮捕和我们党及文艺界营救他们的情况。那是当年震动了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却恍如昨日。黎丁在为一个年轻人题纪念册时，就写了此事，并说：“从敌人对笔杆的恐惧，益见笔的份量和力量。”

上午九时许，抵达重庆。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不少人抗战期间都曾在此工作和学习过，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离开后首次重来的黄裳、荒芜、宗璞等倚在船舷上，望着雄伟的朝天门和两岸高大的建筑群，高跨在嘉陵江上的缆车，都惊叹重庆的变化之大。

重庆市文联王觉等负责同志来接。首先驱车到革命圣地曾家岩五十号，

即当年的“周公馆”参观。黄裳告诉我，他曾以记者的身份在这里采访过周总理。

午餐后，兵分两路。一路去参观渣滓洞、红岩村；一路去南温泉。前一路我曾两次去过，所以选择了后一路。同行者有苏金伞、萧乾、黄裳、荻帆、绿原、黎丁、张常海等。抗战时期，为某种风声所迫，我曾在南温泉一友人家隐居过一段时期。故地重游，山水依旧，而远比过去繁华。今天是青年节，游人很多，不像当年那样幽静了。

四时，我们一上车，就落起了大雨。在雨中赶到抗建堂。因为《红岩》杂志正在这里举办“五月诗会”，我们只赶到了尾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我们能与许多年轻的诗人见面，见到了老诗人方敬、杨山、邹绛、梁上泉，以及李纲、王群生、张继楼、杨益言、黄济人诸位。

会餐毕，雨已住了。有的同志直接回船，我和荻帆、宗璞等由几个同行的青年陪同，去乘坐从重庆到江北的缆车。从地面向上看去，那似乎是很惊险的，但站立其中却是异常平稳。重庆、江北、南岸繁密的灯火，长江、嘉陵江夜色中的风光，尽收眼底。

九时，回到朝天门码头，发觉先我们而返的同志们都散坐在人行道边上。原来，我们乘坐的船开到江北的一个码头去了。大家只好耐心坐在地上等待，一直等到十一时，船才开来。回到房中，荻帆来聊天。我们谈诗，谈过去，更多的是谈将来。只要我们活着，将来就会永远是我们的话题。五月五日

早晨，船在阴雨中离开重庆。

几天来，笔会参加者除在风景点参观和埋头写作外，也常常在一起交谈。这样彼此可以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和交流意见。而在较熟的人之间，偶尔也戏赠几首打油诗。这里我想摘录几首。宗璞赠荒芜：“衣衫反结衣袖舒，低壁萧条诗满腹。洒洒何人无拘束，长江水上李荒芜。”荻帆也有一诗戏赠荒芜：“一步一诗长江游，三百诗篇囊中收。吟得发丝无几许，若入空门不剃头。”荒芜当然不甘示弱，分别有诗回答，答宗璞的是：“多才博学冯宗璞，一首新诗十里长。却与赵公争上下，三鹿硬说是三羊。”并有附注：“赵公系指‘指鹿为马’的赵高。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宗璞、黄裳我们三人逛汉阳公园，园中有石雕三鹿，宗璞近视，硬说是三羊”。答荻帆的是：“苦吟发展敢辞劳？倒是终南径一条。面壁达摩磨厚脸，近来穿上紫罗袍。”这样的打油诗（荒芜说连打油都不是，只是打水诗）当然是不供发表的，随手写来，读后一笑也就扔掉了，但我觉得从中也可以看出作家们的幽默感和风趣的。

荒芜给我看了他刚写的《和金伞七十自嘲诗》。金伞的《七十自嘲》是在十年浩劫后期写的，当然不免有悲愤之语。原诗是：“学诗无成已七十，抚摩双鬓欲何之？俯首新贵觉气短，坐待焚尸嫌日迟。出门常恐遇冷眼，合窗唯有读古书。但愿东风终会来，株老犹能开数枝。”三年前，金伞重病在北京住院。后来奇迹般的逐渐康复了，而且还不断有新作问世，这回是他病后第一次远游。荒芜的和诗是：“东风习习已吹来，老树寒梅冒雪开。要为苍生说疾苦，大江东去不西回。”金伞今年已八十岁，我对他说，应该再好好写一首自寿诗。

下午三时半，船泊石宝寨。我们上次已去参观过，这次当然就不去了。于是到石宝寨对岸的西沱镇去看了看。这镇属于石柱县，居民大多是土家族，镇上只有一条街，沿坡而上，有几里路长。街最宽处只有五、六尺，最窄的

地方打一把伞可以接两边屋檐流下的雨水。这是一个别有风情的古朴的小镇。

晚七时，船上照例又举行欢迎宴会。外宾中，一位美国妇人用纯熟的北京话祝酒，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兴趣。后来翻译介绍，她是在抗日战争中曾任驻华美军总司令和中印缅战区最高司令官的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名叫南希·史文思。当年史迪威将军因不满于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主张把美国对华援助物资平均分给国共双方，终于和蒋介石决裂。他的正直和卓识远见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三年前，有一个青年将他写的有六十万字的史迪威传记的原稿给我看，想与我合作写一个电影剧本。因为种种原因，剧本未写成，但读了那传记后，使我对史迪威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更深的钦佩。没有想到在船上会遇到他的女儿。

十时，船靠万县。我和荻帆、严辰、荒芜、萧乾、公木等一道上岸去看了看。雨后颇有寒意，萧乾穿上了五件毛衣，外加风衣，上那高高的石坡时，他一直冲在前面。万县沿江的街边有夜市，主要是竹席、竹椅、竹沙发和各种小吃。我们各买了一两件小工艺品就回船了。

五月六日

九时许，船抵奉节。上次过此时，因天雨，大家没有去参观白帝城，想留待返航时再去。可今天又是阴雨天气，大家决定冒雨也要游览这有名的古迹。我已去参观过两次，而且十号将在武汉举行这次笔会的诗文朗诵会，我必须写一点什么，所以就留在船上，赶写一篇短文。同时留下的还有好几个人，苏金伞想去被我们劝阻了。他颇有感慨地写了几句话：“远望白帝城，飘杏在云天。踟蹰未敢上，勇壮愧萧乾。”

短文写成草稿，不太满意。黄鹤楼的重建，不仅是恢复一个世界闻名的古迹，而且还包含着历史的启示，时代的象征，应该是大可抒发情怀，让想象纵横翱翔的。但如何写得精炼，情文并茂，却并不容易。

我抽空为笔会的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送来的纪念册各写了几句话。同时也翻看了别的作家、诗人们的题词，其中有的颇有意思。比如，端木的：“相逢毕竟曾相识，两代情殷信有之。黄鹤归来不算晚，武昌鱼美花开时。”另外，还有谁的一首（我忘了录作者名字）：“纵目云天外，望洋好放船。起锚浑沌港，系统自由湾。诗老唯余辣，酒酣最忌甜。文章拙手著，道义铁肩担。”还有公木的：“甘做剑鞘，自己宁可经历风霜，而保护剑的锋利，这样的人是我们的好同志。”绿原为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摘引了歌德的几句话，也引起了我的深思：“题材摆在人人面前，主题只有少数人知道，而表现手法永远是个秘密。”

下午，与李普谈天，他谈到了在“文革”期间一家人的遭遇，那也是够悲惨的。我想，他的健康状况不太好，恐怕与他在“文革”期间所受的折磨有关。在抗战期间，重庆《新华日报》刊载了他报道解放区情况的一组文章，很受读者的重视。我认识他是解放初期在武汉，他的夫人沈蓉是我高中时的同学，而且我和她同在一个地下党支部。他让我看了沈蓉最近写的一篇散文《小黑的故事》，那是纪念在“文革”时期陪伴他们，尔后被入杀害的一条可爱的小狗，写得很感人。

午后三时许，游白帝城的人回来了，虽然冒着微雨，他们的兴致都很好，说在雨中游览，另有一番情趣。他们还谈到所乘坐的小火轮为另一条船所撞的事，当时正在波涛汹涌的风箱峡，幸好没有一个人受伤。冒了这一点

风险，更为他们的游览增添了色彩。

后天，船上将又要举行联欢会。宗璞组织萧乾、荻帆、绿原、荒芜和我来合唱一支美国歌曲《老黑奴》和一支中国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我们一起在萧乾房中练习了几遍。五月七日

晨六时，船从奉节开出。天已放晴，霞光四射，我们真是“朝辞白帝彩云间”了。不久，船在急浪中驶入雄冠天下的夔门，进入瞿塘峡。这是三峡中最短、最狭而最有气势的一段。而且名胜古迹，比比皆是。中外游客都来到观景台上，一会指点“孟良梯”，一会又指点“盔甲洞”。一会又来到了“风箱峡”。午后一时，船通过西陵峡，葛洲坝已经在望了。

左岸，由于修大坝在这里炸山取石，青山露出了一大片淡红色参差不齐的坡壁。据船员告诉我们，完全可以到三星坪那边去取石，而不应该破坏峡中的风景。

一时半，船进入葛洲坝的二号船闸。每个乘客都走出了舱门，先是挤在船头看船如何进闸。后又拥向船尾看那沉重的闸门如何关闭。大家（包括那些海外游客）都怀着兴奋的心情，这里那里，到处都是照相机在晃动。在船上，望着闸中的江水渐渐下落。后来，前闸门缓缓打开，我们通过葛洲坝了。二时抵宜昌，先乘车去“三游洞”参观。三年前我曾来过。

这次重来，发觉增添了一些新筑的亭台，特别是张飞擂鼓的石像，很有气势。三游洞之得名，是因为唐代诗人白居易和他的弟弟白行简、与元稹到此同游过。宋代时，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又来同游过，称之为“后三游”。这次我们一行中诗人不少，宜昌文物局的同志要诗人们留下一点墨迹作纪念。

接着去葛洲坝参观。由于时间匆促，只是在坝上走了一圈。在泄洪闸前，大家留连了很久。那不断翻滚的浑浊的巨浪，那在夕阳映照下千变万化的高高溅起的浪花，那雄壮的澎湃声，真是惊心动魄，而又有着一一种壮烈的美。绿原说，这不是水，这是一片土地。这句话给了端木以启发，他说他要以此写一首新诗。

在桃花岭饭店进晚餐后回船。休息了一会，与史迪威将军的女儿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她一头金发，穿着大红的衬衫、黑裤、中国布鞋。瘦削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佩戴着一副红色的闪亮的耳饰，上有两个中国字“友好”。她已七十二岁，毫无老态，谈笑风生。我们告诉她，看上去她像只有五十多岁。她笑着说：“啊，你们太赞美我了。”一口娴熟的北京话。

在谈话中，她还经常夹几句：“你说是嘛？”或是，“啊，对罗！”因而显得特别亲切。她七岁时随父亲来中国，在北京住了三年。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三五年，她又来北京和天津各住过三年。她还记得当年在北京的旧居：国子监附近的大方家胡同二十三号。她怀着深厚的爱谈到史迪威，说到他是一个多么好的父亲，是一个多么有卓见的将军，说到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蒋介石的斗争。她说：“如果当年罗斯福能听我父亲的话，就不会有朝鲜战争和后来的越南战争……可惜他去世得太早了。”显然，她自己对中国人民也是有着真挚的感情的。她和宋庆龄、丁玲等都是朋友。解放后，她已六次来中国。这次她是带一个旅游团来的，她是这个旅游团的团长。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样的长途跋涉，而且还要经管一些具体的事务，是很辛苦的。而她说：“我很高兴中国人记得我父亲，我希望全世界都能知道他，我也很喜欢中国。在八十岁以前，我要每年来中国一次，我想让更多的美国

人了解中国。”在谈话进行中，我一直留意观察她。使我感动的，不仅是她对父亲的爱，对中国人民的友情，而且，也是在这样一个比我大整整十岁的老妇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激情和不知疲倦地一往直前的精神。于是我知道了：我还年轻。

五月八日

明天早晨将返回武汉。大江上的旅游就要结束，笔会也近于尾声了。

下午二时，举行了一个座谈会。老诗人、老作家、老画家们每一个人都讲了话，都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集会，一次难忘的旅行，都说这次黄鹤楼笔会是很有意义的。

公木建议将黄鹤楼笔会作为永久性的组织，隔几年召开一次，每次邀请不同的作家、诗人、画家来参加，而且要多邀请中青年。端木说，他这次来汉前，见到秦牧，秦牧让他为笔会带来一句话：要多写新诗。秦兆阳出口成章，一开始就念了几句诗：四十余年风月，八千里路云烟。归来双鬓皤然，今夕故乡大变。他说：“今胜今迹”更重要，诗人应该更多地歌唱祖国的今天，歌唱祖国的变化。——每一个人的发言都充满了感情。我注意到，当苏金伞说：“这次笔会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时，他的眼中闪着泪光……晚上，船上举行联欢会。美国、英国和日本外宾都表演了节目。我们表演了小合唱：英文歌曲《老黑奴》和中国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萧乾和宗璞又合唱了一支美国民歌。晚会结束前，端木代表我们，将一件小小的纪念品送给了史迪威将军的女儿。那是一张由他写了几句怀念史迪威的话，笔会的每一个参加者签名的宣纸。在会场热烈的掌声中，她接过了宣纸，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是一件珍贵的礼物，谢谢，谢谢！”五月九日

船在大雾中停了很久，到岸的时间延迟了。

十时，在明丽的阳光中，我们又远远地看到了长江大桥，又看到了金碧辉煌的黄鹤楼和雄伟的晴川饭店。离别了不过十天，却好像已是过了很久。是的，这一次航行是值得纪念的。

绿原对我说：“这次回去后，我要好好写一组诗。”我相信他会写出的，我相信那将是美丽的诗。

我相信笔会的每一个参加者都将奉献出自己最好的诗。1985年5月

三人行

和荻帆、绿原一道参加了“黄鹤楼诗会”。解放以来，由于分住在不同的城市里，我和他们见面的机会不多；由于一场风暴，有二十多年我们还完全处于隔绝的状态。这一次却相处了半个月，而且是三个人在一起。这半个月中，有十天在“扬子江”号旅游船上度过，使我们得以有畅谈的机会。这条船是由武汉驶向重庆的，那是我们共同度过了青春岁月的地方。

四十多年以前，在重庆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上，我们，还有姚奔、翼沆、史放等一批朋友相聚在一起。那正是抗战时期，我们都是远离家乡的穷

学生，在抗日的烽火和流亡途中，才开始比较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在人生的长途上，算是刚刚迈步。除荻帆外，都是在那一两年才开始发表作品，在诗坛上也才刚刚迈步。我们在沙滩上散步，在碧波里游泳，在小茶馆里聊天，在小油灯下写诗，同时也常在一起探讨一些社会和人生问题，探讨诗。我们憎恨所见所闻的一些黑暗腐败暴虐的现象，对延安有热情的向往，对将来有执着的追求。这一切都反映在我们当时的诗作中。我们穷困，然而欢乐。我们幼稚，然而有着朝气。我们可以说是相濡以沫，然而决不认为自己是涸辙之鲋。在青春的心中，大路展开在面前，生活是一支响亮、美丽的牧歌。

不久后我被迫离开了那里。伙伴们都为我写了送行的诗篇。荻帆在诗中写着：……

“寂寞……”

你说

那拿着花瓣为你擦血的少女那讨论着带有油墨气息的刊物的朋友那折磨了你的青春

而教给你战斗的图式的地域都将

再见！

……

后来，他们也都先后离开了那个小镇。那条美丽的江和那个小镇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现在，三个年轻时的伙伴又相聚在一起，相聚在一条驶向重庆的船上。四十多年了，江水流去了多少，我们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而且都经历过艰危、坎坷、磨难。

我们当然不再像当年那样幼稚和狂热了。但我发觉，虽然更成熟了一些，更稳重了一些，他们的性格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包括他们的优点和弱点），虽然经过了磨损，跳动着的也还是同样的心。我们并没更多地述旧，却是彼此勉励着要有向上攀登的决心，无论是在诗还是在人生的山道上。

半年前，荻帆突然得了心肌梗塞，几乎走向黑色的异乡。我原以为他不可能来参加这次诗会的。然而他来了——大病后的第一次远游。他还是那样温和地微笑着，和大家一起爬山登岭，手边一直拿着一本大的记事本，随时记下一点什么。虽然往往和我们谈到深夜，还是黎明五时即起写作。而绿原还是像当年那样，在谈话中常有警句，一有闲空就埋头苦读；有时写一点什么，唯恐给我们看到，不到完稿他是决不示人的。——他们都激励我，实质上是不满于我还是像年轻时那样在广泛的兴趣中不能掌握主要的目标，因而浪费了精力和生命，他们更以自己的榜样无声地、然而严厉地批评了我。

因为白天有一些活动，我们的长谈大都是在夜间。我在激动的心情中往往不能入睡。听着静夜中的涛声，回忆起了当年在嘉陵江边的许多情景。在舒适的舱房中，怀念当年我住过的那间破烂的小土屋，朋友们是常常在那里聚会的。现在，有的友人不知下落，有的友人已去世。我思考着历史、人生和诗。我所经历过的一切，无论是欢乐、搏击，或痛苦和磨难，于我都是有益的，都是哺育我的乳汁。我已没有当年那样丰富的时间，但却应该有比当年更强的力量。——我深深地感到了两位老朋友对我的激励的份量。是的，我决不能再浪费珍贵的时间，而应该迸发出最后的热能，将诗融入生命，或者说，将生命融入诗中。当然，我所说的，不仅是那种狭义的诗。在汽笛的长鸣中，船抵达重庆了。

我们并肩走向了嘉陵江。映照这三个人的身影的已不是当年的流水了，而这三个人在生活的浪涛中也消逝了青春。但是，曾经照耀他们的青春的光芒还照耀着他们的现在，他们的感情还不像他们的面容那样苍老，在内心深处，还保留着最值得珍贵的东西。所以，在返航的途中，“扬子江”号顺流而下，站在船栏边，看着滔滔的大江，我想起了最近绿原写的一首富有哲理的诗，那题目是：我们走向海！1985年8月21日

樱花时节的聚会

这么些天总是风风雨雨，但在雨丝风片中花还是要开了，春天还是要来了。

又到了桃花、樱花的时节，又到了我们老人也挤在年轻的人丛中看花的时节。

你们哪天来呢？

我们每天都在盼望，等候……等候仙子和诗人的降临。

——这是武汉大学教授、老诗人毕矣午前不久邀约我们几位老朋友去他家聚会的信，是一则诗柬。现在的年轻人未必熟悉毕矣午这个名字。他是和何其芳、卞之琳、曹葆华等同辈的诗人。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两本诗集：《掘金记》和《雨夕》。

今年，《长江》文学丛刊从中选出了若干首重新发表。虽然是五十多年前的旧作，读来还是感到清新可喜。他现在已七十五岁高龄，还是那么热情洋溢，这从诗柬中就可以看出，只是，最后那一句浪漫色彩太重。我们当中有几个写诗的，但并没有仙子。几位应邀的女士都已是白发苍苍了。

记不清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了，大概是在十年浩劫后不久，郑思夫人马国英、伍禾夫人聂碧莲、天风夫妇、秦敢夫妇、田野夫妇、阳云夫妇，还有我和老伴，每年春天都到矣午家聚会一次，虽然因为出差或别的什么原因，有时候人不是到得那么齐。珞珈山上，有两条旁边栽满樱花树的山路，每年四月下旬，赶到山上看花的人很多，至于我们主要倒是看看老朋友。相交几十年了，其间都经历过坎坷风雨，在那十年人妖混淆、是非不分的岁月，也都经受了大磨难，而且郑思、伍禾都已不在人间。现在处境都有了根本的好转，但大家都忙，住得又分散，见面的机会不多，相聚在一起就更为难得了。所以就以赏花为名，碰面谈谈天，挤在年轻的人群中看看樱花、桃花，也是难得的愉悦和悠闲。

第一次聚会时，矣午还住在珞珈山下、东湖之滨的一座平房中。这说起来颇有一点诗意。那两间破旧而又狭小的土屋有如农舍，他也确然刚辞去“牛倌”生涯不久，墙上还挂着放牛时戴的草帽。他给大家讲了几件放牛时的“逸事”，惹得满座哈哈大笑。后来他迁入校区内的一幢小楼，住房多了些，每间还是很小，又堆满了书刊，上十个人挤在一起，就真是只能促膝而谈了。室外不远就是繁茂的樱花，就是拥挤的看花的人群。春天在那里。但春天也在我们这里。虽然室小而陋，在座都是白头人，却也谈笑风生。谈谈

身体和孩子的情况，也谈谈做了些什么工作，还有什么打算，也议论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彼此还开开玩笑……老朋友之间的那种温暖、关怀和亲切，恐怕不是年轻人所能体会到的。而且，等一会儿，我们也要挤到那些年轻人中去了，也要挤到樱花丛中去了。

当然，总是要分手的，互道珍重。

明年还将有春天。

明年我们将收到老诗人的更美丽的诗柬。 1986年

怀旧书店

日前重读了朱自清先生的《伦敦杂记》，其中有一篇谈到他在伦敦逛旧书店的情况，令我颇为神往，因为我已多年没有领略过逛旧书店的那种乐趣了。

逛旧书的习惯是从进初中以后就养成的。当时已喜爱文艺书籍，而零用钱很少，新书一般都买不起，就把目标转向了旧书店。抗战以前，汉口的保华街附近和武昌的长街都有好几家，当时我很少过武昌，就只在汉口的几家旧书店逛逛，往往可以用便宜得多的价格买到新出不久的书，也可以淘到一些别的好书。抗战时期，在重庆，两路口和米亭子是旧书店较集中的地方，也是我常去的。后来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逛旧书店是我的日程之一。解放初期，汉口胜利街有几家旧书店，就在我服务的机关附近，上下班路过时，常去看看，和其中一位胖胖的姓张的老板混熟了，有价值一点的旧书和杂志，他都要为我留着。抗战前出版的整套的《文学》、《译文》，我就是在那里买到的。那一套《文学》，我转让给了《长江日报》资料室，现在想必还保存着。当时街上的书摊也多，书都摆在地上，也常有一些值得一看的书，而且很多线装书。一部日本精印的共10册《史记会注考证》我就是在地摊上买到的，价格十分便宜。但地摊的主人还是有钱可赚，因为他原是论斤称来的。这样积累下来，我也有几千册书了。1959年，北京的旧书店来人到武汉收书，不知怎么打听到我有一点藏书而找上门来。但他看后不免失望，我实在没有什么珍本。他花了两三百元就收购了我一大批书去。我当时因经济拮据而不得不出手。事后颇为惋惜，到“文革”抄四旧时，我又反而庆幸这样的处理了。“文革”期间，旧书店当然不存在了。前几年，交通路又开了一家旧书店，是国营，店堂不小，但书籍的品种不多，而且大都是滞销书。积习难改，我也去逛过几次，往往空手而归。由于顾客零落，后来终于停业了。现在武汉已没有了旧书店，只是在僻静的街头出现几个地摊，大都卖的是言情、武侠小说之类，贫乏之至。

逛旧书店的乐趣在于“逛”本身。一般是并无目的而去，随便翻翻也是一种享受，无意发现了一本喜爱的书，一本渴望已久而在新书店买不到的书，其乐如何？这就要求品种多，也要求经营者的眼光和魄力。通过旧书店，读者可以互通有无，是培养读书的兴趣、开拓文化领域的一种手段。就我所知，有的朋友因住处狭窄，而藏书过多，无处可放，想处理一部分而无处可

卖，作为废纸论斤卖掉又太可惜了。所以，无论是为买书还是卖书，都很需要旧书店的设置。

依照目前文化市场的情况看，这未免是一种奢望吧？不过，这难道真的只是奢望吗？！

那就让我在这里说出我的怀念，一种怅惘的怀念。

申砚楼半日

申砚楼是画家谢申的画室的名号。那天上午，我和易难应邀到那里作客，易难和谢申是原来就有交往的。我早八年前就看过谢申的画，也有几个朋友向我谈起过他，这一次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但他说，在60年代初期，他就和一个与我很接近的朋友一道去看过我，那么，我们初交应是在30年前。老年健忘，我一点印象也没有。那时他还年轻，初涉艺坛，现在他已年过50，已是知名的画家了。

他的画室宽敞、明净。我们相约在这里见面，是因为可以随便聊天，不会有人打扰；也便于作画、写字；而且我也想比较集中地看看他的画。我过去只看过他的“娃娃画”，他的画室一面墙边陈列的却是十多幅风景。他还拿出了几十张拍成照片的画给我看，也都是风景，这些画有情趣，有意境。是国画，又吸收了一些油画的技术，他告诉我，他原在西安美院就是学油画的。他还给我看了20年前画的一个长卷，题材是18罗汉，用的又是工笔了。

但他主要还是以娃娃画知名于世。他说为了画好娃娃画，曾揣摩过杨柳青的年画，无锡的泥人，民间的剪纸。他说画娃娃不宜过实，又不能过于变型。他通过多年的探求，已形成了一种自己的风格。他笔下的娃娃们活泼、天真，而在艺术上又有其特色，受到了国内外许多人的喜爱。他当场画了一张娃娃和公鸡的画送我，又与易难合作了一幅画送我。他画的娃娃，易难则是画的猫（这是易难送我的第5只猫了）。他们两人还合作了一幅画，由我题款，是送给长年卧病的周代和他的妻子王淑芳的，想到能够为他们伉俪带去一点喜悦，我们也很高兴。我则写了几句话赠谢申：“似而非似，画而有韵，大俗而雅，返朴归真”。我还为他的女儿砚子和易难的女儿璐璐各写了一幅字，并为湖北教育出版社成立十周年写了一幅字。字当然还是稚拙，毫无章法。这样接连在宣纸上大胆挥毫，在我也是“史无前例”的了。

大多的时间则还是谈天，谈到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艺术本身的特质，艺术家的追求和突破自己已形成的风格的艰难……由于是以画为题，并是各自的体会，谈得不是那么空泛。

你一句，我一句，谈得很随便，很自如。主人先是招待我们喝茶，后又喝“孔府家酒”，微醉微醺后，又一杯一杯地喝咖啡，四、五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谢申一再地说：“偷得浮生半日闲”，这样的一次聚会的确是很愉快，又很有收获的，值得一记。

抓住那逝水年华

1991年的最后一个晚上，除夕。合家在一道高高兴兴地看完了中央电视台的“祝福明天”晚会。孩子们各自睡去了。我和老伴稍稍整理了一下房间，换上了新的年历和台历，于是有了一些喜洋洋的气氛。时间到了12时整。不像农历除夕那样全城响彻了震耳的鞭炮声，周围一片寂静，宛如平日。然而，一个新的年头开始了。

已经过去的1991年是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到来的前几天，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说过这样几句话：“20世纪90年代又将跨进新的一年，我们临近了世纪末，但我们永远没有世纪末的悲哀，却只感到了日益逼近的新世纪的光辉。”在迎接1992年时，我依然保持着这样的心情。

现在我要谈的倒是一点有关个人的感触。回顾了一下过去的一年自己做了点什么，不能说是一片荒芜，但是，浪费的时间也真不少，而我已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了。谈论“时间”的诗文很多，中国古代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抓住那逝水年华，抓住！抓住！”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前者表达了对时间流逝的感叹，后者则警示人们要及时珍惜时间。类似的话我们从年轻时起就听到过的，但只有随着年岁的增长才愈来愈体会到这些话的份量。

珍惜时间，当然是指应做一点事。我想起了老教授程千帆的一封来信。他说：“……你这一辈子也可以说是从小闯荡江湖，阅历文场，如果身体还好，何不写点回忆录？不一定很完整，也不要大结构。一篇一事，想到就写，记得就写，事有大小，见有浅深，都无关系。

近代野史逸闻不少，我们的子孙会感到寂寞。他们会不胜惆怅地说：我们的爷爷奶奶，为什么那么吝啬，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一张白纸呢？”他的如何写回忆录的这一段话和所设想的我们的子孙们的感叹很有意思。关于写回忆录，《新文学史料》的主编牛汉还有别的几位友人也都向我提出过。我这几十年来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个人生活也颇有起伏曲折，应该是可以写一点什么的。事实上，过去一些年中也零碎写过了几篇。只是多年的日记都已丧失，而记忆力日衰，有的事记得还清楚，有的事则模糊甚至淡忘了，要想写较完整的回忆录是很有困难的。千帆兄的提示帮我打开了思路，小大由之，想到就写。另外，以前在一些杂务上过于分散了精力，今年应该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一方面。

老伴送来了用今年的第一壶开水泡的茶。我坐在炉边品着茶，眼前闪烁着过去的漫长而又短促的岁月。回顾过去生命的足迹，也是为了探求生命的下一步。时钟的“滴答、滴答”声伴着我默想……

意志的赌徒

翻检文件匣，看到了一份从武汉晚报上剪下来的短文：钱刚写的《问你敢不敢放“胜负手”》。说的是在奥运会男子自由体操的决赛中，最后一个出场的李小双面临着决定其命运的选择。“在他之前出场的选手都取得了高分。他如果要后来居上，首先的条件就是得选择超过别人的高难动作——团身后翻三周，这是当今世界男子自选体操中难度最高的动作。但这个动作能否顺利完成，赛前他只有50%的把握。在今年4月的世锦赛上，李小双因‘团三周’失败丢了名次。但他没有因过去的失败而裹足不前，冒着失败之后只能得第八名的危险，他毅然放出了‘胜负手’。他做了‘团三周’的动作，他成功了，他得了冠军。”

看了这篇短文后很有一点感触，就顺手剪了下来。当时，我还联想到老作家骆宾基在抗战时期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乡亲——康天刚》。我没有找到作者送我的收有这篇小说的集子。但还记得这篇小说的内容，虽然读它是将近五十年前，许多细节已模糊了。

康天刚是山东农民，由于贫困，就停当年许多山东人那样，漂海到东北去寻找生路。他选择的是挖参。他运气不好，多年来只挖到过一些小参，生活困难。而与他同船到东北的一个乡亲则开垦了一片荒地，辛勤耕耘，不愁衣食，并已娶妻生子。康天刚曾几次到那家作客，他有些羡慕那虽不是很富裕但却安适的家庭生活。但他谢绝了主人劝他留下来共同种地的邀请，依然在丛山峻岭中穿梭，去追寻他的目标。他渐渐老了，由于都认为他晦气，各个采参帮不愿他加入。有一个参帮收留了他，却只让他做伙夫。人们瞧不起他，轻慢他，多年来与他作伴的只有一只狗。而那狗也老了，在一个月夜，当那狗死在他脚下时，他伤心地哭了。他将狗的尸体扔进了一个深谷，站在悬崖边，他也准备纵身一跳——在这个世界上，他已无所留恋。但就在此刻，在月光下，他看到了在险峻的山坡边摇曳着一支巨大的参，他的欢呼惊动了全帮的人。那的确是一支稀见的珍贵的宝物。全帮人都衷心感激他，并歉疚于过去对他的轻慢。然而他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随着他多年的忠实的伴侣老狗去了。

当年，这篇小说受到了一些人的赞扬。但有一位名人提出了批评，大意是认为不应该轻视平凡的劳动，不应该好高骛远。我是喜欢这篇小说的。不仅因为文笔优美，那故事本身也使我深受感动。当然，平凡的劳动是不应该轻视的。作者的本意显然是在歌颂那种敢于树立一个巨大的目标的壮志和勇于追求那目标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我是从中受到了鼓舞的。

李小双与康天刚的情况是并不相同的。李小双对于他所要做的高难动作，虽然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但却是经过了刻苦的训练的。而康天刚则带着更大的盲目性。使我将他们联想在一起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可以说是意志的赌徒，为追求胜利而孤注一掷。他们都成功了。李小双成为世界冠军。康天刚则在人们感激的心中含笑逝去，他临终的遗言是：“如果能摘到月亮，我就不要星星”（大意）。

但是，如果他们失败了呢？失败当然会带来巨大的遗憾，然而那种追求的勇气本身就是值得赞美的，即使失败了，那也是一首悲壮的歌。1992年

旅途小记

今年7月中旬，我外出旅游了一次，到了青岛、烟台、威海、大连、北戴河、北京等地。除北京、北戴河之外，其他几座城市都是初到，而且都在海边，这是使我动心一游的原因。青岛的八大关路，有着掩映在各色树木中的风格各异、造型优美的楼房，环境幽静，使我留连。大连新建的开发区“五彩城”，每一座不同形式建筑的门面和墙壁上，都有着大型的壁画或图案，灿烂夺目，华丽而不俗气，使我如置身童话境中。另外，我还在烈日下爬崂山，在暴雨中上蓬莱，在大海中游泳，登长城远眺，在刘公岛吊古战场……这可以说是一次壮游。我在国内有过多次旅行，只有1984年在大兴安岭林区穿行，在黑龙江上乘船沿中苏边境航行了三天，在满洲里辽望近在咫尺的苏联边卡，后又在呼伦贝尔草原放马那次旅游可以相比。

不同的是，那一次我是一个诗人访问团的成员，沿途有人接待和安排，一切不用自己操心。而且由于我是访问团中年龄稍长者，格外受到优待。这一次同行的只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和他的10岁的儿子。我们是普通的旅客。我没有惊动和造访各地的朋友。从买车船票到找住所，都靠我们自己，当然，主要是那位年轻的朋友代劳。我们有时坐带空调的软席火车，有时挤站在车厢连接处的过道处，有时在颠簸的海轮上，有时在长途公用汽车里；有时住大的宾馆，有时落小的客舍；有时吃海鲜、喝啤酒，有时啃面包，冲方便面。每离开一地，要购买车船票都颇费周折，但也完全可以适用那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总还是有办法将票弄到手。隔几天，甚至只隔一天，就在旅途上。就是停留在一地时，也是抓紧时间游览。

几乎没有午睡过，而在家时那是我不可少的。比起参加团体的旅游，这次行动要自如些，但却更为劳累，有时候是相当艰苦的。但是，我居然无灾无病地平安过来了。途中，萍水相逢的人们偶尔问到我的年龄时，都惊讶地表示“你这样长途跋涉不容易呀！”我也观察到，旅游者中比我年长者似不多。这诚然说明我的体质还不是那样坏。但是，我感到，更重要的是，在需要时，我还能在精神上付出力量，来承担应该承担和需要承担的。回到家里后，一松弛下来，就觉得颇为劳累了，以至难以相信我是怎样能够经受这次漫长的旅程的。这种意识到自己还有足够的精神力量的喜悦，甚至超过了这次旅游本身所得到的愉快。

范用的贺年片

这十来年，每当新春，都收到范用同志（原北京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寄赠的颇为精致的贺年片，内芯或是一幅小画，或是一句题辞，都是出自名

家之手。如1990年是马年，贺年片的皮面是一小幅以深绿色衬底的白色奔马，简炼古拙，似取之于汉画像石的拓片。内芯是冰心老人题写的三个字：“寿而康”，俊秀而又苍劲。这些由三联书店自印的贺年片，十分清淡高雅，这也正是三联书店书籍装帧的一贯风格（其中不少封面就是范用兄亲自设计的）。这是友情的纪念，也可以作为小艺术品收藏。

1991年他寄赠的贺年片则颇为别致。皮的一面是他的一则短信，另一面则是他9岁的外孙女许双的一篇作文：《我的外公》，篇幅不长，照录如下：我的外公已经67岁了，他瘦瘦的，个儿不高。

他做什么事情都快，看书快、写字快、走路快、吃饭快，就是喝起酒来，慢慢的。

他喜欢学习，天天看报纸看书，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夜里，我们都睡觉了，他还在看书。

他喜欢音乐，经常欣赏有名的乐曲。他也爱唱歌，总是拿着歌本坐在那里哼歌。有时候还把唱的歌录下来，听听自己唱得好不好。

外公喜欢收集酒瓶，他的房子里有各种各样的酒瓶，颜色不同，有大有小，都挺好玩，我也喜欢。

他有些习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吃饭的时候，他睡觉，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又吃饭，走来走去，弄得我们睡不着觉。晚上，我们吃米饭，他不吃，要吃面条，有的时候，我们吃面条，他又吃饭。你说他怪不怪？

这就是我的外公。

我与范用兄在抗战时期相识于重庆，他当时就在三联书店工作。50年来，我们交往的机会很少。我知道他一直没有脱离出版界。“文革”后，在他主持下的北京三联书店成绩斐然，出了许多好书。通过贺年片上他小外孙女的这篇作文，使朋友们得知他离休后生活过得还很自在。但就我所知，他也还在为出版事业尽力，并关心世道的。

今年春节收到的他的贺年片，则是华君武、黄永玉、平凡、苗地、方成、丁聪、叶浅予、鲁少飞8位漫画家这几年先后为他作的八幅头像。下角是他题的一句话：“画老朽为神奇”。八位著名的漫画家都为他画像，可见他在文艺界交游广阔。八幅头像都各具特色，真是难得的珍品。

贺年片的另一面是他写的一则短简，他说“漫画使人开心一刻，可以延年益寿”。看到这张贺年片，我是乐了的。而他自己面对这些漫画头像，当更会笑口常开吧。算来，今年是他70初度，那么，相信他一定会“寿而康”！

“圣”与“佛”

老作家骆宾基前不久路过武汉。我们在闲谈中提到了雪峰和绀弩。他说雪峰是“圣”，绀弩是“佛”。突然一听，我有点愣住了。接着想了想，自以为对他的意思有所理解。他和雪峰、绀弩有着长期的交往，他用这两个字概括这两位长者的性格，我认为是相当准确的。

雪峰和绀弩都是老一辈的著名的作家，是老党员，对革命文艺事业有过巨大的贡献和影响。解放以后，他们都没有能够逃过五十年代的灾难，被“扩大”了进去；当然，更没有能够避过那十年浩劫的磨难。雪峰含冤去世；绀弩则被判了“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些年来，他一直卧病在床，也于今年与世长辞。

抗战后期，雪峰由党将他从上饶集中营中营救出来后，移居重庆，文艺界的同志们对他非常尊敬和关心。当时就有人称他为“圣者”。那不仅是由于他具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和在文艺上有巨大的成就，也由于他对党的忠贞，对人生的执着和洞察，待人的诚恳和甘于淡泊的生活情操。在解放后，他在更为严酷的考验中，在更为艰难的处境中，依然故我，毫未动摇自己的信念和做人的态度。我听说过一些他在这期间的极为感人的故事。

称绀弩为“佛”，我是从骆宾基口中第一次听到。我当时愣了一下，主要就是为此。在鲁迅先生去世后，他可以算是最优秀的杂文作家中的一个，我甚至想说，是成就最大的一个。试一翻那本厚厚的《绀弩杂文集》，多少文笔恣肆、嬉笑怒骂、富有战斗性的好文章，其中不少在解放前是传诵一时的。他为人则在洒脱中很是认真，看来似乎有点玩世不恭，其实是满腔义愤。他的这种性格，从他的文风中也可以感觉得到。在经历了漫长的劫难的岁月后，他的性格上有所改变，不，应该说是升华。“一场冬梦醒无迹，依旧乾坤一布衣”（《记梦》）。而且，他真是家破人亡，唯一的女儿于他出狱前一月丧生。只有老伴周颖和他相依为命。他的住室可以说是寒伧的。长期卧病在床，写作不辍，旧著新作，一本又一本问世。他的《散宜生诗》是诗坛的异彩，瑰宝；是旧诗，却开拓了新的意境，内容大都涉及刑狱流放、坎坷落拓的生活，而他超越于大痛苦之上，表现了乐观的精神和诙谐的情趣，而其中又深藏着铮铮风骨。他的文风也有所改变，《绀弩散文》的自序，已达炉火纯青之境。

骆宾基称雪峰为“圣”，绀弩为“佛”，当然是在一种新的含意上说的。一位是忠贞、明彻、坦荡；一位超凡脱俗，以慧眼看人世。而共同的是，他们都有着对理想的坚定的信念，对人生的执着的追求。他们所表现的宁静和淡泊，正是激情达到高度的一种境界。

我们珍惜他们在文学领域内留下的财富。同时，我们也要学习他们做人的风范。因为艺术的高峰只有具有崇高人格的人才可能攀登。当文艺界正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中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探索的时候，我希望能记住这一经验：人生战斗的起点才是艺术战斗的起点。1990年

在斯特鲁卡国际诗会上

斯特鲁卡国际诗会是在一个美好的季节：每年夏末秋初，在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一个美丽的小城斯特鲁卡举行。

这个一年一度的诗会是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的，为的是纪念马其顿爱国诗人康士坦丁·米勒丁诺夫和迪米塔尔·米勒丁诺夫兄弟逝世一百周年。他

们为了使祖国从异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曾经英勇地战斗，后来在监狱里慷慨就义。在诗会上，每一年都要朗诵他们的诗。浩淼的蓝色的奥赫里德湖，在他们的歌声中轻轻波动，如同跳动着的心。而斯特鲁卡，这个诗人怀念着的小城，是早已在灿烂的阳光的照耀下了。

为人民而歌唱、为自由而战斗、为理想而献身的诗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们活在人民的心中，活在他们自己的歌声中。

“桥上诗会”是斯特鲁卡诗会的一个主要项目。

德里姆河穿过斯特鲁卡，河身不宽，大约二十米的样子。一座朗诵台就搭在德里姆河桥上。夜色降临了，远远看去，在强烈的聚光灯的照耀下的朗诵台，像一颗巨大的闪光的神珠。河两岸的树丛中，闪烁着彩色的小灯。

首先是放花炮，五颜六色的火焰的花朵在深蓝色的夜空开放。那是象征着诗：诗像火焰那样灼人，那样美丽，那样燃烧着人的心。那也是诗人的象征：诗人的心中永远燃烧着火焰，诗人是人类的花朵。

于是，朗诵开始了。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诗人们，来自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诗人们，各自朗诵着自己最心爱的作品。他们用的语言是各异的，然而那都是心中的歌。诗的内容是各异的，然而共同的是对生活热爱，对美好的将来的向往。

沿着河的两岸，挤满了听众。这个小城的两万居民：那些青年，那些老人和那些孩子，似乎都拥到这里来了。他们安静地倾听着。这个国际诗歌节也是他们的节日。他们在这个小城里倾听着世界各地的歌声。

诗会每一年都有一个讨论的中心题目。前两次是：“诗能做什么？”，“诗人先锋队”。今年的题目是：“梦幻与现实之间”。

这是自古以来为许许多多理论家和诗人探讨过的题目，牵涉到诗的作用与意义，也牵涉到诗歌艺术的奥秘。

我听了来自各个国家的诗人的发言。他们从不同角度热情地阐述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我发言的题目是：《诗人的两翼》。

我说：一个从来也没有梦想过、并承担过梦想的痛苦和欢乐的人，不是诗人，也不可能成为诗人。

诗人应该有两翼：一翼紧紧依傍着大地，另一翼伸向高远的青空。诗人凭着这两翼在生活的国土也在艺术的国土飞翔。

梦幻不应该是逃避现实的麻醉剂，不应该是缥缈的乌托邦，它应该通向理想，上升到理想。

在诗会上，结识了许多友人：东道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和来自世界其他各国的。诗会提供了各国诗人结交的机会。在鸡尾酒会上，在大交通车上，在休息厅里，在奥赫里德湖边……相互微笑，就随便地交谈起来了。有时候，有人特地走了过来，问：“你们是来自中国的吗？”于是紧紧地握手。他们有的是到中国访问过的，诉说着中国留给他们的深刻印象。有的没有到过中国，诉说着他们的向往。我发觉，无论是东道主还是来自其他各国的诗人，对我们的态度都是异常热情的，原因只是在于我们是来自中国。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表达了我们的友谊，了解了他们国家诗歌创作的情况和别的情况。诗人们大都是热情、坦率的，谈话很少那种不必要的客套。仅仅相处几天，仅仅几次谈话，我们已成为朋友了。我们相信，友谊的种子是会开出花朵的。一个星期的诗会结束了。

人们各自散去，回到黄河边，回到尼罗河边，回到恒河边，回到密西西比河边，回到莱茵河、多瑙河边……而当然，这些世界上的河都是要汇合到大的海洋中去的。

桥上诗会

不是在沙龙里，不是在大厅里，不是在剧场里，甚至，也不是在广场中，这座歌台是搭在德里姆河桥上——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最大的一项活动“桥上诗会”，就将在这里举行。

斯特鲁卡是座安详的、美丽的小城，面临奥赫里德湖，德里姆河从城中穿过。它是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有名的风景区。对于这座小城的居民们，这个诗会也是他们的节日。几天来，小城的街上就显得热闹、活跃极了。在青石板铺成的两岸沿河大道上，可以看见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诗人们，三三两两的在初秋的阳光下漫步。他们从黄河来，从恒河来，从刚果河来，从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来，从莱茵河来，从多瑙河来……现在他们在德里姆河边走着，兴高采烈地交谈，选择各个风景点照相。在行道树旁，高高飘扬着几十面诗歌节参加国的国旗。

在举行诗会的那天黄昏，在沿河大道上就渐渐聚满了这座城的居民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些妇女还抱着孩子。他们坐在青石的河岸上，坐在河坡的绿草上，后来的就站在岸边，一直顺着河的两岸排过去，排过去……，邻近河岸的那些楼房的窗口，也都挤满了人。

这座小城的居民们似乎全都参加到这个诗会来了。是的，这也正是他们的节日，一个诗的节日。

夜色缓缓降落。我有意走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眺望桥上的歌台。在闪烁着繁星的深蓝色的夜幕前，它在聚光灯的照明下显得分外耀眼。河两岸的树丛中闪耀着一颗一颗小小的彩灯。河水潺潺。一切像是在幻梦中。

诗会开始前，放起了焰火。各种色彩的火花伴着一阵阵的欢呼声在夜空开放，组成各种各样流动图案。

朗诵开始了。坐在台上的来自世界各国的诗人们，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诗人们，一个一个在掌声中走到台前。古代一位罗马的演说家面对咆哮的大海练习演说。而这些诗人们面对奔流的河水朗读自己的诗。通过扩音器，他们的声音在夜空中震荡着，播送到很远，很远。

我想，奔流的河水将把他们的声音带到更远，更远，带到全世界的河流汇集的海洋中去。

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从他们饱含激情的声调中，从他们燃烧着的面容上，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心在跳动。而且，我自以为理解了他们各自的诗的内容：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大地的歌颂；对于自由和独立的渴望；对于美好的将来的追求……我听到了喊中国和我的名字。一阵掌声将我推到台前。由于我的名字是和我的祖国联在一起，一种庄严的感情从我心中升腾起来，一股暖流散向我的全身。在掌声停止后，在深沉的寂静中，面对河水，

面对黑魑魃的人群，我朗读着歌唱祖国的诗，用我的全部激情，用我的心。我觉得我是在朗诵给世界听，也是在朗诵给远在万里外的祖国听。……诗会结束了，聚光灯熄灭了，人们渐渐离去了。

我还在沿河大道上徘徊。多么安静的夜，德里姆河潺潺地流着。

我想着一百多年前的马其顿爱国诗人康士坦丁·米勒丁诺夫和迪米塔尔·米勒丁诺夫兄弟。在故国的受难的土地上，他们英勇地战斗着，反抗异族的统治。后来被投进监狱，受尽折磨，从容就义。——一年一度的斯特鲁卡诗会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举行的。迪米塔尔·米勒丁诺夫在铁窗下曾经这样歌唱：

多么希望长起强劲的翅膀，从这个罪恶的牢居，
飞向祖国南方，
让斯特鲁卡搂着我，
让奥赫里德湖把我的歌声震荡。

灿烂的太阳
可还抚问着我的家乡？

今天，照耀着斯特鲁卡，照耀着马其顿共和国的正是他们所向往的灿烂的太阳。而且，这一对既是诗人又是战士——或者说，正因为他们是诗人，所以他们也是战士——的兄弟，也正以他们的精神的光芒照耀着斯特鲁卡和他们的祖国。在今天的诗会上，就朗读了他们的诗。他们的歌声将永远在奥赫里德湖上震荡……。我想，诗人们应该是可以从这中间得到启示，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职责、自己的道路的。

我又想着这个诗会在桥上举行是一个多么好的象征。诗，正是友谊的桥，是人与人的桥，是心与心的桥。要将更多更多的人吸引到诗的身边来，要将更多更多的诗溶化到人的心中去。我要写一首美丽的诗来歌颂“桥上诗会”，而我又想到“桥上诗会”本身就是一首美丽的诗。

奥赫里德城当然是因奥赫里德湖而得名的，这座小城就在那 片大湖的旁边。这两个奥赫

里德都是美丽的。

我们在进入城中心之前，先来到城边的一座不太高的山上，参观一个十五世纪的古堡。

主楼有十多丈高，环绕着它的是厚厚的城墙，都是用石块垒建起来的。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使它残破了，但还是显得威武而庄严。穿越过古堡的拱门，是一个广场，荒草丛中有一些断垣残垒。没有别的游人。我们的到来使几棵参天老树上的一群乌鸦惊飞起来，在天空盘旋，鼓噪。

从山上的一面望下去，是奥赫里德湖。好一片辽阔的蓝粼粼的水在夕阳下闪动，一直延向地平线。有几座远山隐隐约约地在云雾中。湖上飞着一群水鸟。远处还有几支帆船，似乎静止不动地浮在那里。从眺望的第一眼，我的心就得到了澄清，进入到一幅淡远的图画中，沉浸在一种静穆的境界中……而从山的另一面望下去，就是奥赫里德城了。丛丛绿树中，一排排造

型不同的红瓦白墙的楼房，还有一座古老的教堂。站在古堡前的荒草边向下俯瞰，那里显得多么温暖、安详。

我们来到了小城中，一条主要的小街不过两丈多宽。像我们国家的那些古老的县城、小镇一样，街面是用青石板铺成的。没有车辆行驶。虽然正是黄昏，行人也并不拥挤，他们从容地走着。街两旁的楼房都不过是两三层，下面是商店，在出售一些现代化的商品外，还有好多是经营手饰、工艺品和当地的风景照的。街旁有几个带着小炉子的卖烤包谷的小贩。我很有兴趣地发现，还有一个转糖的小摊，和我小时候在家乡经常去照顾的转糖的小摊差不多。

到这里来过的中国人很少吧，我们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好奇。但他们唯恐我们发现他们是在打量我们，只是悄悄地一瞥。有的人向我们微笑点头。

走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小街的尽头了。我在一棵古老的大树下的石沿上坐下。那里先坐着一位戴着小花帽的黝黑的中年人，在抽着烟。他笑着用简单的英语问我是中国人吗？得到我的答复后，他扔掉了烟，拉起我的手，俯下身来热情地吻着，我还不大习惯于这样的礼节，而且是这样突然，有些张惶。旁边站着的人都笑了。那个人从口袋里摸出了几张钞票，一手抚胸，说着不清楚的英语，意思是要请我们去喝冷饮。我们当然笑着谢绝了。我给了他一张名片，他珍藏了起来。当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又热情地吻我的手。走开后，同行的丽里娅娜告诉我，他是吉卜赛人。啊，阿乐哥和卡尔曼的后代，我立即想到许多富于浪漫情调的故事。我回头再看看，他还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

小街的另一头是一个广场，中心是一个大的花圃，开满了形形色色的花。广场过去，就是奥赫里德湖了。湖边有几个钓鱼的少年，湖上有几艘游艇。

我站在湖边的矮矮的石墙边，回过身来望着那个在晚照中的小城。这时，响起了晚祷的悠远的钟声，它也在我心中轻轻回荡……

使我心醉的不仅仅是这里的美丽，而且还有那样一种和平、宁静、安详的气氛。我欣赏它，如同欣赏一首古朴的牧歌。我离开了奥赫里德，那座小小的、美丽的、安详的城，在那里留下了我的一个缥缈的梦……

莉里娅娜

“我是中国人！”一位南斯拉夫诗人带着她来了，她笑着对我们说。

当时，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正在德里姆河边的诗歌宫前一个不太大的广场上举行开幕式。高台上的火炬已经点燃了，火焰在蓝色的夜空中飞腾着。大会的主持人在致词。他说的是马其顿语，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我们站在人群中，周围是来自各国的诗人们，还有很多斯特鲁卡的居民。我们是昨天才飞离北京，在斯可普里过了一夜，今天下午赶到这里的。我有着初次到异国的那种兴奋和激动。但由于语言的隔阂（我们只带了一位英语翻译），也感

到了一点落寞，一点茫然。而这时候，她来了。她笑着说：“我是中国人！”是道地的北京话。她有着黑色的头发，披在娇小的身上的是一件蓝底白花的中式缎袄（后来她还特地让我们看她穿着的中国布鞋，有一只上面已破了一个小洞）。但是，在朦胧的夜色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外国姑娘的脸。大概是看到了我们困惑的神情，她又笑了。她说她是南斯拉夫人，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了两年，还没有毕业，是放暑假回国的。她的家在马其顿共和国的首府斯科普里，听说有中国代表团参加诗会，特地赶来看看我们的。“我叫莉里娅娜。”

我感到分外的喜悦和亲切，忽然想到了那句旧诗：“他乡通故知”。虽然这完全不贴切，她并不是我们的“故知”。但是，我们是在远离祖国两万里外遇到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外国姑娘，而且，她又是这样的热情。

我和我的三个同伴和她交谈了起来。她也显得喜悦、兴奋，完全没有初次相识（而且，我们究竟是不同国籍的人）的那种客套和矜持，立刻就成了我们的朋友。开幕式结束以后，我们一道走进诗歌宫参加诗会的第一次文学晚会。她很自然地成为了我们中间的一员，除了她回家的四天以外，陪伴着我们参加了一切活动，担当我们的翻译和联络员，一直到最后，和我们同机回国。因为，暑假已经结束，北京语言学院秋季开学了。

几天以后，她告诉我们，她原准备只看看我们，玩一两天就回家的。但是，“一和你们说话，我就喜欢你们了，真的，我太喜欢你们了，所以我不走了。”

她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就是我们中间最小的小王，也比她大六岁。而我、流沙河、汪承栋，都是她父辈的人。我们对她很热情，很诚恳，这当是她喜欢我们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出之于她对中国的感情吧。她不是诗会的工作人员，在开诗会的那几天中，她不能在我们的饭店里住宿，而是借住在朋友家，深夜去，早晨来；也不能和我们一道吃饭，而是到外面的小餐馆去随便吃一点什么。有时无暇出去，就饿一顿。她的更大的牺牲，是她不能回家陪伴父母。在中国学习，她只能在暑假中回家一次。她是独生女，父母苦苦地盼望了一年，当然是希望她留在身边的，而她自己又何尝不依恋父母呢！但是，她却将一段宝贵的假日花在我们身上了，只是每天晚上和家里通一次长途电话。她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陪伴我们、为我们工作，看作是她的义务。当我们有几次向她表示感激时，她说：“何必说这些，我也是中国人啦！”

像她喜欢我们那样，我们也很喜欢她，不，应该是更喜欢她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需要她，通过她的翻译，解决了我们许多交往上的困难，也由于她的性格：热情，坦率，朝气蓬勃，是一个有头脑、有抱负的姑娘。我们平常大都是随随便便地交谈，有时彼此开开玩笑。

但也有过两次严肃的谈话，谈到南斯拉夫在风暴和斗争中渡过的岁月和它的现实，谈到南斯拉夫青年们的思想和生活，谈到她对中国的观感……大都是我们提出问题，她回答。她的回答是坦率、诚恳的，而且是那样的激动，强烈地流露出感情。她还年轻，一直还没有走出学校的大门。然而，她的知识相当丰富，她的理解力敏锐，有时是深刻的，使我不能不带着惊异的眼光看她。她似乎已经成熟，就她的年龄说，是过于成熟了。她告诉我，她不喜欢那些只讲究化妆、衣着，只关心一己的幸福的姑娘们。但我为她过早地跨越过少女的单纯、美丽、带着梦幻色彩的心境而感到……怎么说呢，感

到有点惋惜吧。她说，她理解我的意思，然而，她愿意如此。她谈到理想，谈到她自己的前途，她要为她的祖国、为这个世界、为人类的幸福，奉献自己的力量——一只小鹰望着辽阔的天空在拍击着翅膀，她会飞得很高的，她会飞的。

她是有语言天才的。她是马其顿人，也会说塞尔维亚语（那和马其顿语很有差异）。在中学里学会了英语，能流利地会话。她在中国留学两年，* 崆肆街钟锯浴V泄 八*得很不错，包括一些土话。她说她不欢喜抽中国烟：“太冲了。”她形容一个人的风度：“他很帅。”当我们称赞她美丽的时候，她说：“不要阿谀奉承我。”有一次，她笑着问小王：“你也得了‘气管炎’（妻管严）吧。”她在中国的同学中，有一个是墨西哥人，他们经常在一起，她从他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

大会原指定了一位会说英语的南斯拉夫的女同志照料我们的，她出现后，就代替了那位女同志，经常陪伴着我们。但那些来自南美洲的诗人们，来自西班牙的诗人们，以及来自其他各国的诗人们，也常常要请她帮忙翻译或为别的事麻烦她。当她走动时，常常被某个代表拦住。有时她正在与人谈话，有人就在旁边守候着。而她看到某个代表需要翻译上的帮助，也会主动地跑了过去。她几乎成为大会中最忙碌的工作人员之一了。她不得不经常对我们说：“对不起，请等一会儿。”就匆匆忙忙走了。有几天，她伤风感冒，头痛，但她还是忙着，唱着，笑着……

她喜欢唱中国的民歌，口中常常哼着“半个月亮爬上来……”、“跑马溜溜的山上……”。她还会唱两句京戏：“苏三离了洪洞县……”，居然还有那么一点韵味，使我们大笑着拍手叫好。不过，她就会那两句。她也喜欢跳舞。有一天，我们住宿在德多夫城附近的一座高山上的饭店中。山上居民很少。由于这是欧洲著名的滑雪胜地之一，那饭店的规模不小，设备现代化，建筑格式却又带一点乡村风味。晚上刮起了大风，落着雨。从窗口望出去，夜色茫茫，这就更显得室内的温暖。餐厅里坐满了客人，喝着啤酒和冷饮。一个男歌手在五个人的乐队的伴奏下放声唱着马其顿民歌，歌声高亢，欢乐而又略带苍凉。有几位南斯拉夫客人跳起了民间舞，后来更多的人（包括外国客人）都参与了进去。莉里娅娜正患感冒，她站起来走了。我以为她回房休息。不一会，她穿了一套漂亮的连衣裙，笑嘻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好看吗？”一转身，她也卷入到舞蹈的行列中去了。她跳着，笑着，唱着，于是，我看到了一个快乐的小姑娘莉里娅娜。后来，我也被她拉进了舞蹈的人群中，我觉得，我也年轻了。但是，我常常没有能够合上节拍，不得不退了出来……

在离开南斯拉夫的前两天，她说：“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你们的。”她说：“这次认识你们，会影响我一生。”她要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她认为我们可以给她具体的帮助。她说：“如果回到中国以后，你们不理我，我，我……在就要天天骂死你们。”

而我们当然也会记得她的。在南斯拉夫的两个星期是难忘的，而她的出现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回国的前夜，在为我们举办的一个文学晚会上，我向热情的主人们告别，最后我说：“没有莉里娅娜，在许多场合，我们就将是聋子和哑吧。”事实上的确如此。而且，她也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带来了温暖和增加了色彩。——是的，我们会永远记住她的。只要她需要，我们也会帮助她的，一如她帮助我们那样。

她和我们同机回国了。南斯拉夫作家协会委托她和一些中国作家联系。她将作为中国作家和南斯拉夫作家之间的一座桥。

她也将是南斯拉夫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一座桥吧。“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当她与我们分手半天或一天后再见时，她就笑着这样说。这句话，她是从我们这里学去的。而现在，我已整整一个月没有见到她了。

1983年10月12日

波 芭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机场下飞机后，我对来迎接的一位南斯拉夫的女同志说：“你是波芭吧？”她微笑着点点头，同时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那意思是：“你怎么知道的？”

在这次出国前，近几年访问过南斯拉夫的几位友人向我介绍情况时，都用赞扬的语气谈到了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波芭，说她对中国客人是非常热情的。

现在她就站在我们面前，美丽而端庄。后来我才知道，她已是两个女孩的母亲，大女孩已有十五岁了，而她依然显得那么年轻。她的明亮的蓝色的眼睛含着笑意。

在走出机场的路上，她向我们问到了邹荻帆、邵燕祥、骆文这些她接待过的中国诗人的近况。她的询问并不是礼节性的，而是出于一种真实的关切。

她送我们到塞尔维亚饭店，陪我们喝了一点冷饮，安排了我们活动的日程。为了要赶上第二天就要举行的斯特鲁卡诗歌节的开幕式，我们当晚就要赶到斯科比，她又送我们到机场。和她只相处了两三个小时，她已留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虽然接待过许许多多外国客人，却一点没有矫揉的热情，她是诚恳、亲切的。而且我感到，在她的西方的外表下面，有着一种东方人的气质：文静、含蓄。

几天后，我们再返贝尔格莱德时，又是她到机场来接我们。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为我们举行的两次座谈会和一次宴会，她都参加了。她微笑地坐在那里，不大发言，有时用英语为我们翻译。只是在她陪我们参观贝尔格莱德市容的那一天，我们才得到了从容谈天的机会。

那是一个阴天。她带着十岁的小女儿伊琳娜到我们住的饭店来了。一见面，那女孩用中国话对我们说“您们好！”当我们送了她一点从北京带去的小礼物时，她又用中国话说：“谢谢！”我们都高兴地笑了。波芭要我们注意，那女孩有一双中国式的黑色眼睛。她告诉我们，那女孩喜欢中国人，正在学说中国话，所以带她来看看我们。

波芭没有开车来，我们是步行出去的。中途落起了雨。她犹豫了一下后提出，她父亲的家就在附近，问我们愿不愿意去稍坐。在与她父亲的交谈中，我们得知他是老游击队员，曾经担任过南斯拉夫共和国的教育、文化部长。那么，用我们的话来说，波芭也是“高干”子女了。雨住后，她领我们

参观了贝尔格莱德最大的公园、古堡和一座古老的教堂。这些地方，她当然不知来过多少次，不知为外国客人作过多少次介绍的。但她还是耐心地、细致地解答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而且经常主动地为我们讲解。同时，我们也像朋友式地交谈。

小伊琳娜还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什么果子送给我。波芭说，南斯拉夫人认为，将这样的果子放在枕头下面，睡觉就可以香甜。小伊琳娜有两颗这样的果子，一颗送给祖母了，她希望这另一颗也能为我带来香甜的梦。我要波芭转告小伊琳娜，我相信那果子的神妙的作用，而我在香甜的梦中会梦见她的。当波芭俯下身子翻译我的话时，我看到小伊琳娜那双中国式的黑色的眼睛亮了起来，她转过身来牵着我的手笑着说什么。波芭转告我，她说她也会在梦中梦见你的。

走得很累，也有些饿了。波芭引我们到一家饭店去吃午饭。那饭店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是一座有乡村风味的古老平房。店堂不大，只放了六、七张餐桌。店子的招牌上只有一个大的“？”号。我问波芭，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店名。她说，这家饭店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是作家们经常喜欢光顾的地方。店名用了一个“？”号，恐怕是想表明作家对于人生的探索精神吧。不过，当初为饭店命名的主人也许另有他的深意。对于我们，这也只能是一个大的“？”号，说着我们都笑起来了。

我们边吃边谈，接触到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她的话不多，但说得很中肯。她也不满意一些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的轻率态度，她说应该有真挚的感情，应该有“人情味”。她说，人的美，主要是在内心，而不是衣著；当然，衣著也不应该太随便。我注意到，她的衣服是很普通的料子，但整洁，大方。她谈了一些过去的经历，说她在大学是学美术的，现在从事外事工作，是学非所用。我说，这也是用她的另一面的所长吧。她能流利地说英语、法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我问她：“想不想学中文？”她说：“当然想。但中文很难，要学好，必须集中好几年的时间。而现在很忙，不可能。”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只有她一个人，来访的外国客人很多，接待工作是够繁重的。而且她还在自修，准备攻考“美术史”的硕士。她不仅因为知道中国是古老的、美丽的国家，是在斗争的风暴中成长起来的走着自己的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因为那里有着敦煌、龙门石窟、兵马俑……这许许多多的文化遗迹，都是与她的专业有关的。我说，中国作家协会已经向她发出邀请。她说，是的，现在正在积蓄路费，那要好大一笔钱呢。我冒昧地问，不能要她的父亲给予帮助么？她微笑着说：“父亲是可以也愿意帮助我的，但我觉得主要应该靠自己。我现在尽可能节省地生活。”

我们是在一个深夜离开贝尔格莱德的。她来送行。仅仅几天的相处，我们已经是真正的朋友了。她忙碌地为我们张罗着一些出境的事务，后来安静地在我们身边坐着，明亮的蓝色眼睛中含着笑意。是不是也感到有一些黯然呢，临上飞机前，她握着我的手轻声地说：“我好多多次在这里送别中国的朋友，你们每一个人走，都带走我的心的一部分。”

我说：“那么你的心差不多已整个在中国了。我们等着你的人来。”

是的，我们——到南斯拉夫去访问过的中国作家们，都等着你来，波芭。我们将像你接待我们那样来热情地接待你，我们将像你引导我们参观你们的河山那样，引导你来参观我们的大地，你所向往的大地……

一个老游击队员

那一次的拜访完全是意外的。

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波芭陪着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游览。飘起了雨，而且愈落愈大了。我们没有乘车出来，不得不在商店的走廊下暂避。看来，雨一时还不会停。波芭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们，愿不愿意到她父亲家去坐坐，那就在附近。她又加了一句：“他是老游击队员。”

老游击队员？那太好了。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我们就听到过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许多传奇般的故事。我们也知道，现在还健在的老战士已经不多了，他们是很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尊敬的。我们当然很高兴有机会和一位老游击队员谈一谈。冒着雨走过一条街，走上了一座公寓大楼的第三层。为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头发已经花白、胖胖的老妇人。她开始是惊讶地看着我们。当波芭向她说了几句后，她张开了双臂，笑容满面地请我们进房。

我们在客厅里围着长桌坐下。当那位老妇人——波芭的母亲进厨房去为我们张罗着什么的时候，我打量着并不太大的房间。壁上挂着几幅油画。家具并不很多，都是乌木色的，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的玻璃橱柜，里面放满了式样不一、风格各异的工艺品，显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整个房间显得典雅、庄重，使我能想象主人的性格。

波芭的父亲从另一间房中出来了。身材高大、挺直，穿着米黄色的毛线衣，也是花白的头发，红光满面，两眼有神。他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说着欢迎的话。

谈话从一般的相互问候开始，渐渐就转入生动、热烈了。波芭的父亲说塞尔维亚语，由波芭翻译成英语，再由我们的翻译小王同志翻译成汉语。双重翻译并没有妨碍我们感情的交流。有时候，塞尔维亚语、英语、汉语同时在进行，反而显得更热闹一些。初次见面，而且我们是来自遥远的另一个国家，这也并没有影响我们以诚相见。主人倒正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特别热情。在谈话中，我们时而大笑，时而叹息，时而沉思……，完全忘记了我们不过是闯进来躲雨的，没有注意到窗外哗哗的雨声……

那个老游击队员向我们谈到他是在农村度过贫困的童年的。当法西斯的铁蹄踏入国土后，他就参加了铁托领导的游击队，从一个普通的战士逐步成长为一名指挥员，经历过许许多多艰苦的战斗。他说，当年一些战斗的场面，一些牺牲了的同志的面影，还常常浮现在眼前。

波芭的母亲几次为我们送来了咖啡和冷饮。她还再三向我们道歉，说不知道我们要来，没有能好好招待远道的客人。波芭的父亲对我们说，她当年也是游击队员，他们就是在游击队中相识、相爱、结婚的。他们并肩作战，而当他们有了孩子以后，她还要从事繁忙的家务。他们共同生活四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过争吵。他显然深爱他的妻子，并以有这样一个终生伴侣而自豪。我以尊敬眼光看着这位笑嘻嘻地站在我们面前的和蔼、慈祥的老妇人，我没

有想到，她当年也是活跃于山林、在炮火中出生入死的战士。

而我也没有想到，波芭的父亲是南斯拉夫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任教育、文化部长。波芭事先没有向我们谈起，他也只是谈话中不经意地顺便谈到的。他说，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用四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过去要两、三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值得自豪的。但是，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他特别着重地谈到国家如何为消除官僚主义危害所作的努力。他说，当年自己担任教育、文化部长时还年轻，只有二十五岁。手中有了权力，生活条件优越了，经常可以听到一些阿谀奉承的话，这样就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逐渐地，他对这一点有了深切的体会。他说，像金钱一样，权力也是可以腐蚀人的。作为一个领导人，必需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要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说，目前南斯拉夫正在采取各种方法克服和改善某些不合理、不健康的现象。在这当中，文学艺术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说，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伟大的也是艰难的任务，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奉献自己的力量。现在，他六十七岁，已退休好几年了。但并没有闲着。他经常到工厂、农村、学校去为青年们作报告。他还积极从事写作，已出版了十二本书。说着，他走进另一间房里去，取了一本他的著作送给我，书名是《这一代的信息》。叙述的是老游击队员们当年的战斗生活，他们的信念和理想。他希望将他们一代的信息传达到年轻一代中去。

这位老战士的某些话，是发人深省的。而他在简短的谈话中，几乎回*肆恣 囊簧 *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游击战士，一个政府的高级领导人，而现在，他又是一位作家。他永远在他的岗位上。他是和他的祖国一道受难，一道斗争，一道成长的。他已老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祖国还年轻；他已老了，但是，他还在勤恳地工作，为社会主义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而且，他还用期望的目光望向年轻的一代，通过他们遥望祖国的将来。

坐在这间庄重、典雅的房间里，面对着这位在精神上还显得年轻的老战士，听着他的恳切的谈话，我想得很多。我又一次认识到，在生活中，斗争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有着不同的方式。而人的自我要求是永远也不应该停止的，应该达到每一个时期所能达到的高度。我看看同在座的流沙河、汪承栋、王宏杰，他们也都在沉思。波芭是为我们担当翻译的，她讲话也有一点激动。而坐在一旁的波芭的母亲，不断地点着头，有一次，我看到她悄悄地揩了揩眼角。这位老战士显然也回想起了那些火热的斗争的岁月……波芭的父亲似乎感到气氛太严肃了，他转换了话题，邀请我们去参观了他的书房，那也并不大，四壁都是书柜。他又和我们一道照了几次相。我和他们夫妇合照了一张相。他笑着说：“不行，我吃亏了。明年，要把你的夫人也请到我们国家来，我也要和你合照一张相。”他还说了几句打趣的话，我们都大笑了。

看看表，我才发觉已经坐了两个多小时，而窗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住了。

印度诗人“阿盖”

神来了在这呼啸的风中。谢谢你，神，感谢你的来访不拘礼节：非常欢迎你。有朝一日，我也将来访，同样不期而至：甚至是默默无声地来临。

这首诗的题目是：《上帝，谢谢你》。作者是当代印度诗人萨琪达南德·希拉南德·瓦茨雅彦“阿盖”(SachchidanandHirananandWatsyayan‘Agney’)，他是这一届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金环奖”的获得者，是诗歌节的各种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穿着印度式的灰色的长袍，身材高大，挺直，银白的头发已经稀疏了，沿着下颚，有着半环白须。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在银边的眼镜后面，是一双智慧和慈祥的眼睛。看到他，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泰戈尔。

颁发“金环奖”的仪式在奥赫里德城的圣·索菲教堂里举行。教堂并不大，古色斑斓，保持着几百年以前的那种风格。在这座古老的教堂里举行授奖仪式，是有着一种特别庄严的气氛，而且，与那位得奖的老诗人的风貌和气质是和谐的。诗人作了诚挚的激情的发言，并朗读了自己的诗。另外，由演员朗读了他的诗和演唱了为他的诗所谱写的歌曲。

在诗会开幕第一天的鸡尾酒会上，我就和他进行了交谈。我问道他的年龄。“您看呢？”他带着幽默的微笑反问我，接着说：“我已经过了七十了。”但他的精力是旺盛的，诗会的各种活动他都出席了，而且必须接待许多来访的人。他的态度总是那样诚恳、彬彬有礼的。我说不清他的身上是什么吸引了我：是他的东方人的气质？是诗人的风度？是哲人的深沉？我很想和他谈谈，但又感到不便打扰他。后来有了这样一次机会：在贝尔格莱德，诗人彼得洛夫请我们到他家去作客。我们去了以后，看到阿盖也是被邀请的客人。另外，还有几个南斯拉夫的诗人、编辑、出版家。我们都挤坐在别有风味的阁楼上，那是彼得洛夫的书房也是接待室，大家谈笑风生，我和阿盖虽然是促膝而坐，也很难进行个别的交谈。他只是告诉我，明天就要到英国去，几周以后，还要到西德，一时不可能返回印度。他说，他到过许多国家，却没有到过中国，而那是他久已向往的。

根据文字介绍，我知道他已出版了十本诗选和关于诗的书。他还是小说、散文作者，也是出版家、编辑和翻译家。半个世纪以来，阿盖已成为印地诗歌最重要、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但是，在我国似乎还没有介绍过，至少，我没有看到。

“阿盖”的原文含意是“不可理解的人”、“不可捉摸的人”，那是带着一点神秘性的。有一篇评论文字，说他是“一个不安的灵魂，一个火热的开拓者，一个坚定的创新者，一位不断接触新的事物的作家，他一只耳朵倾听着来自未知王国的呼声，另一只耳朵倾听着他自己的话语——或者更准确地说——倾听着他自己的无语的沉默”。我手头有他的一本诗选集，其中绝大部分是印地语，只有十四首诗是用英语写的。从这十四篇中，大致可以看出他的风格。他的诗带着一点“纯诗”的倾向。带着一种哲学式的沉思，带着一点朦朦胧胧的美。然而，仔细地读一下，就可以看出，诗人并不是那样宁静的，在表面的淡泊下，跳动着一颗挚爱生活的心。在前面，我们引了他的一首诗，表达了他的超然的生死观，和与大自然溶合为一的胸襟，下面，我们再引一首诗，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态度：

宣言

爱这朵花吧，
但它要枯萎时就让它枯萎；对你生活中的一切，
用你整个生命来品尝，但要死去的，就让它死去。
年龄是游泳者的手臂；任何要活下去的人
游过去。

鲜花盛开时充满的只是喜悦，而不是欲望；我，一个走向湮灭的人愿把这一点宣讲。

杜伊斯堡印象

我是在早晨八点半钟到达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城的。这里在冬季经常是灰蒙蒙的天气。但这个早晨却有着淡淡的阳光。从香港起飞，在曼谷转机，前后经过了16个小时的飞行。在300多旅客中，只有我是唯一的中国人。我有些劳累，也有着一个人在旅途上的那种紧张和陌生感。所以，当我提着行李走出机场，看到来迎接我的联邦德国友人克拉特先生时，我感到了轻松和欢欣。他也满面笑容。我们欢呼着拥抱了。

他自己驾车接我到他家去。他住在杜伊斯堡市。那是武汉市的友好城市。

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不过20分钟，克拉特先生告诉我，已经进入杜伊斯堡了。我一面和他简短地交谈，一面望向车外。马路并不十分宽阔，在两旁高大的行道树后面，闪过了一座又一座两层楼、三层楼的小洋房，式样和色彩都是不相同的。大街上奔驰着车辆，却几乎看不到行人。电车和公共汽车上，乘客也稀稀落落。我知道杜伊斯堡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我看到的是一个宁静安详的城，甚至近乎田园风光。

当我到达克拉特先生的家时，就更加深了我的这一感觉。克拉特先生的家在六湖公园旁边。他新建的宽大的玻璃温室里布满了鲜花和盆景。一张小圆桌的桌面当中挖了一个洞，插着一把直径一米半长的中国式的黄纸伞。我们就坐在纸伞下的圆桌旁进早餐。天已大亮了，还点着两支红烛。在烛光的摇曳中，我望向室外那一片静谧的深蓝色的湖水，和在湖上安详地游着的几只白天鹅，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和旅途的劳顿。

后来，我也参观了杜伊斯堡的工业区：一个又一个高矗入云的烟囱，一排又一排巨大的厂房。这里是欧洲钢铁产量最大的地区。我也参观了码头，鲁尔河和莱茵河在这里汇合，如同武汉的长江和汉水；一条又一条人工河道，一艘又一艘巨大的船舶。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口——它们显示了这个城市雄伟的一面。

但我总还是不能摆脱我最初的印象：这是一座安详美丽的城。很少高

层的建筑，没有我惯见的城市的喧闹，大街上的行人远不及汽车多。式样和彩色各异的住房的大玻璃窗的窗口，都布置着鲜花。后来，我发觉，我所到过的每一个人家中，都是装饰着鲜花的。鲜花商店即使在较僻静的街道都可以看到。

当然，这里也有热闹的市中心区，那在火车站附近，集中着各种规模宏大的商店。我是在圣诞前几天到达的，那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人行道的两旁布满了临时搭起来的小售货亭，出售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玩具，色彩斑斓。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吃，飘荡着诱人的香味。

拥挤的人流。一片嗡嗡声中夹杂着儿童的笑叫声。在人群中，还有一个化好妆的圣诞老人。

当他知道我是来自友好城市武汉时，高兴得叫了一声，紧紧地抱住了我。

在克林斯市长接见我时，在答谢致词中，我说：“我看见了在圣诞树的华灯照耀下的杜伊斯堡，我看见了在圣诞树下欢笑的杜伊斯堡人民。”我说的是真实的感受。而从克林斯市长，从那个圣诞老人，也从新结识的朋友们（我曾到十几家做客，其中有工程师、教员、大学校长，也有火车司机、女清洁工）对我的热情接待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人民、对友好城市武汉的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诚挚的情谊。

我离开杜伊斯堡的那一天，是一个难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乘坐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急驰。我想，大概很难有机会再来了，但这个安详美丽的城市和主人间的情谊，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1989年2月16日晨

克拉特博士

一般地说，人进入老年后，是不大容易和新结识的人产生深厚的友谊的，何况是异邦人。但我对克拉特博士却有着一种亲切的感情。

是他邀请我到联邦德国观光的。1988年4月，他到中国访问时，我才认识他。在这以前，我从我的在杜伊斯堡大学进修的儿子的口中，也从几个到过杜伊斯堡的中国专家和留学生口中，听到过一些他的情况，他们都很喜欢他。我和他虽是初见，而且需要通过翻译（我们有时也用英语对话。他的英语不错，而我的口语很差），却交谈得很愉快。不久就消失了那种生疏和矜持感。他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人。有一次，在餐桌上举杯祝酒时，他说：“我要邀请你到我们国家访问，并到我家作客。”我说：“谢谢。”我只当那是一句客气话，但他回国后不久，就寄来了正式邀请信。他是认真的，并信守他的诺言。我于1988年12月中旬到达杜伊斯堡——他住在这座城市。这里靠近北方，冬季寒冷，气温经常在零度以下（但这一年比较温暖，没有下过雪）。天空总是灰蒙蒙的，难得有几个晴朗的日子，有阳光也往往是淡淡的，这不是适宜于旅游的季节。他邀请我这个时间来，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可以在这里和他们共度圣诞节——这是他们隆重和欢乐的节日，共度元旦；而且，他希望我参加他和他夫人的生日，那分别在这一段时期内。

我清晨八点半钟在杜塞尔多夫城下的飞机。他到机场接我，自己驾车送我去杜伊斯堡。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在一条幽静的小街上的一座漂亮的两层楼房前，他停下了车，微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家。希望你喜欢它。”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

经过了一间小小的茶色玻璃和钢筋筑成的外间，才是大门。一位妇人打开门，满面笑容地迎接我。我立即猜到，这是克拉特夫人。我原听说她身体不好，有心脏病。但从外表看来，她很健壮，脸色红润，精神也很好。这是冬天，因为室内有暖气，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短袖的毛衣。我一走进室内，一种愉悦的心情就产生了。我来不及细看，只是感到宽敞、幽雅，触眼所见，是油画、中国画、挂毯、鲜花、盆树、各种小摆设、各式的灯具，还有长列的高高的书架……当我表示赞赏时，克拉特有些得意地微笑了。他又引我走进与书房、餐厅毗连着的玻璃温室，那里有更多的鲜花和盆景。而更引我注意的是一把高大的中国式的黄油纸伞，那是插在一个小圆桌的中心的。他让我在纸伞下、小桌边坐下。虽然天已大亮了，克拉特夫人为我送咖啡来时，点燃了桌上的两支红蜡烛。透过玻璃，我朝室外望去，一片在严寒中也还是保持着绿色的草坪，过去就是深蓝色的湖，湖上几支白色的天鹅，湖边几株只有秃秃的枝丫的高大的柳树……这种宁静、美丽的境界，在城市中是很难享有的。

克拉特告诉我，这间玻璃温室是三年前才建成的。他的住房原来是他工作的单位——一家炼铜厂的宿舍，后来他买了下来，自己设计并参与动手，加以扩建、修整，现在是有五间大房的舒适的住宅了。这是他勤劳的果实，并付出过自己的心血。所以，他对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在这里度过他幸福的晚年。

果然如他所说的，我欢喜他的家，当我将离开时，有了一种依恋的心情。那不仅是由于生活的舒适和方便——事实上，在这一方面，不久我就习以为常了；主要是由于他们夫妇对我的那种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到达的当天中午，他们就催促我在他家里为我的老伴打一个电话，告知我的平安到达，以免她担心。那是我已想到，但不好意思提出来的，因为那需要他们付出费用。我有些激动地拿起了电话筒，五分钟内就听到了老伴惊喜的声音……他们仔细地观察我的饮食习惯和嗜好，发现我欢喜吃甜食，就经常为我做了各种点心、糖果。

他们关心我的健康，问寒问暖。他们唯恐我感到拘束，常常与我亲切地谈话，克拉特还不时地与我开开玩笑。克拉特细心地为我安排了每天的日程，自己开车送我到各地去参观，有时一天行程三四百公里，陪我到许多人家作客……在我住在那里的一个月间，耗费了他们许多精力。

克拉特这样地对待我，使我感动而又有些不安。但我知道，他对所认识的在杜伊斯堡的中国留学生和专家也都非常热情。他们也常到他家做客。有的人回国后还和他保持着联系。

我看到，他和他的夫人过生日时，就收到不少从我国寄去的祝贺卡。在杜伊斯堡市长接见的会上，市长克林斯表扬了他为促进中德两国人民友谊所做出的努力，并赠送了他几件礼物，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很高兴。他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了出来。他的大门的后面，挂有一个赭色的小木牌，上面刻着童稚体的白色中文字：“克拉特博士”。

他的餐厅好像是一个小型的中国展览馆：从杭州运去的红木餐桌和八把宽大的红木椅，四壁挂着几幅中国画，壁毯，长橱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工艺品，其中有两个一米高的景泰蓝花瓶。这些都是他三次来中国访问时搜集的。他还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的幻灯片，常放给朋友们看，并加以讲解。他有一个大书橱，放满了有关中国的外文书籍，有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更多的是西方作家写的，其中有关于中国的旅游指南和游记，也有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书籍，其中还有一本德国出版的中国漫画家的漫画集。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对中国这样有兴趣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到过世界许多国家，我原先对法国入迷，每年都要去旅游一次。至于中国，在我年轻时，那在我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那么古老、神秘，离我们那样遥远，所以我很想去看看。我终于有机会去了。有一个德国作家到中国去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我在中国感到陌生》。而我在中国一点也没有感到陌生。相反地，正像我当初对法国入迷一样，我又对中国入迷了。”停顿了一会，他又加了一句说：“我想，我再也不会迷恋别的国家，因为我年龄已经太大了。”

是的，他的年龄不算小，已76岁，整整大我十岁。但他看上去并不显得比我老，如果说不是显得比我年轻的话。头发灰白，还没有怎么脱落。长型的脸上并没有很多皱纹。中等个子，身体不胖，肚子微凸。走起路来很有精神，头脑反应也很灵敏。他是博士，懂三种外语：英语、法语、俄语。当过教员，他的夫人就是他在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当过化工厂的厂长，后来长期在杜伊斯堡的炼铜厂负责“专利”工作。十年前退休。他只有一个女儿，是画家，已结婚，住在另一个城市里。平时在他那宽大的房屋里只有他和夫人相依为命。他当然有一些积蓄，还享有退休金。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汽车。已不担负任何工作，应该是很清闲的，但他总还是忙忙碌碌。每年都要外出旅游。在家则担任采购，打电话和朋友联系，参加某些社会活动。他有一个作坊，存放着各种工具，修理和制作一些小型的家庭用具。他的木工活做得不错，我看见了送给小外孙女的两尺高的木制的房屋模型，里面还摆设着各种家具。每天要抽出相当多的时间读书报。知识面很广，也喜欢文学艺术。所以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虽然已退休了，他的生活是充实的。他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很满足。他的书房中，有一幅他很欢喜的静物油画，画的是一杯酒、一块面包、一本书。他说：“有了这三者，余愿足矣！当然，还要加上爱情。”他笑着向他夫人挤了挤眼。

他热情、健谈、富有风趣，常常说一些幽默、甚至是带有童趣的话。譬如，有一次，在火车上，他仔细地研究那种可以灵活地翻倒的烟灰盒。他说：“发明这种烟灰盒的人是聪明的，否则，为了倒烟灰，就必须把整个火车倒过来了。”他的这种性格就更使他显得年轻。

但是，办起事来又是十分认真，一丝不苟的。关于我的活动日程表，他就仔细地画了几次。

当埋头坐在书桌前，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而一站起来，他就是一个谈笑风生的人了。不过，究竟年事已高，容易忘事。出门时，已发动汽车，他往往又要下车回屋取应该携带的物件。有时，他怕要带出门的东西忘了，就时常提醒自己。有一次，他将一张他夫人开的购物单不时从衣袋中取出来看看，而当他到了商店时，才发觉终于被他看丢了。

特别难忘的是要离开他家的前一夜。平时，我们大家都是在晚上九点

多钟就互道晚安各自回房看书写东西了。这一天却谈得很晚。主要是他谈他的经历。他曾有好几年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而且不知道妻子和女儿的下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和刻苦地工作，也随着德国逐渐富强，他才得以站住脚跟，为自己的家带来了温暖和安乐。他有些感慨，也有一种自豪和自慰。谈话的中途，他突然急匆匆地走出去了。好一会，在门外大声喊：“你们看吧！”我和我的夫人望向门口，他一进来，我们就忍不住大笑了。原来他换了一身当年在劳动时穿过的服装：棉帽和棉衣棉裤。他还表演了劳动的样子。后来，他又出去了，先后换了阿拉伯的服装、非洲的服装、美国西部的牛仔服装……接连换了五六次，每一次都带表演，维妙维肖，显示了演员的天才，而且显示了他内心的青春。我在大笑中又深深感动。一时忘了他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一位知名的博士了。至于那些服装，是他旅游的纪念品，有的是友人送他的。

我也问过他对中国的看法。他告诉我，他曾应武汉政协之邀作过一次报告：《一个德国人看中国》。可惜我没有听到。他对我谈过这样两点：他说，中国有一种活动扳手，可以拧各种不同型号的螺丝钉。而德国对各种不同型号的螺丝钉都有不同的专用扳手。中国人显得很灵活，但活动扳手对每一种螺丝钉都不可能拧得那么紧；德国人似乎笨拙些，但专用扳手拧得更精密。还有一次，他说：“德国多的东西，中国少。而中国多的东西，德国少。”他没有进行具体的解释，这样倒反引起了我在多方面的揣度深思。

相处短短的一个月，我们已像是老朋友了。我很高兴，在我老年时，能够结交这样一个长者，一个对中国入迷的异邦友人。1989年3月5日

梦的巴黎

1

巴黎在我是一个梦。

——一个遥远的梦。一个缥缈的梦。一个色彩斑斓的梦。

2

像许多人一样，我是从历史书籍和文学艺术作品中认识巴黎和爱上巴黎的。

从少年时起，一些有关巴黎的史实和以巴黎为场景的各类艺术创作就逐渐吸引了我。我也读过一些巴黎游记。1789年在巴黎爆发的大革命，是法国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也使世界开始了新的行程。它的光华一直照耀到现在。两百年来，在巴黎曾发生过多少壮丽的事件，多少传奇般惊心动魄或是悲欢离合的故事，涌现过多少名人。而多少文学艺术家又从中吸取了素材，激发了灵感。

从历史和艺术中，也从游记中，我感到巴黎像是一个多棱角的水晶体，每一个人从每一个侧面和每一个角度来看她都是不同的：庄严而又轻佻，辉煌而又阴暗，欢乐而又忧郁，是花都也是渊薮……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比她更神秘，更富于浪漫色彩，有着更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了。

各种事件、各种人物、各种印象逐渐聚集起来，溶合在一起，我甚至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这形成了一种神秘感，一种魅力，激发了我的好奇和向往之情。

3

关于巴黎，有过一次难忘的谈话。

那是在“浩劫”时期，我的住所当然是在“牛棚”里。有一天，我发现老诗人徐迟也被关到我所在的单位来了。不过没有和这里的“牛鬼蛇神”关在一起，而是在一个单间中。我有时在走道上碰到他，相互只能暗暗地点点头，做一个眼色而已。

有一个下午，我们却谈了一次天，而且谈了两个多小时。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我已回想不起怎么可能有了那样的机会。也许是由于斗争高潮已过，所以看管放松了一些。谈话是在一间空阔的大房进行的。旁边还坐着一位监管我们的“小将”。当然不可能敞开心来谈。但是，从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所涉及的内容已大大“越线”了。

我表示很喜欢他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那在当时是当作“毒草”的。谈到了我们未可乐观的将来，他说了一句使我敬佩的话：“我准备过任何生活。我能够过任何生活。”谈到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而谈得最多的是巴黎。那时他也没有去过巴黎，却熟悉巴黎的种种，甚至可以画出这座城市的地图。我们谈到了有关巴黎的历史和有关的文学作品，愈谈愈高兴。我有时瞟眼看看那位“小将”，他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毫无干涉的意思。

最后，我问了徐迟一句：“你喜欢的是巴尔扎克、雨果、波特莱尔的巴黎么？”

“不！”他说：“我喜欢的是建立了第一个公社的巴黎。”

我们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最痛苦难堪的处境下面，却怀着激情谈到一座遥远的城市。

十年后，徐迟终于有机会到那座城市去了，回国后，写下了一本美丽的书：《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而巴黎在我仍是一个遥远缥缈的梦。

4

没有想到，在将近又一个十年后，我也到了巴黎，虽然只停留了两三天。

我是乘到联邦德国访问之便，抽空去巴黎的。梦想将变成现实，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当旅游车穿过比利时进入法国后，我有如童年时第一次去参加夏令营那样兴奋、喜悦。呵，巴黎，终于要看到你了。旅游车上的收音机播放着轻快的音乐，司机笑着大声说：“巴黎到了！”我惊喜地望向车窗外，看两旁的高楼，五光十色的橱窗，熙攘的人群……一到旅社，放下简单的行包后，不顾坐长途车后的疲劳，我和陪伴我的大儿子小丹就拿着地图，摸索着到了凯旋门。虽然正在修复，难以看清它的真实的面目，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它的气魄和雄伟，而且浮现出当年拿破仑的大军，在响亮的号角、激越的鼓声，和两旁人群的欢呼中从这里走过的情景。当晚，我们在亮着彩灯和探照灯的游艇上漫游了塞纳河，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上议院、市政厅、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在深蓝天空的衬景下，在闪烁的灯火中缓缓飘过。

回到旅社，已是深夜了，困倦而又难以入睡。第二天又一早出去，登上了高耸入云的艾弗尔铁塔，俯瞰在我脚下的巴黎。走进了庄严、肃穆的巴黎圣母院，在钟楼上，已不见那个撞钟的善良的怪人。爬了几百级台阶，观

光了建筑在巴黎最高点上的白教堂，在层层台阶上，聚集着不少弹琴欢唱的青年男女。在教堂下面的一个广场上，则是一个卖画的集市，画家们*沟背 S 慰兔腔 癩 也恢5 滥侵屑涓遣皇怯械贝 鳇蟾吆屠着*阿。也走进了似乎毫无美感但又有着一种异样的美的蓬皮杜文化中心大厦，这原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却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游客，来参观的人似乎比坐下看书的人还要多……我从这一个名胜点跑到那一个名胜点。在每一个点上都只是浮光掠影，匆匆而过。而还有更多我向往的地方没有能够去。

当我们从这一个名胜点转到另一个名胜点时，路远就坐地铁，那是像蜘蛛网一样通向全城的。乘客很多，但并不拥挤。其余的时间我们就在大街上奔波。巴黎很少几十层的高楼建筑，大多数房屋还保留着古典的风格，连色调都是略带陈旧的。我在世界著名的跳蚤市场走了一圈，在塞纳河边那一排长长的旧书亭前随意浏览了一遍，我在蓬皮杜文化中心前的广场上看了看江湖艺人的表演；我穿越了红灯区，看到了那些在寒风中倚立在门前的卖春女郎；我在街头看到了艾吕雅诗中歌唱过的卖糖炒栗子的摊贩……我不知疲倦地奔跑着，而我所到的只是巴黎的一个小小的角落。

有人说，没有到巴黎，就不算到了法国；没有到罗浮宫，就不算到了巴黎。又有人说，不参观红磨房的大剧院，就只算到了半个巴黎。——而罗浮宫我只是一闪而过，不仅没有看遍其中全部的艺术珍品，也没有仔细体会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我无福走进红磨房的大剧院。何况所涉足的少数名胜古迹也都没有能够容我从容地留连，品味。对整个巴黎的市容，也只看到了一个角的浮面而已，那么，我来了也等于没有来。值得一记的是，我在巴黎迎接了1989年的元旦。除夕晚上，我在大学城里和几个中国留学生共进晚餐。将到11时，我们一道坐地铁去香榭丽舍大街。他们告诉我，那里将是一片狂欢。果然，长长的香榭丽舍大街灯如海，人如潮，一阵阵欢笑、喧嚷和歌唱声。马路上一行一行地排满了汽车。一到12点钟，所有的汽车喇叭齐鸣，人群中爆发了震耳欲聋的欢呼，接着到处是“新年好！”的祝贺声，一群群的男女青年如痴如狂地载歌载舞……

1989年到来了。这一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

但我终究只是一个拿着地图探访巴黎的匆匆过客。我没有认识巴黎，没有窥见她的秘密，没有真正欣赏到她的情调。

陪伴了我两天，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中国留学生牟志坚安慰我说：“也许这样也有好处。住久了，巴黎可能就对你失去魅力了。”

临离开的那天清晨，我带着依恋的心情走上大街。过惯夜生活的巴黎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行人和车辆都很少。回顾这几天紧张的奔波，各种印象纷至沓来，恍如一梦。现在离开巴黎已三个月了，当我想写下一点什么时，我发觉，我完全不能描绘巴黎本身，而只能记述一点感觉，而这又是如此难以表达。

在我没有来之前，巴黎在我只是一个梦。

现在我来了，巴黎从我梦中走过……

祖与孙

我很喜欢德国漫画家埃·奥·卜劳恩的无字连环漫画《父与子》，搜集到了我国出版的四种版本。正如一种版本的前言所说，它“无言地流泻出纯真的赤子之情与融融的天伦之乐”。那善良、慈爱而童心未泯的父亲和调皮、聪明的儿子的形象都是异常可爱的。而我的一位朋友，看到我常常抱着孙子在外面玩耍，他笑着说，大可为我们画一本《祖与孙》。我也笑了，没有想到我们也够格入画。

我有四个第三代：孙女和孙子，外孙女和外孙，“品种齐全”，也都很可爱——这并不是作为祖父、外祖父的偏爱。孙子和我住在一起，所以接近的机会更多一些。陪着他一道玩耍，成为我的“日课”之一。因而他也特别亲我。

他一岁又三个多月，刚学会走路，两手平放在胸前蹒跚而行，有点像小熊猫。还在咿呀学语，只能用不同的声音和做一些动作表达他的意思。摇摇头是不要或不愿，点头是谢谢，飞一个吻是再见，讨好你时就笑笑，挨了批评就撇嘴，不如意就大叫甚至跺脚，即便大哭大闹，一说上街就安静了，脸上还挂着泪珠到处找帽帽往头上戴，却怎么也戴不上去……我的笔他要抢，我的书他要翻，我的眼镜他要玩，我放食品的盒子无论藏到哪个角落他都能找到，不打开决不罢休，拿了一块巧克力或饼干就跑，爸爸要打他时就往我怀里钻……从他还是婴儿时，我就常常唱着《宝贝》的歌催他入睡，一如当年我抱他的父亲。而当他稍长大后，就学会了咿咿呀呀的和我一道唱歌，并一边拍着手。带他上街去常常是我的任务，我家的旁边有一个小广场，他看到旁的小学生玩单杠就一定要试试，居然也可用小手吊半分钟，小脸挣得红红的，使我乐得大叫。让他去滑滑梯，开初，虽然扶着，他还是有点紧张，后来感到了乐趣就一次又一次地滑，累得我满头大汗。有几次我抱着他滑，溜下来后仰抱着他平躺在地上，要旁边的小学生拉一拉才能站起来。我有时将他放在童车中推他到邮局去发信或到商店购物，就让他坐在车中等在外面。他的奶奶和妈妈知道了后总是提心吊胆，再三埋怨我：“要是坏人把浩浩推走了呢？”雨天，就只能抱着他在窗前望街，他安静地看着外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有一次，雨刚停，抱他到街上，他闹着要下来，我告诉他地上潮湿他也不听，就恐吓地要将他往一个小水洼放，而他突然用力一挣，双脚踏进了水洼中，溅得我满脸水珠。回家后，祖孙两人都受到了他奶奶的批评。还有一次，我让他坐在一个足球上，他洋洋自得，左顾右盼，谁知球一滑动，我抢抱不及，他跌了个手脚朝天！他妈妈不好说什么，我因而又受到他奶奶的指责……我诚然在他身上花去了太多的时间，因为影响了工作而苦恼，而且抱他上楼下楼，陪他玩，也使我感到精力不济。但是，他常使我开怀大笑，带给我许多欢乐。我说我是“陪”他玩，那是表明，我也沉浸在一种情趣中，使我苍老并刻有斑斑伤痕的心还能生发出——唔，就算是“老天真”吧。

和他在一起，我有时就不免想起遥远的过去，回忆起儿时祖父带领我的种种情景。

面对他滚圆、晶莹、纯净的眼睛，我有时也想到未来——他的未来和祖国以至世界的未来。他会比我们生活得幸福的，但正如列宁所说，毕竟不必羡慕他们，我们曾经在狂风暴雨中经历过别一种幸福。

有些老朋友向我叫苦连天，说到为照料第三代所遇到的种种麻烦。他们虽然摇着头，但却是笑着向我说的，显然苦中有乐。从他们所说的种种可笑的事情中，可以看出孙子的活泼、天真，也显现出祖父的慈祥、眷恋。比起父与子来，祖与孙的年龄相差悬殊，夕阳与朝辉相映，那是更强烈的反差，但又都具有一种天真。在他们的相处中，有着另一种情怀，另一种情趣，可以令人大笑，也可以令人含泪。真的是可以入画，可以入诗的。卜劳恩在盛年就被纳粹迫害致死，要不然，当他进入老年后，通过自己的体会和观点，也许会画出一套足以与《父与子》媲美的《祖与孙》来的。1991年

孩子和春天

最近好几次想起了多年前读过的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一篇童话，题目似乎是《巨人的花园》。说的是一个巨人有一座很美丽的花园，其中生长着各种树木和鲜花，所以邻近的儿童们常常溜进来玩耍。唱着，笑着，一片欢乐的景象。有一次，巨人感到他们太吵闹，大声吼叫着将孩子们都赶走了。他得到了安静，但同时也看到树木都突然落尽了叶子，各种鲜花也都枯萎，原是美丽的花园显得异常的荒凉。他发觉仅有一棵树依然枝叶繁茂。他好奇地走了过去，看到有一个孩子躲在树上，由于太小，不敢爬下来。巨人将惊吓得满脸泪珠的孩子抱到了怀中。他领悟到，如果没有孩子们，这座花园也就没有春天，于是，他将吓跑了的孩子们都呼唤了回来。于是，花又开了，树又绿了，阳光照耀着欢笑的孩子们。

原作写得很生动感人。时隔多年，我所记得的只是大致的情节。最近我想起这一则童话是因为我也有着巨人的那种体会。

我有一个孙女和一个外孙女，她们都已进小学，学习成绩不错，在家里也很懂规矩。我还有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孙子和一个刚满两岁的外孙，还不够进幼儿园的年龄，而在家则一刻也不安静。两人有时非常亲热，一道做游戏、一道唱歌、跳舞，但顷刻间却又因为争夺一个玩具或别的一小点小事而打起架来，下手都不轻，于是又哭声一片，天翻地覆。他们又特别喜欢来找我，或是相互告状，或是讨东西吃，或是要带着上街……我故意板起脸大声喝叱，甚至做出要打人的姿势都不能迫使他们退让，结果退让的倒往往是我，只有叹一口气，放下手头的工作，满足他们的心愿。

这些天，因为要赶做一点事，让他们各自随着他们的父母暂时住出去了。开始我还感到是松了一口气，埋头在书桌前。但常常不自觉地停下笔来，环顾四周，难以习惯于那种近于空虚的寂静，感到家里缺少了生气，正如那位巨人感到花园里没有了小孩子就没有了春天。

对于幼小一辈的那种眷眷之情近年愈来愈浓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年心境的一种表现。

几天前，外孙满两岁，我在旁人送我的祝贺卡上写了这样几句话送他：

这是别人送我70岁生日的祝贺卡我转送给两周岁的你

当你活到外公这么大年纪时它将带给你一些遥远的温暖的回忆我听见

了你唱的一支歌“春天在哪里？”

春天就在你稚嫩、欢快的歌声里春天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的祝福当然也包括其他几个孙辈，同时我也祝福正在成长的所有的孩子们，他们就是春天，愿春天永远属于他们。

爷爷的祝

这几年，第三代在我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我有四个第三代：孙女、孙子、外孙女、外孙。品种齐全。朋友们说我是“有福之人”。他们也都很可爱。孙女汶汶、外孙女越越已上小学了，都很聪明，学习成绩很好，课外都在学钢琴。孙子浩浩和外孙然然都是四岁，都在上幼儿园。浩浩比然然大三个月，身高相近，长相相似，常被人误认为是孪生兄弟。都很活泼，也很调皮。

他们经常有一点病痛使我心忧。他们——特别是小的那两个的打打闹闹使我心烦。但他们带给我的更多的是喜悦和安慰。看孙女、外孙女的作业和成绩单，听她们弹钢琴；听孙子、外孙咿咿呀呀地学唱歌，看他们煞有介事地表演“武功”；看他们四个人一起做游戏，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其中有许多我想不到的精彩的句子）；领他们上街，和他们一道逛公园……在我都是一种享受。我忘了各种烦恼，走进了他们的世界，有时也情不自禁地和他们一道玩了起来。

他们不仅是我的安慰，也是我的希望的寄托。所以，我就常常想到：他们将经历怎样的道路，成长为怎样的人呢？我还不自觉地与自己成长的道路相比较。

当然，他们的童年远比我的童年幸福。我的童年是平淡，甚至可以说是黯淡的，没有他们所享有的那样多的色彩和欢乐。我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是：被父亲遗弃的母亲的凄然无神的眼光和她多次望我为她争气的叮咛，使我过早地体会到人世的悲凉。当我初中毕业后，在抗日的烽火中，告别母亲，告别故乡，作为一个流亡的学生，独自漂泊。几十年来，经历了不少坎坷和风险，承受过不少打击和灾难。

但我也未必羡慕他们。我能亲历时代风云的变幻，在风暴中翱翔，在巨浪中奋游，在沉重的打击中试验并锻炼自己的力量，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特别是，在一次长达二十多年的没顶之灾中幸存了下来，终于能够有一个比较安静的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遍尝人生的各种滋味，过去的种种都因时间的净化而得到升华，从某一意义说，连当时认为不堪忍受的一切，对自己也是一种滋养，虽然那代价是太大了。

想到他们的前途，我也不是没有耽心的。他们属于被称为“小皇帝”、“小公主”的这一代，在优裕的生活和过分的宠爱中享受着金色的童年。这也养成了他们性格中的一些弱点：娇气、任性、倔强……他们将来有没有力量去抵抗各种危险的诱惑，承担一些可能的险阻呢？会不会堕入某种陷阱而无力自拔呢？能不能正确地理解生活的意义和作为人的价值呢？看到当前一

些腐败的社会风气和一些青年的令人痛心的表现，就更加深了我的忧虑。只要我健在，当能及时提醒他们一声，用我枯瘦的手拉他们一把，或用佝偻的身子为他们遮蔽一点风雨。但如果.....

不能想，或者也不必想吧。俗语云：“儿孙自有儿孙福”，我怎么能管得那么多，又怎么能管得那么远呢？人生的道路还是要他们自己一步一步地走的。那么，让他们将来各自去迎接各种考验吧。而永远伴随着他们的，是一个老朋友的祝福。

幼小时的回忆

我的童年并不是那样甜蜜，甚至可以说有些黯淡。

太幼小时的情况我已完全模糊了。我的追忆只能从四五岁开始。那时候，我的来自贫困农家的母亲已被从大学毕业的我的父亲所遗弃。父亲虽然还是住在同一城市里，却已另外成了家。我的童年的回忆中没有父亲的影子。母亲那时不过二十五六岁，带着我跟随祖父祖母生活。

祖父开着一家小小的百货店，紧靠着一条名叫老庆安里的巷子，里面有几家住着一些粗俗而又浓装艳抹的女人，入夜后在巷口站着或是进进出出，招引来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还有一些地痞流氓在这一带活动。离我家不远的斜对面一条直街上，集中了好几家舞厅，舞客大都是外国水手和水兵——这里临近长江边，在那个年代，江上是经常停着外国商轮和军舰的。那些水兵和水手常常喝得醉醺醺的，高唱着或呼啸着游荡在大街上，有时还互相斗殴。

一看到他们，祖父就赶紧将我拉进屋中。

我家一楼是铺面，二楼住室很狭小。我的活动天地主要就是门前的街道。有一次我穿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幸好没有伤到筋骨。当时我的两个叔父结婚不久还没有小孩。我的游伴就是邻居的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孩。我们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跳“房子”，踢毽子，捉迷藏，打打闹闹.....大太阳天、下雨天、下雪天，家里人不放我出门，我就只好跟在母亲身后晃，听她和两个婢娘絮叨什么。她们说的引不起我什么兴趣，就去扒在小楼的窗口望着大街，开始体会到寂寞的滋味。

我一点也想不起母亲为我讲过什么故事，除了她有时以“甘罗十二为丞相”的历史来激励我。她很忙碌，做饭、缝制衣服、纳鞋底，稍有一点闲暇，就看字迹很密很小的石印油光纸唱本，有时还轻轻哼唱了起来——她没有上过学，通过自修认识了一些字。我也记不起她带我上过街，因为她自己几乎是不上街的。她当然是疼爱我的。我是她唯一的安慰和希望。

但这种疼爱一般都不大流露出来。只有在我病中，躺在床上，只要我睁开眼睛，无论是白日还是黑夜，就看到她焦急的脸俯向我，并轻声地喊着我的名字：“冠！冠！”平时她对我管教得是很严的，因为我实在太调皮。她有时还打我，通常是利用两个机会：为我洗澡时或是当我上床后。因为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我无法逃跑。她一面打我的屁股一面教训我，数落我所犯的

错误。我虽一面乱蹦乱跳，一面大喊大叫，却不大哭，她自己倒有时哭了。多少年后我读到一位诗人的诗句：“孩子呵，你用顽皮抹煞了母亲的辛酸。”我就想起了母亲打我时的心情。不过，我当时从大人的隐隐约约的言谈中，从母亲有时在灯下、有时在小楼窗口失神地独坐的状态中，已朦胧地意识到母亲悲惨的命运。它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是长孙，受到祖父的宠爱。他常常带着我上街。他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十年，熟人很多。走几步就有人和他打招呼：“曾大爹，出来走一下？！看你的孙子好灵醒！”祖父就哈哈笑着，轻轻地拍着我的头说：“可调皮了！”他有时晚上带我到附近一家京剧戏园看戏。

他认识那些守门的，可以不买门票。后来我有一次独自溜进戏园子看戏，家里人焦急地到处寻找。当祖父终于在戏园的一个角落里找到我时，他狠狠地用手“栗子”敲我的头，这是他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打我。

是的，关于童年，我的回忆中带着一些苦涩。当我六岁那年，有一个深夜，隔壁的一家烧腊店起了大火，我家也被烧毁。就迁入到附近一条街上居住。不久我就上了小学，开始了生活的另一个阶段。1991年

记忆中的小书柜

当我10岁时，有了一个小书柜。当然老早丢失了。我很怀念它。它是与我童年的回忆连系在一起的。

我进小学后，离家在外的父亲为我订了两份杂志：《小朋友》、《儿童世界》。当时订阅的杂志都是由邮局寄递的。我在家里做功课或是和小伙伴们在门口玩耍时，听到邮差（当时对邮递员的称呼）高声喊我的名字，就急忙忙地跑了过去，接过卷得好好的杂志，我是很快乐，很得意的。父亲还为我买了一些别的儿童读物，我自己也设法弄到了一些。杂志、书籍渐渐多了起来。我喜爱它们，却不善于收捡，到处丢散着，有时为了找不到一部本想看的书，急得大叫又跺脚。这种情况，母亲当然看在眼里。有一天放学回来，看见一个小小的柜子放在房中。母亲说：“这个就给你了。以后，你的宝贝书就放在这里边，再不要乱扔了。听到没有？”

那大约是做小生意的祖父过去用来放置杂物的小柜子，约两尺多高，一尺多宽，一尺来长。内分三格，有两扇门，是棕色的。已经很破旧了，被扔置在坪台上。母亲修补了一下，洗刷干净，交给了我。我高高兴兴地将书籍、杂志清理好、放了进去。我把小书柜放在堆杂物的后房，那里家里人是不大去的。我常去看看我的小书柜，翻检一下，这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感到自己有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有时，就坐在杂物堆中静静地看书，看得那样入神，一直到天渐渐暗了，母亲喊着我的名字走了进来，催我下楼吃饭。她一面责备我不守时，一面又含着隐隐的笑意：她显然因为我嗜好读书而感到喜悦。

现在想来，我是理解母亲的这种喜悦的心情的。我小时很调皮，很贪玩，由于不用功，学习成绩不太好，各门功课大都只是七十分。母亲寄希

望于我，因而很为我的前途担忧。

我热衷于阅读——即使那不是正式的课本，对她也是一种慰藉。从我自己说，拥有了一个小书柜，培养了我对书籍的感情，几十年来，我收藏书籍的习惯，是从那时开始的；同时也培养了我阅读的兴趣，使我课余的时光不致完全消耗在嬉戏中。那对我日后的发展是有影响的。从某一意义说，那个小书柜可以看做是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的摇床。

当我读初中以后，我的书愈来愈多，主要是我自己省下零用钱买的。我喜欢跑旧书店，在那里，可以用比平时少得多的钱买到一些好书。我的小书柜也不够用了，不得不将一些书籍留到外边，而书柜的内容也在渐渐地起变化。我最初珍藏的是《苦儿流浪记》、《十五小英雄》（这当时是法国作家凡尔纳的一本科幻小说的译本）、《爱的教育》、《稻草人》等。到我初中毕业时，小书柜中主要放置的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些著作，最多的是鲁迅的作品和一些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了。那一年，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我告别了形势危急的家乡，开始了流亡学生的生活。当然，也告别了我心爱的小书柜。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了家乡。故居已成为一片废墟，小书柜再也找不到了。但它还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

我初中先后进了两个学校：一、二年级是在汉口市一中。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默退。和我同在一个读书会的三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是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另两个是别校的学生）被捕。一个名叫阎夏扬的特务认识我父亲，要他对我“严加管教”。祖父唯恐我继续卷进漩涡中，就逼迫我转学到黄冈县仓子埠正源中学。我是在那里初中毕业的。

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先后有三个。我留下印象较深、并给我影响较大的却是一位代课老师王志之。

先谈一谈那三位教师。初一的语文教师名叫吴树人，这名字比较好记，因为是和鲁迅先生的原名一样的。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分配到校不过一两年吧，年纪很轻。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态度比较严厉，但同学们还是不怎么怕他，课堂秩序不大好。他是湖南人，有点大舌头，说话不是很清楚，同学们为他起了一个绰号：“烧萝卜”。其实，他有学识，讲课也是很认真的。我记得他讲鲁迅的《秋夜》和周作人的一首新诗（可能是《小河》）使我对这两篇作品，也对散文和诗，有所启发和理解。他与我还有这样一点关系：我被选拔参加全市中学讲演比赛的讲稿是他写的，训练我讲演的也是他。我能取得比赛的第一名，其中大半的功劳都应该归功于他。读二年级时的语文教师姓宁，名字则记不准，似乎是澄澈，也是北大中文系毕业。他年龄也不到三十岁，瘦瘦的，衣着比较讲究，经常穿西服，这在老师中不多见。风度潇洒，讲课时也很轻松自如。学生们都很喜欢他。我对他还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是因为和我同在一个读书会的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他是倾向进步的。当时“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浪潮在全国澎湃展开。我们学校的校长和

训育主任对学生的爱国热情采取了压制的方式，一般教师都不大表态，但宁老师却是同情学生，并暗地支持学生的。他的这种态度在讲课时也有意无意地流露了出来。可以感觉到他是热爱新文艺的，虽然他也依照课本讲古文，但讲现代作家的作品时就特别富有一种激情。他住在离我家很近的一所漂亮的楼房里。他有一位美丽的妻子，穿着时髦。他俩常常一道骑着自行车上街，很引人注目。他们是当时新潮派的人物。我读初中三年级时已转到正源中学。一个乡镇的中学当然不能与汉口市一中相比，设备简陋，师资水平也差。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姓胡的五十多岁的老先生，矮矮胖胖的，戴老式深度近视眼镜，络腮胡子。只为我们讲古文，同学们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当时抗战已经发生，经常有省城来的各种宣传队来，慷慨激昂的歌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

同学们也都热情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哪里有上课的心思？！但那位老师总是上课铃声一响就来到课堂，学生闹轰轰的，有的干脆溜了出去，他照样望着窗外念他的之乎者也。

现在我要说到王志之老师。宁老师病了，他是来代课的。他从北京来不久，是宁老师的朋友，也许是亲戚，就住在宁老师家里。宁老师向我们介绍过，他是一位小说家，笔名含沙，认识鲁迅。这就使我肃然起敬了。我当时喜爱文艺，并常在销路少得可怜的《时代日报》的副刊上写稿，那副刊编者田一文是我们的熟人。但真正见到一位作家，这是第一次。

我对鲁迅先生是热爱的，一位和鲁迅有交往的人，当然会引起我的兴趣。王老师中等身材，很健壮，留着长发，宽宽的脸，戴着一副黑边的大眼镜，经常穿灰色的西装。他代课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除课文外，常选一些补充教材，大都是现代作家的作品。我听他的课是很用心的，也的确有所得。在同学们的要求下，他也谈过一些写作经验。他告诉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不容易的，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要有多方面的素养，还要有进步的世界观。由于我们还只是初中学生，他讲的只是一般的常识。类似的话，我当时在一些文章中也读到过。

但通过一位作家亲自说出来，就有一种特别亲切感，更能打动我的心。而且，他当时正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将原稿分发给一些同学抄录一份。由于我的字太劣，没有能接受这一任务，但看到那一大摞原稿时，是惊羨不已的。想到真应该好好努力，将来也能写出这么大的作品。

关于他，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读到了刚刚出版的《中流》杂志，上面登有鲁迅先生的文章《死》，在他作为遗嘱留给亲人的几条中，有一条是：“损着别的人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且勿和他亲近。”我年少，不能体会这几句话的含义。在下课后，当他走出教室时赶着跑去请教他。他站住了，默默地打量了我一会才开始讲解。我已记不清他的原话，只记得他提到了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韧性斗争的必要。我虽没有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却有着某种领悟和振奋。他当然也知道我是受到学校当局注意的“不安分子”，他走开前，在我肩上拍了一下。一股暖流通过我的全身，我感到受到了激励，被推着向人生道路上跨进了一步。

就在那一学期结束后，我被学校默退，宁老师夫妇和王老师也再没有在那所学校执教了。我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鲁迅书简》出版后，我读到了鲁迅给王志之的那17封信，从语气上看来，鲁迅和他相当熟悉并是爱护他的。他那部长篇小说后来出版了，但我未读到。鲁迅去世后，他写有一本《鲁迅印象记》，我先后买过两本，都在动乱中遗失了。

时间过去了将近60年，我只能写这样一点零乱而浮浅的回忆。对于今天的读者未必有什么意义，但在我自己则是一个纪念。1992年12月20日

我与《大江》

——片断的回忆

《大江》是解放前汉口《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创刊于1946年3月，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出了400多期（每周二、四、六出刊）。它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主编是女作家葛琴（鲁迅先生曾为她的小说集《总退却》写过序言）。其后接替过这一位置的有端木蕻良、王采、天风和我，以我任职的时间最长。曾经协助过编务的是青年诗人牧星。在这个副刊上写过稿的作者有茅盾、雪峰、荃麟、艾芜、吕荧、邹荻帆、阿垅、路翎、绿原、冀汭等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有许多青年作者。它为荒芜的武汉文坛带来了生机，显示了希望。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激烈地进行的时期，这个副刊以它明显的倾向配合和响应了这一伟大的斗争，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所以，它受到了反动派的监视以至迫害，而受到了进步读者的关注和欢迎。在武汉的新文艺运动史上，它应该占有一定的篇幅。牧星应《新文学史料》杂志之邀，拟写评介这一副刊的专文。去年春天，他从长沙专程来武汉，查阅旧报，访问有关人士。他一再要我也就《大江》写一点什么。我也确有这一义务。但是，我保存的《大江》和一些有关的资料，早已丧失殆尽。现在，我只能凭记忆写一点短文。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的7月离开武汉到重庆的。于1946年的6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故乡。当时我在一所大学念书，学校由重庆复员到南京，一时无法开学，所以我可以在武汉停留一段时间。当时，友人邹荻帆、陈枫已先期到了这里，他们告诉我，荃麟、葛琴夫妇也在武汉。这两位文坛前辈，我都认识，前几年，荃麟在桂林编《文化杂志》，葛琴编《青年文艺》时，我都写过稿。后他们到了重庆，住在张家花园全国文协机关里，我们多次见过面。他们是著名的进步作家。抗战胜利后，没有去上海（抗战前他们在那里），而来到从未有工作关系的武汉，我暗暗估计，一定是负有党的某种使命的。几位与他们接近的朋友们也大都意识到这一点，而反动派也肯定会注意他们。记不清是荻帆还是陈枫，在我回武汉后不久，陪我去看他们。他们住在积庆里一栋古旧房子的二楼。只有一间房。房子不算太小，但摆着一张大床，一张小床，还有书桌、饭桌和一些杂物，就显得很拥挤。荃麟还是那样瘦弱，经常头晕，所以戴着健脑器，但谈锋依然很健。他向我们谈到时局和文艺界的一些情况，葛琴进进出出的忙着照料两个都不到五岁的小孩，还操持着家务活，也抽空过来坐下与我们谈她编辑《大江》的情况。看来她是很爱惜这个副刊，并倾注了不少心血的。她约我写稿。我当然允诺，而且，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面对阴霾弥漫的现实，我是有相当多急于一吐的情感和愤懑的。

我先后交了两篇散文：《归来》和《战栗的城》。不久后，大约是在七月中旬，葛琴向我提出，想将《大江》转交给我编。她说家务较忙，实在难以兼顾，荃麟也在一旁鼓励我接下。我有点意外，也很犹豫，恐怕自己无力挑此重担。但想到这是他们经过考虑和商量才这样安排的，我不应该推辞，就作为接受一个任务，答应了。我先代她编了几期。后来，她带我到报社见了社长刘人熙，经他同意后，就正式代替了葛琴的位置。两个月后，荃麟、葛琴夫妇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汉口，去了香港，在新的岗位上战斗了。

我虽正式成了报社的一员，却很少去报社。事实上，报社也没有供我使用的办公桌。报社的人员不多，编辑、记者一共只有十来个人。但只有一间二十平方米大小的房子作为编辑部，就显得狭小而拥挤。我在家编稿。有时将编好的稿子送到报社去交给牧星，有时由他来我家取稿。有什么事就由我们两人商量。审稿、与作者读者写信联系，画版及一些杂事，都由我们两人承担。在具体事务方面，牧星做得更多一些，工作是相当繁重的。到了11月初，因为学校即将开学（由于初复员到南京，学校开学较平时晚了两个月），我辞去了《大江》的编务，我最后一次发稿恰好是《大江》100期。我以编者的名义写了一篇《百期的话》，表达了我的心情并声明了我的离去，接替我的编务的是前辈作家端木蕻良。他当时和演剧四队生活在一起。演剧四队的队址就在新市场（现在改名民众乐园）旁边的南洋大楼里。

1947年6月，那正是震动全国的南京“5·20”学生运动后不久，由于受到特务的监视，我曾到上海暂避。毕业考试前夕回到了南京，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当夜就搭船回到了武汉。想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临*
* 铨究Q 保 沕悠傅揭患宜搅 醒 *教。当时《大江》的编者又换了王采。当报社的负责人得知我回来后，由副总编辑黄邦和约我谈话，他表示还是欢迎我回去编《大江》。我同意了。这样，我一面教书，一面兼编《大江》。一直到1948年的10月，几位老朋友约我一同去鸡公山一所中学教书。那里邻近解放区，而学校负责人的态度比较开明，我们去了可以做一些工作。这样，我又将《大江》的编务交给了在报社工作的诗人天风。我在山上只呆了三个月，由于受到特务追踪而逃回武汉。《大江》的编务又转回给了我。那正是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胜利的时期。在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升起红旗以后，武汉也临近解放。从可靠的方面得到消息，特务将逮捕我。于是，我通过组织的联系，于5月1日由一交通员带路，化装成一商人到了孝感——当时那里已经解放。离开武汉前，我没有通知报社。只是留下了一些选用的稿子，交给了《大江》的经常撰稿者蒲汀，请他代我到报社发稿。5月16日武汉解放，我于5月20日连夜赶回武汉。从此，《大江》扩充了篇幅，增加了许多新的作者，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抗战以前，我也曾编过汉口《时代日报》的杂文副刊《偶语》。和我同编的还有蒋文高。我们都是初中学生，十分幼稚。副刊的稿子大都是我们自己和朋友写的。而那家报纸的发行量也少得可怜，谈不上什么影响。我们编了一个短时期以后就罢手了。而《大江》是一家有声誉的大报的副刊。当我接手的时候，葛琴已为这一副刊建立了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质量，在读者中享有信誉。这使我不得不慎重从事，至少希望使这一副刊保持已有的风格和水平。同时，那正是解放战争进行的时期。我意识到这一副刊所应担负的任务和自己所应尽的责任。我是怀着战斗的心情来从事编辑工作的。一如我在解放初期所写的一篇纪念性的短文所说：《大江》自然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

然而它却是立足在一个伟大的基础上——即争取那人们在以血肉换取的战斗的目标。在反动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争取一个据点，团结一批友人，这存在本身就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无论如何，《大江》是与这个时代的命运相结合的，是与兄弟们的进军相呼应的。

当然，我们的工作会受到限制。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传达人民的呼声，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到实际的政治环境，在选稿时不能不采取有所克制的态度。但即使这样，也还是受到反动派的注意，好几次报社负责人转达了警告。而另一面，又遭受少数在政治上比较单纯的读者和作者的误解。譬如，有一位名叫周澄的作者写了一首抨击黑暗现实的诗来，因为过于显露，我只好退回了。作者因而写信来愤怒地质问：“你有没有良心？”并要求公开答复。我理解他的心情，而且知道可能还有别的读者和作者也会有类似的不满，于是我就公开答复了：

热心的友人出于爱护本刊的心，投寄来的壮烈的呼喊，血泪的控诉，却有些没有能够刊出。为什么？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不考虑到现实情况。赤膊上阵有时是必要的，但也要看一看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大江》的不足之处，我愿承担一切责备。

……我们是在夹缝中匍匐着爬行。有时候，在异常悲愤的心情中，我想，那么倒不如沉默好吧：“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还写过这样的话：

文字的效用是有限的，当人们在以生命写史诗的时候，文字就更显得无力……好几次，我都想推开这劳什子副刊不编了。

事实上，这也是对反动统治的一种暴露和抗议。这些答复也是过于直露了。但当时我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懑和渴求的。

以上所引的这些话，都是发表在“编辑地位”的栏目内。这个栏目经常保持。有时配合发表的作品写一点读后感，对作品进行分析；有时谈一些文艺观点；有时是与作者的通信。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编者、作者、读者中形成了亲切的交流。现已60多岁的周代，回忆解放前他在武汉大学念书时，就很喜爱《大江》。他特别提到：“人们还常常注意一块比豆腐干还小的‘编辑地位’。”我在《大江》上发表过长诗《母亲》的第一部，那是署名曾卓。而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为了抒发在生活中的一些感受，我还在《大江》上发表过不少杂文和散文，那就用的是各种笔名了，如柳江、方亮、方洛、林薇、马莱等等。解放初期，我曾从中选编了一部分，编了一个小集子《痛苦与欢乐》出版。通过几次“浩劫”，我已丧失了这本小书，多方寻觅也没有能够找到。那些短文倒是很能反映我在那一段时期的心情，也多少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侧影，所以我是感到一些惋惜的。

在《大江》创刊的时候，葛琴在“发刊词”中就着重提出了发现和培养新作者的任务。

在她担任主编的那一时期，她很注意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副刊上，出现过不少新作者的名字。当我接手以后，她好几次对我说过，一个副刊，需要知名作家的支持，这样可以保证副刊的质量，建立副刊的信誉；但更要注意从自由来稿中发现新的作者，即使作者还不是那样成熟，但只要看出还有发展的苗头，就应该与他们多联系，给予鼓励。这样既可以培养新生力量，扩大作者的队伍；同时副刊也会显得更有生气，能更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

我记住了她的话，在这方面作过一些努力。我认真阅读来稿，只要是真正从生活中来，有着真情实感的作品，虽然在表达能力上还不是那样熟练，也大都给予发表的机会。有时还在“编辑地位”的栏目内，对作品给予推荐，并适当指出其不足之处。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投稿者，后来都成了《大江》的基本作者，而且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他们在逐渐进步和成熟。譬如周代、犁夫、彭勃、李致远、葛苓……现在，他们还没有和我失去联系。前几天，我收到葛苓一封信，他在署名前写着“一个《大江》的老作者”，使我这个老编辑感到亲切，并得到安慰和温暖。

荃麟、葛琴夫妇于1946年春来到武汉，当然是肩负着党的使命的。《大江》的创刊，可以看作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离开以后，虽然换过了几个编辑，《大江》一直坚持着他们创刊时的宗旨，保持着原有的风格。还应该指出，当时《大刚报》的几个负责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有时还为我们承担了一些压力。他们是大致了解荃麟、葛琴的身分的，也知道后来的几位编辑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在武汉解放前的那半年中，他们可能已怀疑我地下党员的身分，但是对《大江》的编辑工作依然是放手的。另外，《大江》也得到了不少友人的支持和帮助，它才得以在黑暗、险恶的处境中艰难地跋涉，终于欢乐地看到，红旗在这座大城飘扬！

现在，四十多年的岁月已随着长江流走了，当我回顾编辑《大江》的那一段日子，有些激动也有一些感慨。当时，曾有读者来信说：“《大江》是武汉的一点光。”我在一篇短文中答复说：“这对我们不仅是值得欣慰的赞语，而是沉重的鞭策。光么？那是只有在‘有一分热’的解释下，我们才敢承担的。”是的，正是凭着这一分“热”，才得以经受黑暗统治的煎熬，才能具有对胜利的渴望。当我赶写这一篇小文时，在我眼前，还时时浮现出当年并肩战斗过的友人们的身影。其中有的已去世，如蒲汀；有的已不知下落；即使还健在者，也大都垂垂老矣。让我在这里向他们表达我的怀念和问候。我相信，他们也记得并珍惜那一段岁月的。1993年774曾卓文集

在大潮中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宣言”中的这句话，激动着全国学生的心。因为，以当时旧中国之大，也没有一个角落可以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在中国的西北角，在红军征服了万水千山到达陕北以后，那里闪耀着红霞。但在旧中国的上空却是阴霾的天空，乌云翻滚。在“九·一八”事件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跨过了山海关，伸向了华北。祖国在危亡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活动。那浪潮急猛地澎湃到了全国各大城市。十二月二十日，武汉各大学、中学的学生也走上了街头。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武汉举行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当时，我是一个初中学生，我也挥舞着小纸三角旗，唱着歌，高喊着

口号，走在游行的行列里，投入到了在全国激荡的大的浪潮中。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但当年的一些壮烈的情景还浮现在眼前，闪动在我心中。

我记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样雄壮慷慨的歌声是怎样震撼着这座古旧的大城。我记得，在十二月十九日的夜间，当时国民党武汉市市长吴国桢慌慌忙忙赶到我们学校，企图以甜蜜的谎言和无耻的威胁阻挠我们第二天的游行，结果在同学们义正词严的反驳和抗议中，灰溜溜地走了。我记得，大游行的第一天，反动派停航封江，不让武昌的学生过到汉口参加这边的游行行列，一万多学生在码头上，在屋檐下过了一个寒冬之夜，受到荷枪的国民党士兵和便衣特务的监视，而老百姓却热情地送茶点慰问学生们。我也记得，学生们的斗争终于胜利，反动派不得不撤消对长江的封锁，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武昌的学生终于过来了。当他们唱着歌和汉口的学生队伍汇合在一起时，许多同学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浩荡的队伍走向已临时架上了铁丝网的日租界前，面对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高呼口号……。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当时我还非常幼稚，是凭着单纯的爱国激情和受到进步书刊影响而产生的朦胧的对理想的向往，而投身到那大潮中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参加者。

但以那为起点，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当时参加运动的学生也都是怀着爱国热情的，而其中的在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进步学生是中坚力量和领导骨干。运动的大潮以不可遏止的势头继续在向前发展。在一九三六年，武汉也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的成员都是在“一二·九”运动中锻炼成长的。

抗战时期，在恩施集中营被杀害的何功伟烈士，就是武汉“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另外，当时在武汉大学念书的万国瑞、李锐、潘琪，懿训女中的学生范元甄、市一中的学生密加凡、省高的学生何公楷等等，当时也都是武汉“一二·九”运动中的领导人或积极分子，后来都在时代的大潮中继续受着锻炼，在我们党的各个岗位上担负起重要的任务。从全国的范围看，也正是这样。——可以说，在“一二·九”的大的浪潮中，成长了一代革命者。前几天我从报纸上和从荧光屏前，看到在北京的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白发苍苍的老战士和现在的大学生座谈的消息和情景。他们共同高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熟悉的亲切的歌声将我带回到五十年前的情景中。而且使我想到了，作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光辉诗篇的“一二·九”的历史任务虽然已经完成，但它的精神的光芒一直照射到现在并将照射到将来，正是这种精神的光芒，使这样两代人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伟大的爱国热情和为一个神圣的理想而斗争不息的意志！

更向前

一位朋友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翻检旧报时，看到了1950年1月1日《长江日报》上我写的一篇短文：《更向前！》。这是41年前的事了，

我当时保存的剪报早已在动乱中丧失，看了朋友的文章，才隐约地记起了有这件事。但我一点也想不起写了什么。朋友在文章中引用了一句话：“对于我们，在辉煌的阳光下勤劳地工作，是最大的愉快和对祖国的最好的祝福！”

这很能表达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元旦，我，还有许许多多人的心情，我也很喜欢我那篇小文的题目：更向前！当时我未到而立之年，明年却将进入70岁了。不能不有“时间飞逝”的感叹，而现在我比当年更能体会“更向前”这句话的份量。

前不久，在我写的一首小诗中有这样两句：“在时代的风雨中跋涉，在生活的漩涡中浮沉。”人总是在前进的，人生的道路总不会是那样平坦。有坎坷，有险道，有陡坡，有曲径……然而，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向前走。在绝壁前，我们迂回；在乱石中，我们开拓；在荆棘中，我们留下血迹……进入老年后，身体当然会衰弱，但精神应该还是保持健旺；脚步不免踉跄，但却不应该停息，人生的欢乐就正在于搏斗。我们要做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而不羡慕“坐看云起时”的隐者。

我们当然有时不免回顾，看看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更常常倾听未来的呼唤，那永远是一种鼓舞，一种激励。辉煌的理想是美丽的，而要达到那理想却需要付出无穷的努力，无数的牺牲，无尽的代价。而人生的欢乐也就正在于追求。重要的是，心中要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焰……一年又过去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将跨进新的一年。我们临近了世纪末，但我们没有世纪末的悲哀，却只感到了日益逼近的新世纪的光辉。

是的，让我们更向前！1990年12月24日

王大化在重庆复旦中学

在上海的友人陈必智来信，说王大化同志的公子最近找到他，想了解王大化当年在重庆复旦中学任教时的情况。必智那时也是复旦中学的学生，但和王大化私人接触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我写一点什么。

在我读到的纪念大化的文章中，没有人谈到过他在复旦中学的那一段经历。可能因为他在那里的时间比较短，仅只有四五个月，外面知道的人不多。我当时是该校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与他相当接近。为了使人们了解这位“人民艺术家”生平中的这一段生活，也为了我们的情谊，我当然是应该写一点的。

只是过去了近五十年，一些记忆已比较模糊了。

但是，他当年的形象还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高高的个子，瘦削、微黑、显得刚劲的脸，两眼很有神。初到校时，他留着长长的头发，不久后却剪成了平头。穿着一件黑白格子的土布衬衫——他当然还穿过别的样式的衣服，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件，因为当时我也仿做过一件。

他是1939年3月到重庆复旦中学来担任音乐教员的。他第一次上课就使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前一任音乐教员姓杨，年纪不大，音乐素养可能不错，只是教学方法有些呆板，教的又大都是三十年代早期的歌曲。

他的嗓子不行，只能教，不能唱。同学们对他缺乏应有的尊敬，对音乐课不太感兴趣，课堂秩序总不太好。而大化一上讲台就将学生们“镇”住了。那是由于在我们眼中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是当时在重庆相当活跃的木刻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剧专毕业的，主要从事话剧活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作品。得知他要来校的消息时，倾向进步的同学曾高兴地奔走相告。现在他微笑着站在我们面前，有着潇洒的风度和在别的教员中少见的那种青春的生气——他原也大不了我们几岁，只是二十出头一点。他教学的态度很富于激情。而他又有一副很嘹亮的嗓子。他教的是抗战歌曲。这一切就使他对学生们产生了吸引力。音乐课堂从此有一种热烈的气氛，激荡着雄壮、热情的歌声。

他的寝室就在男生宿舍的下面，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小房。家具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三屉桌，一把靠椅，所以还是显得有些空荡。那里成为一些男同学们爱去的地方。有几个同学，其中包括我，是校内一个歌咏队的主要成员，而主要的，我们是怀着对一个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敬慕心情，到他房中去的次数就更多一些，他对我们很亲切，很热情。我曾将我发表的一些习作向他求教。

不久，我们的关系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时，复旦中学已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廖临川，宣传委员是我。上级派来领导我们支部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们，不久将由另一位同志来接替对支部的领导工作。有一个晚上，大化约廖临川和我到他房中谈话，他说出了接头的暗号，我们才惊喜地知道，新来的领导同志就是他，立即扑上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说上级考虑到他在学校任教，与我们接近比较方便，所以才将领导任务转交给了他。他要我们汇报了支部工作和支部成员的情况，学校里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然后我们商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

重庆复旦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它不像一般“国立”中学在政治上卡得那么紧。但校内情况也还不是那样简单。学校中有三青团的组织，还有几个军统特务学生（其中有一个叫但家瑞，后来在复旦大学曾经殴打洪深教授。顺便说一下，由于他有一次向学校当局打我的“小报告”，我曾让别的同学走开，关起教室门，揍了他一顿。这是轰动了学校的大事。可见我当时政治上的幼稚。这是我后来被学校勒令退学的一个原因）。训育主任张某是校内三青团的负责人，可能与中统有关系。不过，当时国共关系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同学们大都是从外地流亡到重庆的，抗战热情很高。大化同志指示我们，可以通过群众组织团结更多的同学。我们决定扩大原已建立的“复活歌咏队”，在此基础上成立“复活社”，再创建话剧团、口琴队，还成立了篮球、足球、排球队，并定期出版墙报，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众团体。另外还组织了秘密的读书会。通过这些活动，支部先后吸收了七、八个新党员，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活跃了校内（有时我们还到校外）的抗日宣传工作。大化亲自担任了歌咏队的指挥。每个星期都定期进行活动。在校内演出过几次。他还为我们排演了一个话剧：洗群的《反正》，并饰演了其中一个伪军角色。另一位年轻老师季耿也参加了演出——我们过去也在校内演过话剧，但这是第一次师生同台演出，所以在校内产生了轰动。而且，过去的话剧大都是由我担任导演，我实在没有什么经验。而这次则经过了大化的严格的正规排练，演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而在排演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使以后的演出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在我的记忆中，大化没有直接参加过我们的支部会。主要是通过廖临川，有时也找到我，传达一些上级的指示，分析政治形势，并谈谈如何开展支部工作。他的态度当然比平时严肃，但也还很亲切。

由于我们不仅是师生，还是同志关系，在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友谊，我们的谈话就很自如，天南海北，社会见闻，文学艺术，什么都谈。现在我能够记起的，有这样几件事。他谈到在复旦中学之前，在成都演员业余剧团的一些工作情况。他说他主要是担任舞美设计并兼舞台装置工作，条件很简陋，人手也很少，有一次他装置舞台时从高梯上摔下来跌伤了腿，仍坐在椅上指挥工人们工作。他谈到抗战前他哥哥在山东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他说他就是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其中很有一些惊险的故事，可惜已记不清了。但他当时绘声绘色热情地讲说的姿态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激动、神往的心情我也还记得。

还有一件事更值得我纪念，有一个晚上，在他的小房里，在烛光下面（学校是有电灯的，但常停电），他向我介绍了天蓝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那是刚发表在延安出版的《文艺战线》上的。他极为赞赏这首诗，说感情真实，深沉而悲壮。他站起来怀着激情用他那浑厚的嗓音大声朗诵着。最后那句：“你想单骑渡黄河，黄河有不测的风波，你奈黄河何？！”他几乎是含泪倾吐出的。他说，如果能配上电影画面来朗诵这首诗，那效果一定很好。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天蓝的名字，以后就很注意他的诗作，并受到过他的影响。

重庆的政治形势渐渐劣转。我们的活动原就受到学校的注意。大化突然被学校辞退。几个月后，廖临川和我都被学校勒令退学。但在大化指导下的“复活社”却一直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在困难的处境中坚持了下来，一直到重庆解放。

在大化离校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比较熟识的同学聚集在他房里。大家感到气愤，又为他的离去感到依恋和惆怅。他的情绪却还是很好，微笑着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在这里呆不久的，我也没有打算久呆。”问他将到哪里去呢？他还是微笑着说，到我想去的地方去。他将两箱他的木刻的底版托负给一位四川籍的同学刘之俊保管（刘之俊是“复活社”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这两箱木刻底版由大化的亲密女友贾如珍取了去）。

他走后就没有消息，约一个月后，有一个黄昏，我在学校附近的化龙桥街上碰到了他。

他告诉我说就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不久将到“那边”去，只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和我握别了。后来我得知他已成行，就写了一首送给他的诗：《寄D·X——一个木刻工作者》，发表在靳以先生编的《文群》副刊上，诗相当长，靳以作了一些删节。几年前，友人为我查找了旧报，抄寄了来。我曾考虑收入集中，却终于没有。因为那是写得太粗糙太幼稚了。但从中还是可以反映出我和同学们对他的感情。这里我就摘引几句：“几片木头，几把刀，披一身风沙，你来了……你教我们唱歌，教我们演戏，教我们认识人间的真理……我们爱你，敬你，在我们眼里，你是一颗亮星……你走了，我们的心也生了翅膀，飞到遥远遥远的你生活和战斗的地方……我们记住了你留给我们的话：‘不要珍惜过去的珍珠的日子，珍珠的梦，吹开新生花朵的，你们是春天的风’。”最后那一段所写的他留给我们的话，我想未必他真是这样说的，只是，他的确热忱地表示过对我们的期望。我看见过两份内部材料，都说他是1940年春到延安的。但我这首诗的末尾注明了是写于1939

年12月12日。那么，他离开重庆的日期应该是在这以前。

后来，我们知道了他在延安主演《兄妹开荒》的盛况，深以他曾经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为荣。我相信我们还会见到的。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却得知他在东北翻车遇难的消息，使我深感悲痛。1988年

我的照相册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打开的书，那么，照片就是最真实的插图。

我的照片很有一些。有的已安置在照片册上，大多数还散放着没有清理。其中几乎都是近十年照的。在解放以前——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私人照相机还很不普及，我无力购买，要照相大都要到照相馆去，所以拍照不多，解放以后两次抄家，全部搜去了，后来虽然退还，又遗失了一些。但我幼年时期和后来求学的各个阶段，以及开始走向社会时，都还多多少少的各留下了一点。其中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几张，是很值得珍贵的。

一张是我和曾祖母，还有几位叔父、姑姑合照的。当时我大约是3岁吧，戴着大绒球顶的瓜皮帽，穿着黑色的小马褂和浅色的长袍，站在曾祖母的旁边，圆圆的脸，稍稍歪着头，大睁着惊奇的眼睛望向前面。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照相。

一张是我和姑姑合照的。姑姑（那时是中学生）坐在椅子上。我站在一边，拿着一本书，似乎很用功，但眼睛却望着照相机，当时大约是八、九岁，不长的头发搭向前额，穿着毛线衣，黑长裤。

一张是我和一个远房的叔祖母，还有妹妹，几个堂弟合照的，我留着分头，穿着双口袋衬衫，短西服裤，背着手站着，装着雄赳赳的模样，当时大约十一、二岁。

这几张照片都是在照相馆照的。风云变幻，其间已流逝过五、六十年的时光。照片已经破损并发黄了，照片上的人大都已不在人世了。我也垂垂老矣！看着幼年时的那几张照片，真难以相信那就是自己。那以惊奇的眼睛望向前面的3岁小孩，他看到了什么呢？他能看见什么呢……

我的业余兴趣

我的兴趣较广泛，爱好较多，那渊源还是在于我的青少年时期。

看到我这么老迈瘦弱，未必会有人相信我少年时曾立志想当一名运动员。我幼小时经常玩“侦探捉强盗”一类的游戏，和同伴们在大街小巷中出入奔跑。进初中时，我狂热地爱上了足球，是一个自以为很不错的守门员。

后来还练习中距离赛跑，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市中学运动会的比赛。我也喜欢打篮球、排球，喜欢游泳。

读高中时，我又热衷于唱歌，演戏。我的嗓子似乎还不错，但跑调很厉害。偶而一声高啸也许可以听得过去，唱整支歌就不行了。在高中、大学时代，我一直没有停止话剧的演出活动，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以前，我当过几个月的职业演员。在解放前半年，我在鸡公山中学教书时，还和学生一道登过台。

中学时期，我喜欢下象棋。读大学时，则迷醉于桥牌，有一段时间，消耗在上面的时间大概比我上课的时间少不了多少。

解放以后，我几乎停止了体育活动，只是偶尔游游水。在我的影响下，我的三个孩子在十多岁时都已能横渡长江。在十年前，我教我的第二个男孩和他的伙伴们踢足球，旁边的观众中，有人猜测我是“老湖北队的”，这不免使我得意。其实我只能做做样子。篮球、排球已经与我无缘了。但对体育的兴趣还保留，很关心体育动态，喜欢阅读一些有关运动员的传记，而在荧光屏前，我是每一场运动比赛的忠实观众。

当然，我再也没有粉墨登场了。不过，话剧、电影我还是非常爱好。至于音乐，那是我一直保留下来的嗜好。听听好的唱片、好的录音带，参加一场好的音乐会，在我都是一种享受。不过，近年来，这种好的音乐会实在不多。偶尔我还唱歌，在海边，在大江上，在草原上，在大森林中……或是当郁闷的时候。二十多年前，我常抱着出世不久的第二个男孩，轻声唱印度尼西亚的民歌《宝贝》，现在他已长得比我还高了。前两个月，我得了一个孙女，我又常抱着她唱“阿拉木罕怎么样？她是不胖也不瘦……”，将这当作了催眠曲，而她果然也就在我的歌声中入睡。

我喜欢美术，从高更、珂勒惠支等的画册，到卜劳恩的漫画集《父与子》，我都珍藏。

我也喜欢旅行，正如我引用过的一位美国女诗人的诗：“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也喜欢……总之，广泛的兴趣调剂了我的生活，也使我的感情不像我的头发那样苍白，使我的心不像我的前额那样满是皱纹。

“老夫聊发少年狂”，“一事能狂便少年”，那种境界，我心向往之。在一部有关我的电视片中，我觉得最值得珍贵的镜头是我和少年们一道踢足球，虽然我只踢了几分钟。

我的“书法”

最近看到了翼南发表在《今古传奇》上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他将我用毛笔在他的一本纪念册上写的两句话给程云同志看过，“艺术家程云极称道曾卓的书法”云云。我忍不住呵呵大笑，不是高兴于他称道了我的书法，而是讶然于我的“书法”（这的确是需要加引号的）竟受到了称道。

前些天去一家医院进行体检。院方领导要我写几句话留念。笔墨纸张

都已准备好了。我再三说明我的字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他们认为我是客气谦虚。情不可却，只有硬着头皮在洁白的宣纸上写了几行，真是信笔挥来，在气势上可说是“龙飞凤舞”，如果看字，评之曰“不堪入目”可谓恰如其分。我为白白浪费了一张宣纸而惋惜，更愧对主人的盛情，我感到主人也因为出乎他们的意外而有些尴尬。

我的父亲的字写得不好，他可能有一些痛苦的经验，因而经常告诫我要练好字，说字是“门面”，字写得不好将来在社会上会被人看不起。我进小学前就描过字，写过九宫格，临过柳体、颜体。但都只是——用母亲的话说——“鬼画桃符”，草草写完，脸上手上还有墨迹，就冲向门外打球或作游戏去了，母亲追都追不及。在进初中以后，我就几乎不用毛笔了。

当年有人写信给鲁迅先生称赞他的字。鲁迅回信说，他的字谈不上好，但也写了50年了，当然大致还看得过去。而我写字已60多年了，不但不成体，而且简直不成形，这当然因为我缺乏基本功，没有苦练过。我又总是图快，牛汉说我“他连写字都是匆忙中一挥而就的，我没有见过他写过工整的楷书”。而我还有一种自我解嘲，我的字不好可能还有一个天分问题，“三分人事七分天”，不是有许多人也没苦练过而写的字还颇看得过去么？！

由于字不好，的确使我吃过一些亏，遇到过一些难堪的场面。念书时常常因字不好而受到老师的批评且不说了。当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个职业就是教高中三年级的语文。我在讲台上先发制人，声明我的字很坏。而在讲课中总是半背着黑板随意而划，用以为我的字的拙劣作掩饰，但我还是因同学们的轻视的眼光而惶然。好在我的课讲得还不是那样糟糕，所以没有被轰下去。这些年来，在游览一些名胜或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时，需用毛笔题字时我就远远躲开了。有时采取别人写字我和其他不善写字的人共同署名的办法，也应付过好几次。有时被逼得不得不写，那结果就往往使主客双方都感到有些尴尬，一如我前面就提到的那一次。

但我还是有的字被制成了版和悬挂在公共场合，熟悉的友人偶尔向我提到时，脸上都浮显着一种——怎么说呢，就说是“神秘的微笑”吧。

研究者说，字与为人很有关系。信然。从我的字就可以看出我的浮躁、稚拙、不羁的性格。程云同志当是在“不羁”这一点上称道了我的“书法”的。有友人劝我多写写毛笔字，并送来了文房四宝，说练字也是气功的一种，并可养性。我很感谢他的好意，并信服他所说的道理。俗语说：“八十岁学吹鼓手”，我何妨七十岁来学书法呢。

我下定决心从明日开始。不过，“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还是蹉跎复蹉跎。冷静一想，又不免感叹“明日何其少”了。

一次难忘的险遇

旅行诚然是生活中的一大快乐。不仅是名山大川，就是一座小小的县城，一个僻远的村庄，我都愿意看看，如果我没有去过的话。只是在旅途中也往往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甚至使得你烦恼、狼狈的事。这里我想谈谈

我的一次遭遇。1988年的12月，应联邦德国一位友人的邀请到那边进行访问。我出过国，那是参加一个代表团，带有翻译，一切事务有人照管。而这一次我是单独出行。出国机票是德国友人寄来的，泰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要去香港登机。我于起飞的头一天乘火车从深圳到九龙，是晚间到达的。在车站前商场的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位朋友，他要我等着，他有事，将请一位先生来接我，那位先生的特征是留着大胡子。我置身在熙熙攘攘的商场，守着行李。过了四十多分钟，接我的人来了，虽留着大胡子，却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瘦瘦的年轻人，穿着随便，又显得潇洒。他帮我叫了一部出租车。上车后，我们简单地交谈了一下，他就不大说话了。他告知了他的姓名。职业呢？他说没有正式职业，是画家。不到一小时就到了我那位朋友的家。他的妻子回大陆了，他要我和大胡子都住在那里。明晚他要参加一个宴会不能送我，还是请大胡子代劳。我们谈到深夜。第二天起床后，吃完早点，我就独自上街了。朋友要我下午五点钟前赶回来，因为飞机是晚七点起飞。他叮嘱大胡子在家里等我。我到中环路和海边看了看，到几家书店逛了逛，后到三联书店去看一位朋友，她请我吃了午饭，谈了些香港的情况，我就赶回住处了，看看表，五点还差一刻。上到三楼，我看见那位大胡子艺术家坐在门口的楼梯上。看到我，无精打采地咕哝了一声算是招呼。为什么不进房呢？他说把交给他的钥匙丢在房里了。我说赶快找主人吧。他说打过电话，有事出去了。我愣了一会，也就在他旁边的台阶上坐下。大胡子再也不说话了，用一把剪刀在剪一个饮料罐。我告诉他，飞机七点起飞，我的机票和行李都在房里呢。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低声地说“我知道，”又继续专心地剪他的玩意儿。我心如火焚，但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一会儿，他似乎完成了他的杰作，站起来，用剪过的罐头皮——原来他是剪了一把钥匙，去开铁门的锁，居然打开了。那一声“咔嚓”，在我听来是最美丽的音乐，心境豁然开朗，对他的感激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但我高兴得太早了，他的杰作对于那正式大门的锁毫不起作用。他左试右试，大门就是打不开。他又坐下了，还是那么镇定自若。他拿出烟，给了我一支。我们不声不响地并坐在台阶上抽烟，我提出是不是去找一个锁匠。他摇摇头，意思似乎是一时难找。我真想大声问他：“那么怎么办呢？”但还是忍住了。我又想提出是不是把门砸开，但也知道这是不行的。我又幻想着念几句“芝麻，芝麻”，大门会不会自动打开呢。我苦笑了一下。对这位大胡子产生了恼怒的心情。如果是熟人，我早就要将他骂得狗血淋头了。但我只是抽着烟，并不时看看表，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五点半，五点三十六分，五点四十分……我完全绝望了，再等下去就赶不上飞机了，开始想着是不是去打电话通知将在德国机场接我的德国朋友和我的在德国进修的儿子，想着回到武汉后如何向为我这次德国之行忙碌了半个月、殷殷送我上火车的老伴交待……而那个糊涂蛋大胡子只是不声不响地抽烟。反正又不是他的事，他没必要着急。只是，我斜眼看去，他额上已沁出了几滴汗珠。天啦，难道我的这次难得的旅行就这样葬送在这个大胡子里吗？！我陡地站了起来，大胡子仰起头睁大了眼看看我……而这时，我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大胡子也站了起来。呵，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是我那位朋友回来了。他看到我和大胡子站在门口感到很惊讶：“怎么，你们还没有走？”

当他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后，捶了大胡子一下，回头对我说：“真是你的运气，我原想直接去参加一个宴会，临时想到该换一套衣服，这才回来的。”

大胡子叫了出租车送我上机场，还为我付了车费。当我在飞机上坐定后，突然想着：如果我现在还和那该死的大胡子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呢？……

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

——记我与胡风的关系谈到胡风先生与我的关系，如果仅仅限于交往，那是十分简单的，用不多的话就可以说清楚了。但如果从另一面看，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不仅是指我曾被定为所谓的“集团骨干分子”，因而长达近25年在一种险恶的处境中，而且也是指在文学思想上和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

1940年的夏天，胡风当时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邹荻帆带我到他家去看他，那是离学校不远的农村中的一间小土房。他一家人正围着一张低矮的小桌吃晚饭。他穿着背心和短裤。他赶快扒完几口饭，过来接待我们。那以后不久，也是荻帆带我到重庆张家花园中华文协去看艾青，他也正在那里。再就是1947年春在南京，剧专剧团公演路翎的话剧《云雀》，我在后台碰见了——他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看演出的。解放前我们就只见过这么三次面。在重庆一般的文学集会的场合，我还看到过他，那就谈不上什么了。就是这三次见面，时间也都很短暂，没有进行多的交谈。但每一次见面都还留下了一点印象。初次见面的那一回，他交了一叠稿纸给荻帆，出来后荻帆告诉我，那是他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部分原稿，要抄一份送往延安去。第二次见面的那一回，他和艾青正在对将要在《七月》上发表的吕荧写的《人的花朵》一文进行讨论。1947年的那一次，有人谈到一位熟人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他听后默然久之，但可以感到他心情的激动。

我没有在他编的《七月》、《希望》上发表过东西。1942年，我听说他认为我的一篇受到有一些人赞扬的散文诗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他当时正在编《七月诗丛》，约了我的几个朋友編集，却撇下了我，这很使年少气盛的我感到难堪，而且颇为忿忿，就发誓不向他编的刊物投稿。

解放初期，我们通过两次信，一次是我请他对我发表的一个独幕剧提提意见，他回信倒是给予了鼓励的。另一次是，我认为他在一本文集的后记中，批评一位同志的态度和语气是过分了。他回了一封短信说：你不认为他写的那篇批评我的文章的态度和语气是更过分么？我把那篇文章找来看了，就再没有说什么。

从1947年夏到1953年春，绿原和我都在武汉。绿原和胡风保持着联系，有时他将胡风的来信给我看看，特别是解放以后的那几年间。1948年在香港展开的对胡风的批评并没有能说服我，倒是后来胡风作为回答的那本《论现实主义的路》，我认为很有分量、很有水平的。对于解放以后他的处境我颇为同情。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和几个朋友一道去看过他几次，这才有机会听到他较多的谈话，直接对他有一些了解。他对当时的文艺现状是不满的，对于那次文代会认为也难以解决问题，

他也谈到了几年来自己的遭遇，我感到了他心情的苦闷、激动和焦躁。我后来和绿原谈到，他要冷静一点才好……。绿原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路翎也有同感。绿原要我直接找胡风坦诚地谈一谈，说这是有必要的。但我感到，我和他不熟，又是后辈，不便谈，就罢了。一年多以后，胡风托绿原转告我，要我对他过去的理论工作谈一谈意见。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谈。而且，那正是1955年大风暴的前夕，根本不是谈理论问题的气候了。

我们过去的交往不过就是如此，有什么可多说呢？

然而，我年轻时在文艺思想上，特别是在对于诗的观点上，是深受他的影响的。

我最初是由于对鲁迅先生的热爱而注意到他的。我将他看作是鲁迅的战友和学生，当时有这样看法的人是不不少的。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林语堂论》和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张天翼论》（记得署名是胡丰），他和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战，我都认真阅读过。

那一场由他的一篇文章（那是鲁迅和雪峰授意他写的）而引起的关于两个口号的大论战，是当时我和几个少年朋友们经常的话题。我们未必很了解问题的实质，但本能地是站在鲁迅这一边的。后来，他编的刊物（从《海燕》、《工作与学习丛刊》到《七月》、《希望》）丛书，我大都看过。我认为他是一位严肃认真而且是很高审美水平的编者。他陆续出版的几本论文集，我都反复读过。可以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在对文艺的基本理解上，我受他的影响最大，并培养了我对理论的兴趣。由于我写一点诗，我非常注意他的关于诗的理论。

他强调“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强调诗人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与人民共呼吸；强调诗人必须将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表现为对待生活的激情；强调诗人与诗的一致，诗的表现力与人的战斗力不可分；同时也强调诗必须是诗，对诗的艺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都给了我以教益。我现在对诗的一点理解，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说的他对我的一首散文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评，也曾使我暗自反省，我后来在写诗的道路（也就是在做人的道路）上就有所警惕。而且，我感到可贵的还在于，他的理论文章洋溢着激情，不仅是以道理来说服读者，也是以他燃烧着的心来感染、鼓舞和激励读者的。

由于事态是逐步发展的，对1955年夏季的那一场大风暴，我不能说毫无思想准备，但问题提到了那样的高度，还是令我惊骇和悲痛，虽然我尽可能从大的方面（政治需要），从原则上去加以理解。我自认为虽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但和他并无什么关系，所以在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中，将我定为“骨干分子”，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就处在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对于受到牵连的友人们的消息，几乎一无所知，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一直到1979年的夏天，友人田一文从成都来，说在那边的一家招待所见到了胡风，才澄清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言。那么，他还活着！我为他去了一封问候的信。他很快回了我一封短信，谈了一点他的近况和心情，还对我的一首刚发表的诗提了一点修改意见。看来，他的思路清晰，字迹也还是有力的。不久后他到了北京。

1980年我在北京见到他，却是在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房中。他是由于幻视、幻听被送进来的。那病房宽敞、整洁，而我在精神上总还是感到一

种压抑。我是将近分手三十年后第一次看到他，还可以认得出来，但显得虚弱而衰老。那一天，他的神智还算清醒，能谈谈天，话不多，而且只能用低微的沙哑的声音。他用喜悦的口吻谈到了前些天《光明日报》上登了一则有关他的消息，说那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不带“形容词”。谈到了他被任命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也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出现在艺术研究院张贴出的选民榜上。他指着桌上的一叠书给我们看，说：“那是我过去写的东西，是一位老朋友最近给我送来的，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东西了……”他在喜悦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天真的神情。

他没有提到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只是叹息着说了一句：“我们过去犯了什么法呵！”而当谈到还活着的和已不幸去世的朋友时，他含着泪说：“这些年，他们为我吃苦了……”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怀着这样的希望生活好多年了——正是这样的希望支持我走到今天，支持我走下去。”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他的病态的一面：他还是有一些惶惑甚至惶恐，对有些事将信将疑。我和同去的一个年轻的同伴向他说明了新的大好的形势，尽可能地安慰他。他不断地点头，说：“是这样！是这样！”

第二年，我因工作去上海。他又正住在那里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是由于幻视、幻听比过去严重，从北京转移来的。一般不让人去探望，我设法去看了他一次。只坐了一会。他不大说话，而且露出一种不安的神情。我只好告辞走了。

看起来，他的病情比我在北京去探望他时更严重些，我很担心会恶化。但他终于渐渐好了起来，回到了北京。我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了不少文章，还看到他出席一些会议的报道。

——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带病，仍不肯好好休息。

这几年间，我到北京时，总要抽空去看看他。他静静地微笑着，不大说话。有时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但可以感到他的思路已恢复正常，他的内在精神力量远比身体要强，这从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来。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1985年的元旦。我和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过去被指为“集团骨干分子”的几个朋友一道去看望他，还合照了几张像。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的纪念。

就在那一天，我劝他到湖北走一趟。他已多年没有重回故乡了。他摇摇头，微笑着低声说：“一动不如一静”。那以后不久，武汉将举行“黄鹤楼笔会”，因为他是湖北人，又是诗人，我提议邀请他，虽然我想他是不会来的。意外的，他却表示愿意来。但准备动身前到医院检查，却发现患了癌症，而且已到晚期。后来，一位参加了笔会的友人回到北京后来信说，到医院去看过他，告诉他我们是多么盼望他去。他摇摇头说：“我再也去不成了。”说时热泪盈眶。那么，对于故乡，对于生活，他还有着深深的眷恋……我不知道他临终前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时有着怎样的心情，是不是也热泪盈眶呢？如果是的，那不是伤心的眼泪，而是对生命、对斗争的执着——在他复出后的这五、六年间，他是依然在继续为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追求而斗争着的。在什么地方他写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不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几十年来他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我也亲自听他说过，是由于对党、对群众的信任，支持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他到了晚年，终于亲见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时代；他自己也得以摆脱了被投掷在身上的污秽，站在时代的阳

光下面，而且，他也得以以一个真实的面目，站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中间。

我看到新文学史研究者，将我也看作是“七月派”的一个成员。我并没有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东西。但从诗的战斗方向上说，从诗的总的风格上说，是可以这样看的吧。至于就我个人说，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的，“七月派”诗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我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1992年4月23日附记：这是根据我在1985年所写的《我的悼念》一文改写的。

重读路翎

收到路翎寄来的新出版的《路翎小说选》，感到很喜悦，当即放下手头的事，原只想翻看一下，却情不自禁地读下去了。

这一本《路翎小说选》是由朱珩来编辑并写序，作家出版社出版的。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也曾经出版一本《路翎小说选》。现在新出的这一本，显然编者有意识地避免重复，在选目上仅有少数几篇雷同。这些小说我早就读过，而且不止读过一遍，但那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次重读，就感到新鲜而又熟悉，而且情绪激动，一如当年。于是把他这十年来重新出版的八部著作都取出来翻看了一下，并写信给路翎说我很想写一点什么。

是的，我很想写一点什么。不是评论和研究，只想谈一点心情，一点回忆。

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文学道路起步的时间上，路翎与我是同代人。1939年，他开始在胡风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小说。我首先认真阅读并引起我的注意的是1942年出版的他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胡风在序言中高度的评价当然是一个原因，小说本身也吸引并震撼了我。那以后，我就一直留意他的作品。他是多产的，不断有作品在胡风先后主编的《七月》、《希望》和少数别的报刊上发表。几年中，接连出版了短篇、中篇、长篇、剧本等多种集子。他的每一篇作品，只要能看到的我都阅读过，他所出版的集子我都收藏了。

我年轻时眼高手低却又骄傲自大，对于路翎却是钦佩的。他是最喜爱的作家之一。由于我知道他还小我一岁，这种喜爱中就还夹杂着羡慕甚至嫉妒的因素。

我惊异于他的作品涉及的生活面之广，对生活理解的深刻。各阶层的人物（其中主要的是劳动人民）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且都能刻画得那么生动。没有曲折的情节，也不是仅仅描绘生活的画面。他所展现的是，在黑暗腐朽的旧社会里，在生活的波涛中浮沉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的心灵，他们复杂、细微的感情及其变化。而且，无论是他70万字的大长篇《财主的儿女们》，还是只有一千多字的短篇《滩上》；无论是对受难、挣扎、反抗着的劳动人民的歌颂，还是对统治者、剥削者、市侩们的辛辣的嘲讽，严厉的批判，都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炽烈的感情和对未来的信心。一如他当年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所说的：“无论怎样的苦难在这个时代都能达到光明，却正是光

明，使将来充满希望。这就是我要说的。”（《路翎书信集》第87页）就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融进入作品中的激情，使他的作品闪现着一种异彩，洋溢着一种热力，那往往是能直迫你的内心，感人肺腑的。通过他的作品，使我深感到人生的痛苦与庄严，加强了对黑暗现实的憎恨而又激励着我对未来的希望和追求。在我的人生道路、艺术道路上，一些国内外文学大师和前辈给了我引导和鼓舞，而在同代人当中也有一个人——至少我首先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路翎。我还在他们影响下，化名“柳红”、“马莱”写了十来篇小说，当时友人黄若海来信说，它们在创作风格上，是和路翎相近的。

抗战时期，我和路翎都在重庆。1946年至1947年夏，又回在南京。他有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但我和他没有交往。只是在1947年春，他的剧本《云雀》上演时，我去看戏时才认识了他。后来和冀沅一道到他家吃过一次饭。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在胡风先生家碰见过他两次。都没有深谈。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观察他。他浓眉大眼，颇为英俊。我想到绀弩的一句话：路翎是一个美男子。

在1955年夏季的大风暴中，他作为胡风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子，当然被卷进去了。我也未能幸免。1979年的9月，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已有所改变，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到北京去，见到了几个老朋友。我们相互谈了谈各自的经历。我向他们打听路翎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听说他被囚禁长达20年，其间还住过精神病院。几年前已刑满释放，在街道上作清洁工，住在芳草地，具体住址不详。我和我的同行者周翼南，第二天就赶到了芳草地，花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挨家挨户地询问，人们都不知道路翎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徐嗣兴（这是他的原名）其人。当我们已经绝望时，通过一个老人的指点，在一排简陋的平房中的一间小屋里，找到了他的妻子余明英，路翎因事出去了。余明英见到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她说已二十多年没有见到一个老朋友，也不知他们的消息。她说路翎是1975年才释放的，在街道上扫地，开始每月15元，现已加到20多元。她自己在一家街办工厂做工，每月也可收入20多元，有一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勉强可过。那房间里铺着两张大床，一张破旧的木方桌，桌上放着一份报纸，但没有看到一本书籍或刊物。余明英轻言细语地谈着，可能是由于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处境，只能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打击。但我的心情是沉重的，而且不能不深有感慨。等了好一会，不见路翎面，已是午饭的时间，我们就告辞走了。她也没有留我们，只约定星期日要我们一定再去。后来我们如约去了。路翎见到我丝毫没有激动，一如我们昨天才分手。问到他的情况，他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只是向我打听胡风和别的几个朋友的消息，我告诉他胡风已出狱，现住在成都，并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朋友的情况告诉了他，说现在政治形势已好转，问题会得到公正的解决的。他也并没有表示出欣喜。他说话很有条理，看不出任何精神病兆。但他有时沉默不语，两眼茫然地凝望空间，无意识地移动着下颚的样子，却使我心酸直至心悸。他的冷漠和麻木，有如一座火山的死寂，而那火山曾沸腾着怎样灼人的浆液。经受了二十多年严酷、残暴的打击没有能使他倒下，但却熄灭了他生命中最可宝贵的灵气和激情；也使当年那么英俊、潇洒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须发苍白、满脸皱纹的老头。他的手曾经握笔写出了几百万字震撼人心的作品，现在他却以手在清扫着小巷了。

我们告别时，他没有和我握手，转头就走了。我回头久久地凝望着他的有些佝偻的背影。我感到，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恐怕是很难写作了。没

有想到两年以后，我就在《诗刊》和《青海湖》上读到了他的几首诗。我欣喜地写了一篇短文加以评介，并说“那么，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他就突破了由于深沉的痛苦而产生的迟钝和冷漠，恢复了生活的激情，生活的敏感——根源是对生活的爱。这是真正令人惊奇和欣喜的。一棵枯萎的树又发青了，在时代的阳光下。”对他关注和爱护的人还是不少的。我记得1985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我和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副主编的刘心武同桌吃饭，他告诉我路翎寄去了一篇小说，我问他写得怎样，他回答说还来不及看，“但无论如何，是要发表的”。后来果然发表了。

我知道，这些年来，路翎一直还在埋头写作，回忆录、小说、散文、诗，都发表了一些。也还有一些是没有发表的，我手头就还有他的两份小说原稿。我不能不惋惜地说，要达到他当年的水平是不容易了。

好在他过去出版的主要著作，这十年来都得到了重新出版的机会。那是他从17岁到32岁这15年间的成果。每当收到他寄来的新书时，我都感到喜悦而又不免抚卷叹息。当年他那么年轻却已奉献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而且正日益走向新的高峰。如果不是人为的摧残，他肯定会写出更多更光辉夺目的作品，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对文坛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在海内外注意到他的人还是有的，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总的来看，他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于他还是比较陌生的。每一次收到他的作品时，我都很想写一点什么。但要真正研究他，分析他的作品的内容，在创作方法上的特色，美学上的新的开拓，在现代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那是我无力做到的。这次收到他新出的《路翎小说选》忍不住提起了笔来，那是因为其中头两篇中篇小说《谷》和《青春的祝福》，都是他不满20岁时的作品，我是这一次才有机会重读的。我记得初读这两篇作品时的激动的心情，现在我已年过70的老人了，历尽沧桑，感情上已经受过血与火的磨炼，但在重读时，我的情绪也还是随之起伏。特别是其中分别写到两个倾向进步的青年，在时代的风雨中和反动政治的压迫下，过着贫困不安的生活，经历着苦难、搏击、反抗……，使我回忆起朋友们的和我自己的青春岁月。在《青春的祝福》中的那位女主角，十八岁的单纯的姑娘章华云，在她的进步的哥哥的启发下，在严酷的生活的锻炼中渐渐觉醒，认识到生活的真理。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章华云认识到：“接触一切人们，为他们工作，多么好！她胸中充满了阳光和诗，充满了新生的祈祷。幸福又降下来了，这次是用了想象的形式。逾越过沉重的江波和层叠的峰峦，前面是无数的人，后面也是无数的人，她向前走，勇敢地向前走……”这也表达了当年许多进步青年的心情。而他们，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也要经受严酷的考验的，譬如路翎自己。我不能不深有感慨。而且，那位年轻姑娘的纯洁的祝福，现在听来也还是给人以振奋的呼唤。

路翎的作品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过去的许多批判却大都失之公允。跳动在他作品中的健旺的心和对人生追求的激情是十分可贵的。年轻的路翎通过他的作品给了我力量和鼓舞。现在我老了，那个年轻的路翎的作品还温暖着我的心，给我以热力。1992年11月28日

路翎纪念

2月14日早晨，接到一位朋友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路翎于2月12日去世，紧接着又收到两位朋友的信，告知同一消息。他去世的那天是阴历正月初三，还在节日的气氛中。

这几年来，有好几位老朋友先后去世，我都只是默默地承受死别的悲哀。对于路翎，却想来写几句。

我和他是1941年在重庆北碚相识的，至今已有五十多年了，却来往很少。但是，在同辈作家中，他是我最为喜爱，最为钦佩，也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因而在感情上，我是对他十分亲近的。

我不能，也不必在这里对他的文学事业作出评价，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任务。我只想谈一点这样的感受：当他进行创作时，总是力图走进他所创造的世界，不仅描写出生活里的形形色色，而且通过体验去表达人物内心深处隐蔽的感情、情绪的激荡变化，并使读者感同身受地去体验人物的感情。他在创作过程中总是满怀激情，寄寓着他对人民的热爱，对黑暗势力的憎恨，对理想的追求，对明天的信心。由于他的这种激情，就使他的小说大都具有诗的素质，闪耀着光华，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是感人肺腑的。他的小说的题材主要是劳动人民，也写知识分子、商人、官吏、士兵、地主……我从中扩大了生活的视野，激扬了对生活的热爱，在艺术上也得到了启发。解放前我用另几个笔名写出的一些短篇小说，是很受他的影响的。

由于从事进步活动，他读到高中二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从此就先后在几个单位当小职员，并在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他是勤奋的，在解放前的十年中已有两百多万字的作品问世。

主要是写小说，也写文学评论、剧本、散文、诗歌，也都有其特色，真是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他初涉文坛时，只有十七岁，即受到胡风先生的重视。他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在20岁左右，即完成了被誉为“青春的诗”的长篇《财主的儿女们》。他受到了不少赞扬，也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批评，而他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从他194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开始，到1953年他深入抗美援朝前线，写出了《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受到广泛注意的小说，可以看出，他在艺术上是逐渐走向成熟，肯定会攀登新的高峰，作出更大的贡献，而1955年在反胡风的那场大风暴中，他被吞没了，当时才只有32岁。

我也受到牵连。在艰难的处境中，常常念及一些同命运的友人，其中也包括路翎。我在痛苦和困惑的心情中写过一篇短文，引用了他的两句话：“人不是神，不能承担这样严酷的考验；人应该成为神，必须承担这样严酷的考验。”我知道他受到的打击一定比我更沉重，他将怎样承担呢？1979年9月，我的问题还未解决，但总的政治形势已大有好转，我有机会到北京，见到绿原、牛汉，向他们打听路翎的消息。他们也多年没见到他了。只听说他已出狱，住在芳草地，具体地址不详。我决心去看看他，和同行的翼南到芳草地挨户挨家地探询，终于找到了他的住所。在这以前，我最后见到他是1953年秋季，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不久，是那样英俊洒脱。而现在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了。而且神情淡漠，完全没

有当年的热情和气概。看着他，看着他的贫民窑似的简陋、萧索，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没有一本书刊的家，我可以想象他身心所受到的巨大的摧残，可以想象他目前清苦的生活。他一点也没有谈及这二十多年来的遭遇，只是询问了一些友人的情况。倒是他的妻徐明英告诉我，他因受刺激过深，曾经住过精神病院。这几年是在打扫街道，每月收入约20元。她自己则在街办工厂劳动，每月收入也不足30元。我无言，感到了沉重的悲凉。

第二年，胡风问题平反。他的处境和待遇得到了根本改善。他又埋头于写作，发表过一些诗、散文、小说，表达了他在新时期的感受和对新生活的热爱，但是，已缺少那种灵气和光华了。恐怕还有不少作品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我手头就有他的几篇原稿。他能够重新执笔总是一种可喜的事。我曾就他的作品写过三篇评介文字，希望他能因此感到一点温暖。我更希望时间和新的生活能治好他心灵上的创伤，重新燃起火焰，并融合这几十年来对人生的深刻感受，写出更为宏丽的作品……但是，现在我只能满足于在灯下翻读这十年来重新出版的他的旧作，好在那已包括了他的一些主要作品。我依然像当年那样心情激荡，并惋惜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作家的殒落，因而思索着一些问题…… 1994年2月28日 515 曾卓文集

悼春芳

在寄来春芳的讣告的同时，荻帆还写了一封短简：我难于忍受这样的悲痛，她觉撒手而去。

心脏与尿毒病并发，二者相克。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不愿死在医院。她是死在我们长年相聚的小房我深深感到没有还清我对她的爱情的债务。我原指望在余年与她相亲相爱过些时日。

信是在匆忙中写的，从这简短的几句话中，我理解了他的哀痛心情。

我为春芳的离去难过，我又失去了一位年轻时代的友人。多年来，每次见到，她总是亲切地接待我，给我许多照顾。我也为荻帆难过，他将怎样承担这永别的悲痛，并忍受今后的孤寂的日子呢？失去了与他在风风雨雨的人生长途上患难与共，相依为命五十年的伴侣，那种孤寂与空虚，是任何别的感情难以填补的。

我是在1940年夏天，重庆北碚认识荻帆的，他那时从抗日战场来到后方，打算投考复旦大学，住在学校边上的一间小茅屋里。通过荻帆，我认识了春芳，她已在复旦大学念书，也喜欢文艺，倾向进步。他们是通过举办小型的文艺晚会开始交往的。认识也并不久，已开始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正由于这样，他们——主要是春芳，有时就乐于有我在场。陪伴他们在嘉陵江边，在星光下，散步，谈天，念诗，唱歌，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夏天，虽然我们当时穷得连吃一碗大肉面都是难得的享受。荻帆进了复旦大学以后，1941年夏天到1942的春天，我也在北碚工作，和他们也常在一起。后我被迫离开北碚，春芳也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勒令退学，她和荻帆后来辗转去了成都。我在重庆和他们保持着书信联系。1947年我们又相聚在武汉。

那时他们已有了孩子了。解放前半年，他们先后到香港，在荃麟同志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解放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到了北京。我每到北京必到他们家做客，有时还住在那里。五十年来，只有我在困厄的那二十多年里，不能和他们交往和联系。虽然我已在一个可怕的罪名下为人神共弃，但我相信有一些朋友是理解我的清白和无辜的，其中就有荻帆和春芳。在六十年代初，荻帆到武汉时，就敢于来我家看我，并转达了春芳的关怀。在1979年秋，我的问题还未解决，到北京去他们家时，他们还是殷切地接待我，一如当年……荻帆于今年四月出国访问，得知春芳病重的消息后，当即动身提前飞回北京。他来信说，春芳经过手术后，已度过了危险期，从医院回到了家中。我因而感到了欣慰。没有想到她还是很快撒手而去了。

她和荻帆共过患难，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荻帆遭罪时，她表现得那样坚强、勇敢，是一个好妻子。她年轻时就要求进步，几十年来，从事革命工作，默默地奉献自己。她可以安息了。但是，荻帆将永久记得她，朋友们也难以忘怀她。荻帆寄来了他今年出国前和她在北海公园的一张合影——这是他们最后一张合影了。我看着照片，有许多感慨。认识春芳时，她是十八岁的少女。荻帆和朋友们都喊她“小史”（她姓史），岁月如流，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她已先离荻帆和朋友们而去，当我在哀痛的心情中写这篇短文时，也真正地感到自己老了。

悼振武

得知王振武同志去世的消息后，我的心情颇为沉重，既感到沉痛，也感到惋惜。

我们相识虽有二十五年，却来往很少。但在我的感情上和他是很近的。那是因为他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和我也很熟识，这样在感情上就形成了一个纽带。他们多次向我谈及他，使我得知了他的为人，其中有一些事迹和表现是很感人的，而每次和他见面时，他的朴质和真诚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身上毫无飞扬浮躁之气，这在一般已有一点名气的中青年作家中颇为难得。三年多前，他身患重病后的顽强精神更是令我感动。

我们常常谈到人生必须拼搏。他正是与病魔拼搏过来的。他脑溢血后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一面坚持锻炼，一面还不懈地写作。去年，他还又一次跋山涉水去了鄂西山区，看望他所熟悉的那里的土地，那里的人民。他做出这一切，是承受了怎样的身体上的痛苦，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他在重病中曾衷心地感叹过：“生活多么美！阳光多么美！”他的拼搏精神正是来源于对生活的执着，对生活的爱。

他只读过小学，后来进了戏校，长期当舞蹈演员。他的知识和文学素养主要是靠刻苦地自修。他在一九八一年才开始写小说。他发表第二篇小说《最后一篓春茶》就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为什么他在创作中一开始就能够闪现光辉呢？这当然有各种因素，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真正深入了生活，而且能够以比较正确的态度对待生活。几年以前，我曾在一篇谈到

他的短文中这样说过：“他已发表的和还未发表的小说，都是取材于鄂西山区。二十多年来，他作为一个剧团的创作人员，经常下到那里去，有时一年去两次，一去就是几个月，他熟悉那里的景色、风俗、人情、历史，谈起来如数家珍。他爱那一片荒僻、闭塞然而美丽、富饶的土地，将那当作了自己的故乡。更重要的是，他爱那里的勤劳、纯朴、善良的人民。他和他们成了真正的朋友，人们愿意向他袒露自己内心的隐秘，向他诉说自己的苦恼、悲哀、欢乐。”另外，他的创作态度也是认真严肃的，不是猎奇，不是追求飘渺的诗情，而是通过生活的真实去追求艺术的创造，通过艺术的真实去追求人生的哲理。他的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对待艺术的态度使他将有一个光辉的前景。因而他过早地离去使我们不能不深为惋惜。

振武比我年轻得多。天道无常，现在是我来为他写悼念的文字。而且，我从他身上可以汲取到许多东西。对他的哀思也是对自己的激励。

我最后一次与他相处是在去年春节。我邀他到几个朋友家里聚会。这在他是很难得的，他显得十分高兴。返回时，我们乘坐的汽车无法开进他住家的那条狭窄的小巷。他下车后，坚决谢绝我的搀扶，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不时回头向我笑笑。他走得很慢，但走得很踏实。他的安详的笑容和他的踏实的脚步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迟来的悼念

——怀伍禾

从一位友人寄来的羊城晚报的副刊《花地》上，读到了在《诗人伍禾十五周年祭》的标题下刊登着的绀弩前几年写的追念伍禾的三言诗，和贺苏、周敏新写的悼诗。我的心感到沉重。真是岁月如流，伍禾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我早已应该写下我的悼念，却一直拖延着没有动笔。这些年来，如果要写哀悼的文字，那是不止两篇、三篇的。我都没有写。不是对于战友的忘情，而是我想逃避，不愿让自己又一次沉入哀痛的心情中。但我也并不能得到心的安宁，每一念及他们，就感到愧疚和不安。特别是对于伍禾，以我们的友谊，不应该默无一言，而且他是在那样悲惨的情况下去世的，身后又是那样地寂寞。友人将关于伍禾的悼诗寄来，当是好意。我却从中感到了无言的责备：“难道你不应该写点什么吗？”是的，我应该写一点什么，虽然，只能是简短的……抗战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刚刚开始报纸的副刊上投稿的时候，已经知道伍禾的名字，他当时在武汉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诗人了。我没有机会结识他。抗战期间，他在桂林为一家文艺刊物编诗。我在重庆。他写信来约稿，这样我们开始了通信。我们见面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在国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撤退中，他和妻子聂碧莲带着一个不足一岁的婴儿，在极其艰困、危险的情况下，到了重庆（他在《抗战文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逃难途中的情况），在一家从桂林迁来的出版社工作，名义上是经理。但那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就只有他一个，除了编辑之外的一切事务：校对、跑印刷厂、发行……以至勤杂，他都必需担当起来。我当时住在重庆

郊区，每当进城时，就去看他。出版社在一个小小的木板楼上，而那里也就是他的家了。在堆满书、纸型和杂物的空隙中，有一张床和一张破旧的三斗桌。他热情地接待我，但难得安静地坐下来，往往是一面和我谈天，一面处理着出版社的工作或是家务。他的工作繁重，做每一件事又都极其认真，因而就异常忙碌。而生活是清苦的，他没有时间写稿，靠一点微薄的工资负担一个家。有几个友人认为他得到的待遇不大公平而愤愤。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怨言。他说：“一切为了事业……”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将他们出的书给我看，赞扬着那些作品。我们交往密切起来是在武汉。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夏初，他脱离了那家出版社，回到了武汉。我不久也回到了武汉。他主编一家报纸的副刊《长江》。我则从葛琴手中接编大刚报的副刊《大江》。我们都住在武昌，经常见面，谈天、谈大局，也交换一些工作上的意见。有时，两人一道过江到汉口发稿。

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进步的文艺运动已经被反动派扼制得近乎窒息状态。在武汉，更是一片荒凉。而伍禾所在的那家报纸是国民党的省报。他是在“虎穴”里工作，处境就更为险恶。

然而，在他所编的副刊上刊登的作品，大都是反映了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的。当然，他常常受到警告，友人们有时也劝他不要“赤膊上阵”。有一次，他对我说：“是的，应该注意策略。但退让只能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否则，编这个副刊还有什么意义呢？冒一点风险，也是必要的。现在做什么工作能不承担一点风险呢？除非躺下来睡大觉。”他在一则编后记中写道：当千军万马奔腾在几乎是一整个亚洲大陆的时候，当壮健的骑者在冒死犯难用生命创造历史的时候，我们却伏在一个静如死水的斗室中，吮笔编写。

……

壮健的读者无需祝福，更何况“北风吹断马嘶声”。我的亲爱的友人，能发光么？一点萤火，一支烛光，一把炬火，都好都好，请把这个瑰奇的时代照得通明！

他工作的那间小厢房，是名副其实的斗室，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棺材那样狭长，而且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斗室。他坐在纸窗前，埋头在破旧的条桌上，他的心和“壮健的骑者”的心一同跳动。而且，他呼唤友人们做萤火，做烛光，做炬火，来照明这个瑰奇的时代。——我们应该想到，他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在刀枪剑戟丛中，这样来公开宣告自己的心情和希望的。

而同时，他也注意在文学创作上抵制那些不良的倾向。当时泛滥成灾的黄色文化当然是为他所厌恶的，而他也不满意于那些主观公式主义的作品，那些顾影自怜的感伤主义的作品，那些浅薄的乐观主义的空洞的叫喊……。而对于真正从生活中来的，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真实的作品，虽然在技巧上比较差，他却乐于推荐给读者。他坚持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

伍禾不止一次地对我谈到雪峰同志的一句话：做任何工作，即使看来是小小的工作，都应该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精神，伍禾正是以这样的精神来做副刊编辑工作的。

他认真阅读来稿，发现了一篇较好的作品就异常高兴，他用毛笔一丝不苟地和分散在各地的作者们写信。他联系了一些知名的作家，如聂绀弩、骆宾基、邹荻帆等，而更多的是年轻的作者，如田野、苏汜、何钟辛、葛珍……。

他们对他们进行了具体的帮助，为他们的成长付出了心血。在当时当地，《长江》受到许多倾向进步、要求进步的读者的关注和爱护也正是必然的。伍禾正是从读者中，从“声气相投”的作者中汲取了力量，从对自己工作意义的认识，从对人民、对时代的责任感中汲取力量的。他在艰危的处境中，在清贫的生活中，勤劳地而且是乐观地工作着。诚然，《长江》上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作，即使从当时整个斗争的形势看，《长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是有限的。然而，它曾经团结了一批作者，它曾经照亮了黑暗的一角，它曾经温暖和鼓舞了许多读者的心……武汉终于解放了，全国终于解放了。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能够畅谈的机会不多。偶尔见面，感到他心情健旺，身体也比过去好了。而且，在生活上也开始摆脱了贫困。

没有想到，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们都被卷入了一阵突然而来的旋风中。我们完全被隔绝了。两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和他在一起工作的郑思已离开了人间，那么，伍禾的命运呢？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呢？我无从打听。

一九五七年的秋天，我们偶然相遇了，那是在一家医院的门诊部里。分手两年，却恍如隔世。有多少话要倾吐，却只是简单地交换了一点彼此的情况。他告诉我，他现在一家出版社当普通的编辑，即将下乡去劳动。那以后不久，我却偶然听说，在乡下，他又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那时“反右”的高潮早已过去，他是“补划”的。

我们再见面已经是一九六二年了。他已从乡下调回武汉，工作关系转到了省图书馆。他原就有肺病，一九五五年受审查期间，房间当西晒，又不通风，他就只有睡在泼过水的水泥地上，这样度过了酷暑，却因而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在乡下劳动，使病加重了。现在不能上班，就在家整理关于鲁迅的资料。他还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工作着。

他的问题并未解决，所以来看他的朋友很少。我的处境当然不会比他好，只能偶尔到他家去坐坐。虽然我们在态度上还是亲切的，但却又可以感到某种无形的距离，我们不能也不愿深谈，只是一般地聊聊天，从中得到一点温暖。这也是“相濡以沫”吧。他当时开始研究围棋。当我们相对无言时，他就要我和他对弈。我完全是外行，而且对此道并无兴趣，但为了不让他扫兴，有时就陪他下一盘。同时我感到了他内心的深深的寂寞……

后来，就是那动荡混乱的时期。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已病得很严重了，不能出门走动。我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和一些见闻。他流露出对现状的某种困惑和迷茫，后来激动起来了，说：“看来，我要戴着‘帽子’去见马克思了。哈哈！……”我打断了他的话，提议来下一盘棋。他同意了。但一反常例，下棋时心不在焉，一下子谈到解放前的某些遭遇，一下子谈到对某个友人的不满。后来，他突然说：“你看需不需要我再为你写一点材料？那对你或者有点好处的……”他的话使我感到意外，而且，老实说，我不相信材料可以决定或改变我的命运，因为，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所以我含含糊糊地答复了他，而且立即转变了话题。两三年后，我在“牛棚”中，从一个审讯我的“小将”口中得知了他的死讯。又过了几年，我才从一位友人那里得知他死的详情：他不但心脏病严重，而且由于受到各种摧残，死前已经精神失常了……

在一九八一年，他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我参加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哀乐声中，在他的遗像前，过去交往的种种情景都浮上了心头。我从他的

亲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他的欣慰：他曾经以他的生命的热发出他的光，就算那只是“一点萤火，一支烛光”吧，但已融合在时代的光华中。此外何所求呢？我也从他亲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他对我——一个老朋友的期望：为了珍惜幸存的生命，要让它更旺地燃烧…… 1983年7月31日 825 曾卓文集

遥 寄

——悼念李先盛

你是在为小学生讲公开课时，突然声音暗哑，虚汗满额，倒在讲台上的，你的口袋中藏着医生两天前为你开的病休条。你死时52岁，正当壮年。同事们、学生们和当地的乡亲们都很哀伤。由于对你的事迹逐渐有所了解，引起了愈来愈多的人对你的关注和崇敬。而生前，你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教了几十年书的乡村教师，最后是一所山区小学的校长。

我来到黄陂县——那也是我的家乡，来到你所在的中心小学。听你的同事们、你的学生们满含感情地讲述你生前的种种感人的情况。长年的劳累使你落下多种疾病。拖着病弱的身子你还是孜孜不倦地工作，经常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为孩子们的成长呕心沥血，为乡亲们的脱贫致富多方设计。多次以粮食和金钱资助学生和同事，而你自己也一直在贫困中……在你所做的那每一件似乎是平凡的小事中，体现着你的不平凡的意志，不平凡的精神。每一件事迹都闪耀着光点，许许多多光点集中起来就成为火炬，照亮了你的灵魂，也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你使我又一次体会到，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要以非凡的意志和非凡的精神去从事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即使看来是平凡的工作。

你使我又一次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不仅是用地位、名声（更不必说金钱）来衡量的。我们需要叱咤风云的英雄，需要名震一时的智者……而我們也需要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作出奉献的人——他们奉献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心血，甚至生命，如你。他们的生命也闪耀着光辉，如你。

我也到了你在僻远山林中的古老的居屋，在你的遗像前站了很久。人已远去，我不知道你的骨灰埋葬在哪里。你的同事们、学生们都含着眼泪讲述你。当学校为你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时，附近的山民们放下手中的活计，成群结队自发地来为你送行。那么，你的圣洁的墓地就在他们的心头，也在许多知道你的事迹因而崇敬你的人的心头。 1994年5月

记荻帆

荻帆在送给我的他的两本诗选集（《布谷鸟和紫丁香》和《邹荻帆抒情

诗选》)的扉页上,分别写了两句话:“这里面有我们友谊的回顾。”“它将唤起你青春的回忆”。当我翻读这两本诗集时,的确感到了亲切和温暖,回想起许多往事。1940年,我在重庆南岸一所中学读书。放暑假了,无家可归,生活成了问题。老朋友朱文尧告诉我,田一文和邹荻帆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镇上租了一间小屋,可以去找他们。田一文是我在武汉的老熟人。邹荻帆则不认识,但知道他是一位有名气的诗人。当时我正在诗坛上起步不久,能够结识他当然是很高兴的。复旦大学在北碚。我身上的钱不够买一张从重庆到北碚的轮船票,也出于一种浪漫的情绪,我决心沿着嘉陵江步行去。顶着烈日,太热了就跳到江中游游水,当天走了六十里,到了土碛镇,已经疲累不堪。还剩下三十里,我不能继续走了。

我在搬迁到土碛的求精中学找到了一个过去的同学朱朝升(他现在是著名的电影剪辑师),他招待我吃了晚餐,留我在他宿舍里挤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朦朦亮,他送我去搭木船,当天早晨到了北碚,在一间只有两张窄床和一张破桌的小小的土屋里,找到了田一文。

还有一个穿着已经泛白的黑衬衫的青年正埋头在破桌前写什么,我猜到那就是邹荻帆。田一文为我们作了介绍。邹荻帆走过来和我热情地握手。当他得知我还空着肚子时,立刻邀我到一家小店去吃油条、豆浆,掏空了他身上所有的钱。

我们一见面就熟悉了起来,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我就在他们的小土屋里用木板搭地铺。伙食则是在复旦大学的食堂里顶着暑假离校的同学的名额混饭吃。当时我们是那样穷困,而那又是怎样令人难忘的快乐的日子啊。

一些爱好文学的复旦大学的学生常来找荻帆、一文谈天,渐渐熟悉了起来。在那间小土屋里的小油灯的晕黄的微光下,举行过一次小型的诗歌朗诵会。十多个人将那间小房挤得满满的。荻帆用他那带着浓重天门腔的普通话(他一生都没有能改变他的乡音),朗诵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会者中间有几位女同学,其中有一位使荻帆倾心,后来终于成了他终身的伴侣。我、荻帆和他的女友“小丝”常常在一起,在大石桥上,在通向北温泉的一片桑树林中,在嘉陵江边,我们谈诗、谈生活、谈自己的经历、谈理想……。荻帆高兴起来就在石阶上大跳自编的黑人舞,我有时就高唱自编的“骑士歌”。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些美丽的时光。

抗战前,我在当时著名的刊物《文学》和《中流》上,就读到过他的诗。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由于知道他也是湖北人,所以另有一番感情。我特别喜欢他抗战初期发表在《七月》创刊号上的一首小诗《江边》,充溢在那里面对祖国深挚的感情使我感动。我认识他时,巴金先生已为他出版了三本诗集:《在天门》、《木厂》、《尘土集》,同时还有不少诗作在报刊上发表,是当时很活跃的青年诗人之一。《在天门》和《木厂》由于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一出版就受到反动派的查禁。他家乡的黑帮人物还扬言,他再返回天门就要打断他的腿。抗战开始后不久,他就参加了以臧克家为首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出入于烽火战地。后来又转到金山、王莹领导的第二演剧队。他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青年,我简直怀疑他的天门腔的普通话,观众怎么能够听得懂。不过,他人概更多扮演的是日本鬼子和群众甲乙之类,那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1940年,他辗转来到了重庆,想奔赴延安,和我多次商量过这个问题,也找过一些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没有能够如愿。为了找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他考进了复旦

大学。

东北籍的诗人姚奔原就在复旦大学念书，冀沅、绿原、冯白鲁后来也先后进了这所学校。我则在这所大学当过几个月的小职员，被迫离开后，又在北碚一家小剧团里当过一阵子演员。这群年轻人都是流亡的学生，主要的收入就是靠一点微薄的稿费，但穷困丝毫没有损害他们欢乐的心情。他们经常相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们也常严肃地谈论时局，热烈地讨论诗。他们对诗的追求是在对理想的追求的光照下面。他们渴望有一片自己的园地，这样就靠募捐的方式筹集到了极少数一点经费，创办了《诗垦地》丛刊。后来，靳以先生又在他编的《文群》副刊上为《诗垦地》定期出专页。

《诗垦地》当然是以荻帆为核心的，因为他的年纪较长，而且在诗坛上是已有一定影响的。但每一期以致每一篇稿件，都通过了大家七嘴八舌的、有时是面红耳赤的争论，荻帆并不滥用他作为主编的权威，而是以他亲切、公正的态度和他的美学眼光来说服众人的。他也非常注意发现和团结更多的作者。这就使《诗垦地》不止是一个同人性质的刊物，而且扩大了队伍。《诗垦地》的创刊是在皖南事变后不久，进步文艺受到极大的摧残，由于它的政治倾向，也由于它具有一定的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所以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可惜只出了六期，就被迫停刊了。1943年的春天，我在重庆已无法立足，不得不远走贵州，在一个荒凉的小城中生活了一段时期。临行前，几个熟识的朋友都有诗送我，在《诗垦地》上出了一个专辑。荻帆写的是《给C·T》。在最后一段，他写道：……

这边

将有旌旗举起

将有时代的声音澎湃

你将卷土重来

后来我的确又“卷土重去”了重庆，我与荻帆又长谈过几次。当时，他已不复有几年前的那种单纯的欢乐的心情，严峻的现实使他更加成熟了。他说我们都应该踏踏实实地生活，认真做一点事。不久，他就去了成都。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先后回到武汉，这才才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当时荃麟和他的夫人葛琴，肩负着党的使命，在武汉开辟工作。荻帆常邀我去看望他们，1946年的10月19日晚上，在荻帆工作单位的地下室里，秘密地进行了一个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到会的人数不多，大都是可信任的文艺青年，而会议的气氛严肃，荃麟和荻帆都讲了话。在武汉，以荻帆为核心，又先后创办了《北辰诗丛》第一辑《沙漠的喧哗》和《荆棘文丛》第一辑《大江日夜流》。团结了不少本地的进步作者，并在荒凉的武汉文艺界吹起了一阵清新的风，这两个丛刊都只出了一期，就被反动派查禁了。

1948年的春天，荻帆被迫离开武汉，到了香港。从他来信中，知道他一直在为生计奔波。后来在一家飞机修理厂做工，生活才比较安定，然而工作是够繁重的。但他一直没有放下他的笔。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自费印的诗集《恶梦备忘录》，都是时事讽刺诗。同时我也在报刊上读到了不少他抨击反动派黑暗的统治，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诗。

我和他再次见面，已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了。他在外事部门，工作异常繁忙。他说，现在应该认真写一点东西了。但我也感到了他在写作中的某种苦闷的心情。他觉得应该唱出这个时代的壮丽的歌。

1953年，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我们几个老朋友又得以聚会了。

那与当年我们在北碚时相聚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这是我们所向往的新的中国。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工作岗位。而且，我们已都不复年轻了。但是，没有想到，在两年以后，我们都在一阵突起的巨大的波涛中沉没，彼此都失去了联系。只有荻帆，在经过了一年多单独隔离反省后，侥幸地得以恢复了工作的权利。我注意收辑阅读他的作品，但无法写信给他，不了解他的具体的情况。1962年的夏天，意外地，他出现在我面前。原来，他是陪外宾来武汉，打听到我的住所，抽空来看我的，并约我一道到了两处公开的场合。在我当时的处境下，他这样做是容易惹是非的，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他一如既往那样亲切地对待我，只简单地问了问我这几年的生活状况，要我乘机多读一点书，也不要放下笔。他回北京后，又寄来了他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大风歌》。几年以后，就是那一场搅乱了全国的“大革命”。我在“牛棚”中，几次有人来向我调查他的材料。从外调者的严厉的态度和偶而吐露出的几句话中，我知道荻帆的日子也不好过……阳光终于又照到祖国大地，1979年9月，我到北京去。这是我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又到北京。在荻帆家中，几个老朋友又得以聚在一起了。荻帆拿出了即将发表在《诗刊》上的我的几首诗的清样，那是他不久前来信要我寄他的。我拿着那一份清样，有着比几十年前第一次发表作品时更激动的心情，那是在艰难的岁月中唱给自己听的歌，决没有想到会有发表的可能的。而且，当时我的问题还没有处理，现在却将以一个“人”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

那以后不久，荻帆在一封来信中告诉我，他刚发表的一首长诗中，有我的影子。我将那首诗找来看了，那写的是另一个形象，但我深感到他的友情。后来我又读到他的三首《致诗友》的诗，是分别写给冀沔、绿原和我的。给我的那一首的题目是《拒绝》，那后两段是：想江边不复是那样月色，思念之树常青——

你还是那少年的影子？

我知道波浪已卷上你的头额，浪花已溅上你的发丝。

但是波浪并没有吞没你，胜利者的笑是把悲哀拒绝于门槛外，江水有情，明月有意，为我们歌难忘的真理之曲！

这里有怀念，也有期望。这几年来，每次见面时，荻帆总是劝我少搞一些杂务，多写一点东西，他总是以亲切的，有时是轻描淡写的语气谈的，唯恐伤害了我。我不仅感觉到故人的殷殷之情，也感到那含蓄的责备的份量。他本人的表现就是对我的最有力的批评。他一直担任着具体的工作（前年一场大病后才离休），写作都是业余进行的，他每天四时就起床写作。这十年来，大江南北，戈壁大海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歌声。他随身总是带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听到的、看到的和想到的，随时都记下来。这十年，也就是他进入老年以后，是他发表作品最多的时期。

两年多以前，我得到他患心脏病的消息。这使我很难过。几封从北京的来信都说他的情况不佳。1984年12月，我去北京开作协四次代表会。与会的许多朋友都想去看他，但唯恐有碍他的健康，被辞谢了。只有几个老朋友在1985年的元旦到他家又一次聚会。我们约好不在他面前谈他的病，只稍坐一会就出来。但荻帆不让我们走。他已过了危险期，只是还很虚弱，脸瘦削，说话的声音极其低微。我们要他到隔壁房去休息，他坚持要坐在那里听我们谈话，并提出要和我们一道照相，说是：“再……再留一个纪念吧……”。

但奇迹的是，他几个月后就恢复了健康，到武汉参加了“黄鹤楼笔会”。日程安排得很紧，他还是黎明即起，埋头疾书，创作了许多作品，而且，他不听劝阻，不让人搀扶，去攀爬峭壁陡坡。那以后，他又多次在外奔跑。由于已经离休，他的写作时间更充裕了。除了写诗以外，他有一长篇小说已经完成了初稿。而今年，他已年届七十了。

荻帆是我青年时代的友人，是我的兄长，在诗歌道路上，有好长一段时期是他携着我的手帮助我前进的。当我回顾这几十年来生活时，都会想到他，感觉到他友情的温暖。我没有敢展开我的记述，那将会太长了。但我还必须提到一点，就是他为人的朴质和真诚，他在大城市里生活了很久，又多次出国访问，但他的身上始终有着乡土的气息。不仅对老朋友，就是对一般的熟人，对年轻者，他都热情诚恳地相待。凡是接近过他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1987年5月27日

平凡、寂寞与富有

——桂向明印象

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用他的心血灌溉着祖国的花朵。他的头发渐渐斑白了。在一个偏僻的小县中，几十年来，踏着同一条小路，从家里走向学校。

而他也在祖国的大地上遨游：黄山、鼓浪屿、绍兴……都留下他的足迹。他面对高山、大河、大海沉思默想。一口浪井，一块鹅卵石，一头从大漠来的骆驼……，也带给他多少情思。而他也在艺术的世界里遨游。罗丹的《思想者》，梵高的太阳，做了一个长长的泥土的梦的维纳斯……，都使他沉醉。他膜拜美，赞美自古以来美的寻求者和创造者。

而他也在人生的大海里遨游。他仰望那些以生命作火炬的先行者；他呼唤志同道合的伙伴；他悼念在奋击中倒下去的战友。他思考着生命的意义，人的价值。

他是如此平凡。一个偏僻的县城中的普通的老师，而那是一种高境界的平凡。

他是如此寂寞。深夜中，一盏孤灯对着一头白发。而那是由于永不遏止的渴望和追求而来的寂寞。

因而，他又是如此富有。他的心与历史，与大地相联。他在精神上拥抱一切，并使一切被他拥抱的都放出诗的光彩。1987年6月30日

布克和雪虎

这是两只狗，出现在杰克·伦敦的两部中篇小说中。《荒野的呼唤》描写的是家犬布克怎样通过各种遭遇逐步地变成了一只狼——它原来就是狼的后代。而另一部小说《雪虎》则描写一只狼怎样通过各种遭遇变成了一只家犬。

两个相反的题材，却同样令人惊心动魄。描写的是狼和狗，作者对它们的习性、生活是那样熟悉，而且对它们的性格、它们的内心世界刻划得那样细致入微，真实可信，一如描写人（作者正是以“他”和“她”，而不是以“它”来称谓他的主角的），正由于这样，而不是由于故事和情节的新奇，才紧紧地吸引和深深地感动了读者。

作为人，我们当然喜欢一只驯服的、忠实的狗，所以在小说中“雪虎”被称为“福狼”，为司各脱法官全家宠爱地接受了。但作为人，对于“雪虎”在棍棒的法则下和一点爱抚的熏陶中，不知不觉地变成一只奴才似的，而且甘于奴才地位的狗，又感到愤懑和悲哀。

我同情常常倾听着荒野的呼唤而终于奔向自由的“布克”——那恢复了野性的狼。我似乎听到它和伙伴们在大森林中疾奔的步伐声，和它在黑夜中发出的长长的嚎啸……

1974年

“作为一个人！”

这是一个朋友向我说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我被关在A市国民党的监狱里。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比我晚一些也被送了进来。从他的谈话和表现中，可以判断他大概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肯定是牵联到一个重大的案件中，经常被提去审讯，而且往往是遍体鳞伤地回监。

后来，对他的审讯渐渐减少，以致完全终止了。他的伤势还没有完全养好，躺在一个角落里，常常低声地唱着歌，有时还说两句带有幽默情趣的话。看来，他是坚强、乐观的。

一个晚上，秘密地传来了消息：他将在次日清晨和另外两个同志一道被处决。

同号子的难友们都在沉重的心情中默无一言。他也知道了自己的命运。突然，在寂静中，他低声地说了：“我多么想活下去！……”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不知道他还会说些什么。

接着，他说：

“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没有别的选择！”

第二天的黎明，他在难友们的悲愤的歌声中被带走了。后来，我常常想到这个青年。当我遇到艰难、危险，因而犹豫、彷徨，考虑着怎么办的时刻，常常想到他最后的那句话：“作为一个人！……”

我宁愿……

杰克·伦敦在他生命的晚年为自己修建了一所住宅。

耗费了好几年的精力和全部的财产，克服了层出不穷的困难，大厦终于修好了。而就在落成的那天晚上，一个对他心怀嫉妒的人放了一把火……惊惶、痛心、焦急的杰克·伦敦久久地望着在烈火中的大楼。

他喃喃地说：

“我宁愿是这被烧毁的房子的主人，而不愿做那个放火烧房的人！”

是的，常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况：宁愿是一个无辜的被损害者，而不愿做那带着私心损害人的人！

激 励

我和妻子到有名的风景区张家界旅游。平地的景点都游过了，那一天要攀登黄石寨，它在一座高山上。

上山的路铺有石阶，并不难走。山脚排列着几十乘用藤椅绑成的轿子。轿夫们拥挤上来要我们乘轿。我们谢绝了，觉得那样会减少旅游的情趣。慢慢向上爬着，开始还悠悠闲闲，渐渐就感到吃力了。有几处相当险峭，攀爬十分费劲。在可以清楚地望到山顶的一个长长的陡坡前，我浑身酸软地坐在一块岩石上，感到休息是这样幸福。抬头望望，真怀疑自己还有没有力量爬上去。

几位操着河南口音的妇女从下面爬上来了，气喘吁吁。她们在我身边歇住，仰头望着陡坡叫苦。其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胖胖的妇女大声嚷着：“我的妈！还有这么高呀！真要命。”她注意到了我，笑着打听我的年龄。得到答复后，她怔了一下。回头大声对同伴说：“连这位老先生都敢上去，我们要打退堂鼓就真该跳崖了！走！”她转过身大步走向陡坡，同伴们跟着她。

我微笑着看她。暗地高兴能以身作则给人一点激励。

我立即站了起来，和妻子一起也向陡坡走了过去。——她的赞许也给予了我以激励。

看杂技

我是杂技的忠实的观众。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杂技表演只有在失手时才能吸引他。这是一句

含意丰富的话。说此话的人必然曾经沧海，难以轻易动情。

我现在远比说此话时的纪伯伦要年长，生活也颇多波澜。但好的杂技表演总能吸引我，使我喜悦、惊叹、激动。当杂技演员失手时（这是难免的），我感同身受地分担着他的痛苦，为他不安。而当他终于成功后，我更为热烈地为他鼓掌、欢呼。少年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我理解纪伯伦的心情。

而我乐于享有自己的心情。

——当然，这不仅是指看杂技。

关于老年的文章和诗，古今中外都不少，其中不乏精辟和富于哲理之作。最近我常常想

起的是一首小诗和两句话。诗是惠特曼的《给老年》。原诗就只有一句：“从你，我看到了那在入海处逐渐宏伟地扩大并展开的河口。”

一句话是冰心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的，不知原作者是谁，“要有更多的云霞造就一个美丽的黄昏”。

还有一句话是泰戈尔说的：“我和每一个相交的人都是同龄的”。

惠特曼的诗将老年提高到一个宏伟阔大的境界，几十年来的奔波，所经历的风雨、坎坷、磨练，所积累的经验 and 智慧……，生命的河流终于奔向了生命的大海。还很少有人是以这样庄严，健旺的心情去描绘老年的。冰心引用的那句话是一声向所有老人们的呼唤；对每一个老人自己来说，则是自我要求和自我鼓舞：要用自己的努力，要用自己的余年，去完成生命的灿烂的画幅。泰戈尔的那句话表达了老人宽阔、博爱、永远保持纯真的心，他和每一个与他相交的人都没有距离，没有隔阂，而且能从对方汲取力量、欢乐，即使那是远比自己年轻的人，甚至是一个儿童。他因而永远年轻。

黑夜的眼泪

年轻的时候，我大都是在夜间写作。渐渐进入老境以后，熬一次夜几天精神都难以恢复，就不得不改掉了这个习惯。

前几天，为了赶写一篇急用的稿子，又一次在夜间伏案，停下笔来，已是夜半两点多钟，心情还在一种亢奋状态，不想上床，就又点了一支烟，去站在窗前眺望，深蓝的夜空中，闪烁着稀疏的星星。大地上是参差的大楼的剪影，只有少数的窗口亮着寂寞的灯光。在沉沉的夜色中，在两排乳白色的路灯照耀下，没有车流和人群，一直通向隐蔽的远方的马路，显得陌生而神秘。受到周围气氛的感染，我的心渐渐沉静了下来，而且达到了一种明彻的状态。在白天，我虽然有时也沉思，却难以达到这种状态。我似乎独自站

在地球的中央。

没有名利的骚扰，没有得失的顾虑，想着一些事，认真地审视自己，并审视这个世界。

是谁说过：“不曾在黑夜里哭泣的人就不懂得人生”。我少年时也曾在黑夜里哭泣过，因为痛苦，因为忏悔，因为思念，也因为渴求和欢乐。是的，我就在这中间体会着人生，思考着人生，这是有助于我的成长的。而此刻，我的眼睛又渐渐潮润了。这是一个老人的眼泪，其中饱含世事的沧桑，但也映照着渴求和希望。

而无论是少年时纯真的泪还是老年时沧桑的泪，都洗涤着我的灵魂……

胡子与微笑

今年8月，在艾青作品国际讨论会期间，诗人邹荻帆邀请了上十位与会的朋友在他家小聚。一位南斯拉夫诗人笑着问我：“你不记得我了吗？”我仔细地端详了他，最后还是带着歉意地摇了摇头。

“我是彼德洛夫”，他说，“那年你到南斯拉夫，我曾接待过你的”。

呵，记起来了。1984年我和流沙河到南斯拉夫参加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在返国的头一天晚上，在贝尔格莱德，曾应邀到他家作客。他当时是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主席。那天在座的还有那一届诗歌节金环获得者印度诗人阿盖，和好几位南斯拉夫文学艺术界的朋友。

在他那富有艺术风味的宽大的阁楼上，喝着酒，谈谈笑笑，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主人的热情和豪爽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怎么竟没有认出他呢？“我剃掉了胡子，所以你难以认出我了”。是的，当年他是留着大胡子的。他接着说：“你也显老了些。但我记得你的微笑。我喜欢你的微笑，我从你的微笑认出了你，我的胡子可以刮去，你脸上的微笑却是刮不去的。”我又一次微笑——不，大笑着拥抱了他。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祝福和赞美呢？岁月流逝，风风雨雨，脸上的微笑却是刮不去的。

两本书名

一位朋友曾对我谈到一位德国作家，说他是很有名气的。

但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却记住了他的两本书名：《门渐渐地开了》

《永远不会过去的过去》——两者都给人丰富的想象，前者是动态的，门打开后将显现的是什么呢？一种惊疑地等候或一种惊喜的期盼。而后者引起的是难忘的回忆：它或是一次邂逅，或是一次冒险，或是决定一生命运的转折，或是一道刻在心上的血痕……；它或是个人的，也可以是民族的。那

些是不能忘却的，而又形成一种力量、负担或心态，影响到今天，并联结到将来……。

少年时的读物

少年时期，我珍藏有黎烈文翻译的两本法国小说：一是洛蒂的《冰岛渔夫》，一是儒勒·列那尔的《红萝卜须》。前几年，《冰岛渔夫》重印出版了，我买到了一册。最近，一位朋友又送了我一本新版的《胡萝卜须》，但译者不是黎烈文而是徐知免，书名改译为《胡萝卜须》。黎烈文的译本附有大量生动幽默的插图，这一本却没有，但我还是很高兴，将它和《冰岛渔夫》放在一起。

这两本书都写得不坏。我是从《冰岛渔夫》开始认识海的性格和海的魅力的，从而引起了对海的向往。而《胡萝卜须》，我记得在黎烈文的译者前言中介绍，正像阿Q在中国一样，书中所描写的那个被称作“胡萝卜须”的小孩，在法国也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受到父母的歧视，受到哥哥和姐姐的欺侮，引起我深厚的同情。

而我现在还很喜欢这两本书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当我重读少年时所热爱的读物时，总会引起一些遥远的温暖的回忆，而且我也想比较一下少年时和老年时读同一本书时的心情。相隔五十多年了，其间多少风雨，多少坎坷，多少江水已经流逝，但一颗布满创痕的心和一颗纯真的心，却被同一本书激起了同样的波澜，两颗心似乎重叠了起来，似乎岁月在这中间停止了流逝……

热爱生命

怀着沉重的心情到医院去看望一位病重的朋友。我们相交多年，都已进入老年。常常收到一些共同熟人的讣告，感叹之余，有时就不免谈论到“死”，接触到一些哲学家的看法和一些名人泰然面对死神的例子。这位朋友说：顺其自然，也就是征服了死亡，从而得到了自由。

现在，在病房中，他的态度是安详的，平静地谈到自己的病情，自知不起，他说：“那一天终于要来到了”。我说不出任何宽慰的话，而且，我知道那也是不必要的。沉默了一会后，他喃喃地说：“说真的，我无力做到那样超然，我还是有所挂牵，有所眷恋，我还有一些事要做，我还想看看世界……”一滴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沉重地滴到了我的心上。它照亮了他的心，或者说，我的心。我们终究是平平凡凡的人，对生命的热爱压倒了他理智中的哲学的思考。

